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康庄大道和羊肠小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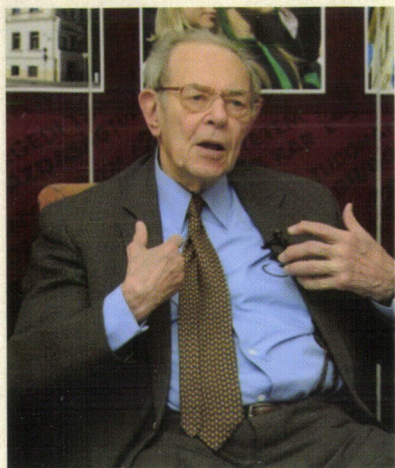
改革与后共产主义转型研究



[匈牙利] 雅诺什·科尔奈◇著 朱桂兰◇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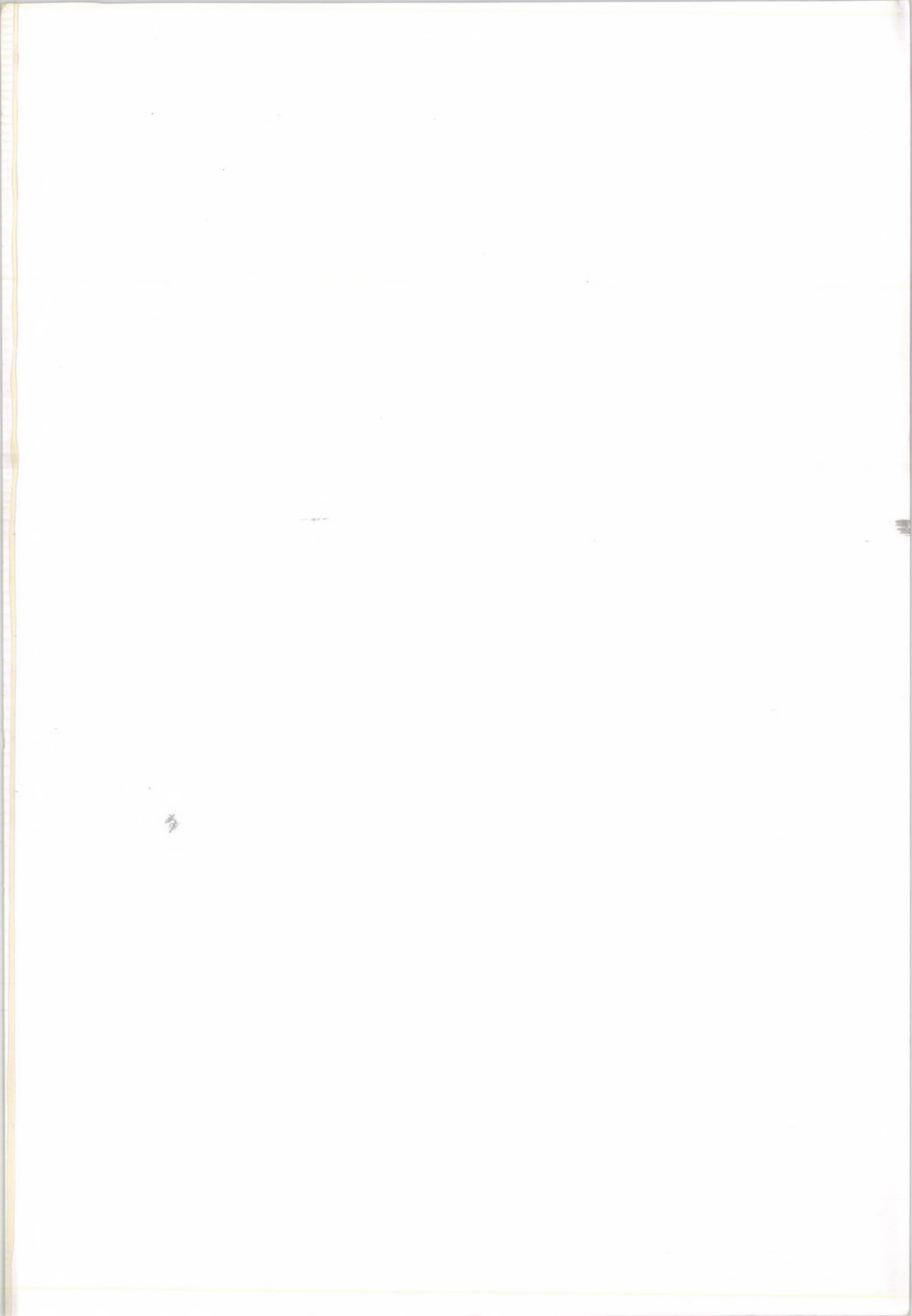
Highway and Byways:
Studies on Reform and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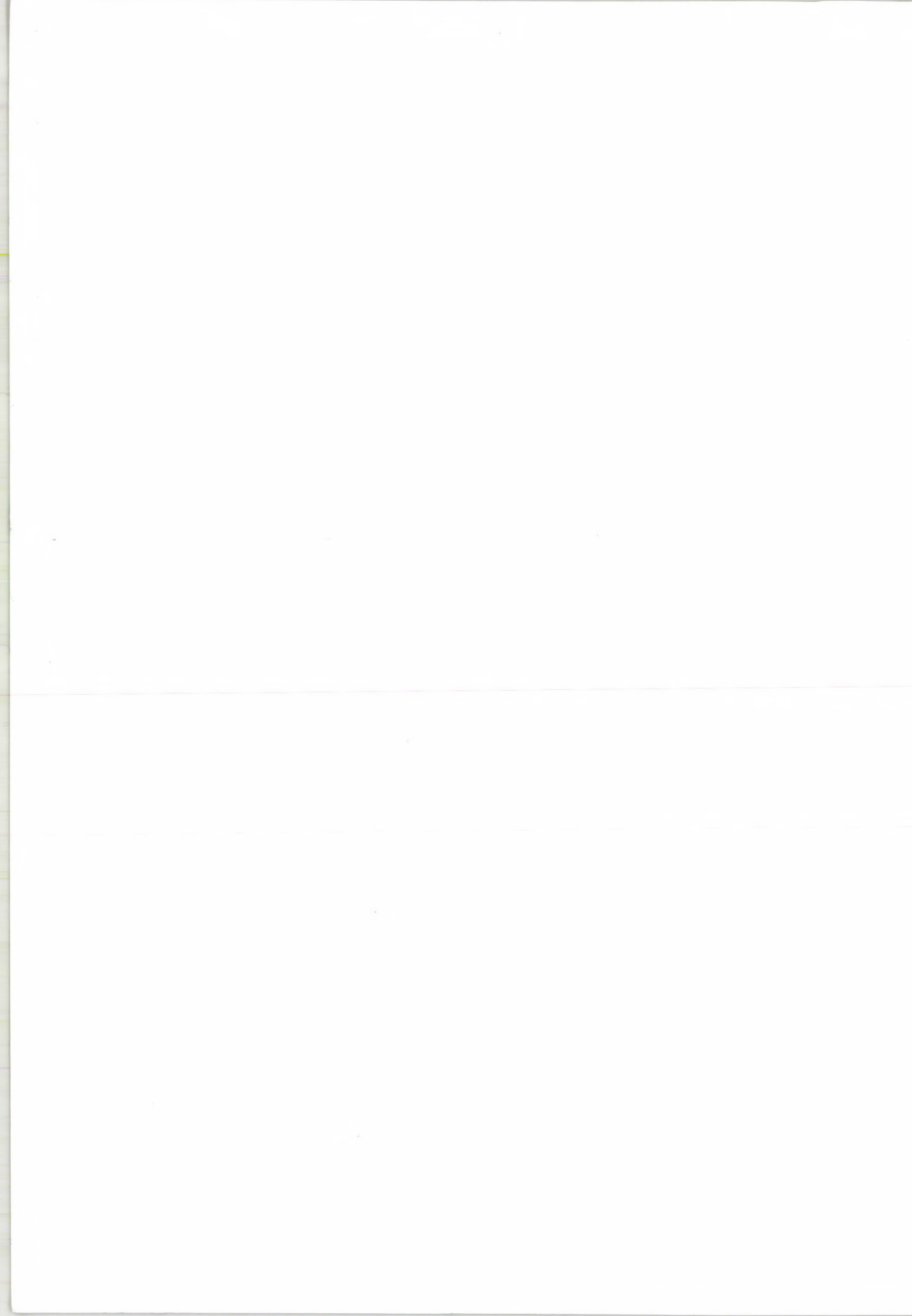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1928年1月21日—），匈牙利经济学家，匈牙利科学院院士，瑞典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退休教授。曾任匈牙利科学院计算中心部主任，世界计量学会理事和会长，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等。以对东欧共产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批评和分析著称，他的《短缺经济学》等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知识界有很大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康庄大道和羊肠小路

改革与后共产主义转型研究



[匈牙利] 雅诺什·科尔奈◇著 朱桂兰◇译

Highway and Byways:
Studies on Reform and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 - 2015 - 133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庄大道和羊肠小路:改革与后共产主义转型研究/(匈)科尔奈著;朱桂兰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

(社会发展译丛)

书名原文:Highway and Byways: Studies on Reform and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ISBN 978 - 7 - 5161 - 6266 - 8

I. ①康… II. ①科…②朱 III. ①共产主义—研究 IV. ①D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3799号

©MIT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 2015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享有本书中国大陆地区简体中文版专有权,该权利受法律保护。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茵
特约编辑 喻苗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4.75
插页 2
字数 251千字
定价 55.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社会发展译丛》编委会

主 编 李汉林 赵剑英 渠敬东
副 主 编 张 彦 王 茵
编 委 折晓叶 刘白驹 沈 红
葛道顺 高 勇 钟宏武

《社会发展译丛》编辑部

主 任 王 茵
成 员 夏 侠 喻 苗 李海莹
孙 萍 马 明

总 序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发展始终是解决国计民生的硬道理。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生了急剧变革，发展创新所带来的经验需要积累，需要科学总结，以使理论与实践结合，促进中国改革事业的进一步深化，回应对改革的种种质疑，解决发展中暴露出来的各项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身处全球化时代，如何总结自身的经验，吸收国际发展的成熟理论、先进观念，融合到中国自身的文化之中，拓展中国经验的理论意涵，业已成为中国学界应担当的责任，也是新时期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题中之义。

到目前为止，国内有关社会发展的系统性研究仍比较缺乏，尚未有以社会发展为主题编纂的专业丛书。一方面，关于社会发展的经典理论、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经验，其引进和介绍尚处于零散和片面的状态，这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极不相符，也远远落后于国际学术更新脚步；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经验亦需要与外国相互参照、相互借鉴和扬弃，而有关国际发展比较研究的领域尚未得到拓展。

本丛书的宗旨在于系统出版国外有关社会发展的理论、经验、战略、模式的著作，同时发扬经世致用的传统，研究社会发展的机制、动力，以及相应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条件等结构性要素，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中观层次出发，从发展理论与方法、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发展经验四大主题出发，来完整呈现社会发展中的理论范式和关键议题。

我们衷心地期望，这套译丛的出版能够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学科，以及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伟大事业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努力。

是为序。

《社会发展译丛》编委会

2015年5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市场社会主义回顾	(1)
第二章 所有制形式和协调机制之间的亲和力	(27)
第三章 苏联的自由经济之路：旁观者的评论	(44)
第四章 东欧市场化的本质	(61)
第五章 后社会主义转型与国家：基于匈牙利财政问题的反思	(83)
第六章 后社会主义体制的财政纪律演变	(108)
第七章 转型后退：匈牙利发展模式的一般现象	(125)
第八章 后社会主义转型：综合性观察	(163)
附录 研究前因和第一版出处	(178)
参考文献	(181)
关键词索引	(199)
人名索引	(215)

前 言

我从最近四年的写作中，选录八篇文章，编著成这本书。虽然每篇文章在阅读和理解时是相对独立的，但它们之间有一根主线连接彼此。每一篇文章的主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关键问题：匈牙利和其他保持社会主义体制的整个东欧地区是如何寻求新的发展之路。^①

“第一条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首先被之前的沙皇帝国人民舍弃掉，其次被在共产主义政党管制中的人民所抛弃。这些国家和人民倾向于寻找一条新路，即“第二条路”，发展社会主义体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初始的疯狂经济增长率开始缓慢下来，相比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发展、创新、产品质量和人们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遇到了瓶颈。

本书中第一章和第二章讨论了改革的过程，即寻求新的发展之路的起始阶段。是否有一座新的、更加舒适的、迷人的大厦，可以建立在旧的、不可变动的根基上？社会主义改革倡议者们希望他们可以构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一条不同于并且优于资本主义模式和经典社会主义模式的社会秩序。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改革是要引领社会在第一条路（资本主义）和第二条路（斯大林主义、经典社会主义）之外，寻求一条新的道路即第三条路，并大步向前发展。社会主义改革倡议者们认为，新的道路不会引导社会改变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第三条路是一条自成一格的发展之路，它可能会取得永久性的社会发展。（viii）

这并不是说改革过程没有有利的成果。一些变化开始将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国家区分开来。在经济上，经理们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他们开始学习市场经济预期和行为模式。如果只是从一个狭窄领域的角度来看，融合正式

^① 请参阅匈牙利版本的书，《寻求之路》（*Utikeresés*）。

和非正式私营部门的混合经济形式已经出现。但是，改革除了为人们日常生活带来明显的小变化之外，在世界史方面，正如它显示出来的那样，改革的主要影响是那些微小元素的力量削弱了社会主义体制。社会主义改革尝试结合既相互陌生又互不兼容的元素。一方面，既包含“民主主义”，又可以维持共产党作为唯一规则制定者；另一方面，既有市场运作，同时又保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简单来说，改革背后的想法是尝试融合水与火。取代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是一个不连贯的改革社会主义体制，而这其中充满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紧张关系。

本书的第二部分探讨了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第三章，作为这一部分的第一篇文章，对改革和革命之间的区别进行了简单但深入的讨论。我认为，改革和革命的区分标准不是变化的速度，更不是社会和平或社会暴乱，而是转型的深度和激进的程度。只要用行政手段保护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处于垄断地位，人们谈论最多的也只是现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当政治架构中的一些基本功能发生深刻变革时，才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一些领域，匈牙利的变化可认为是一个**持续和渐进**的过程：提出私有财产和基于自由价格的市场机制，调节宏观经济形势，并引入立法。这让匈牙利社会折回第一条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①

下列幻想将会是个错误：这条发展道路（第三条路），作为一条高速公路，显而且必然是从改革出发点到唯一可想而知的改革最终点之间的最短可行路线。让我们先从改革**目的地**谈起，正如社会主义体制实际上类似于一个**家族**系统，虽然它的成员们在很多特性上都不同于彼此，但它们都共享着一些主要特征。这样讲来，资本主义体制也类似于一个家族系统。历史学家一定会看到，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不可重复的构造特性，使其发展到现在的样子，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是由独一无二和不可复制的因素构成。即使使用归纳和高度抽象的方法有些欠妥，但是这种方法可以将多样化的资本主义（x）模式区分开来。在这里，为清楚起见，我们先用“**地域**”作为标签来做分类：第一类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其特征是高度的个人主义和国家（政府）有限的角色；第二类是北欧的福利资本主义，其特征是广泛的收入再分配；第三类是日本的资本主义，其特征是强大的国家干预，银行资本和大规模产

^① 如果继续同样的比喻，虽然改革发起人期望这一实验遵循着一条独立于第一条路的第三条路，但是最终的办法还是回到第一条路。改革有利于奠定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根基。

业资本之间的相互渗透，等等。那么，我们应该遵循哪一个模式呢？又或者哪些模式可以结合起来，值得我们去追求？又或者通过发展一些其他地方还没有出现过的特征模式？

让我们假设，至少一些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执政党和政府，他们现在很清楚改革目的。即使这样，仍然没有任何地图可以显示一条通向目的地的道路和具体的路线。从飞船的高度，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条路”似乎是一条广阔的独径。从直升机的高度，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条路充满了无数或大或小的主路和辅路，曲折的路径，攀登和陡峭的斜坡。这在英语习语中被称为：**康庄大道和羊肠小路**。^①但问题是，如何到达目的地？以什么样的速度？成本多大？有多少牺牲者？谁是赢家？而谁又是输家？每一个交叉路口都面临着选择的问题。因此，尽管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可这一“主要方向”，前方还有无数的难题。

本书中第二部分的所有研究都讨论了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即将面临的十字路口。^②第三章提出转型的政策建议。第八篇，也是最后一篇文章额外地对事实进行了正面性描述和预测。从第四章到第七章，这四篇文章融合了实证研究和规范性分析。我尽力在基于事实的实证分析和基于价值的规范性分析之间，让读者始终保持清醒。

《通往自由经济之路》这本书中，出现“路”的比喻。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本关于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书。1989年的夏天和秋天，当我写这本书时，认为一些非常严峻的困难是可以预测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决定要提出怎样的措施来解决这些困难时，内心一直很挣扎。我没有犹豫，用“路”这一词语，以“单数”的形式来做那本书的标题。充满快乐和痛苦经历的五年自

^① 瑞士画家保罗·克利 (Paul Klee) 有一幅辉煌的画，描绘出复杂的道路体系，这幅作品的标题是“*Hauptweg und Nebenwege*” (康庄大道和羊肠小路)。当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阿尔伯特·赫希曼 (Albert O. Hirschman) 的著作《走向发展之路的旅程》中再次看到它时，我意识到，这幅美妙的绘画和它的标题，精确地表达了它所蕴含的意义：既有高速公路，又有羊肠小道和各种岔路口，但是，它们最终都一样：一种向上发展的导向。我很感谢阿尔伯特·赫希曼的这一理念。

^②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保持完全积极的态度去审视社会主义体制，并且克制自己不要为领导层提出实际性的政策建议。但是，1989年我撰写了一本充满激情的小册子，*Indulatos rőpirat a gazdasági átmenet ügyében*，《经济转型的起因》(修订版以英文出版，《通向自由经济之路：社会主义体制转型——以匈牙利为例》，纽约，诺顿出版社1990年版)。在那本书里，我总结了一些观点和建议，提供给在1990年自由选举中的议会，以及在议会支持下的合法性政府，这将它们绑到一定的政治条件之下。在本书中，关于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研究中将做进一步的讨论，或者在我觉得有必要进行讨论的部分，用以修正之前书中的一些规范性观点。

此过去。本书的标题反映了“复数”的理念，比起那个时候，现在我更加清晰地欣赏着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转型的话题。同时，正如我之前书的标题所暗示，这本书较为明确地表达出我们面临的选择：**未来的主要道路**。然而，前方仍然有很多后续的开放性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即使隔了五年的时间，我坚持认为匈牙利和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采取“**第一条路**”转型到市场经济，这才是正确的道路，而不是寻求“**第三条路**”作为解决方案。比起之前，现在我对那些没有得到解答的重要问题，有了更好的理解。

我并不同意每一个问题只有一个解决方案的观点。我认为，即使在早期的历史发展中，一系列可选方案逐渐变得越来越少的状况下，总会有多一种选择存在。严格意义上讲，从来都没有唯一的“**必修课**”；相反，政客们主张的只是提前减少他们自身的责任。本书就像我以前的文章，表达并期望推广与之相反的观点和态度：那些拥有决定权的人，无论是众多的议会，还是政府或部长，都需要承担其所包含的全部责任。

即使我在一些文章中提出了政策建议，但它们通常都带有限定条件。政治和社会条件，政策执行的结果，都需要综合考虑。我不认为自己是先知，^(xii)那些先知们具有内在驱动力，可以帮助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内完成应该做的事情。我只是一个研究者，即使当我尝试提出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建议时，也只是个研究者而已。我的研究重点是清晰地表达出每一项政策背后支持和否定的论据，这包含了每项特定政策所附带的代价和风险。我努力找出，特殊情况下，隐蔽的陷阱、缺陷、自相矛盾和恶性循环的地方。同时，分析清楚根据不同价值观作出的选择之间的“**权衡取舍**”。这可以让政治家用全部的自信心保持他们的优势。在社会劳动分工中，科研人员的作用是，分析并阐明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以及每个方案的预期结果，同时，在合适的时候指出困难，提出质疑，指明其中的不确定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中的八篇文章，是与我之前两本集册直接相关的续集：《**矛盾与困境**》、《**愿景和现实、市场和国家——矛盾与困境再访**》。这两本书的标题表达了怀疑的态度：权衡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并反对相互冲突的价值观。这本书的书名，不仅指的是为社会发展寻找一条现实的新路，同时也为我个人的研究生涯寻找新路。第一篇文章，关于市场社会主义，明确指出，跟社会主义改革的困境搏斗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关注的主题，也是我要关注的。这八篇文章也包含了我一直在努力却始终挣扎于过去与现在相冲突的价值观之中。

我坚持学术诚实所以公布了每项研究的原始版本。^①我对几个问题的看法已经有所改变。这既表现在随后的几篇文章中，我用评判性的眼光审视之前的研究，也表现在我以脚注的形式，让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现在的研究和原始版本之间的差异。这样，他们可以了解我观点的变化。^② (xiii)

在这本书中，我并没有比较之前提出的政策建议和那些被执行或者没有被执行的实际措施。因为内容已经写出来，所以让所有的资料都保持在完全的最新状态，或者用最新的论证来加强一个观点，都不太可能。当评论家和读者阅读本书时，可以比较我的预测、政策建议和实际事实，以及评估它们之间的偏差。他们将会看到，某些预测或其他的事项，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对一些危险的预测也得到了证实。然而，其他的一些方面，跟预测大相径庭。一些建议被采纳，而其他的仍然停留在单纯的文字状态。在未来一段时间，当我可以足够远离在1990年至1993年之间发生的事件，并且可以完全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我计划重新审阅之前的预测和建议，并重新阅读之前的作品。

虽然我尝试去传达一个更为普遍的讯息，但是只有第三篇文章没有探讨我所在国家的社会经济转型，它主要探讨了苏联在解体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的变化。一些研究探讨了整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转型，但大部分内容都是直接探讨匈牙利的改革。不仅仅是在这本书中，几乎在我整个学术生涯中，我一直都是而且首先是个匈牙利经济学家；直接经历着自己国家在改革中面临的问题，并尝试帮助我的同胞们，这些总是在首位。我的理论性思考来源于匈牙利的实际经验，以及跟匈牙利智库们一起辩论的结果。同时，正如我在一些国际性会议中的演讲一样，我尝试对匈牙利各个方面进行观察，来找出一些更为普遍的现象。这或许有益于其他国家借鉴和效仿匈牙利改革中的成功部分，当然匈牙利改革中失败的部分也可以予以警告，从而避

① 一般而言，这个标准还要求我转载原始研究而不删减任何部分。如前面提到的，另一个关于再版的观点认为，每一篇或者每一个部分读起来都应该是通俗易懂的；要懂得读者的需求，不管读者是研究人员还是学生，他们可能正巧需要阅读这本书中的一部分，而非整本书。我认为这两个必要条件超过另一个缺点：在同一本书或集册中，一些研究可能会包含一小部分之前已经论述过的观点或内容。当然，也可以有一些办法避免这样的重复，例如，通过一些微小的切口，而不会影响之前的论述，我已经这样做了，用切割符[……]来标示。与规定仍然一致的，原文内容应该没有出现都没有改变，从规范性的角度看，例如，为了确保印刷的统一性，我做了一些编辑上的修改。

② 在随后的章节，我增加了一些后续脚注，用现在的眼光读之前的文章，我认为一些补充说明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避免任何误解。

免出现错误性的转弯。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像匈牙利一样，很多国家都在经历着后社会主义体制转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 (xiv) 我从来没有疑虑，将匈牙利的问题呈现在国际经济学家面前。开放、坦诚、不加修饰地呈现我们的错误，这样才能够提升匈牙利以及它的知识分子们在全世界人眼中的声誉和信誉。这不仅可以让其他人帮助我们一起思考，而且可以协助我们克服困难。我认为，匈牙利籍的研究者们，不仅不能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内，而且在遇到国外研究者时要保持一定的傲气，为本国的事业发展提供服务。在我看来，当他们把自己的研究结论和悬而未决的问题呈现在国际舞台时，匈牙利的研究者们在做正确的事情。他们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专业知识的发展和国际实践经验的运用。这样，他们可以让外国同行们的思维更富有成效，而且拥有跟同胞们一起接受新知识的动力。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年内一直在尝试，比起之前，匈牙利国家的制度变革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国际交流机会。

这本书是开放的：新经验、新问题，层出不穷。关于匈牙利改革的第一套集册——《矛盾与困境》，呈现了一个试管实验，这其中可以看到匈牙利的整个改革。这场在匈牙利和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体内的真实的伟大的实验仍然在持续，即使心理上希望回避，但是我们并不能回避它，因为正在发生的每一个过程都没有历史先例。我想做的，首先是缓解这一实验。尽力减少随着制度的变革和转型所带来的痛苦，并尝试扩大它所带来的益处。

-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在这本书撰写和编辑过程中帮助过我的每一个人。我在每一篇文章中都曾提到每一个研究机构和每一个人对我的帮助，在这里再次
- (xv) 感谢他们的支持。首先，我要感谢在这本书编辑过程中最亲密的伙伴——玛丽亚·科瓦奇 (Mária Kovács)，她一直保持着愉快、兢兢业业和专注的工作态度。另外，我要感谢布赖恩·麦克莱恩 (Brian McLean) 和朱莉安娜·班波 (Julianna Parti)，他们将匈牙利文出色地翻译成英文，并保有文章原意。同时，感谢祖苏撒·丹尼尔 (Zsuzsa Dániel) 和安·弗莱克 (Ann Flack) 在编辑中给予的帮助，感谢卢卡奇·奇伊洛娜 (Ilona Lukács) 编制了索引部分。我很高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合集。最后，要特别感谢迈克尔·西姆斯 (Michael Sims) 和安·索契 (Ann Sochi) 在编辑上的支持。

第一章 市场社会主义回顾^①

(1)

东欧、苏维埃共和国发生的巨大转型和中国发生的改革，在学界引起了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热烈讨论。^② 本章没有覆盖全部的内容和主题。首先，我将界定这一章的主题，并简要介绍研究方法。

1. 初始条件对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在事件发生之前，它从哪里开始？每一个事件均源于不同的初始条件。在这里，有必要分清两个重要的主题：第一，市场社会主义是一个取代资本主义的体系；第二，市场社会主义是一个取代旧体系，即斯大林主义、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或者，在我的研究中曾提到的，“经典社会主义”。^③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探讨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运作。^④ 我并不探讨任何与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下的资本主义改革相关的话题。(2)

当然，这两个话题是重叠的，因为它们都需要详细权衡同样的价值选

① 感谢肯尼斯·J·阿罗 (Kenneth J. Arrow)、祖苏撒·丹尼尔 (Zsuzsa Dániel)、帕塔·达斯古普塔 (Parta Dasgupta)、埃里克·马斯金 (Eric Maskin)、玛丽亚·科瓦奇 (Mária Kovács)、卡拉·克鲁格 (Carla Krüger) 和约翰·M·利特乌克 (John M. Litwack)，对这篇文章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布赖恩·麦克莱恩和朱莉安娜·班波优秀的翻译。

② 在这篇文章交稿时，苏联和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体制国家。文章中所使用的术语是属于那段时期。几乎每一篇以改革为主题的文章和书籍中，在讨论改革的初始阶段时，都会提到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很多写作的重要主题。在这里，挑选出让我深思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文章和书籍的作者们：P. 巴尔坦 (P. Bardhan, 1990)，W. 布鲁斯 (W. Brus) 和 K. 拉斯基 (K. Laski, 1989)，A. 德·雅赛 (A. de Jasay, 1990)，D. 拉沃伊 (D. Lavoie, 1985)，J. 勒-格兰德 (J. Le Grand) 和 S. 埃斯特林 (S. Estrin, 1989)，A. 诺夫 (A. Nove, 1983)，G. E. 施罗德 (G. E. Schroeder, 1988) 和 G. 特姆金 (G. Temkin, 1989)。

③ 我的书，《社会主义体制》(1992)，详细阐明了“经典社会主义”的概念。

④ 对术语做详细的阐述是必要的。在这篇文章中，“社会主义”，正如我在其他文章中的讨论，是指政党支配着实际运作中的社会经济系统。同时，有必要对社会主义思潮的拥护者们澄清是否这一体制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我是在价值中立的基础上界定社会主义的概念。这是一些国家和地区曾经使用或正在使用的名称，而我也不会替他们更改社会主义的名称。

择和相同的工具。但是，在实践结果和规范性政策建议方面，它们各自拥有独特的背景。社会主义改革的框架并不适用于资本主义改革，反之亦然。历史不是摆钟，它不是只有一个方向的摆动，历史的变化永远回不到它的初始状态。忽略历史的本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任何解释都很容易陷入严重的谬误中。

2. 有影响力的思想都遵循着一条长长的路，从理论上的第一次形成到实践中的每一步操作。为了简单起见，在这里区分一下这条道路的三个阶段。

远景：以概要形式呈现的乌托邦思想或标准模式的纯理论。^① E. 巴罗内 (E. Barone, 1935) 开始了这一系列的讨论，接下来奥斯卡·兰格 (Oscar Lange, 1936—1937) 做出了杰出的研究。在 F. M. 泰勒 (F. M. Taylor, 1929) 和 A. P. 莱内尔 (A. P. Lerner, 1946) 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与兰格思想相关的观点。^② 由于其在理论史上的杰出意义，本章的后续部分将对兰格模式做进一步分析。

蓝图：以各种形式呈现，例如，改革派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③ 领导人的政治宣言，或者共产党和政府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决议。

实践：涉及具体的经济发展过程，实际的游戏规则，以及体制中行动者的态度和行为规律。

虽然远景非常重要，它并不是这篇文章探讨的主题。本文的主题是政治史和经济史，不是思想史；所以，主要关注集中在“蓝图”和“实践”。^④

^① 关于远景概念的讨论，请参阅 J. A. 熊彼特 (J. A. Schumpeter, 1954)，R. 海尔布隆纳 (R. Heilbroner, 1990) 和 J. 科尔奈 (J. Kornai, 1986b)。

^② 兰格—泰勒—勒纳模式的形成源于几本重要著作；在这里我想强调，K. J. 阿罗和 L. 赫维茨 (L. Hurwicz, 1960) 的经典著作，E. 马兰沃 (E. Malinvaud, 1967) 和最近的文献，I. 奥图诺—奥尔特 (I. Ortuno-Ortin)、J. E. 勒默尔 (J. E. Roemer) 和 J. 西尔韦斯特雷 (J. Silvestre, 1990)。

^③ 按国家对一些开创性著作做分类。南斯拉夫：B. 克德瑞克 (B. Kidric, 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写的著作，请参阅 1985 年集卷)；匈牙利：戈瑞·彼得 (Gy. Péter, 1954a, 1954b, 1956)，J. 科尔奈 [1957] (J. Kornai, 1959)；波兰：W. 布鲁斯 [1961] (W. Bruce, 1972)；捷克斯洛伐克：O. 希克 (O. Sik, 1966)；苏联：E. G. 利伯曼 [1962] (E. G. Liberman, 1972)；中国：孙冶方 [1958—1961] (Y. Sun, 1982)。

^④ 当哈耶克 (F. A. Hayek, 1935)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与兰格进行的一场著名的学术辩论期间，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正式提出这一问题。他走出纯理论模式的边界，通过提出切实可行的反驳观点，正如这篇文章中的术语一样，从“远景”转到“蓝图”。

虽然我承认乌托邦和纯理论模式是相关的主题，但我想对西方读者们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实际经验不能被忽略，尤其当我们在进行“富有远见”的探讨时，旧观念需要在新证据下重新被思考。

3. 在进行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时，整个国家都会经历这一阶段。1949年南斯拉夫，1953年匈牙利，开始发生面向市场社会主义的变革。与此相比，市场社会主义的某些元素在很久之后才在波兰、苏联、中国和越南出现。这篇文章没有按照国家类别进行讨论。尽管每个国家在推动改革的时间、改革的具体过程和节奏都有明显的差异，我仍旧尝试做出一般性的观察。我总结出一个通用的模式来概括每一个蓝图和实践。蓝图模式的原型由成千上万的政治演说、政党规划、提交给执政者的政策建议，以及政府决议后的方案组成。一些共同的实践做法总结成这一模式，用来描述在国家财政办公室以及国有企业行政总裁办公室发生的事情，和未来经济走向的特征。

这两种模式的原型都是高度抽象的总结。我省略了一些不太重要或者临时性的特征，这主要是用来总结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特征。同时，我忽略国家之间的差异，并专注于它们之间共同的属性。

这篇文章揭示了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带来的多方面问题。第一部分主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做分析；第二部分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政治伦理的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 蓝图和历史实践：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4)

(一) 蓝图

蓝图模式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1) 必须保持共产党的政治支配。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政治自由化；一些政治公开性可能会发展。也就是说，向大众提供的政治信息变得相对可信，同时执政党容许不同的观点，可能对西方国家有更多的开放性。但是，政治体制的本质不允许被改变。

我认为要对两个阶段进行区分：第一阶段是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特征开始出现，但共产党仍然保持政治支配；第二阶段的重点是在政治领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这一点上，体制开始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显然，这一过渡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们在本研究的范围之外。我偶

尔也会提到过渡过程中的问题，但这篇文章的主题是社会主义改革，这跟改革者的名字，南斯拉夫的铁托（Tito），匈牙利的卡达尔（Kádár），波兰的拉科夫斯基（Rakowski）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Gorbachev），联系在一起。

（2）必须保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国家所有制的优势。除了南斯拉夫，其他国家都是如此。南斯拉夫发展的具体特点无法在这里做详细的讨论。下面的讨论是关于国家所有制，但即使如此，这些观察也适用于南斯拉夫的情况。

在历史发展的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也应该是最重要的部分，是正式和非正式私营经济的发展。虽然私营经济所占的比例很小，它的重要作用是开始向大众提供商品，同时引入属于市场经济的财产关系。但是，在实际转型之前，发展私营经济的想法并没有出现在市场社会主义**蓝图**中。蓝图专门规定在国有企业运作前提之下的改革方案。所以，（5）接下来提到市场社会主义专门是指国有部门。

（3）地方政府尤其是企业层面的分散性决策使得中央层决策的相对份额会减少。

类似的观点可以用另一个方式表示：一家国有企业在垂直线上跟它的上级权力部门挂钩，在水平线上跟它的买家和卖家挂钩。在这一蓝图中，纵向关系一直都有，而横向关系需要彻底加强。

（4）公司成功的主要指标是利润。对企业经理的激励应该与利润结合；同时，可以向企业员工介绍利润分配的观念。

（5）中央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和方式有所改变。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使用的主要方式——直接指令，应该让位于间接工具或“**经济杠杆**”。蓝图起草者认为，如果企业的原则是利润最大化，那么它们的行为会受到利率变动、汇率、税收、补贴和具体价格的影响。中央规定的价格和其他金融参数，就像是中央政府在使用木偶戏的拉弦指挥着企业运作。

（6）蓝图模式并没有具体介绍价格的类型。价格是在分权过程中形成的，它反映了市场的实际运转。但是，中央用什么原则来决定价格设置，这其中是否包括了工资、利率和汇率？蓝图中并没有指明价格的设置应该依据市场出清价格。

（7）经济必须保持开放。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引入国际信贷市场，这可以提高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银行和企业进行贷款的

额度。

让我们用最著名的远景模式——兰格模式来做一个简单介绍。这一模式类似于要建立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并拥有高度自治权的国有企业蓝图。同时，使用中央计划价格和财务杠杆来影响企业的决定。但是，兰格模式很显然没有引入市场出清价格。

远景和蓝图之间最重要的差别是蓝图包含了一系列的丰富规则，但纯理论只是将其中重要的因素抽象出来。实践并不是如此，它必须解决每一种选择背后所有的问题。蓝图模式概述了兰格模式忽略的很多体制特征，并概括了一般性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性争论。⁽⁶⁾

这并不是兰格模式或一些学术争论的缺点，对纯理论的知识构建不太能够包含丰富的细节内容。但是，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缺点，如果把理论模式看得太重要，那就是个致命的谬误，可以这么说，太过看重蓝图模式也会是个谬误。^①

实际上，即使是蓝图也没有办法完全描绘出实践的复杂性；蓝图忽视了几个在随后的实践中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些在随后会做详细讨论。

上面总结的七个属性的主要思想是必须创建新的**第三体制**。这跟改革前的经典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不同，也不同于资本主义。^② 它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一个持久和强大的新体制，而不是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

(二) 经济绩效

蓝图模式中的很多特征，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并不适合于上述列表中所有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必须补充的话，历史实践在几个方面跟蓝图模式不同。实践的发展衍生出很多在蓝图模式中没有的特征。在转向具体的陈述之前，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蓝图模式带来的经济绩效。关于这一主题，实证性研究有很多探讨，这些市场经济转型的文章通常是总结前一阶

^① 奥斯卡·兰格 (Oscar Lange) 自己也没有这样的想法。

^② 第三条路的主要思想在戈巴乔夫的话中有很好地体现：“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什么？……一是保持计划管理体制，严格的规划，并用文化和经济的命令。另一个……建议是恢复资本主义。我们可以采取这两种方式吗？不，我们拒绝它们……”（《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

段经济发展成功或失败的特征和原因。^① 这里不作详细的讨论，也不呈现统计资料，我将侧重于强调一些主要的特征。

(7) (1) 经济增长放缓的迹象在改革开始前就已经出现，它成为了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动力之一。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带来最多的是暂时性的经济复苏；但这不会永久性地抑制经济下滑。经济发展到一个点后就会停滞，再往后，生产绝对会收缩，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如果经济在任何行业都有可观的增长，例如，就好像中国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这不是因为它实现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蓝图模型，事实上，这不属于市场社会主义规划的蓝图模型。^②

(2) GDP 的停滞或下降是伴随着实际消费的停滞或下降。再一次需要强调的是，唯一抗衡 GDP 停滞或下降的力量是发展私营经济，这有助于改善商品供应和生活条件。

(3) 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失衡。经典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短缺经济，其特征是扭曲的相对价格但相当稳定的物价总水平。在很多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是伴随着一个新的更复杂的问题：“短缺又通货膨胀”综合征。一个严重的和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不断发展，这成为助长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一些国家，这种状况继续发展成公开型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率被人为压制，也因此产生了巨大的货币过剩。

(4) 生产效率和要素生产率并没有显著改善；同样，在产品质量、创新和技术进步上也没有任何切实明显的改变。

(5) 与资本主义国家共享的国际贸易份额有所增加，但是，在这一方面的经济表现仍然很差。与资本主义市场之间的贸易呈现赤字，外债上升，某些国家甚至快达到破产边缘。

如果蓝图模式是为了建立**第三体制**，那它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比第一种体制——资本主义，更具有经济优势。同样，在跟第二体制——经典

^① 请参阅波兰的研究：D. 利普顿 (D. Lipton) 和 J. 萨克斯 (J. Sachs, 1990 a, 1990b) 和 G. W. 科沃德科 (G. W. Kolodko, 1991)；匈牙利的研究：J. 科尔奈 (J. Kornai, 1986b) 的文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 (OECD, 1991)；苏联的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IBR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BRD) 的报告 (1990)。

^② 对中国改革问题的讨论参见第 16 页脚注^①。在编辑这本书时，添加一些新的脚注，它们被称为“新的注脚”。

社会主义相比较，也没有任何明确的结论。一方面，这样的模式确实有了益处。虽然国有企业没有转变成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的经济单位，市场经济的术语以及一些实际的经济措施，在企业经理人头脑中留下印象。他们学会更多地关注经济指标和买家需求（这使得在巨大政治变革发生之后真正转型到市场经济变得便利）。改善经济形势的真正主导因素是正式和非正式私营经济的发展。也许最重要的是，生活容忍度有所提高，这主要是因为有了保护政治自由的措施，且人权相对更容易被肯定。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严重的消极结果，主要是在宏观经济均衡方面。例如，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这三个国家，政治领导人顽固地抵制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与此对比，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苏联，在不同时期各自推动了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很显然，后社会主义过渡的前夕，在宏观经济均衡上，推动改革的国家比没有推动改革的国家更糟糕：财政赤字大，通货膨胀率高（或既短缺又通货膨胀的经济综合征更严重），外债多。但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实验导致了一种状况，即领导层失去控制。(8)

处理经济的领导层并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再承诺的经济改善没能保持，这导致了广大民众的抵制和抗议。虽然改革已经增加了政治自由化，但是不满常常发生：已经产生示威和抗议集会，同时产生了新政党，旧的政治体制开始瓦解。

所以，市场化的改革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原来的蓝图基本上是好的，但它有一两个缺点需要进行调整和修改，称为“改革之改革”。

另一种观点认为蓝图模式被错误地执行了。该蓝图是为了推进改革，但它并没有以一致的方式执行下去，因为政府和其他保守势力破坏了它。

我认为这些原因只解释了一小部分。本书的主要观点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蓝图模式注定要失败**。虽然经典社会主义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并导致经济效率低下，但它至少具有凝聚性，融合了“必要”的控制，经典社会主义是切实可行且强健的。相反，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却不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体制。实际上，在分崩离析的变化过程中，这种改革只是经典社会主义的前身。

这篇文章的随后部分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基于以下几个主题：国家的角色和政治；产权和软预算约束；社会纪律；进出口和自然选择。(9)

解释失败的原因永远都无法详尽。几个重要的问题被忽略，例如，价

格的问题、跟信息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很多文献中被提到。但是，我认为要审视的现象本身也是导致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

（三）国家的角色和政治

兰格模式的作者们以及与之相关的纯理论思想，并没有特别指向一种具体的国家理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辨别出一些潜在的隐性假设，这些假设不仅仅只是天真而已，而且最终会被证明是伪命题。兰格模式假定国家（政府）将愿意承担三个适当的角色：（1）确定市场出清价格；（2）执行国有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原则；（3）推动一定程度的个人收入再分配。这些理论忽略了任何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更何况，这样一个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运作的非常强大的国家。

蓝图模式并不是一个天真的乌托邦式的纯理论。相反，其不言自明的出发点是：国家以一种特殊形式存在。它假设，一方面需要保留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另一方面，市场在协调经济过程中占相当大的比例。然而，这两个基本假设不能融合在一起，因为每一个假设必然阻碍另一个假设的实现。

让我们来看看，根据契约理论和所谓的委托代理模型之下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现代改写。^① 这表明在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and 国有企业的经理之间存在一种特定类型的合同，国家作为委托人，企业管理者作为代理人。如今，支持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学者们经常得出以下结论：这场市场社会主义⁽¹⁰⁾ 的实验，到目前为止都失败了，因为合同条款是错误的，如果有了更好的合同，市场社会主义体制将会起作用。

为了应对这种观点，本文的主要论点，在上一节已经提出，可以改写为：在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因为实际上这些国家都是国家主导）和国有企业经理（这些国家里实际的经济运作者）之间的确保资源有效分配的任何合同，都不可能制定出并得到实际执行。让我重点解释括号中的限定词，在一个假想的委托人和一个假想的代理人之间的合同，跟本章的主题毫不相干。我需要再次重复，是为了强调：我们关心的是实际存在的组织和个人，他们的行为受其本质和形势所决定。

^① 关于这一前瞻性的研究主题的综合回顾，请参阅 O. 哈特（O. Hart）、B. R. 霍姆斯特罗姆（B. R. Holmström, 1987）和 J. E. 斯蒂格利茨（J. E. Stiglitz, 1987）的著作。

我希望进一步的研究将得出上述观点的确切表述。在严格的逻辑证明的约束下，这种说法只能堪称一个猜想，以作进一步研究来证实或证伪。如果你喜欢，它可以被归类为一个大胆的猜想，就好像本书中其他的断言。但是，直觉是建立在对显而易见的事实的清晰观察之上：在运行市场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成千上万的高智商并用心良苦的人，都无法制定出并贯彻落实可以保证高效运作的合同。

这里有一些论据来支持这一猜想：

(1) 期望任何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福利，是一个错误的假设。政府具有任何其他的可以明确的实用性功能的假设更值得质疑。实际上对政府真正的动机更精确的描述是：共产党领导人具有多重目标。仅举几个例子：履行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的责任；对小国家来说，忠实地服务于大国——苏联；增加国家军事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可能推动和加速经济增长。当然，与这些目标相随的是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对研究实践的政治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真理，没有哪一位政治家曾经有过一致性的偏好秩序。除非他或她愚蠢或固执到即兴发挥，一直调整多元目标，今天这件事情排第一，明天却是另一件事情排第一，直到有突发事件发生。

国家所有制的本质是整个经济机器掌握在政治家手中。期望经济生产可以“去政治化”很天真。相反，它一直会受到不断变化的政治风向的影响。效率、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等等，仍然是很重要的任务，但是，如果政治家们每天都在考虑将大量优先权放在其他任务上或将更多的财政用于军事目的时，这些重要任务很容易就被政治家们推到第二位。⁽¹¹⁾

没有政治家愿意“签订合同”。他们不喜欢将自己的目标说得很清楚，因为这会限制住他们的手，并限制他们的回旋余地。他们不希望绝对忠实于任何承诺或合同。政治家们更喜欢灵活地调整行动来适应额外的不断变化的状况。

即使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主要以利润和效率作为标准管理的经济领域，也从来没有完全地从政治领域中分离出来，这其中有大量的权力纷争，实际的政经分离有很长的路要走。

(2) 另一个视角是看国家角色，而不是其目标。资本拥有者基本上只履行一个角色——产业所有者。在这个角色上，他们主要寻求的是提高经济收入和其财产价值。但是，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几个同时需

要承担的角色。除了确保财产收入外，它会执行以下几个功能：

- 立法者：制定经济规则；
- 警察：执法；
- 法官：仲裁冲突情况；
- 分配者：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
- 保险业者：提供针对风险的缓冲，分配社会保障，家长式的施助者；
- 工会干部：在管理者滥用工人时，捍卫工人权利。

这些角色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在一个宪政国家，它们是分开的；但在市场社会主义国家，这些角色是基于共产主义的权力而产生，它们维持在一个政府制度之中，各种角色结合于一体，而并非是分开的。

- (12) 需要特别提及法官的角色。国家主导和企业经理之间的合同很显然不完整。如果合同涵盖了每一个可能的细节，它将会是无可救药的复杂和不透明，而且合同需要经过极其昂贵的审查。但是，如果这一合同不能覆盖每一个细节，就可能出现法律纠纷。谁来做裁决？在极权国家里并没有司法独立。“原告”、“被告”和“法官”都依赖于党和一切服从于党的国家的上层官僚机构。

(3) 在第一点中提到，虚构的个人政治家，实际上，每一个政治领导人本质上都是一个联盟，一党制也是如此。联盟内部也会有派系和权力斗争，任何联盟都是暂时且脆弱的。所以，即使国家和企业之间已经签订了合同，合同的执行以及能够被重新协商的条件，也受限于权力斗争。没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只有反复无常的波动。即使联盟成员认可企业和他们的关系（即签订的“合同”），在既定时间下的条款管理和合同执行，仍然受到权力联盟突然间的重新调配。

(4) 市场社会主义假设官僚可以自我克制（党的官吏应理解为包含所有官僚的一个总名称；党内官僚不仅仅只是指政府官僚内的核心成员）。但是官僚权力极大，我们期望这一权力可以被限制，这样企业就有权力依据市场上买者和卖者之间的互相协议进行管理并做出决策。

这个假设只是一个奢望。事实上，诱惑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如果权力进入缺乏权力的人手中，他们将竭尽全力使用它。再者，这已经是一个传统和常规，在经典社会主义时期，他们就是这样做。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公民都早已习惯，而且，有时候其实那些受制于权力的人们要求政府这样做。例

如，如果有产品或服务不好，当权者会通过行政手段来干预和解决问题。

奥斯卡·兰格模式试图将这一模式限于两条简单规则中。蓝图模式旨在让官僚机构拥有更大的权力，同时也对它设限，比如，官僚作用在哪里结束，市场作用从哪里开始。但是，在现实中，官僚不断地数以百万计地干预并逾越与市场的边界。微观管制很盛行。(13)

推动社会主义改革的领导层，一次又一次呼吁，官僚应该协助而不是阻碍改革进程。这被证明是荒谬的，因为这一形势含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矛盾。官僚是不能够提供“协助”的，因为它的存在就是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的基本障碍。

官僚机构的增长并不容易停止，而且减少更是无望。一旦官僚里的某个位置已经应运而生，再去废除非常困难。传统体制里的就业人数和财政开支，在这场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实验中，不仅不是远远下滑，反而在上涨。

改革的周边，有着对权力、声望、影响力和特权的斗争。更多的个人自主权和获得更大范围内的私人自愿契约，应该伴随着官僚权力的下降。因此，这样的斗争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抗争。

(四) 产权和软预算约束

这里可以先返回到前面提到的一个问题，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契约”。下面的论点常被用来捍卫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所有权已经被分开管理。大型股份制公司的业主是大量股东，同时公司管理集中掌握在高层管理人员手中。前者构成了公司主体，而后者只是代理人。如果这种方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运行良好，为什么不能够在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顺利运行，即使它的老板是国家（或由政府代表国家）？毕竟，通用汽车在美国的产量跟在阿尔巴尼亚或蒙古的产量差不多。

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基于一个错误的类比之上。上一节已经介绍了对这一思路的批评。

两种体制中，企业主的目标完全不同。在通用汽车公司，股东寻求的第一目标是短期和长期的经济收益；而在市场社会主义下的政府，却有着复杂的动机，其最终是服从于政治目标。

另外，企业主手中的工具也不同。通用汽车公司，股东可以通过分配收入来进行奖励和惩罚，解雇则作为最终的处分；他们没有国家安全委员会（Komitet Gosudarstvennoy Bezopasnosti, KGB）。党政国家有无数的行政(14)

和意识形态手段，尽管这些手段从经典社会主义时期起就已经开始减弱。

所以，两种体制下的合同产生的代理情况根本不同。通用汽车公司的经理有一个出路：他或她可以选择退出。例如，为了紧跟美国汽车业，在跟公司主要股东——亨利·福特（Henry Ford）——发生冲突后，李·艾柯卡（Lee Iacocca）离开了福特公司，跳槽到对手公司——克莱斯勒（Chrysler）——担任首席执行官。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公司经理并没有真正的退出选择，因为最终只有一个雇主——国家。用同样的比喻，这就像从别克（Buick）转到庞蒂亚克（Pontiac），但并没有离开通用汽车公司。无论企业管理者去哪里，伴随他们的是人事档案。不同于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位，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党的人事部门高度集中控制的无处不在的网络，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进行监管和分配工作。与中央官僚机构争论，会严重破坏甚至毁掉一个经理人的职业前景；然而，作为一名党政人员，与党和官僚机构的其他部门保持良好关系，会开辟范围广泛的职业前景，例如，成为一名高级官员或外交官。

这种情况决定了下级代理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动机。这一动机的主要特点是忠诚于上级，而不是企业的成功或关注客户。经理是官僚和权贵阶层中的一员。

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私有制有助于权力下放。这个知名的命题最早是由冯·路德维格·米瑟斯（Ludwig von Mises）提出，随后被“产权学派”极力强调和详细阐述。^①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提供了新的和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这一古老真理。市场社会主义的实验证明国家所有制的生存不可避免地要求保留高度集权。

让我们更详细地看看各种产权关系。

(1) 收入。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股份制公司扣除开支及税项后的盈余，显然属于股份持有人。虽然也是股份制公司业主，但大部分股份都是在个人手上，这就属于个人利益。在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公司的收入会
(15) 归入国库，这是非个人的。即使企业盈余中的一部分，以各种激励方式分给企业管理人员，但是它占的比例不确定，同时也存在不断的谈判。

^① 参阅 L. 米瑟斯 [1920] (L. von Mises, 1935)、A. A. 阿尔奇安 (A. A. Alchian, 1965, 1974) 和 H. 埃罗尔德 (H. Demsetz) (1972) 的文章。这一讨论在 W. G. 纳特 (W. G. Nutter) 的研究 (1968) 《无产权的市场：一个大幻觉》有简洁的总结。

(2) **转让**。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股份制公司的产权可以转让，而在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企业所有权是不可分割的，它的销售已经被法律约束并禁止。

(3) **控制**。在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大量企业管理权已经从国家向企业转移，但是权利并没有明确分开，因为国家继续以各种方式行使对企业的控制。二者间的分界线取决于国家或者各省政府跟企业管理者之间的不定期谈判。

缺乏清晰简单的产权分配。理解这一情形的关键就是观察高层政府机构和企业管理者之间的特别谈判是如何决定每一项政策。它们之间各自的谈判地位并不确定。政府机构也融合了强和弱：强是指它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弱是指它无法处理极端情形下出现的糟糕状况。同时，企业经理们也融合了强和弱：强是指他们可以要挟：“我们企业的生产在短缺经济中至关重要”，“我们不能解雇我们的工人”；弱是指他们的职业生涯取决于他们上司的恩惠和青睐。

这是在**软预算约束**综合征下经常出现的情况。^①正如前面提到，在蓝图模式下，国家利润是企业成功的主要指标，但这并不被重视。在现行的国家政治结构和国家所有制之下，预算约束就一定是软性的。国家不会放任企业破产，它们必须由国家保障。观察国家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便可直接得出这一结论。

私有制是硬预算约束的一个基本要求。私营企业需要自己解决破产问题，这是它们自己的，而不是国家的职责。软预算约束是国家深入介入企业的结果，因为国家承担着企业命运的最终责任。

(16)

(五) 社会纪律

对渗透社会的探讨跟另一个重要主题相关，即社会纪律。

任何复杂的协调过程都需要既定的纪律，必须结合正面和负面激励：胡萝卜加大棒的组合。

工作领域需要纪律，用以确保可以充分利用工作时间，服从技术必要性，以及工作中各个阶段之间的合作。

^① 关于这一概念，可参考我之前的作品，《短缺经济学》（1980）；更详细的说明，请参阅我在1986年的文章和1992年出版的书的第八章和第二十一章。

当报酬或工资跟业绩不匹配时需要纪律，因为这会对微观和宏观经济有破坏性的影响。

财务方面需要纪律。这一要求具有很多方面，其中之一是持续亏损，企业必须清盘，因为它们继续存在只会增加社会成本。

经典社会主义基于命令、指令性的计划指导和严格的强制执行。遵守纪律，忠于党和国家就有奖励；相反，违反纪律就会遭到严厉惩罚。

资本主义采用的市场纪律主要是经济手段。工作纪律可以是精细的薪酬计划，最重要的是所有人都有被解雇和失业的风险。工资纪律可以通过企业的自身利益原则执行，不合理的不按业绩的额外报酬，最终也是出自企业自己的口袋。商业领域的财务纪律主要由硬预算约束来规制：一个公司出现经济困难，不会通过国家采用税收减免或财政补贴来补救，也不会从银行体系获得软性贷款。^①

以市场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改革，命令（计划）经济被废除，但真正的市场纪律并没有被应用。柔软性并不仅仅指预算约束，所有其他形式的纪律松懈都算是柔软性。上司与下属纵容且无视法律，监督者对松弛的纪律视而不见，法律法规失去了威信。

微观层面的低效率也是因为不遵守纪律；同时，在宏观层面上，破坏纪律也造成宏观局势上的紧张压力：螺旋式工资、多余的政府支出、肆无忌惮的信用派发和没有严格的还款要求。所有这些现象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货币过剩和大量债务。

（六）企业进出和自然选择

在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中，企业部门的组成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许多企业不是恒久的，管制企业进入和退出、成立和破产的纪律，都是非常重要的。

资本主义体制中一个重要优势是个人或企业自由进出所有行业，而没有垄断障碍。机会是企业之母。在熊彼特的理解中，企业家将人才与财务

^① 软预算约束的某些症状也会出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主要原因是需要对一些破产企业或整个行业的经济救助。为何不可避免，在何种程度上会侵蚀财政纪律，以及由此带来的在所有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经验中显现出的不利后果，这些都是具有争议的话题和问题。

资源集中起来。^① 借贷资本可能有不同的来源。企业的财务保障，通过有竞争力的银行部门和分散的资本和货币市场提供。

市场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的差别不大。企业进出某个行业由官僚决策支配。这会存在较强的垄断趋势：为什么要为自己创造对手呢？竞争和自由进入的权利是分不开的，它们正是市场社会主义所缺乏的。

企业退出也很相似。在硬预算约束规则下，亏损企业无法生存。这必然适用于非国有部门，通常是中小型企业。中小企业的退出率非常高，在很多国家达到总企业数量的20%—30%。但是，这一比例在国有部门却低很多，类似的选择退出规则是企业收购计划。如果之前的管理无法让企业获得最大利润，那么潜在的新东家就有了通过接管股份进而管理和控制企业获利的机会，而这通常伴随着大量解雇之前的管理层。

(18)

在软预算约束经济体制下，没有办法采用这些严格的选拔机制。另外，政府利润再分配的纪律，也就是从业绩好的企业强取利润，然后援助弱小企业。国家正陷在已经投资的企业中，也就是说，国家是企业生存的既得利益者。^② 国有部门的退出比较少见，当它确实发生时，也只是独断的政府决定。

这种企业进出规则的整体效果不会产生任何竞争。简短回顾之前多次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否可以在国家和企业管理者之间建立有效的“合同”？到目前为止，另一个需要增加的原则就是企业进出机制。对于“委托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国家）和“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企业管理者）之间的业绩评估，应该在企业之间进行比较。这需要有自由进入机制和竞争，才会在比较时有真正的赢家和输家，而不仅仅是纸上评估。^③

如果没有自由进入和退出机制，没有竞争中的失败者，熊彼特认为的如此重要的“创造性破坏”也就不可能发生。一旦生产结构形成，它就会

① 熊彼特（1939，第1卷，第223页）：资本主义是私人财产的经济，其中，创新是通过借贷资本的方式呈现。

② 这种机制被形式化，M. 德物浦（M. Dewatripont）和E. 马斯金（E. Maskin）（*Contract Renegotiation in Models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1990）用图形阐释了其负面结果。钱颖一和许成刚（*Innovation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Centralised and Decentralised Economies*, 1991）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创造性效果进行了分析。

③ 虽然这项研究并没有讨论价格的问题，但必须在这里提及，因为扭曲的不合理的价格导致了企业纸面上的业绩比较报告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没用的。

被冻结。也正是这个原因企业出现低效率和低业绩。

总之，有各种论据来支持本书研究的主要命题，即市场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因为规划蓝图和其实现过程中的缺点。既定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某一些基本特征，使得一个真正追求有效率的经济体缺乏生存和发展的希望。^①

(19)

二 从失望中学习：认识论和道德观

(一) 理解认识的过程

这项研究中一些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在东欧体系崩塌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就已经被提出来，例如，米瑟斯、哈耶克、“产权学派”里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研究中早已多次提出，这些观点到现在都有效。为什么(20) 这些警告没有能够提醒东欧国家？为什么改革派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没有将这些批评听到心里？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有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什么可以约束启示和理性选择？

本章中有一些自传成分：反思有助于分析。我羡慕那些从来没有改变过世界观的人，从他们开始思考人生的重大问题的时刻起，到他们死的那一天止。毫无疑问，在相对稳定的社会里，这并不少见；但是，在东欧的动乱国

^① 1994年的夏天，当这本书在编辑时，这场社会主义改革实验在苏联和东欧的崩溃已经可以用过去时态来描述。但是，这并不适用于其他两个社会主义改革国家：越南和中国。在那里，这场改革生存了下来，改革进程有很多成功的方面。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和越南的经验反驳了我之前的话：市场社会主义实验的崩溃是必然的论据。无论是在我的书中，《社会主义体制》(1992)，或在这本书中的文章中，我从来没有声称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化变化可能不会成功。我也没有指出，社会主义改革模式无法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生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如果条件允许还会有利于它的发展。在《社会主义体制》这本书(第449—452页)，我列举了三个国家，它们都拥有具体的由拥护者和反对者组成的“改革均衡”，使得发展进程中存在着前进和后退的不定期的戏剧性冲突，他们是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卡达尔领导的匈牙利、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执政党可以控制好管制的程度就足以维持权力的垄断，同时给予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关系和协调机制。所以，这是可能的，一种具体的改革社会主义模式可以在南斯拉夫超过40年，匈牙利也是维持了20年。改革社会主义，到目前在越南和中国甚至稍短，这是因为在这两个国家有一个很好的协议机制使其维持更长时间。所有这一切说明，当时中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实际情况是：尽管私有制在这两个国家中蔓延，它仍然受到行政约束。迄今为止，两个国家都尚未正式宣布国家所有制的企业公开私有化的一套官方程序，也没有任何尝试缩小国有部门范围的任何意图。我会接受的反驳，前提是以下三个条件的配合：(1) 在这两个国家里，国有经济的全面市场化应该开始于政府宣布的计划，并取得稳步进展；(2) 所有的政治权力都在一个合法的政党手中，并且维持不变；(3) 这种情况应该被证明稳定和有能力维持本身很长一段时间。*新的注脚。*

家和地区，没有改变世界观的情况几乎不可能。许多人，甚至那些试图坚持同样一套基本伦理原则终其一生的人，都有改变他们的理念，在社会环境剧烈变化和令人不安的经历影响下，这种改变也许不止一次。

人类生活的另一面是他们的观念变迁史。他们在何时，遵守怎样的教义？他们在什么时期（如果有的话）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什么时候又成为改革的拥护者，或许是拥护市场社会主义？以及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放弃要去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希望（假设他们也同样经历过那个阶段）？这里的讨论不包括个人在此过程中经历过的不同程度的信仰、失望和启蒙等变化。我感兴趣的问题是**集团式**的改革派——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因为什么而决定投身于市场社会主义事业中？是什么吸引他们参加？又是什么让他们退却？这是本章研究的中心，首先需要指出，这里的讨论不是基于个案，而是跟随思想变迁的**典型**：一种智力运动，并由此激发出的道德和政治信念。

这一问题依然很重要，因为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想法并没有被大众舍弃，尽管有了历史性的失败案例，它仍然影响着许多人。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越大，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也会越大。

东欧改革派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并把《资本论》作为基本的经典。接受市场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马克思认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高度组织化和企业内的效率，同时，他也强调，纯粹的无政府状态统治也是基于与企业相连的市场。^① 根据这一理念，市场是一个运营不善且盲目的协调机制，它总是在**事后**才作出反馈。因此必须让优越的社会主义体制取而代之，因为社会主义会通过有意识的计划调整，在**事发之前**就作出反馈。

对市场的攻击包含了非理性论点的广泛传播。人们被灌输了深厚的、与市场对抗的、非理性的、情感的诱导性偏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市场持有怀疑且鄙视市场的态度。为什么必须淘汰私有财产的原因之一就是让人类摆脱市场的束缚。

克服这些偏见需要巨大的意志力。很多之前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设法完全解决一些糟糕问题，例如，在改革过程中经常被严

^① 马克思：《资本论》（1867—1894）（1978，第51章，第1021页）：“……最完整的无政府状态的统治是……资本主义本身……”

厉指责的“投机者”、“奸商”和“黑市商人”。

尽管如此反感，许多共产党的政治家们似乎倾向于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接受这作为必要的让步。他们想保留原始的权力结构，即政党的政治支配，因为这是列宁主义政党首要考虑的本质。^① 另外，他们还希望保留国家所有制的优势。社会主义的这两种属性，更属于共产主义价值体系中的工具性价值，而不是其他一些价值体系。例如，最终目的是全人类的福祉和幸福。这两个属性本身拥有内在价值，这是跟“社会主义”一词完全匹配的必不可少的特征。因此，市场社会主义似乎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有前途的组合，这一组合的社会主义基本属性是在主导性的权力结构中增加财产关系的角色。注入一点资本主义是可以被驾驭的，市场调节有一定效果和影响。新的组合将提高经济效益，同时，又不会舍弃社会主义。^②

改革阵营分裂为相互冲突的群体，因为**替代品之间相互排斥**的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

（二）瓦尔拉斯（Walrasian）理论的兼容性

让我们转向另一个思潮：瓦尔拉斯经济学。^③ 这里需要提到三个知识群体：（1）从信奉马克思主义转变到相信当代西方经济思想的东欧经济学家们；（2）东欧的少数经济学家们，主要是老一辈，他们没有经历过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阶段；（3）对市场社会主义感兴趣的西方经济学家们。

兰格模式规范理论的巨大吸引力是：它可以以非常简洁的方式融入瓦尔拉斯传统，将某些社会主义想法结合起来。例如，通过国家再分配的形式可以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而不是从现实角度）。甚至，所有权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真正重要的不是所有权，而

^① 斯大林（1947，第39页）引述列宁的说法：“权力的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并称，“夺取政权仅仅是一个开始……更重要的是保留这一政权，巩固它，并使它无敌”。

^② 作为一个例证，戈尔巴乔夫的引述：“简而言之，计划的优势将越来越多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刺激因素结合在一起。但是，所有这一切要在坚持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原则基础以上进行管理。”（1987，第91页）。随后，他的观点：“市场的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已被证实……受管制的市场经济，会增加国民财富……而且，当然，国家权力必须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消息报》1990年7月11日）

^③ “新古典”这一术语被故意避免使用；这样可以回避另一个问题，即，奥地利学派是否属于新古典学派（这包括米瑟斯和哈耶克，他们将本文的研究主题紧紧地连接起来）。

是正确地制定规则，起草并与经理人签订合同，从而保证他们有正确的动机和合理的价格。

这一章第一部分已经阐述上述观点的缺陷之处。瓦尔拉斯模式，以及随后的很多分支变化模式，包括兰格模式，是搁置在社会政治真空中的一件了不起的智力机器。它是一种缺乏政治——**社会经济秩序为基础的积极的理论构思**。瓦尔拉斯经济学和它最近的理论发展，数量经济学的分支——博弈论、契约理论和组织理论，都是非常强大的分析理论。只要分析建立在正确的社会理论基础上，通过上述分析思路可以得出尖锐且相关的结论。但是，如果分析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社会理论基础上，就会得出误导性⁽²³⁾的结论，不管社会理论是否已经在分析中提到，或者只是构建模型时的隐性假设。

在这里使用“真空”一词；类似于很多模式，兰格模式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所需要的以下属性：

(1) 了解行动者所在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那些影响他们行为的制度因素；

(2) 宏观经济学需要纳入国家因素，这是这一体制的内在成分；

(3) 解释决策者的偏好是什么，它们在决策过程中如何变化，社会条件下制约行动者的政治和社会因素，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社会条件可以解释个人和群体目标。

相比于瓦尔拉斯理论，奥地利学派无疑提供了更丰富的关于上述属性中社会经济秩序的解释，但它仍然不够丰富。我们可以从马克思那里学习很多关于经济秩序的解释性理论的回归和反思（尽管马克思和哈耶克是大家公认的同床异梦者）。经济学家应该跨出一大步，学习和应用现代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累积大量知识。要达到合适的规范性的结论，所有这些知识都是必需的。

只要分析者小心谨慎地对待这些分析工具，瓦尔拉斯学派并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更广泛地说，整个新古典学派的分析方法都没有问题。但是，使用这些分析工具的简易方式诱使人们采取了错误的**研究策略**。研究不应该从正式分析开始。首先应该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合理的假设和猜想必须随之提及。当研究一个“小”问题时，错误的研究策略有较少的危险，特别是研究者可以反复观察发生的事并进行比较。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与实践进行简单地对抗，是避免出现严重错误的保障。但是，“大”的问题，

尤其是很少可以重复的问题，错误的研究策略包含了更大风险；事实上，研究永不重复的未来事件，例如，整个社会的转型，错误的研究策略是绝对致命的。从“中间”开始分析，即使具有精确的正规化过程，但没有仔细权衡所有相关的政治、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假设和启示，则具有高度风险。

在这里，我需要增加一些个人注释，这些想法启发我写一本书——《反均衡论》（1971）。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自己太苛刻，我拒绝了那些有足够谨慎就可以运行很好的分析工具。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去复兴瓦尔拉斯学派的力量。从那时起到现在，这个学派的主要成员们在扩大分析工具的使用范围及提高经济模型的实用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我还是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内心的正义元素让我要去痛骂这个模型。我写这本书时，非常流行狭隘的以技术为导向的研究策略——通过制定一个正式模式开始的“中间”式认知过程。研究者如果缺乏现实社会如何真正运作的知识，就会站在错误的位置上。我想补充一点，这种做法直到现在都是罕见的。“制度派”和“分析派”的经济学家们之间的人为壁垒和互不信任依然存在，而这自然破坏了两种方法的有效性。

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将瓦尔拉斯学派的观点与分布在社会主义中的一些原则结合起来的便利型知识思维，仍然对许多经济学家的思想有所影响。我要求我的同事正面对东欧的实际经验，特别是它的政治、社会和心理方面的经验；这可能会促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坚持市场社会主义的理念。

（三）三大谬误

跟上一节讨论问题密切相关的三大谬误，这里我将重点解释：

1. 熊彼特的先驱理论中提到的企业家作用与本书的主题高度相关——市场社会主义（参见上面关于企业进出和自然选择的作用）。^① 瓦尔拉斯规范理论提出时，回避了一个问题，即，“创造性破坏”是如何出现在兰格模型中：淘汰过时的技术和组织，推出革命性的新产品、技术和组织形式。

(25) 随后，从早期的理论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未来观察，熊彼

^① 参见 J. A. 熊彼特 [1911] (1968)。

特得出了一些深远的结论。^①让我试试，用简化的方式，总结一下他的思路。现代资本主义主要是通过大企业，包括垄断企业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都已经官僚化。企业家的作用也被弱化。官方垄断的企业能够接替企业家的职能，主要是创新上的职能。如果是这样，资本主义本身已经成为了官僚，如果兰格证明市场社会主义是可行高效的，那他最好是承认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这是可预见的，即使它不是好消息，也没有必要反对它。

熊彼特的这一预言至今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②我认为熊彼特的推理是错误的。

第一，熊彼特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有偏见且夸张。幸运的是，熊彼特的早期作品《企业家》，并没有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消失。相反，它往往是企业家们用来创新的“攻城槌”，尽管企业家们有懒惰的倾向，但他们依旧推动大企业创新。例如，效力于微软或苹果公司的创始人，或其他起初的一些小企业，革命性地彻底改变了曾经几乎被 IBM 所垄断的计算机产业。强大的官僚主义倾向肯定会兴起，国家的作用也因此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但那些像我一样，从个人经历中了解什么是**真实的**官僚化体制的人，可能会更好地理解，官僚化的进程并没有走那么远。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基本上保留着分散的、竞争激烈的私人市场经济。

第二，在现实实践中，市场社会主义并没有履行兰格或熊彼特（后期）的期望，正如本书中的第一部分所呈现。熊彼特的书出版 50 年后，它的预言已经被历史驳斥。

2. 一些改革派的经济学家们很清楚当代西方理论偏爱市场社会主义，⁽²⁶⁾原因是他们意识到无拘无束的私人市场经济机制有很多缺点。这份缺点列表是众所周知的：外部性、公共产品和垄断、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等问题。他们也意识到计划和国家过于集中控制的诸多弊端。前者，他们喜欢叫市场失灵，而后者则称为政府失灵。

现在，市场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互补**前景，计划和市场和平地共存，彼此遏制对方的过激行为。当市场失灵时，中央政府提出整改措

^① 参见 J. A. 熊彼特 [1942] (1976)。

^② 参见 A. 黑尔奇 (A. Heertje) 编辑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四十周年纪念册 (1981)。

施。政府一定程度的权力下放，则会避免过分官僚化。^①

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并没有实现如此美好的互补性。市场失灵仍然存在：糟糕的外部性（空气和水污染、环境破坏、拥堵），大型国有企业维持垄断地位，收入分配不公平等。与此同时，市场未能获得活力，因为它被官僚扼杀了，即使市场没有失灵，也会被行政干预。

3. 很多人对“体制设计”和“体制运行”的潜力抱有很大的幻想。有些人认为它们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适用，而不仅仅只是在某个企业或较小的地区。企业优化方案和运作规则必须有条不紊地制定出来。如果一个明智仁慈的政府拥有了这些方案和规划，我们会看到它们会被顺利地实施。

在实践中，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些规则只有与政府和社会的本质相容时才会有效。否则，对规则的植入会被抛弃。很多人清楚地意识到，体制中各种元素的兼容性和一致性是必要的，但仍然缺少一个详细的说明。虽然数学和经济学研究显示这种互相激励性被一致看好，它们仍然只是停留在探索这一问题的初始阶段。这一切依旧暂时不够充分地与社会发展和人类行为的非正式实证研究相衔接。

在变迁过程中大部分社会制度应运而生。这是自然选择的过程。大量(27)的突变发生，伴随着一些被证明可行的新制度和规则，而另一些则相应消失了。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先天弱点是：它是人为构建的，采用哈耶克的术语，它是“建构主义者的造物”。^② 理论模型或与之对称的蓝图模式都是人为创造的，不仅如此，它们是强加给人民的众多政府干预行为的集合。

这里，我将选择本章第一部分提到的一个问题作为例子进行分析。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前提假设是企业的行为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如果是这样，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精心计算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行政价格和优惠利率的信贷来激励企业行为，以确保高利润率。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可以采用类似的反向操作来阻碍企业行为，例如，精心计算的税收、制定不利于企业的价格，以及制约经济的利率。事实上，要发挥这种影响力，政府机构需要先建立自己的激励和约束体制。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实验快要结束之前，在激励和约束国有企业方面，大约有 200 种特殊的税

① 我的书《反均衡论》也提到了这一观点（1971，第 334—343 页）。

② 参阅 L. 米瑟斯（1981）和 F. A. 哈耶克（1960，1989）。

收和补贴。结果却是它们之间互相影响并互相抵消。因为各个因素之间纠缠不清，企业并没有像一个听话的傀儡一样，按照各种拉线需求做出反馈。企业在真正市场上的成功或失败，受到了政府量身定制的税收、补贴和其他关于价格和财务等干预措施的影响，这意味着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不再适用。政府和企业之间不是自然市场中的自由合同，相反，企业是在政府计划操作的环境中运行。

上述关于干预的论点并不意味着国家和政府应该作为被动地观察社会演变的旁观者。它们的活动是必需的，前提是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推动社会健康地向前发展，而不是强加给社会的人工创造物。

（四）经济体系的民主选择

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选择**哪一种体制的问题。需要界定下列区分：寻求引进市场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抑或引进市场社会主义而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只要他们相信通过议会的方式追求民主，所有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有不言自明的权利建议市场社会主义可以替代资本主义，或是改革（28）的一种方式。一个政党以引入市场社会主义的理念去参选，如果它赢得票数，政党可以通过民主宪法的方式将改革立法。我并不会投票支持这样的政党，这跟我自己的观点毫不相关——我完全认同这样一个政党以及它的政治活动的合法性。

但是，“何去何从”的问题，在东欧的案例中，必须再次提出。市场社会主义的理念并没有通过思想的自由竞争获得优势。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政党内获得权力的小组机缘巧合地接受了这一想法，然后将其强加于社会。尽管所使用的方法并没有像之前没收工厂时的大规模集体化那样残酷，市场社会主义的引入仍然通过政府发令号召来实施。

长期以来，许多改革派的经济学家甚至没有考虑上述事实。这似乎是无须证明的——国家统治精英们就应该有权做决定。精英们需要深信改革的观点是盛行的（否则他们的身份会被改变）。这一做法最严重的缺点之一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蓝图模式没有经过咨询——它是否是真正的民心所向——就予以实施。

现在要作出一般性的预测，仍然为时过早。在匈牙利、德国和波兰的选举中获得多票数的政党，拒绝了市场社会主义，并试图引入私人市场经济。那些转向议会民主制的其他国家中的选举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还有待

观察。

顺便说一句，本章中这样的论点，需要建立在另一个关键点上：东西方之间初始位置的巨大差异。在西方发达国家赞成市场社会主义的人通常会受到道德和政治困境的折磨。他们想保留市场经济的效率，但他们也希望有更加公平的收入和税收分配，这是一种更大的平等。无论正确与否，⁽²⁹⁾他们希望市场社会主义会在这些冲突的价值观中找到更好的折中点。西方经济学家们的这一观点背后是一个默认性的假设，即对民主和人权的不言自明的尊重，包括对私人产权的尊重。

东方的争论是另外一个焦点，他们较少注意“效率与公平”的两难困境。长期以来的敌对双方，只是在争论哪种社会主义会更有效，采用没有民主作为基本公理，一党制，或较硬或较软的各类极权主义。一旦这个公理受到质疑，那就是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它标志着一个体制终结的开始。

（五）我的导师：失望和创伤

从自我反思，也从与朋友和同事的谈话中，我可以说，那些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个阶段改变了关于本章主题观念的人，并不是受到这本书或类似文章的影响。他们的思考受到下列综合理性因素的强烈影响：价值观、情感、偏见和希望。它们像一道门，至少像一道过滤器，我们抑或受到一定的影响，抑或直接拒绝它们。一个人的心灵和才智，可以开放地接受一些观念，或者紧关心门。

三十年前，我读米瑟斯和哈耶克的作品，拒绝了他们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后来，在不同的心境下再次阅读这些作品时，突然间我变得容易接受他们的论点。这种阻力已经从旧的自我中离去，那时，我是一个“天真的改革者”，认为东欧社会主义的一些原则是毋庸置疑的，它们是在寻求更大程度的权力下放，而不是权力的过分集中。

一系列政治创伤和幻灭改变了我们心中的观念。各类专家，如经济学家，在许多情况下，致命的打击并不是自己能力范围内的负面经历。改变专业观点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首先，他们生活的哲学根基崩溃，这种状况通常是在一些惊天动地的事件影响下：亲历俄罗斯的坦克出现在布达佩斯、布拉格或阿富汗，又或是听到被释放出狱的朋友介绍类似经历。一旦这个启示发生，突然间或逐渐地，体验心理灼伤后的结果是会立即开

始接受理性论点。想去阅读，或再进一步阅读的激情增加。这些作品已经打开偏见的壁垒，它们的观点忽然间变得令人信服。人自己耕耘着或深或浅的思维层次，同时又包含改变这些理念或专业原则。当一个曾经拥有盲目信仰的经济学家想去再次耕作自己的土壤，可以重新认真思考一些专业问题，例如，企业自由进出和市场出清价格，这些是必要的。(30)

这样的反思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它教会我谦逊，以及在智慧上的谦卑。但是，也需要记住我们要保持一点骄傲，我们有力量，至少与我们自己的偏见作斗争，来开启智慧大门，也帮助他人打开智慧的大门。

但是，同时承认道德是一种美德也是在一个逐渐苏醒的过程中，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早已知道，一个人需要问自己是否值得这么痛苦地寻求回答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我确信，这是有意识、有价值的寻找。

这正好符合社会科学预测能力的边界。这个问题基于瓦尔拉斯思想相容性的部分，同时必须返回到瓦尔拉斯思想。社会科学是能够对“小的”经常重复发生的事件做出较为可靠的预测。但是，却不能通过科学方法对“大的”非经常性事件做出预测。米瑟斯或哈耶克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警告，是一个辉煌的猜测，但是他们没有在事前做出科学证明。愿景也面临着猜测，它不是基于科学多次证明的一个科学命题。现在已经处于事后状况；足够大的知识体已累积到可以做出预言。曾经或正在进行这次市场社会主义实验的国家里的经济学家们，现在可以基于第一手经验做出判断。在这场审判中，目击者和受害者的报告有着特殊的分量。现在在布达佩斯、华沙或莫斯科辩论的市场社会主义跟 20 世纪 30 年代在伦敦或芝加哥辩论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不一样的事情。现在的争论有着特殊的权重，这场辩论更大、更丰富，而且在许多方面比 20 世纪 30 年代的辩论更有说服力。

我刚才提过关于理性信念的限制和阻碍思想的偏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应该要求自己去经历自我学习和幻灭的过程。问题仍然存在，在社会主义体制运行的国家，仍然存在这一议程，这是大世界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例如，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国家，这场市场社会主义实验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此外，一个特殊的后卫行动正在前仆后继地捍卫市场社会主义理念，(31) 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引入议会民主制。这种奇怪的想法，可以称为所谓的“反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总结如下：“共产党人不能处理好国

有企业。现在，我们作为共产党的掌权接班人，将很好地展示我们管理国有经济的能力，不管它有多庞大。”因此，相比经济理性而言国家所有制重新占有更大的比例，官僚集权重新进入国有部门的管理中，行政任命是基于政治因素而并非专业能力。这些都是社会主义体制中的常见现象。

因此，问题仍然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它值得继续探讨。也许，现在已经有了足够得到启发或有潜力被启发的人们，他们愿意听曾经历过市场社会主义实验的人们叙述的一切。我很希望，东欧的经验更容易避免让人们走进死胡同，而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

第二章 所有制形式和协调机制 之间的亲和力^①

(35)

整个世界见证了社会主义国家自 1988 年起发生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大动荡。这一章集中评估过去的经验，并希望通过评估对过去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然后为未来制定出完善的政策提供帮助。当然，推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国家数量并不多，而且这场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或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依然非常不稳定。我们可以尝试的只剩下做出一些初步的粗略推测，然后在未来的历史发展中进行验证。

本章所要讨论的问题有很多政治影响。很显然，所有制和协调机制的相关决策都与政治权力、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除了几个简短提示外，本章不详述这些政治领域内的主题。^②

一 经典社会主义与改革社会主义； 改革与革命

首先，需要澄清一些基本概念。接下来，我将区分两种社会主义模式。第一种是**经典社会主义**，在斯大林、毛泽东和他们跟随者的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形式。第二种是**改革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形式，例如按时间顺序，南斯拉夫（铁托）、匈牙利（卡达尔）、中国（邓小⁽³⁶⁾

^① 谨此表达我的感谢：玛丽亚·科瓦奇、卡拉克·鲁格（Carla Krüger）、赛伦德拉·拉吉·梅塔（Shailendra Raj Mehta）在编辑上的帮助。感谢匈牙利科学院、哈佛大学、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和斯隆基金会的支持。

^② 参阅我的书《社会主义体制》（1992），特别是第3章、第4章、第7章和第15章。*新的注脚*。

平)、苏联(戈尔巴乔夫);相关的研究只列举他们的名字。^①改革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领域上朝着宽松方向前进,国有部门的控制有所放松,私营部门也被允许在较大的范围内发展。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属性: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力量分享权力,国有部门仍然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经济活动的主要协调者是中央集权下的政府部门,尽管协调受制于不再严格的指令性工具。

我们还需要区分**改革**和**革命**。前者的目的是在现有社会主义体制内推动重大改变,但前提是保留现有体制的基本特征。后者开始于一种最终会使国家转轨并离开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型。因此,改革和革命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转变的方法(暴力与非暴力),也不是转变的速度(缓慢地发展或突然地爆炸)。两者之间的区分标准如下:是否这种转变废除了共产党的权力垄断?从这个意义上说,1989年,一场革命开始于(以时间顺序)匈牙利、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避免了改革阶段,采取了飞跃式转变,直接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直接跳跃到另一体制——资本主义。

本章关注改革社会主义,不讨论“后社会主义”国家与革命性质相关的转型问题。^②东欧的历史,仍然如此接近现状,它不仅对转型过程的初始经济条件有着极其强烈的冲击,而且更给政治思想和智力辩论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本章的主题,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的改革社会主义共同的经验与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可能会为社会主义世界令人叹为观止的变化提供一些指引方向。

二 没有战略的转型

如果我们看一下上述这些国家的历史会无一例外地发现,改革蓝图或改革方案都是在实际改革之前就已经制定出来。许多情况下,这些蓝

^① 研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细节和过程分析的文献汗牛充栋。这里只提几个例子:研究南斯拉夫的J. P. 伯克特(J. P. Burkett, 1989),研究匈牙利的J. 科尔奈(J. Kornai, 1986)和拉斯洛·安塔尔(László Antal, 1987)等,研究中国的D. H. 佩尔金斯(D. H. Perkins, 1988),研究苏联的N. 阿法纳西耶夫(N. Afanas' ev, 1988)、E. A. 休伊特(E. A. Hewett, 1988)、G. E. 施罗德(1987)和N. 什梅廖夫(N. Shmelev, 1987)。

^② 关于革命性变革问题的探讨观点,可参阅我1990年出版的书。

图是由学者撰写。事实上，为社会主义转型撰写学术性建议的第一个例子可能是20世纪30年代奥斯卡·兰格提出的著名的“市场社会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术争论。一些蓝图是在分管领导的主导之下撰写出来，也就是说，由党和政府官员制定，例如，南斯拉夫、匈牙利、中国、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最后，也有一些蓝图是由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家通过非法或半合法形式出版，例如，在波兰改革蓝图是由跟非官方工会走得很近的专家们撰写，同样，在匈牙利和苏联也由一些持反对意见的知识分子们撰写。

尽管所有这些改革建议都是有趣的历史文献，而且它们中的一些建议已经对改革的发展过程有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任何国家的实际改革都从来没有对这些蓝图做出反馈。实际上，即使是由政党正式制定的改革蓝图或方案，通常都没有得到一致性地实施；甚至有时实际的改革跟原先计划之间偏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官方都承认他们没有按照原计划执行。当然，在很多案例中，历史总是见证了目标和结果之间的巨大差异：法国大革命的命运并没有反映包括卢梭在内的百科全书派作者们的任何想法；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变成了另一个国家，这跟马克思以及1917年革命参加者所想象的也完全不同。

然而，中央计划经济的实际重大转型却没有基于中央的计划，这具有讽刺意味。中国有一句谚语——“摸着石头过河”。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过程正好符合了这一形象：整个社会像是一条深不可测的河流，从一个石头移到另一个石头的过程中，没有准确的知识可以指导我们到达最终目标。改革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特点是一种对历史的妥协，既前进又后退，同时，乐观和兴奋，幻灭和失望也交替出现。它也常常证明，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一些变化仍然不能被保留下来。形象地说，跑步时常常遇到石墙，人们因此学会改革是有限的。在任何情况下，一个社会的转型所受到的限制只有在转型开始时才可以准确地测量。

在这种状况下，观察转化过程中的自发性演变包含了什么就显得极为重要。马克思用德文中的术语“自然生长”（在自然界生长）来表达这一自发的历史过程。一些现象的出现，并不是按照政府的命令或者行政压力，而是遵循着社会群体的自由意志。

因为改革的结果之一就是个人选择的自由，所以研究“自然生长”型的转变最重要。诚然，改革社会主义体制中依然存在着因无法改变的事实

所施加的限制。然而，自发变化反映了一定程度上的自愿决定，同时阐释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喜好。

正是这样的思路将本研究区别于其他许多研究。大多数关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研究，所探讨的都是规范性问题，而且，即使是在实证分析领域，他们也只是在探讨中央层的意图和行为，以及与之相随的制度安排。本章倾向于关注另一个不那么重要的问题：不按照中央规划，或者即使是在规划上，这一转型中自然发生了什么？

三 私营部门的发展

关于这一方面的努力，我们第一个应该关注的重点是私营部门的发展。让我们重温第一项改革建议被提出的那段时间。例如，我在1954年、1955年和1956年，参与东欧改革智库研讨会；因为改革适用于国有企业，⁽³⁹⁾因此几乎所有参加这场辩论的学者们都热烈讨论了这一问题。^①我们的讨论一直围绕着如何让国有企业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更强的以盈利为基础的激励机制，如何在下放经济管理权限的同时，让所有经济领域内的边缘部门维持在国家范围之内。这些都是当年改革激进者的提议。

高度符合本章前一节中的观点，30年历史飞跃的事实证明：历史已经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路线，它背离了学术型经济学家撰写蓝图中的原始规划路线。所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国家，特别是在匈牙利、中国和波兰，改革发展一段时间之后最重要的结果是出现了显著的私有经济。

私营活动对社会主义经济体最相关的入侵是私人种植。私人种植存在各种各样的形式。无论是土地事实上的重新私有化（例如，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者，尽管发生了各种政治变化，私人种植从来没有被废除，例如在南斯拉夫和波兰。匈牙利的宅基地和私人种植的经济角色在改革之后也被加大。此外，还有典型的农业合作中的家庭分包模式。

除了这些私营和半私营的农业活动，我们也发现在这些经济体内存在着符合法律的纳税私营企业。服务、交通运输和建筑行业中的各个分支已

^① 关于最早主张在东欧推行基于分权化的改革，请参见本书第2页脚注^③。

经出现了显著的私营部门；另外，私营企业也开始参与基础生产建设。^①同时，经济中也存在因私人财产带来的不同形式的收入，例如，在城市中出租私人住宅所得的租金。

除了正规的私营部门之外，各类非正式的“走穴”也经常出现；未经许可，也可能是非法的，但仍然被容忍的经济活动在服务业、商业、运输和建筑行业范围里扩散。^②经济改革的过程，一些个人策划和运作的经济活动也显著增加，例如，在一两位建筑工人和一些朋友的帮助下，自己建房。⁽⁴⁰⁾

一些国家，一些领域，如住房、农业，国家或其他一些社会组织拥有的产权也开始被出售或出租给个人。^③然而，在实践中，私营部分的增长在较大范围内发生，尽管一些私营部门的发展是基于个人储蓄，但是，几乎所有私营部分的发展都是完全依据个人的劳动力投入。

必须强调的是政府没有必要通过宣传策略来说服人们参与到私营经济中。通常情况下，取消某些私人经济活动的禁令之后，私营部门就会自动地爆发开来，私人企业就如雨后的春笋般增长。更显著的是，私人活动的爆发往往是尾随着某一时期内对任何形式的私营企业的残酷镇压之后。改革社会主义国家，只要终止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压制，私营部门立即就会开始真正地自发地扩张。人们没有被诱骗或胁迫去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④事实上，人们立马就被较高收入所吸引；私营经济所提供的激励是在付出与回报之间建立更直接的联系，并扩大自主权。还有一个原因——私人活动将会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和更自由的愿景——特别具有吸引力。

私人活动会带来较高的收入，因为他们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国有企业却做不到。在一个充满私营企业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工匠或街角杂

① 私营企业的运营方式是拥有并管理着一群人，这属于私营部门，由单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拥有和经营的企业。在苏联，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些企业的运营方式是私营形式，但是它们的伙伴关系称为“合作”。

② 关于正式和非正式的私营部门，参阅 G. 格罗斯曼 (G. Grossman, 1977), I. R. 加博尔 (I. R. Gábor, 1985), C. M. 戴维斯 (C. M. Davis, 1988), S. 波莫尔斯基 (S. Pomorski, 1988), 和 B. 达拉戈 (B. Dallago, 1989)。

③ 在匈牙利和波兰，出售国有产权给私人或外国投资者正在成为普遍现象。这是一个明确信号，这两个国家已经在跨越改革社会主义的界限，一个真正的体制转型已经开始。

④ 也许是在苏联，特别是苏联的农业部门，是一个例外。伴随着大规模的集体化和“清算富农”的恐怖记忆是如此深深地印在脑海中，虽然它已经过去一代又一代，但许多人仍怯于开始单干，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私人业务。

货店，或者实际上是小饭馆的老板，他们都是典型的中产收入者。但是，
(41) 在长期的短缺经济中，同样的经济活动早可以将这些人列入最高收入组，这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或贪婪，而是因为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很稀有。他们从付出中获得的收入，只是真正市场运作中一小部分经济的市场出清价格。他们应该很感激国有部门、国家财政和货币制度，因为这些制度运作带来的供给和需求状况使得自由市场里的价格显著地高于国有部门的官方既定价格。

如果人们考虑到一个事实，即，私营经济必须适应由于半心半意地执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恶劣环境，那么，私营经济活动的这种增长比例会更加显著。尽管已经有了一些改善，私营企业日常管理的特点仍然是政府的多重干预和限制。私营部门对原材料的获取是有限的，在信贷和外汇方面，也几乎没有任何权限。他们常常通过非法或半合法的方式获得原材料、信贷和外汇。

另一个迹象是一群人的嫉妒心，这种嫉妒源于对收入增长差距的质疑。他们嫉妒那些突然间赚很多钱的人，这种现象在整个体制中都存在；在一个已经提出要考虑平等作为重大社会发展愿景的社会中，这种嫉妒心很可能会加深分裂。最后，因为缺乏一系列法律制度来保护私有财产并监督私人合同的执行，同时又缺乏政治活动和相关协会维护私营部门的利益，这给私营部门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同样，这些也导致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

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小规模私人经济活动一定会演变成资本主义吗？如果在苏联参加一个会议，探讨一个应该颁发多少牌照给私人出租车主这样的实务性问题，我们并不能完全反对一个事实，即私人出租车主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私营业主；而且，如果路上多一些私人出租车，苏联的社会主义不会受到威胁。但是，如果我们要求客观分析的话，就不太可能如此轻易地驳回上述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将这些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铺天盖地的私营活动定义为一部分小商品生产。粗略地说，在马克思
(42) 主义的定义下，小商品生产和真正的资本主义，两者间决定性的区别在于，前者使用单独的唯一劳动力投入，也许是他和其家庭成员，而后者却需要经常雇佣其他劳动力，从而采用剥削他人的方式来提取盈利。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实际做法已深受列宁经常引用的一句

名言的影响：“小生产经常地、每日每时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①在我看来，列宁是绝对正确的。如果一个社会允许大量的小商品生产者存在，并且允许他们积累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迟早会出现真正的资本集团。要理解这一点，读者可以想象一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如果私人生产者可以像国有企业一样，获得同样的信贷和各类投入，而且它们都将在一视同仁的税收和补贴制度之下会发生什么？毫无疑问，比较成功的私营企业将开始积累资本并不停成长。因此，特定情况下，在社会主义体制中是否小商品生产会滋生资本主义的这一实际问题，其答案一定是“不会”，因为政府不会允许私营企业的增长超过一定的临界点。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私营部门的增长不仅仅受到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繁文缛节的政府过多干预，而且，私营部门的持续增长也违背了社会主义体制的理论前提。因为社会主义体制不会容忍太多资本主义经济部门，所以私营部门时不时地就会受到政党和政府的干扰。

在改革社会主义体制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措施限制私营部门的增长能力。有时，这些约束是简单的法律限制（例如，规定合法的私营企业可以雇用的劳动力上限，或者限制私营企业的投资资本总额）。另外，对私营经济的发展设限，也表现在税收制度上，特定私营经济活动的征税范围变化非常大，这成了政治当局控制私营部门的附加工具。例如，私营工商业者可以指出税收在哪一精确点上他们还能坚持创业；但是如果超过这一点，他们就不得不放弃并返回国有部门工作。当然，在不同的部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企业之间，这些重要的界限值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界限值确实存在，而且它们是强加在私营部门上的制度性约束。对私营部门的资本积累最严重的限制是不确定性和恐慌——私营部门面临着未来有可能被国有化或被没收的危险。过去被压抑的记忆是活的，人们可能会被吓坏，或许某一天他和他的孩子们就被诬蔑为“资产阶级”或“富农”。⁽⁴³⁾

因为资本积累受限，私营部门的发展达不到规模经济。在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之中，对个人而言，不将盈利投入再生产的消费行为可能相对合理。我们习惯于阅读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中家族企业创始人努力创业并将财富留给后代的传记。按照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说，《布登

^① 列宁 [1920]，1966年，第8页。

勃洛克家族》，所描写的故事，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资本家的第二代及其继承者们大肆挥霍浪费的场景。相比之下，在改革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家族企业有着相当不确定的风险——创业人生命结束之前是否企业还会继续存在，所以自从企业运行的第一天起就存在大肆的挥霍浪费。

私营部门所在的社会环境也造成了它的短视行为。因为私营企业主会担心其企业在下一年就可能不存在了，所以他们通常没有兴趣建立和提供拥有坚实信誉与客户的产品和服务。因此，在极端情况下，以卖方市场的整体环境为主，私营企业可能与他们的客户打交道时会非常不诚实，从而尽可能获得大量的一次性收益。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习惯了排队，也习惯了国有经济的短缺，因此对私营企业来说，通常很容易保有他们的客户群，即私营企业的员工可能不及它的对手——例如，国有企业的员工更主动也更礼貌，如果有的话。尽管国家所有制朝向买方市场发展，新的小型私营企业的发展标准，不但没有提高其服务水平，反而下滑至长期短缺经济中的情形。

(44) 在争取必要投入时，私营企业也要适度使用贿赂。这种欺骗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投入，更是为了保护企业的业务，预防国家侵入。许多人加入私营部门的行为并不是企业家精神，而是一种冒险。这就是既定条件下的自然选择过程。

上述情况给私营部门的社会地位设置了陷阱。日常生活中就充满了“反资本主义”的煽动和反对暴利、贪婪和欺骗的流行口号。^①这样的宣传点燃了对私营经济进一步的限制和干预，也导致了更糟的恶化：资本主义正处在最坏的情况中。

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恶性循环。改革社会主义体制需要私营部门的积极贡献，否则就无法为人民提供各种商品。当社会主义无法以一个纯粹的、严格意义上的非资本主义方式生存时，它显然已经到达了一个历史阶段，必须接受与最大的敌人（资本主义）共存，不仅是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也包括其国内的资本主义。

^① 讽刺的是，改革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些政客和记者基于道德基础上反驳高房价和“暴利”（有时甚至是对立群体中的“新左派”圈子），不承认它是跟市场的可取性不一致的声音，在同一时间，否定了由同样的市场机制所产生的市场价格的合法性。

四 政府的持久性

原先改革蓝图的中心思想一直是废除计划经济，也就是说，取消强制性的投入配额和生产目标。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是几个为数较少的国家，还在或多或少地持续推进改革社会主义蓝图中的一些政策建议。两个最大的改革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苏联——也只是实践了一部分而已。

改革者最初的期望是一旦废除行政制度就会出现一个短暂的真空，同时市场机制可以立马填补进去。换言之，政府的行政命令会在瞬间由市场信号所取代。持这种期望的基本假设是，这两种协调机制，即政府和市场，彼此是简单的互补关系。^①然而，这种期望，我在1955年和1956年也曾认可过，现已被证明是幼稚的。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取消行政指令，或者取消直接政府协调机制之后的真空，并不是由市场填充，而是由政府协调机制的间接工具填满。^② (45)

在经典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中，市场作用被彻底排除；随着改革的开始，很显然，市场作用开始增长。然而，政府的影响继续保持普遍性，并以很多不同的方式呈现。^③总之，政府机构在经理人选和企业是否可以进入某些领域的决定权上的作用仍然是最重要的。虽然政府机构已经降低或完全退出国有企业投入数量和产出目标的直接行政控制，它仍然可以通过正式的国家订单和非正式要求来执行控制，或是通过行政定价，又或是让企业财务状况高度依赖上级机构。因此，国有企业一直强烈依赖于政府的

① 这里的术语“政府协调机制”，跟我的其他作品里意思相同，这是价值中立，没有任何贬义，不像许多东欧的著作和演讲里提到的那样。它是指某些类型的控制和协调活动。这一机制的主要特点包括：多层次的组织控制，下级对上级的依赖，和上级的强制甚至胁迫性指示。

② 后来的相关概念，最早出现在卡尔曼·绍博（Kálmán Szabó）、塔马斯·纳吉（Tamás Nagy）和奈斯·安塔尔的作品中。在研究后社会主义经济经验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另一种现象。官僚协调机制取消或崩溃后（这包括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可能会出现一种真空。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无政府状态，一个混乱的“诺曼的土地”，可能政府和市场协调的边缘区域发展。（参见本书第七章，第136—137页）新的注脚。

③ 对术语“官僚制”的解释是必要的。此概念也可采用价值中立方式理解，没有任何暗示，任何否定的判断。它是指层级设置来控制所有社会和经济事务，不仅包括政府官员和管理者，而且包括党内各种组织和群众组织。换句话说，“官僚制”是指在不同于社会中的其他群体的特定社会团体。“官僚协调机制”是指不同于其他机制的特定协调机制，例如，市场协调机制。概念上的区分虽然很明显，当然，这两种现象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政府采用政府协调方法来管理那些应被它管理的人。

- (46) 各个分支：负责生产的部门、外贸部门、价格控制办公室、金融机构、警察等。党组织也频繁干预企业事务。尽管形式已经发生改变，但是企业依赖政府的强度却没有改变。

在私营经济描述中，我们已经采用了“自发”或“自然生长”的术语。这里应当强调的是，政府机构的持久性也是社会主义体制自发的自然结果之一。^① 中央委员会或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必规定改革过程中需要尽可能多地维持政府规模。与此相反，政府规模可能会有所增加，尽管存在着很多致力于减少官僚的尝试，甚至以剧烈式运动的方式来摆脱官僚。苏联的**重组改革**也以减少官僚规模作为目标；然而，即使采用了剧烈的方法推动改革，实际经验不允许我们用大量的信心来检测官僚自然生长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可以观察到官僚的自我繁殖，即使它在一些地方被淘汰，或者某一特定形式的官僚被淘汰，它还会以其他方式重新出现在另一个地方。

许多因素可以解释政府协调机制的这种永久性恢复。很显然，其中一个因素是官僚职位所附带的物质优势，即经济利益、特权，以及可以获得相关稀缺商品和服务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权力的诱惑力。我们再次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政府协调机制和市场协调机制各自发挥作用的比重，并不只是在两种中立协调机制之间寻求合适的分工问题。政府机构统治着社会主义经济。如果允许市场起到真正的协调作用，则意味着政府机构需要自愿交出权力中重要的部分。

- 在这种情况下，最严重的后果是社会主义体制特有的政府机构的自我繁殖倾向演变成强加到国有企业改革上的各种限制。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改革支持者的问题，让这个观点更加明晰。如果国家在更大程度上允许私人经济活动，支持者的比例会很大且定义明确。改革支持者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公民组成，他们可以选择，或至少希望，或者作为创业者或者作为员工，可以有机会在私营部门工作。

另外，在国有部门深化分权改革过程中，每个人都是合格的赢家。权力下放的真正结果是每一个人都被牵扯进国有部门改革的成本和收益

^① 如前述，术语“天然”，不是指在美国广告中所使用的含义，而是和一系列普通的字具有同义词的含义，例如，良好的、健康的和非人造的。我们用它来表示一种现象，在没有政府支持下的再生产，有时甚至旨在反对它的政策，只是社会形势影响下的结果。

之中。政府机构的每个成员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自主权，与此相反，上司可能会失去对下属的管辖权。改革带来的优势，例如，家长式作风的减少和预算约束硬化，同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和工人来说，也成了逆势。^① 国有企业经理和工人们获得更多的自主权，但同时失去了国家保护。这很真实，尽管我们会不赞成，或者充其量对别人的保护无动于衷；但是，一般而言，人们喜欢自己处于被保护状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最能体现这种保护矛盾的例子是人们对自由贸易的复杂态度：如果评估自由贸易对公司有利时，企业会接受较少的关税，以此在国际市场上推销自身产品；但是，如果自由贸易导致外国竞争者加入了国内市场竞争，企业对自由贸易关税政策则会表现出不那么热切欢迎的态度。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仅是管理者，更是国有部门的每个人，对软预算约束、家长式作风的保护，有种精神分裂式的情感。高额税收、财政补贴都不受欢迎，但是即使国有企业现在不接受这些，但可能未来这些会派上用场，因此，他们无法相当坚决地反对。短缺经济让企业不会成为买家，而更适合扮演卖家。

结果事实证明热烈拥护国有企业加入市场化竞争的人，既不是高层官员，也不是国有企业经理，更不是企业员工。一些开明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可能认为，预算约束的硬化和家长式作风的减少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表现。然而，对民众来说，他们并没有达到要采用罢工或街头示威的形式要求提高经济效益或减少国家保护。

事实上并没有草根运动要求国有部门分权。因为，一方面，存在强烈的（48）诱因使得政府维持其固定地位；另一方面，没有人反对政府的持续。结果是政府协调机制的永久再现。

五 经济协调方式的替代方案^②

上文讨论了改革社会主义体制中政府和市场协调机制在国有和私营部门中的作用，现在让我们从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出发逐步贴近本书的主

① 参阅本书第13页脚注①。

② 译者加：这段文字的英文，“Alternative forms of social organization”，直翻应该是“社会组织的替代方案”，但根据作者在这一节中所表达的观点，“social organization”的含义应该是指“所有制形式和协调机制之间的关系”，简称“经济协调方式”。

题。参阅图 2.1。

当提到公有制（1 代表公有制）时，我们心目中的经典案例是中央管制之下的国家所有制，2 代表私有制，A 和 B 分别指政府协调机制和市场协调机制。

所有制形式和协调机制之间存在着两条强连接线：经典的改革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有制与政府协调机制相连；古典资本主义经济——私有制与市场协调机制相连。这两种简单的连接线是基于历史标准模式而得出的结论。这似乎很自然，基于私有制的经济单位在市场上运作，他们既作为卖家又是买家，以经济利益的激励作为动机，同时对成本和价格高度敏感。类似的情况，国家控制下的经济单位由政府机构通过行政手段来管控和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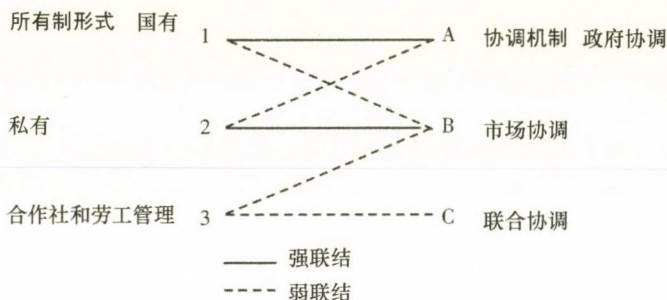


图 2.1 强联结和弱联结

- (49) 对比之下，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中，私营部门，主要是由市场协调，但同时也受到政府管制，这好像是从 2 到 A 的虚线。通过政府控制来管制私人经济，不会也不太可能可以顺利起到协调作用，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就互不协调。

此外，还存在其他的，一般也是不一致的尝试，例如，通过市场协调机制管理国有部门（从 1 到 B 的虚线）。这个想法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蓝图模式的关键理念。然而，事实上政府对国有部门的支配性影响力不太可能被减少。正如这篇研究前面几节我们已经讨论到的，市场协调机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充满了摩擦。尽管改革者努力加强 1 与 B 之间的联动，但总是有一种倾斜力量在恢复 1 和 A 之间的连接：政府协调的渗透力量将市场协

调机制的影响推了出去。

综上所述：后两种之间的关系，即介于 1 和 B 之间，以及 2 和 A 之间的关系，可以定性为弱联结。

“强”和“弱”联结的概念并不意味着价值判断，也不表示它是我的任何个人偏好。这些都是描述性的分类。根据本研究的一般原理，如果所有制形式和协调机制之间的联系是自发的且盛行的，即使存在各种阻力和反对策，它们之间的连接线都会很强。这是基于特定类型的所有制形式和特定类型的协调机制之间的自然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形容词，“弱”，是指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人为的联系，但是它却不够强大到足以抵御“强”联系的影响。不管改革社会主义中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喜欢还是不喜欢，“弱联结”常常会被“强联结”排挤掉。^①

其他形式的经济协调方式如何呢？首先，让我们回到所有权问题。图 2.1 中第 3 行是指合作社和劳工管理，我们不仅需要强调它们是非私有化的，而且需要指出它们并不具有社会所有制的官僚特性，例如，我们在真正的公社或真正工人管理中看到的实际情况。^② 社会主义合作社的理念一直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C 型协调机制，术语，联合机制是一组潜在机制的总称。这可能是最简单的以一种消极方式定义的集合，这种协调方式既不是政府协调也不是市场协调，而是基于自我治理、自由联想、互惠、利他主义或双方自愿下的调节方式。关于社会主义研究的大量文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基于合作社的所有权，并非市场，也不是政府。马克思创造的这一思想传统，有一点贬义成分，即“空想社会主义”。这种思路的早期代表有蒲鲁东（Proudhon）、傅立叶（Fourier）（某种程度上）、欧文（Owen），以及其他一些人。

一些文献并不总是将合作社所有制形式（即，“3”）和 C 型协调机制相连接。一些学者将重点放在“3”上，其他则是“C”，也有一些学者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讨论。在探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改革时有较多的研究

^① 在 1、2、A 和 B 之间，有多种组合方式值得考虑。例如，如果一个经济体制下，私营部门是很强且稳定的，那么 2 和 B 之间的联系中起主导作用是 2，经济体制中某些部分可以成功地抵制 1 和 B 之间的联动影响。换句话说，在基本的私有市场经济中，国有部门也能够适应市场的规则。

^② 按照本章中所使用的定义，苏联私营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合作社。它们的所有制形式属于 2（私人所有制），而不是 3。

将两者结合。^① 南斯拉夫的所有制改革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即使改革非常不完善，但是这场改革努力尝试让社会主义摆脱唯一的经济协调方式，例如，政府协调与国有经济，市场协调与私有经济等。也就是说，改革尝试向“3 + C”的方向发展。但是，这个伟大的历史实验，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这种情况中的社会转型都是通过政治力量强制推进。虽然在起初(51)阶段，政府高层发起的这场实验得到了社会中至少一部分人的热情支持，但是随后的制度化和强制手段使得人们对此失去热情，并认为它偏离了党的路线。因此，南斯拉夫推行“3”模式的所有制改革，事实再次证明了我们并不能证明与C型协调机制相匹配的所有制形式具有真正的发展实力。

这里我不会将其与蓝图模式所制定的标准相比较，而是关注是否合作社所有制和其关联的协调机制在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进程中自发自然地成长？因为在这些国家建立真正自愿的合作社，并采用自主调整或其他形式的联合协调机制是被允许的这个问题有意义。比起私人经济活动，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小型合作社是可以被接受的。在任何体制下，利他主义和非商业化的互惠，当然合法。

但是，我们也观察到，“3”和“C”形式确实且依旧存在，即使是在官僚集权的高峰期，但是在废除命令式的计划经济之后，这些形式并没有呈现出壮观式的增长。中央集权制开始允许除国家所有制之外的其他所有制形式之后，只有私有制迅速抬头增长。废除直接的政府控制之后留下一个短暂的真空，如今，这个真空已被填补，主要是间接的政府协调和某些形式的市场协调。合作社所有制和联合协调，最多，也只能发挥辅助作用。^②

让我们总结一下各种经济协调方式优缺点的一般性结论。虽然，国有

^① 当然，合作所有制不仅可以跟C型协调机制联结，也可以跟市场协调机制联结。例如，南斯拉夫试行的合作所有制形式（自我管理）跟两个协调机制B和C（市场和“联合”协调机制）相连接。经济中大部分归属于通常的市场协调机制。与此同时，所谓的“社会契约”被用来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代表们之间的直接接触；他们被认为是可以自愿地相互调整。官方强调的协调机制B和C之间的互相交替，实际上，官僚协调机制一直是盛行的，并且是处于潜伏方式的主导力量。

^② 在很多著作中，合作所有制和C型协调机制跟一些政治理念相结合，例如，政府行政放权，地方政府角色上升，参与式民主和自治，不同类型的法人观念等。当然，这些方面的讨论超出了本章研究的范围。

和私有所有制形式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但是也存在一些合作社所有制。同样，虽然 A 型和 B 型协调机制被广泛采用，C 型协调机制在一些地区也起到了作用。对比于 1 和 A，2 和 B 之间的强联结，其他任何形式的，所有制形式（1，2 和 3）和协调机制（A，B 和 C）之间的所有潜在联结都是弱联结（图 2.1 显示的虚线，就是四种潜在的弱联结；当然，也有可能会有其他联结方式）。

对所有制形式、协调机制以及它们之间联结的强弱有效性的猜测是一个经验问题。正如引言提到，目前的研究并没有提供经验证据。然而，我认为上述一般性结论可以有效地通过实证检验。这些猜测，在现有文献综述或者未来相关实证研究中，可以获得支持，或被更改，甚至被否认。在任何情况下，需要通过验证的实证型猜想问题必须与严格的规范性问题相分开——人们对所有制形式和协调机制之间的替代组合方案的政治和道德偏好。⁽⁵²⁾

必须承认一些形式的弱联结是基于短时期内对小样本的观察所得出的结论。也许，从现在开始的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研究人员也许能够观察到这些趋势都停止了，历史选择了另一条路线，它总是难以预料的。但是，只要经验没有提供相反证据，我们就值得牢牢记住所有制和协调机制的强弱联结。

完全可以理解各种社会团体和思潮们的提议——让“3”类型的所有制形式和 C 型协调机制及其之间的协调联结，在改革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努力可能会产生有益的作用，但前提是，提出这种建议的人最好不要有一些虚假期望，也不要尝试让既非国有又非私有的所有制形式和既非政府协调又非市场协调的协调机制成为主导。不去关注“弱联结”的弱点，或者认为这些形式可以在“强联结”之边发挥辅助作用，这些观察在理智上都不诚实。

六 规范性启示

如果没有寻求第三种形式的所有制形式和第三种形式的协调机制，人们就不会面临着真正的艰难抉择。因此，我们真正需要决定的是两个强大所有制——公有制和私有制——各自有什么相对重要性。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决定两个强大协调机制的相对份额：政府协调与市场协调。

- (53) 这里需要一个**警告**。在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实证（描述性）研究中，关于改革思路的讨论很少有一些批判性的论点，这形成了一种**规范性扭曲**。其逻辑结构如下：“如果你说的现象 A 会产生不好的影响，那么，这意味着下列的价值判断和规范建议：消除这一现象，就会消除其不好影响。因此，现象 A 应该被淘汰。”这个思路在逻辑上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即使有人能证明这一现象（A）有不良影响，它并不会遵循下面的命题，即，（1）在给定的条件下，消除 A 现象是完全可行的；（2）消除这一现象是消除其不良后果的一个充分条件。

现在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本章所阐述的观点。在实证分析上，我希望自己可以避免出现上面提到的规范性扭曲。尽管实证（描述性）研究证明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是两种强大的经济所有制形式，并且它们各自与其相应的协调机制建立了很强的联结——政府协调或市场协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会存在与这些形式相一致且清晰的经济政策。这些实证研究的结论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改革必须放弃国家所有制而转向私有制，或者相反的建议——放弃私有制并建立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经济格局。另外，这项研究也不认为，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不是……就是”型的互斥的二元选择：不是国家所有制和官僚协调机制，就是私有制和市场协调机制。本章所提出的观点应该被详细解释为以下几点：

（1）公有制和私有制可以在同一社会中共存。然而，在改革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环境中，这样的共存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共生，这一组合有功能失调的特性。

（2）公有制和私有制各自比例的实际位置，政府协调与市场协调相结合的位置，它们都依赖于决定这两个位置的价值体系（这可能是一个人、一个运动群体、一个政党或一个协会组织）。一个人对公有制或对私有制的态度并不按照严格的经济效率而进行思考。它受到强烈的政治、思想、道德和情感的吸引或厌恶的影响。

- (54) 本章并没有对价值判断发表评论，也没有对背后的政治和道德标准进行评论。^① 它所尝试的分析温和很多：它提供了一个**有条件的预测**，基于所有制和协调机制之间的各种可能连接线的优劣势的一个理论猜想。

本章仅仅是个警告：让我们不要存有幻想，不要抱着不切实际的期

^① 我已在 1990 年出版的书中，表明了对这些问题的立场。这项研究仍然在实证分析的领域。

望。当公有制占到很大份额后，就会有“一揽子交易”；而且，这里面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较大比例由政府协调和干预。此外，我们还需要另一个警告：如果一个人真的希望有更大的不断增长的市场协调机制，他必须依据事实并接受随之而来的更大份额的私有制和私人经济活动。如果没有适当的所有制形式（比如私有制）作为显著后盾，就不会有令人期望的协调机制（例如市场协调机制）。同样，如果没有相关的协调机制（比如政府协调），我们也不能得到期望的所有制形式（比如公有制）。这就是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变化的现实政治。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观念。这一常用口号期望公有制与市场协调机制可以相匹配，但这只是个误解或是一种衍生出来的期望。我们可以说，在各种改革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用这个口号作为工具，作为一种教育工具。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每次都必须经历逐步觉醒的路径吗？

(3) 那些真正希望市场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人们，就必须允许有正式和非正式的私人活动空间，企业自由进出、竞争关系、个人创业和私有财产。只有私营部门大量扩展后才会为整个经济的市场化创造有利条件。前进的方向，即私营部门的诞生方向，是经济改革最重要的尺度。没有这样的改革运动口号，改革就只是一个口头上的权力下放和市场协调而已。(55)

我认为，即使在东欧发生了体制上的变化，仍然需要及时地重新思考本章所分析的问题。许多极具影响力的人，特别是经济领袖和学术界的经济学家，他们仍然对市场社会主义抱有极强的幻想。很多人希望国有企业最终可以转化为以真正的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组织。我认为，加斯帕·米克洛什·塔马斯（Gáspár Miklós Tamás）正确地指出，上述的想法是**第三条路**概念的其中之一。^①我相信，只有那些正面面对改革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且对失败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解的人们，可以没有偏见地制定出实用的经济政策，促使制度变迁并过渡到新制度。更深层次的理解，下面的问题值得重新思考：哪一些所有制和协调机制相互兼容，彼此有亲和力？而哪一些基本上互不相容？

^① 参阅 G. M. 塔马斯 (G. M. Tamás, 1989)。

(57) 第三章 苏联的自由经济之路：旁观者的评论^①

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对每一个国家而言，只有生活在这样社会中的人们自己解决了过渡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这项工作才算完成。旁观者也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理解这种困难和过程。这是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它提醒我要谦虚；没有人可以肯定他或她的意见可以被采用，或者他们的观点指明了最合适的方向。在本章开始，我就需要强调保持谦虚，但是，随后我不会屡次提醒自己，也不会保留己见。我的研究都严格思考所提出建议和一般性观点的适用性；同样，苏联的经济学家们也可以在丰富的地方性（苏联）知识基础之上，提出他们的观点。

我不是一个“苏维埃主义者”。为了尝试理解苏联的问题和选择之前，我的观察和知识储备有两类来源。

作为一名匈牙利人，我近距离地研究所有发生在自己国家内的一切事件。跟苏联相比，匈牙利很小，但它可以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一个执行了一些非常重要实验的实验室。在改革实验上，匈牙利已经远远领先于苏联经济几十年。为了推进社会的根本变革，在1953年至1956年，发生了第一次犹豫、中断、无情地镇压实验。1968年重新开始拆除旧式的命令经济。在1989年，终于来到了政治转折点，民主政治体制的形成和与之相随的自由选举；政府公开承认朝向市场经济过渡，私有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我认为，匈牙利的历史经验，对朝向类似方向推进改革的

^① 我要感谢列宁格勒大学校长——S. L. 马恩库日瓦 (S. L. Merkuriev) 教授和他的同事们的盛情邀请。衷心感谢布赖恩·麦克莱恩和朱莉安娜·班波，谢谢他们准确和流畅的翻译。这次演讲结束后不久，列宁格勒的名字被改为圣彼得堡。自此，除了城市恢复到它的旧名称，苏联和其他许多伟大的发生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的改变都已不复存在。

所有国家具有启发意义。^①

另一部分知识来源是基于我有专门关注比较经济制度的事实。我主要关注东西方，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我不仅仅只是查找专业文献和统计资料，在过去十年半的时间内，我常常去社会主义国家（最近是后社会主义国家），另一半时间在资本主义国家。我的工作单位一个是匈牙利科学院，另一个是美国的哈佛大学。这种“通勤”的生活方式让我从两个体制内的生活获得两种体验。

1989年，在政治变革和自由选举之前，我写了一本关于匈牙利的书，《一本关于经济转型原因的充满激情的小册子》。这本书被翻译为英文，并做了一些扩充，书名改为《通往自由经济之路》（1990）。^②我很高兴，现在俄罗斯的读者也可以读到这本书。^③我认为，这本书中很多观察也适用于苏联的情形，当然，需要做出调整，并符合一定的条件。本章与这本书相关。当我写这篇文章时，简单总结了书中的内容，同时增加了一些来自实践经验的观察。^④我想特别强调，从苏联目前的做法中，我获得了一些最重要的观念。 (59)

本章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前一部分的两个小节提出了一个警告：在我看来是应该被避免他们所讨论到的死胡同。其余部分则是我提出的一些建议。

① 关于匈牙利经济改革历史的英文文献包括：L. 安塔尔（1979），T. 鲍尔（T. Bauer, 1983），I. T. 拜伦德（I. T. Berend, 1990），P. 黑尔（P. Hare），H. K. 雷迪斯（H. K. Radice）和 N. 斯温（N. Swain）合编（1981），J. 科尔奈（J. Kornai, 1983, 1986, 1989, 1990a），J. M. 科瓦奇（J. M. Kovács, 1990），G. 喏瓦斯（G. Révész, 1990）和 L. 萨姆利（L. Szamuely, 1982, 1984）。

② 在一定程度上，这项研究可以算是《通往自由经济之路》（1989, 1990a）的简短摘要。然而，在某些方面，这篇文章不同于此书。例如，它让我对休克疗法的问题看得更清楚。有些建议不是那么激进，比如，对个人所得税时间表的累进性，或引入可兑换的速度。

③ 这本书在俄罗斯有三个版本；首先是有限的独家版本，然后在非常普遍和流行的期刊 EKO 上出版四期，最后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大版本（[1949] 1990）。

④ 对我观念影响很大的是波兰稳定的经验，与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的沟通交流，在此表达我的谢意。我从苏联转型的第一个激进计划中学到了很多，这通常跟 S. 沙塔林（S. Shatalin）和 G. 亚夫林斯基（G. Yavlinsky）的名字联系起来，还有其他几个苏联和外国经济学家也参与计划制订。参见工作组制订的所谓的萨塔林计划（1990），以及由 G. 艾利森（G. Allison）和 G. 亚夫林斯基（1991）编辑的册子。本章提出的建议符合其他一些稳定计划，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在一些关键点上不同。

一 改革社会主义

我将社会主义体制区分为两个“原型”。为了让它们更形象，附上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字来区分这两种类型。一种是**经典社会主义**：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苏联）、毛泽东（中国）、昂纳克（民主德国）、胡萨克（捷克斯洛伐克）和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另一种是**改革社会主义**：铁托（南斯拉夫）、卡达尔（匈牙利）、邓小平（中国）和戈尔巴乔夫（苏联）。^①

改革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经典社会主义的某些方面被保留：（1）维持共产党的执政角色，也增加了对不同政见的容忍度；（2）普遍存在国家管制且经济部门从属于政府机构；（3）国家所有制的优势地位。资本主义的下列元素同样存在；（4）市场是主要（或主要之一）的经济协调机制，这包含了深度分权、企业高度自治和价格的部分开放；（5）虽然局限在很窄的范围，但私营部门得以发展……

改革并没有达到**微观经济**应有的真正的市场经济属性；因为它与一些（60）不利的**宏观经济**现象相连。名义工资出现失控。虽然企业没有真正的自治，它的部分独立性足以提出一个与生产增长率脱节的无所顾忌的工资增长方案。银行体系不负责任地分配贷款，也不坚持企业必须偿还贷款。实际上，信用成为挽救处在财务崩溃边缘企业的主要手段之一。财政纪律松散。一方面，既增加企业生产和销售的亏损补贴，又增加各种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补贴。同时，国家却做出不合理的大手笔投资，这必然导致回报的低效率，进而造成实际损失。国家花费巨额资金维持军队，还进一步重整军备。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征收出现松弛。支出和收入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引发了财政赤字，这包含了大量引入国外贷款，或大量印钞，也就是说，通过通货膨胀的手段解决财政赤字问题。

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三种**宏观失衡**危险：（1）长期的日益恶化的短缺经济；（2）加速的通货膨胀；和（3）不断增长的债务。这三个问题以不同

^① 在列宁格勒讲座基础上，形成了这篇研究中的观点，本章所涉及的问题在本书第一章中有更为详细的讨论。为了避免重复，在很大程度上，本章仅呈现了更长版本的演讲稿中的简化观点。即便如此，我一直无法回避两项研究之间的重复。

的比例在各个国家的不同周期内出现。因为这三种危险以最极端的形式在波兰经济改革中出现，所以它曾被称为“波兰综合征”。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波兰走上了彻底变革的道路。如今，它被更贴切地称为“苏联综合征”，因为在苏联这三种不良现象正在并行发展，而且它们之间的融合已经到了最令人压迫的程度。

重组改革结束了经典社会主义的僵化行为，但同时它也放松了原本严格连贯的纪律。同时改革也证明了我们无法在原有基础上创建真正的市场纪律，因为法律需要通过合法的议会决议，而且必须存在真正的市场竞争。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私营业主，他们受成本收益的影响，所有的支出和收入都是自己的腰包，同时他们不依赖国家帮助摆脱任何财务困境。

苏联的这场市场社会主义实验，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不完整也不连贯的，因为它并没有彻底改变体制问题，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财产关系。这场实验属于“跷跷板”，也就是说，两边都不到底：它既不是社会主义（因为如果没有了坚定的镇压和对公民自由的限制，这一制度不能永久地运作下去）；它也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失败是注定的。

二 浪漫的第三条路

(61)

市场社会主义，正如前面提到的，本身就是一种对“第三条路”的尝试；包括苏联在内的几个国家已经推行了这种实验，但结果并没有奏效。然而，依然存在着可以称为“浪漫的第三条路”的思想趋势，任何国家或地方都未曾尝试过。它似乎只出现在文章里，或者更频繁地出现在作家、政治家和社会学家的谈话中。也有一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包含了类似的想法。

虽然这一思想趋势并不一致，我会尽量挑选出他们想法中的几个共同特点。

我们期望什么样的社会呢？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因这一群人的背景和未来期待而有所不同：

- 必须返回到田园式的纯净又自然的生活。
- 必须创建一个真正的生活社区，这意味着公有制。这一想法以不同的版本出现在很多讨论中：村社、农村合作社、真正自愿的合作社等。

- 虽然下列提议可能会被认为是第二个提议的另一个版本，但是需要特别提到的观点是：必须建立工人组织，并且将工厂所有权赋予工人。这意味着要满足工人自我管理的需求。

- 必须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必须淘汰商业中的奸商和投机者。

- 应该有社会纪律，而且它们必须基于传统和宗教戒律。有些人希望有一个独裁统治者——国王或皇帝，按照古老的传统强加社会秩序。其他人则反对专制统治，拒绝因为尊崇和胁迫而建立的纪律。这些想法很接近古老的制度同时也很接近现在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和无国家主义，崇尚自愿纪律，并辅之以“直接民主”，避免现代西方的议会制和多党制的形式。

(62) 或许上述表述太有秩序。现实中，这些想法常常纠缠在一起，很多未经过深思熟虑，只是一种情感的启发而不是有序的理性思考。

让我尝试没有偏见地评估这些想法。事实上，从伦理的角度，我唯一反对的观点就是专制统治：社会纪律不值得有如此的代价。自由和人权是如此有价值的观念，它们不能服从于其他欲望，例如，期望秩序和纪律。

在我脑海中，所有其他的诉求，并不让我反感；我尊重人们期望诚实、社区生活，并摆脱官僚和暴利。我首先要反对的是一个实际问题：我们似乎只希望存在这样的期望集合，而不是提出一个现实可行的建设性方案。“第一体制（资本主义）”不应该经由国家力量而强加给人民。早前几个世纪，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局或政府会宣布：“让我们拥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数百万计的个人自愿决定的综合结果。虽然国家通过法律和制度设定来推动这种演变，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企业家决定了资本的积累，并扩大再生产。

国家力量建立的“第二体制”不同于此，每一个机制都是“自上而下”建立。

第三体制的信徒们需要考虑下面的问题：他们期望的行为形式和模式为什么之前没有大规模地出现，并占据主导地位？如果自由选择地区的人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选择第三条路，怎么可能希望我们这个地区的人们选择这条路呢？或者，如果人们不能够按照自己意愿做选择，是否应该在这个时候将体制强加给他们？

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说, 民主是一种坏制度,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找到一个比这更好的制度。民主有很多版本: 北美的个人主义和平等的北欧模式不尽相同, 但都形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通过改革对“第三条路”进行基本的修改, 但无论怎样修改, 都是非常不完善的。现实选择介于迄今存在的社会主义体制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做选择时不要抱有幻想: 我们不能真正地修复社会主义体制, 同时, 资本主义制度也有许多令人厌恶的特性, 即使已经修复了很多缺点。但是基本上, 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一定要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相对较好的制度。 (63)

三 改革与革命

对于两个死胡同已有很多讨论, 现在让我们转向一条可以到达自由经济的道路。首先, 我们需要简短地澄清改革与革命的区别。已经有许多不同的现有定义, 但对我而言, 需要在这项研究和我的其他作品中指出: 虽然改革带来了重大变化, 但是它依旧保留了旧体制的基本原则。而革命, 极端地改变了原有基本原则, 也因此实现了体制性变化。

因此, 这两个词语, 改革和革命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它是否发生缓慢而稳定的变化或迅速的爆炸式变化。改革可能是迅速的, 而革命也可能是渐进的。此外它们之间的差别也“不”是改革是和平的, 而革命却充满了暴力和血腥。改革的过程中也可能是由血腥的行动引起, 而那些阻碍改革的人也可能会使用暴力反对改革者; 而一场革命可能不会发生流血现象。改革和革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如何在浅层或深部产生变化。使用黑格尔的话, “革命带来质变”。

根据这些定义, 可以说, 重组改革不是革命, 而是改革; 尽管在苏联的辩论中, 许多说法与此相反。现在, 苏联需要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使制度的基本特性发生改变。如果革命没有发生, 这些问题将会进一步恶化, 危机也将继续, 事实上是进一步深化。

从定义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我所主张的是我们需要一场革命, 而不是爆炸式的快速变化。如能顺利和平地发生, 那就更好了。在我的词汇里, 革命是指, 而且只能是指在一些关键事情上不作出任何让步, 同时, 必须坚持改变旧体制的基本原则。当然, 这只是一点而已, 但即使如此, 这一点却是一件不小的事情。如果一国公民期望经济繁荣, 他们必然需要一个 (64)

新体制。

我研究的题目中包含了对“自由经济”的表述，它不是简单的市场经济，因为自由经济是一种更全面的且包含更多元素的经济模式。下面我简单总结自由经济的一些主要标准：

- 经济制度可以保证企业拥有自由进入或退出某些领域的权利。
- 财产自由隶属于应被尊重的自由系列之中。必须保护私有财产；给予私有财产法律保障，保障其不会被没收。经济以产权关系为主导，这其中私有制是主要的所有制形式。
- 必须降低国家角色，国家和政府受法律、议会和公众监督。
- 市场必须是主要（虽然不是唯一的）的经济协调机制。

四 新政治时代：民主共识

解决经济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我是一位经济学家，但必须强调的是，我们面临的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

我对现在的情况或将在近期内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评论。我不觉得自己有能力做出任何评价。我所要描述的是一个新政治时代的开始，而不是假设中的政治局势，其主要特征如下：

1. 首先是公平的竞选活动，其次是公平的选举。开始运作新的合法议会。组成新政府，并能够获得强大议会的支持。
- (65) 2. 联邦机构和各共和国之间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每个共和国都接受了这样的协议。各共和国之间发展可靠的合作。明确划分权力、权利和义务的范围。这些范围可能由几个共和国分割出去。可以假定，目前苏联的大部分领土在未来会继续维持为一个经济共同发展区。
3. 对于军队作用，彼此达成一致，由民众监督。
4. 重建并迈向自由经济的转型方案得到广泛支持。这意味着两种意义上的共识。一方面，获得议会绝大多数支持的经济计划；另一方面，受到来自雇员和雇主的支持，后者也包括了私营部门的企业家们。

从现在开始，我将上文对政治形势总结的四点，简称为民主共识。

拥有民主共识的政府，也会有政治、法律和道德基础，并以此解决民众问题，就好像我们要掀开一国历史的新篇章。我们不能保证，每个人的生活将迅速或明显地改善。可以预见一些大困难，这意味着很多人会备受

煎熬。但是我们有能力领导国家迎接更美好的制度；最初几年会有更好的经济增长路径，也会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

我认为，我刚才概括的是一个历史性的、非复发的机会，但却不是预言，因为我并不能肯定这种情况真的会如此发展。我提出的是一个愿望：这是我希望看到的，那些长期遭受苦难的人，他们所处的政治形势可以向前发展。虽然伴随着这一理想状况的是很多麻烦和剥夺，但是比起其他任何痛苦，这种痛苦相对较少，并且可以相对较快地解决经济危机。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非复发的机会，但是我们错过这个机会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或许会爆发流血冲突，改变也被搁置，国内政治纷争以及相关各方缺乏协议而使得麻烦加重。政府可能会推迟那些痛苦但却重要的措施。他们试图减少牺牲，并尝试用其他措施来取代这些重要措施。(66) 从长期来看，这种做法只会延缓关键转折点，而不会绕之而过，拖拖拉拉一直持续了好几年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转变本身就意味着不可避免的牺牲。

接下来的部分总结了各项经济任务，每个都附有一个标签。

一些提议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提议的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局势；如果它要完全成功，就必须发展民主共识。

另一些提议是**无条件的**。即使民主共识无法发展，仍有实现它们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它们也有助于改善经济状况。

这种分类也表明，我并不主张“**全有或全无**”的策略。我并不是说，当最佳的政治条件实现之后，什么都可以实现；或者，在政治条件不理想的情况下，一切都是无望的。这两种情形之下都会发生很多伟大的社会变迁，但是，如果要达到真正的突破，一个新的政治时代是必需的。

我的提议基于以下三个主题进行分类：（1）宏观经济稳定和自由化；（2）产权关系的转变；（3）社会福利政策。

我没有试图让我的提议在学术意义上是“**原生态**”的：我不能拿出一些迄今为止的秘密法宝治愈所有弊病。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学家一直在世界各地争论这些问题。大多数人没有达到普遍共识，但我认为，至少它传达了另一个我自己认可的观点。

五 宏观经济稳定和自由化

我深信需要有大规模的一揽子措施来让苏联经济既稳定又自由。^① 这(67)是绝对必要的：在我看来，如果没有这些措施，苏联经济不可能稳健地发展。

“休克式疗法”是目前情境下，被大家广泛使用的术语。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术语，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称呼的破坏性已经到达一定程度，它会吓跑许多人。这个术语源于精神病学，是指通过冲击身体来达到治疗效果。但是，对经济稳定而言，这个做法没有用。在这里，我依然用医疗做比喻，“休克式”是不实际的疗法，尽管这一疗法并不希望有副作用，但在某些情况下，会存在无法逃避的副作用。如果这项工作可以不用“休克式”来完成，自然最好。我们需要尽量减少动荡和痛苦。

实际上，在我的作品中，也采用了医疗做比喻，我所主张的是“稳定化手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更好的表达方式；它是一个快速的、激进的干预，同时必须加上术前处理和术后调养。

“一揽子”的术语是指一组紧密且互相依赖的政策组合。如果只是推出单一政策，而不是一套措施，政策效果会受到怀疑，甚至是有害的。要达到成功的一个条件是这些政策需要在大致相同的时间里推出，或在一个短时期内集中推出，并且在细节上它们需要彼此协调。

我认为，一揽子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应该包含以下几项任务：

(1) 消除国家财政赤字。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任务。这里只特别讨论其中几个少数措施。

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消除补贴（包括价格补贴和公司亏损补贴）。即不需要一次性淘汰所有补贴，第一阶段需要将大规模的补贴局部性地拆解开来，并制定出明确的时间表来逐步地彻底地消灭它们。

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大幅削减军费开支。

^① 在我的书中，[1989]（1990）提出了关于匈牙利经济的这一观点。关于波兰经济实际执行的稳定策略，跟 L. 巴尔采罗维奇（L. Balcerowicz）主要观点相关联。对波兰稳定策略有很大影响的是 J. 萨克斯的作品；这个想法和早期经验总结出现在他和 D. 利普顿共同撰写的文章中（1990a；1990b）。其他许多经济学家支持这一策略。例如，参见 O. 布朗夏尔等（O. Blanchard, 1991）、S. 费希尔（S. Fischer）和 A. 格尔布（A. Gelb, 1990）。

同一时间需要提高税收。迟早有必要制定一套包含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在内的最新税收制度。不过，我觉得第一步应该是规范流转税，并提高它们的平均增长率。

在任何情况下，中央银行信贷不能够再包含预算赤字，因为，如果包含会不断刺激通货膨胀。如果所列措施被证明是不足够的，我们有必要推进国外或国内贷款。

(2) 需要严密的紧缩货币政策，并严格控制信贷。如果银行系统继续胡乱分配信贷，经济稳定将会面临严重的危机。(68)

(3) 需要谨慎地确保工资纪律得以执行。这一条极其重要。员工和代表员工的工会要保持自我克制和负责任的行为。当我谈到民主共识的需求时，它是我想到的其中一个事情。但必须补充说明，经济社会稳定的命运不能完完全全委托给人们的自愿型自我约束。当企业没有遵循工资纪律导致名义工资跟实际生产率之间不匹配时，需要征收惩罚性的税收，并采用适当的财政措施。

(4) 必须释放所有价格。采用反垄断法和充分的国家监督来降低一些公司滥用垄断地位的机会。

(5) 需要大幅贬值卢布。设定可以与实际市场转换率相对应的卢布和硬货币之间的汇率，这样可以持续较长时间。

要去稳定一种摆荡的货币，总是意味着我们需要立即调整每一种物价、每一个汇率和银行利率、每一种工资，还有每一个量化指数。那么，我们需要一些“固定点”作为基准。在讨论稳定的文献中，他们使用了“名义锚”一词。“名义锚”是指一种锚，可以固定处于摇摆中的经济船。可能会出现在各种稳定中被应用到的各种经济数据——例如，货币供应量，平均工资水平或固定汇率。我同意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即在东欧和苏联稳定过程中，最佳的候选“名义锚”是固定汇率。汇率固定会减轻第四项任务——价格的自由化。至少，对于国际市场贸易中的产品和服务，其价格的计算起点一定是国际市场价格乘以稳定的汇率。因为国内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它的计算可能与国际市场价格不同，但是从一开始国内价格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不必无中生有地编造新的价格体系。

(6) 何时以及如何兑换本国货币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我的建议与许多经济学家一样，第一批稳定政策组合应该包含了一些政策来促使货币(69)

的可兑换迈出实质性步伐，即使所有复杂标准不能立即在各方面都令人满意。我想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两个相互关联的政策。一个是合法化私人外汇交易。逼迫地下交易是不必要且危险的。在无须受到任何限制或者受到任何有关外币来源的查询的前提下，民众能够将外币存储在其银行外币账户上。另一个所需的政策是国有银行体系的承诺：以固定汇率进行外汇兑换，而不施加任何限制性措施。这样，这个固定汇率就可以转变成“锚”。每个人都明白——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个体户和外商——因为可以以固定汇率在硬货币和国内货币之间进行兑换，所以他们所拥有的钱具有稳定价值。

当然，还需要满足许多条件，货币兑换才可以在现实中得到应用。它不仅仅是一个声明而已。本章后段会提到一些条件，但有一个条件跟第五项任务相关，即正确的汇率。这个数字很难衡量。如果“缺失值”不起任何作用，低估本国货币总会好过高估。就让进口成为耗费很多成本的小事，因为出口会获得不成比例的利润；尽管这会加重社会大众的负担，但却可以提高经济的稳定性。

(7)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开放对外贸易，包括进口。进口到本国的外货可以改善供给，同时引起的商品竞争会鼓励国内生产商有更好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国外价格伴随着外国商品的进口而进口；正如前面提到的，真实的市场价格体系需要迅速地取代先前的荒谬的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为了推行成功的“稳定化手术”，我们需要对整个经济范围做出调整。

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有精心的准备。一些措施需要相互匹配；我们需要细心计算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让它们之间保持协调。

创造必要的政治条件至关重要，即上文所讨论的国家的民主共识。导致通货膨胀的其中一个因素是通胀预期；换句话说，经济中的参与者预计通胀将会持续。这种预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必须驱散它，并用新的期待取而代之，让公众、企业家和经济领袖们相信情况会改善，通货膨胀会得到遏制。这样的信念必须占据上风，政治家的话语和政府的承诺需要赢得人们的信任，采用命令方式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它必须基于政治合法性和信任。如果没有这种信任、信誉和共识，在经济堵塞和信任危机的影响下，稳定计划会崩溃。

改革从一开始就需要至少是一小部分比例的私营部门。改革发生之后

的一段时间，必须有运行着的正式和非正式私营部门，它们可以填补国有部门留下的空缺，并提供商品或服务给民众，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传递主要的稳定性条款。稍后再讨论这一问题。

储蓄是必需的。一方面，必须有货物的储备，如果卖场上出现各种食品，会在第一时间稳定股票市场，并带来信心和更美好的未来。另一方面，必须有外汇储备以确保货币兑换得以维持。如果在供给上出现问题，可以采用快速的辅助性进口措施。

稳定措施必须从根本上基于本国已有资源，但最好同时也有大量的西方援助，这样可以减轻负担。最有利的援助是稳定外汇储备和增加进口信贷形式的商品库存。

即使所有这些条件都得到满足，政府决定执行稳定性手术，仍然会带来巨大的动荡。一方面，可以获得相当大的效果。在价格上涨的初始冲击之后，可以预计以目前速度上升的通货膨胀将受到遏制；同时社会主义体制下最严重的慢性疾病——短缺，将会在广泛的经济领域内被克服。另一方面，伴随着部分的成功，巨大的困难也会被预测到：众多行业的生产力下降，一段时间后失业将持续增长。即使完成上述转变，也将难以保证稳定状况。

不幸的是，我们也需要正视其他一些可能的情形：上面列出的很多条件可能并不会得到实现。我认为我们不能够给出任何简单的治疗处方。如果上面总结的“一揽子”七项任务，只是一个一个地推进（或者缓慢地推出），它们带来的效果很可能弊大于利。我们不能给政治家们开出一张空白支票，这样他们在七项任务中任意挑选和设置任何他们看中的任务，以随意的速度或随意的顺序推出，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将事情控制住。如果确实如此，这会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它足以完全抹黑稳定计划。^① (71)

① 俄罗斯为众人所知的激进变革发生在1992年年初，这其中的一两项变化与本文提出的一揽子政策建议中某些相似。这次变革通常也被认为有诸多不利，对俄罗斯经济有令人担忧的倾向存在。我的观点仍然是，俄罗斯经济在1992—1994年的严峻形势并不能证明，这项研究于1990年提出的建议是有问题的。我在研究中指出，政治和经济状况是手术稳定的成功条件，尤其强调需要政治体制和权力关系进入，我称之为民主共识中的一种状态，并且私营经济可以获得一个关键的最低比例。不幸的是，1992年的稳定措施发生在这些必要条件都还缺乏的时刻。我提出的建议是有条件的。由于条件未能达成，历史经验不允许得出关于这一建议的结论性评估。发生了跟这项研究相反的偶然性事件：只有一些激进的措施相继出台，甚至是在缺乏必要的条件之下。由于这个过程被扭曲，并且只是一半完成，这一稳定规划的信用被广泛降低。

但是，我没有说，它是典型的“全有或全无”案例。仅举两个例子，减少预算赤字或遏制信贷供给的任何进展都是有益的。作为顾问，唯一能做的是权衡每一个案例中单一的部分性措施的优缺点。无论如何，今天的苏联所处的状况预示着没有任何一个局部措施可以代替庞大的大刀阔斧的一揽子方案。

六 产权关系的转变

首先，让我先讨论我们要达到的最终点。可以预计私营经济不会是一个绝对的统治者，它的比例不会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私营经济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份额的公司将继续保留公有制（州或市）。现在仍然太早做出决定，这一比例线究竟在何处绘制，这取决于各种产权形式之间的竞争，同时也需要参考国际经验。其次，公众的意志必须通过议会来发挥；什么可以继续保留国有制，什么需要私有化，都必须由法律来决定。

(72) 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私营经济也不是一个统一画面。小型、中型、大型，甚至是巨型企业，都并排运作。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济生产已经被过度集中，所以小型和中型企业的相对权重肯定会有所增加。

各类私有企业的法律形式相映成趣：股份制企业中的全部股份或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有限责任公司（尚未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个体户等。值得记住的是：美国和英国除外，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上市的股份制公司，尽管它们在市场上发挥很大作用，它们在整个经济生产中只占较小的比例。

经济过渡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达到最终点。我和我的很多东西欧同事们辩论这一问题，他们催促“快速私有化”。大家不要误会，我也希望过程可以尽快完成。但是，愿望是一回事，要去实现愿望的机会是另一回事。政府可能会做出货币可兑换的决定，或者修改外币兑换汇率，并下决心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项任务。但是，政府不能决定“引进资本主义”；即使是通过法令任命企业家。“资本主义”一词本身就揭示了一个事实：私营企业假设人们在赚取利润的希望之下自愿承担风险投资。一旦这样做，他们中的一些会破产，而其他人则会积累财富并扩大产业。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政府明智的措施可以加快这一过程，而愚蠢的

措施或冷漠会减缓这个过程。无论如何，这个过程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走完。

采用前面提到的条件，发展私营经济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它不同于一个宏观稳定有条件的任务（至少在稳定任务中最令人向往的“一揽子”方案中，这项任务是有条件的）。现在我们立即转向其中的一些任务。一揽子方案中的大部分任务可以在任何时候开启，即使缺乏关于民主共识的某些条件。如果政府将目前消耗能量的政治斗争的精力转移到执行这些任务，将是个好主意。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激进的政治变革和建立一个民主共识，也将会极大地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73)

让我列出一些部分任务：

1. 必须创建适应私营经济运作的“法律基础”。以下是立法所需的不可缺少的几个例子：合同法、公司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破产法、银行法和劳动法。即使早期的法律、法令、条例已经涵盖了这些法律，我们依然必须重新起草与现代市场经济需求相匹配的法律条文。

2. 伴随着法律的改变，舆论再教育是比较可取的方法。克服公众对私营经济的偏见，并引导公众欣赏和尊重私有财产和商业经济。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家、报刊和电视的宣传。

3. 早期阶段，私人商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被禁止；甚至在改革之初，私营企业也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较小的范围内才被允许。大部分私营经济被迫转入地下，以“影子经济”的形式运行。现在是时候改变各个经济成分的比例，可以允许哪些经济体运行，必须限制哪些，需要禁止哪些。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自由的，追求一切私人活动；“自由企业”应该成为一项基本权利。这项权利可以被限制，但只有在重要的公共利益前提下。认真起草需要被限制的部分，并通过立法做出规定，而不应该让其受政府的率性和随意影响。

4. 如前所述，必须禁止警察、当局和政治组织对私营企业的骚扰行为。私营经济不能等到企业自认为私营属性是完全安全的时候才开始发展和累积。

5. 私营经济的根基必须得到鼓励。除了从道德和政治上鼓励私营经济，也需要为他们提供有利的信贷条件；国家应该松绑信用体系，为“刚刚起步”的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同时，应该给予私人企业优惠性税收。

6. 需要高度重视目前已知的在一些东欧国家里出现的“小规模私有

(74) 化”。这包括零售店、餐馆、小旅馆、小工厂、车辆、住房和小型农场，它们既可以是个人所有，也可以是合伙经营。我只提到，买方以相对较小的股票资本进行交易。国家必须制定特殊的长期信用和还款计划，同时提供慷慨的资金来推进小规模私有化。

但是，如前所述，社会主义经济过于集中；许多巨型企业的规模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将它们分成更小的经济生产单位将会带来有利成果。

第5项和第6项任务密切相关。新的私营企业实际上可能通过购买国家所有的资产，或者私人企业成立之后，可能会在其发展后期，通过其他方式购买国家财产，扩大企业生产方式，并开始新的发展。

7. 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1)完全保留国家所有制是不可取的；(2)将其分解成更小的经济生产单位也是不理想的；(3)如要在经济上可行，将其转移到私人手中，对这种最有效的产权转移方式，存在着诸多争论。

我认为主要的措施应该是将这些企业转成股份制公司，并出售股份。让管理者和员工参与私有化计划已被证明是有益的；例如，提供合适的信贷计划，让他们获取一定比例的股份，这一方式值得鼓励。一旦市场经济逐步规范化，广大市民的大部分积蓄可以以股份的形式存在。人们可以从各种大型机构那里购买股权（例如保险公司和私人基金会）。

很多人支持股份免费派发，或者给企业员工，或者以优惠券或代金券的形式派发给所有国民。就我而言，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我能够支持的也就是以初始运营资金的方式向某些机构（例如，分散(75) 养老基金）分配免费财产。详细说明各种支持和反对的观点超过了本章研究的范围，所以，我只是提醒苏联同事们，他们可以查阅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文献。^① 各种情况下，借鉴东欧到目前为止的先前经验，苏联私有化的正确规划将变得更容易。东欧各国选择私有化的战略各有差异：东德和匈牙利基本选择了出售国有资产，而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正在准备大规模地免费派发给民众。比较各种战略的效果具有启发性。

8. 到目前为止，上述所有的任务都与金融部门强有力的发展相关联。下放银行系统的权力，发展私人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伴随着社会保障体

^① 在本书第四章中我将阐述我的立场。据我所知，产权自由转让的想法首次在J. 莱万多夫斯基 (J. Lewandowski) 和J. 思宗布格 (J. Szomburg) 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另参考R. 弗吕德曼 (R. Frydman)、A. 拉帕钦斯基 (A. Rapaczynski, 1990)、D. 利普顿和J. 萨克斯 (1990b)。

系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包含了大量其他各类金融机构，如投资和互助基金，资助高危新商业的风险投资基金，专门从事住房投资的金融机构，等等。

同时需要强调路径和工具的多样性。我想从众多的任务之中挑选出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发展新的中产阶级”，即出现上百万的中小规模的企业家。加入私营部门的这个新阶层，包括它的员工，其收入一般会明显地变得相对较高；这个新阶层成为新体制中城市和农村的堡垒。可以通过衡量这个阶层的增长速度来衡量经济转型的速度。中小私营企业家阶层的发展程度是考核新民主政府经济成功的指标之一。

七 社会福利政策

在新的民主政治时代，所有积极参与者必须从第一天开始就努力以人道主义方式完成社会转型。这也属于“无条件的任务”；不管是否具备有利于转变的条件，所有相信新民主政治秩序和高效率市场经济的人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在自己的领域内，努力缓解转型中面临的严重问题和伴随社会转型的各种阵痛。(76)

政治家的民粹主义言论顶多在一段时间内赢得人气，除非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可以帮助解决转型面临的问题。我不想掩饰一个事实，即推行本章第一部分列出的政策会伴随着多种牺牲。许多部门的生产量下滑，这也就产生了失业。相对价格和工资的调整减少了很多人的实际收入。大部分人的利益会随着价格的自由化和税收增长而受损，而他们也只是获得了部分补偿。当真正的市场经济成为主导时，许多方面的不安全因素会增加：商业失败，工作也不再安全。这一切都发生在国家临近崩溃，且储量耗尽时。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而且必须确保的最低标准是什么？

首先，必须公开承认失业是经济发展周期中的永久性附属品。这意味着，在尽责考量国家经济潜力之后，我们需要建立失业救济金制度，并以更好地组织劳动力的交流和再培训计划作为补充。

此外，需要建立福利制度，至少提供给那些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重返社会的人暂时性帮助，给予那些没有能力帮助自己的贫困者们永久性的支持。

旧有的社会主义体制中运作着一个大范围、烦琐且过于集中的再分配制度；这些分配包括住房、医疗保健和养老金。关于这一领域，非常需要执行权力下放，并让私营机构参与国家再分配制度，一起并肩作战。但是，必须以稳妥的方式完成再分配制度的转变，这样才不会在稳定化改革过程中，进一步加深给人民带来的创伤。我们需要以循序渐进的、非常委婉的方式推动转型。

我注意到社会福利政策在被转移到许多东欧国家时，阻碍了民主共识的发展。我真诚地希望，在苏联，他们将吸取这方面的经验，并尽量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社会福利需求不是为了建立新的国家规则和制度，而是为了创建和维护一种新的公共道德。我们生活的早期时代，国家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既令人感到压迫，又保留着家长式作风，人民希望得到很好的照顾。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个人自由和自治的观念成为了价值观的中心。首领的诫命也是为了让所有积极的人自己帮助自己，不再懒散地等待国家代替他们做出决定，也代替他们做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当务之急也需要辅之以另一种任务：社会必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或由人们自愿自发地组织，或通过国家方式提供帮助。

第四章 东欧市场化的本质^①

(79)

一场范围广泛的关于东欧私有化改革的辩论正在悄然发生，这既包括了东欧国内与国际之间的辩论，也包括了西方学界内部的辩论。当然，辩论并不是局限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科学。由于私有化是社会主义转型的根本问题之一，政府、政党、国际组织和商业领域都拥有他们的立场。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表达了上百种不同的意见，同时伴随着的是，人们也提出上百种不同的解决实践问题的具体方案。^② 在此，尽管我会提出我个人的见解，但却没有试图要制定任何一个“一百〇一个”方案。^③ 我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读者针对问题进行有条不紊地分析。我勾勒的知识结构使人们能够聚集他们所拥有的信息，并在选择立场之前，正面面对其他不同的意见。

“私有化”一词，正如这篇文章的题目，蕴含两种意义。在狭义上是指国家迄今为止拥有的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更广泛的解释是，经济中的所有产权关系是一个整体，私有化必须被理解为，私营经济的份额增长至它最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本章所讨论的私有化是更广泛意义上⁽⁸⁰⁾的概念。

正如题目中提到的东欧，本章主要的研究范围包括了后社会主义转型道路上的众多小国。不过我相信，本章所讨论的问题，苏联也面临着类似

① 本章是布赖恩·麦克莱恩和朱莉安娜·班波从匈牙利版翻译成英文版，我很感谢他们的出色工作。我还要感谢玛丽亚·科瓦奇和卡拉·克鲁格的援助，他们收集了本章中相关文献。

② 关于这个问题有非常广泛的文献。这里，我只选择了几个关于东欧私有化的英文研究：S. 菲舍尔和 A. 格尔布 (1990)，R. 弗吕德曼和 A. 瑞帕斯拟思科 (1990)，D. 利普顿和 J. 萨克斯 (1990)，J. 莱万多夫斯基和 J. 思宗卜格 (1989)，M. 海因兹 (M. Hinds, 1990)。D. 斯塔尔克 (D. Stark, 1990) 做了一个这一辩论的非常好的调查。

③ 我在 1990 年出版的书中第一次提出关于私有化的观点。借鉴于随后的辩论和实践经验，本章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之前的观点。这项研究纠正了之前观点的一些问题，我认为这很有必要。

的问题。

第一部分论述推动私有化的价值观，第二部分探讨转型的演进特征和国家的作用，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讨论私有制的主要形式，第五部分涉及私有化的速度。

一 价值观

国际辩论中对私有化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但却没有明确回答一些关键问题：他们期望这一过程是为了什么？他们寻求实现什么样的价值？他们做出这一决定的标准是什么？

我赞同那些坚持在分析实际运作中必须将目的和手段明确区分的观点。^① 我们还需要对过程发生之后的任何后续评估提出明晰的标准以做判断。在这里，我并非将所有的关于价值的细节都考虑进来，只是提出那些我认为本章主题中最重要的部分，并分为四个层面进行讨论。

（一）社会层面，长期性的历史角度

一个继承社会主义体制的社会，新的民主运动方向是什么？

经典社会主义——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给人们带来的是统治政府和组织等级的社会。国有化延伸到超越企业生产的范围，几乎涵盖所有的社会活动。每一位身强力壮的人，除了少数的例外，都是国家的雇员。

很多年前就已经推动改革的国家，例如，我自己的国家——匈牙利，⁽⁸¹⁾ 曾有过一场运动，予以摆脱最终形态的**中央集权**。这里不讨论转型中的各种状态，而直接转向转型过程带来的长期远景。

1. 类似于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将是理想的社会结构。社会中应该出现由独立自主的商人和企业家组成的广泛阶层。也就是说，不同于绝大部分财产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上，社会中应该有一个广泛的包括中小企业主构成的中产阶级。简言之，社会应该经历中产阶级化。^② 社会中的官僚和等级分层，应该由广泛的财产分化所取代。换句话说，尽管国家

^① 这是 J. 丁伯根 (J. Tinbergen) 作品中的一个主旋律方法论思想之一。例如，参见 J. 丁伯根 1952 年的作品。

^② 参阅 I. 撒列尼 (I. Szelényi, 1988)。

的经济活动会继续保持相当大的比例，但是依然需要消减国家在经济中的过度活跃的日益增长的角色。

通过普及最新的科技和生活方式，所有社会结构的转型都需要现代化生产和其他社会活动的配合。

在很多东欧人看来，“西方式”的社会景象是可以实现的社会转型目标，但很显然，这并不是唯一的既定设想，即使“西方式”社会景象是其中一个不同于早期社会主义体制所拥护的社会理念。

2. 有些人讨厌西欧和北美的现代化商业状态：商业化、投机商、超大和拥挤的现代都市，工业化对环境造成破坏等诸多弊端。所以，相反，他们倾向于另外一种图景，浪漫的“未受污染”的社会。拥护第三条路作为其世界观的人被下列景象所吸引：接近大自然中的村庄，和平的小城镇，简单的小规模农业和工业经济体。

3. 另一个关于“第三条路”的社会远景是将资本主义融入社会主义的平民思想中。这个目标就是“人民资本主义”，所有的公民都成为业主。

所有这些未来社会发展的远景都对私有化改革过程有直接的影响。我准备好谴责这些缺点，并倡导大家要努力减少这些缺点；但我也知道，这些缺点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接受“西方式”的社会发展就必须接受它所有的顽疾。我认为，我们不可能到达刚才提到的“第三条路”的未来景象，抑或实际实践，抑或理想状态。⁽⁸²⁾

(二) 经济层面标准

这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各种经济利益都需要考虑。

1. 我认为最重要的经济指标是企业所有制形式可以带来高效的生产率。私有化的其中一个使命是必须在业主的直接经济利益与市场表现和利润之间建立明显的亲密关联。

让我挑出其他三个经济标准，它们也值得考虑。

2. 私有化过程将有助于加强私有财产的安全。

3. 财政激励：私有化有助于通过出售国有财产提高国家财政收入，通过预算支出分配补贴亏损的国有企业，并寻找新的税收机会。

4. 货币激励：一些形式的私有化对反通货膨胀有帮助；它们有助于消除未用购买的“货币过剩”。其他形式的私有化对增加通胀压力有明显的完全相反的作用。

（三）政治权力层面

虽然关注经济合理性和道德标准的学者们可能不愿意考虑这一层面，但事实上，这是任何形式私有化都必须面对的政治问题。执政的政党和团体要加强维护他们的权力，而那些反对者在期望组建政府的视野中看到问题。所以，人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即任何私有化计划是如何当之无愧地被推出，亦或不应该被普及。

1. 国家将没收的财产归还给原主人，在一些因素中，政党主要考虑的(83)是通过此增加政治影响力，又或者是在下一次大选中能赢得多少票。

2. 那些支持员工持股的政党也是希望赢得这一广泛社会阶层的政治支持。

3. 最后，向所有公民提供免费的股票或凭证的主张，所依据的想法是在整个过程中受到公众的欢迎。

之后，我将再次探讨这一问题。这里，我只谈论一个小观察。这些想通过一些或其他方式寻求政治支持率的人常常忘记仔细严格地审视是否那些期许真的是他们真正热衷的理念。我几乎找不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令人信服的民意调查。就我而言，我还是有质疑，但必须承认我的怀疑是基于不够充足的令人信赖的印象。这些获得财产的人可能会失望和愤怒，而不是政治上的感激，他们发现所获得的财产低于他们的预期或者是低于被承诺的部分，而且这一过程缓慢而烦琐。

（四）分配道德规范层面

这个层面的标准是另一个非常复杂的、充满内在矛盾的体系。这里，我们需要考虑的道德原则，只限于那些直接与收入和财富分配相关的部分。

1. 那些在之前的体制中遭受损失的人们，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必须全部或部分地获得补偿。有些人认为，在可能的情况下，被没收的实际财产项目应该归还给原主人，如果它们仍然保有原来的物理状况。其他人支持，应该仅仅以金钱或有价证券的形式赔偿。后一种方法的几个版本，大家都可以想象，包括赎回中的各种限制和转让的比例问题。

这个层面的一系列疑难问题都会发生。什么样的伤害应该被纠正？赔偿是否只限于持续没收的经济损失的部分，还是应该包括其他种类的损

失，从冤屈关进监狱或被惩罚而导致失去工作，或者被剥夺继续接受教育或出国旅游的资格和机会？什么日期应该算是被补偿的起点？它应该是在共产党上台后，或者时期应该拉长，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统治时期遭受持续性损失且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却一直没有获得补偿算起呢？

最终，那些对重新私有化持有伦理观点的人希望应用这一原则来获得再次的补偿。⁽⁸⁴⁾一种经济观点，在上述经济标准2列出，也可以用以支持重新私有化：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理念的具体体现。但这种说法，可以被与另一个同样依赖于经济标准2的观点所驳斥：重新私有化的漫长过程可能会破坏基于现状的财产关系的安全性。前业主的建筑物或企业可能已经被私有化。

重新私有化还可能与其他经济标准相冲突。它剥夺了财政收入或实际涉及的额外公共开支（经济标准3）。如果以证券方式来支付应获得补偿的部分，以及那些可以买卖的部分，很多人会为了在消费品市场获得立竿见影的收益，进而卖掉那些证券。这意味着，这一过程会增加通胀压力（经济标准4）。

对重新私有化赔偿方案需要做进一步的评论分析。那些支持这一方案的人们试图制造一种形象：国家正在对一些公众给予赔偿。但是，在这一情境下，什么是国家的而不是所有纳税人的总和？重新私有化的赔偿方式是将财富从非受益人的口袋和纳税公民一边，转移到补偿受益人一边的再分配行动。没有人关注，谁应该从没收到补偿时期获赔，而谁又应该在此期间遭受损失。现在这一代没有收到赔偿的人们也遭受着损失，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遭受因为原有制度的经济损失和落后带来的一切后果。

2. 基于道德权利的基础上，一个特定群体有权利要求获得鉴于他们的社会地位状况或其他公共财富的某些部分。“我们的土地属于那些原主人”，“我们的工厂属于那些在这里工作的人们”，“让国有单位属于那些住在其中的人们吧”。即使辩论局限在道德层面，但是可以被反驳掉，社会上其他人对创建这些资产也做出了贡献。是否耕耘这些土地的人们，在营利性工厂的现有工人，抑或现在住在具有吸引力、宽敞的公寓里的住户，比起那些不幸运的人，真的应该得到更多有价值的财产？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引用的口号是有利于社会中某些群体，以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再分配规则。

3. 公平和平等的要求。这一原则是由那些想要划分国家的一部分财产
(85) 给所有公民的人提出。是否这一提议跟其他标准相冲突将在后面讨论。让我们将时间保持在伦理争议的逻辑中。

旧制度未能履行其承诺——平等：民主继承的是一个物质财富和智力资本分配不均的社会。与这些初始条件相比，如果富人和穷人，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和未受教育的人，身体健康的人和患有疾病的人之间都受到适合的免费资助，很少会有改变。此外，免费资助很快就会被一些人根据需求出售，并且被那些聪明的有资本的人廉价收购。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更加平等的真诚拥护者，应该推动财政政策、福利政策、教育、卫生和住房政策，这些领域可以推进他们的目标。

私有化的目的是引进市场经济。尽管市场和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有许多实用的品质，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对经济高效运转的刺激作用，而公平和平等并不是其品质之一。它们不仅奖励好的绩效，还有好运，同样，它们惩罚不只是坏的绩效，也包含厄运。虽然它们作为一个整体通过鼓励群体去开发好运并抵制厄运而对社会有用，但是它们不“公平”。我认为，将公平和平等的口号混合到资本主义私有化的计划中，是一个道德悖论。

可以评估达成私有化立场依据的一系列标准已经被众人提及。其中，有些是兼容的，互为补充，但也有特定的情况下会发生冲突的价值观。短期的经济利益可能与社会转型后的长期利益产生冲突。伦理层面的考虑可能触碰到社会或经济需求。

在价值判断上，我自己的看法，其实在之前已经提到，这里我将做一个简要的总结。虽然我是一名经济学家，在社会层面，长期性的社会标准我认为决定性的，我选择前文社会层面标准1作为发展方向，因为我认为由企业家和商界人士组成的资产阶级化的广泛阶层的出现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把经济标准中的1作为重点强调：私有化必须以最有强劲的推动高效生产的方式实现。虽然其他经济条件也很重要，我认为它们是隶
(86) 属于我刚才提到的经济标准1。我承认一个事实，即政权层面也适用，但这不影响我自己的价值选择。关于分配的道德层面，我并非无动于衷，但是我会避免它们被应用在私有化的背景中。

当然，我尊重别人的不同于我的价值选择的权利。我想推荐给政治家、立法者、主张立法的专家、监督和批评规划和执行的记者：让他们分

析并公布，他们支持私有化方案的价值选择。让他们面对价值观的冲突，面对冲突性需求之间的“权衡”，并且公开承认如果他们赞成一种选择就会抛弃另一种价值。希望他们不要假装，他们认可的实际建议可以中立地并进一步考虑其他价值观的好建议。

二 转型演变的本质和国家作用

广为流传的观点是，国家机构应该为私有化发挥重要作用。这种观点可以在政府机构中找到。例如，在匈牙利某中央机关要求国家产权代理机构尝试在很长时间内将每一项私有化行动紧握手中。类似的集权可以在德国观察到。

许多外国专家也非常强调国家的角色，他们肯定不能被指责是想通过此次增加自己的权力。我本人也听到了以下的建议：苏联应该通过国家指令迅速建立二十项投资基金。管理这些项目的经理人应该由政府任命，同时引进国外专家的建议。这些资金应该由国家以前的国有企业分配股份，然后投资公司的股票应免费发放给所有公民。

我认为，匈牙利私有化的过度集中状态，并形成投资基金由国家政令来管理私有财产的概念，是哈耶克称为“建构主义”形式的好例证。^① 它们是人为制造的，而资本主义发展活力是源于可行制度的自然成长，而不是被强迫的结果。

苏联斯大林的集体化时期，极有可能通过国家指令消除富裕的农民基层，即富农。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法令可以创建一个富裕的农民阶层；这只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国家可以决定执行“没收”，但没有一个国家的方案可以创造出一个福特、一个洛克菲勒和一个杜邦。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业主阶层的出现是进化过程中发生的。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一堆已经浮现的制度和选择中，我们需要选择那些未在当时情况下消亡而继续运作良好的制度，以及那些真正地适合发展任务并生存下来的制度。^② (87)

波兰经济学家 J. 科瓦利克 (J. Kowalik) 创造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

① 参与哈耶克 1960 年和 1973 年第一章。

② J. A. 熊彼特 [1911] (1968) 就已经提出市场运行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观点，随后 A. A. 阿尔奇安 (1974) 做了进一步更详细的阐述。P. 默雷尔 (P. Murrell) (1990a; 1990b) 极力强调熊彼特的自然选择观点跟社会主义转型相连接。

名词，“中央集权的自由主义”，用来指一个好奇的思潮学派，他们提出通过官方人为制造出一些组织来追求自由的目标（如，私有财产、个人的自主性、消费者主权），目的是在社会转变过程中控制国家官僚机器的强制和行政措施。

国家主要应该做的是站在一旁，让私营部门自我发展，并确保其下属机构没有通过政府阻碍私营部分的发展。在此之外，有许多可行的国家措施，它们可以积极协助私有化，这些措施将在后面讨论。但是，政府不应该期望通过政府网络、过度的监管措施和政府官员热络的一系列活动，来取代自发的、分散的、有机发展历程的私营经济。

三 企业类型

（一）个人所有制

首先，让我举几个例子，让这个概念清晰一些。

A1. 家庭农场或承担另一种类型经济分支的家庭，偶然情况之外，一般不会雇用除了家庭成员外的人。

A2. 小型或中型公司，其中，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分离，企业所有者一并负责。

(88) A3. 一个新成立公司，在熊彼特意义上说，由企业家创立和管理，企业运营资金是借来的外来资本，而不是企业家自己的。^①

A4. 个人或团体拥有的股权占主导地位的任何规模的股份制公司。这也不必是多人股份；20%—30%的控股就足以让股份拥有者（或者是一个群体）在企业管理和监督、重大财务事项和投资决策上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和选择权。^② 例如，企业股份是分散的情况下，这种显著性一直存在，只要其他股东一直处于很被动的状态。这种情况可能类似于如果股票的剩余部分是由国家持有，国家会积极主动地干预公司业务。

^① J. A. 熊彼特 [1949] (1989年, 第266页) 写道“这一方式的基本重点是企业家很少用自己的储蓄……”并继续编录金融体系的各种来源, 包括信用体系。其中一种来源, “借用其他人的储蓄和‘创建信用’……‘信用创建’退出了银行和准银行业务……”在这个研究和其他一些研究中, 熊彼特具体分析了信用系统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

^② 术语“核心稳定”(稳定的核心)已成为流行, 如法国文学作品, J. 弗里德曼(1989)提到。

A5. 通过管理层的收购, 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或管理层已经成为企业主, 或者至少是占主导地位的股东群。

我还没有对互斥的案例进行严格分类, 仅仅是举了一些例子, 它们之间可能在功能上会重叠。这些例子可以包括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它们可能采用法律形式承担无限责任或不同程度的有限责任, 范围从家庭农场到现代股份制企业。那么最终, 这些例子的共同点是什么? 现实中, “看得见”、“有形”的个人或群体, 作为公司的负责人而存在。这些个人、家庭或团体拥有强大的和直接的所有者利益, 从而, 公司的盈利或亏损的大小都会影响他们自己的口袋。此外, 业主可以直接运行公司, 或者在雇用和解雇经理上有主导权, 并监督他们的工作。

个人业主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融入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一种是创建全新的事业; 另一种是购买一部分或全部现有国有企业。这两种方法经常结合: 国有资产被现有的私营公司收购。(89)

我相信, 个人业主在东欧私有化过程中是关键人物。让我们回顾这篇研究中第一部分的小结, 我概述了自己的价值观。我的选择互相兼容, 个人业主的大规模出现, 将确保最大程度的预期社会转型, 资产阶级化(社会标准1)和有效激励生产效率(经济标准1)。此外, 如果这个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购买国有资产, 这也将满足财政和货币标准(经济标准3和4)。因此, 可以说, 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可以更广泛地传递到个人业主中, 私有化的进程就更成功。东欧转型最令人鼓舞的特点之一: 演进中可预知的先进性。^①

有一种普遍的观点, 即私有化购买的上限应该根据市民累积的储蓄总额而设定。市民可以动用的储蓄和国家财富之间的差距常常会引起预期的警报。得出的结论: 可能在50年或100年之前, 公众已经成功购买了国家财富。因此, 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无偿分配国有资产会造成国家财产的迅速减少。

我认为这个论点依赖于错误的前提。公共投资(包括购买国有产权)

^① 东欧国家的统计数字已达到一个关键时刻。之前所有统计数字都是基于早前大型国有企业所提供的详细信息。这一比例正在缩小。与此同时, 统计部门还没有准备好, 既没有组织性也没有方法论, 来观察和衡量私营部门活动, 至少在很多情况下为了逃税私营部门试图尽可能掩盖其大部分经济活动。所以不可能对作为整体的各种私有制的发展规模做出可靠的估计。

的购买力，可以通过适当的信贷和延期付款计划而加倍。^① 首期信贷或延期付款的比例可以低至 1:10 或 1:20。从一开始这个比例取决于国家财富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出售给那些通过私人储蓄购买进而从事商业活动。此外，当一些企业开始盈利后会有更大的投资倾向，这个过程会加速发展。首先，它取决于国内和国外银行，以及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可以提供什么范围的诱人信贷和延期付款计划。此外，外国政府、国际金融和经济组织给东欧提供帮助的主要方式是设立类似的融资和支持计划帮助东欧建立私营部门。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建立特殊的“风险投资”的机构，在后社会主义经济中，贷款给新兴私营企业一定会附带特殊风险。但是，如果还款不能及时或拖欠，可以通过适当的抵押制度来降低这些风险，以确保财产归还给贷款人。另外，从一开始，贷款人可以是合伙形式。如果国家真的想要激活经济，应该考虑通过提供至少部分信用做担保来减轻贷款人的风险。在任何情况下，比起很多不进取的国有企业，大多数私营企业家将是更可靠的借款人，即使他们拖欠贷款。

只要，信贷和延期付款计划的设计足够谨慎，它们不会带来通胀风险。事实上，偿还债务和利息的讯息将使得一些潜在消费支出远离企业家（经济标准 4）。

管理层收购是一个很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对民众而言，他们是个矛盾体。值得高兴的是——专家接管工厂，而不是没有诚意的人；但不那么令人乐意的是，旧政权下的“干部们”蜕变成重生的资本家。在我看来，这不值得法律禁止，因为这难免会发生。直接告知公众，并受到公众、法律和有关当局的监督，这样更有利。需要澄清的是，需要订立管理层收购的道德和业务规则，包括正常信用条款。根据这些规则和法律手段，管理人员或管理层可以购买国家资产。

应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农民希望拥有私人土地种田，私人小规模的工业和贸易，以及作为整体的小企业。这在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很常见，⁽⁹¹⁾ 这些群体获得有利的信贷条件，并可能获得长期或短期的减税优惠。这也适用于东欧，尤其是现在，当我们的目标是从根基开始建立起这些群体，

^① 在这里我再次提请注意熊彼特对企业家和信用体系之间关系的论证，如第 68 页脚注^①的引述。熊彼特认为这如此重要，所以在对资本主义定义时，将其纳入其中：“资本主义是私人产权经济，其中创新通过借入资金的方式开展。”（1939，第一卷，第 223 页）

鼓励大规模的新兴小企业。社会标准 1 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建立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成分是中小型企业的加速发展。

这跟另一个范围的问题直接相关：如何克服企业规模分布的扭曲。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过度集中。西欧和南欧国家大比例的就业集中在员工不到 500 名的企业，大多数东欧国家的中小型公司都伴随着大规模人为合并。^① 给予中小型企业有利贷款申请的考虑因素中，我们需要考虑更为健康的企业分布比例。

（二）员工所有制

这里我想到的是，已被转换成股份制的国有企业的股份由其员工持有。对此，最常用的术语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著作中提到的员工持股计划（ESOP）。这一想法有很多不同的变异；某些情况下，员工获得全部股份，另一些情况下，他们只获得了较小比例的股份。在员工获得股份时，具体操作的建议也各不相同，从完全自由分配到相比于市场条件，员工购买股份的价格和付款条件的相对优惠。最后，关于出售股份有些什么限制的不同建议也已经被提出，例如，暂时或永久性转让。

当决策者考虑这种形式的所有制时，他们主要会受到政治标准的影响。只要政治家们坚信，他们可以通过可靠的民意研究：民众真正呼吁员工持股，以及员工真正需要它，我认为接受这些温和版本，没有特别的危险，也就是说，以有利的条件让员工持有相当小比例的股份，比如企业私有化后的 10%—20% 的股份。我认为以大幅折扣的方式出售给职工股份，⁽⁹²⁾ 而不是让他们免费获得是比较实用的做法。

小公司的情况，将所有股份传递到员工手中是可以接受的，换言之，处理有问题的企业，其所有制形式可以采用类似合伙或真正合作的方式。

一致性支持员工持股（或者我应该说是极端性）在现实中走得更远。他们希望所有的国有企业（或尽可能多的）完全转变成这种形式的所有制，不论其规模大小。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这项建议与无偿转让的观点扯在一起。他们为自己的立场提出两个主要论据。一个是经济标准 1：员工也

^① E. 埃利希 (E. Ehrlich, 1985) 使用 1970 年的数据，比较西欧资本主义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企业规模分布。根据她的计算，只有 32% 的资本主义工业公司曾经雇用超过 500 名员工，而 66% 的社会主义工业企业都这样做了。

是企业主，他们会有较强的激励去提高生产效率。就我而言，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证据。相反，如果员工选择自己的管理者，管理者变得依赖于自己的下属，这可能削弱工资和劳工纪律。反对这个假设的足够证据是源于工人自我管理的经验——东欧，特别是南斯拉夫的经验。

推行全面员工所有制的另一个论据是可供选择的分配伦理层面的标准 2：让工厂属于那些在里面工作的人。我的反驳已经在讨论价值标准的章节提到。

我希望各种形式的员工所有制，可以持有相近的立场，迟早这一所有制可以到达发达的西欧和北美国家的状态，换句话说，这一所有制将在经济结构中呈现出可观的比例，但远远不太可能成为主要形式。

（三）机构所有制

在可以适当地对另一种思路评论之前，需要对这一大比例的产权形式做分类。

C1.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一些后社会主义经济机构继承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双层银行体系，即中央银行之附属商业银行。一些后社会主义国家，直接进入了后社会主义时期，它们跳过社会主义改革时期，依然继承了单一银行体系，而现在必须设立商业银行网络。但是，无论起始位置如何，在后社会主义过渡的起始阶段，这些银行呈现下列特征：

银行的唯一所有者是国家。它们有可能发展成被称为“混合所有制”形式，这其中，银行之外的国有企业成为银行股东，由国家行政机构分配银行的所有权，反之，银行可以持有国有企业的股份，当它已被转成股份(93)制企业。^①但是，跨界所有制仍然仅仅是公有制的一种间接形式，并不能代替私有化。

组成东欧银行业的各类组织承担相当狭窄范围的经济活动。发达市场经济中有大量金融机构，根据严格的法律和经济标准，它们不能被认定为“银行”，例如，信用卡公司、风险投资公司、投资基金、共同基金、储蓄和贷款协会、外汇局等。后社会主义经济体需要制定一个多样化和多类型

^① 我的书 [1989] (1990) 讨论了混合所有制。在匈牙利的经验基础上对现象进行了详细描述，可以参阅 M. 莫拉 (M. Móra, 1991) 和 E. 沃斯卡 (E. Voszka, 1991) 的研究；演讲时尚未能读到这些文章。

的银行系统，这源于很多重要原因。

有些类似于银行的金融中介机构（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银行”）可能从一开始就会变成私有制。发展新的准银行机构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可以通过外资并购。

真正的私人银行，特别是大型私营银行的发展，似乎比较困难，即使它们的活动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很必要的。一方面，外资银行期望在东欧国家开设分支机构，当然这将是真正的私人银行。有一种可能，即从起初就是私有制的一两家分支机构将以准银行的形式运营，最终它们会被转换成真正的银行。除了这些银行的发展，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私有化也将发生。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这大概会意味着只有部分私有制银行和主要由国外投资的银行。

广义上银行部门的私有化将不只发生一次。在私有财产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之前，我们需要一些时间。几个因素影响银行部门的私有化。

(94)

瓶颈之一是专业知识、经验和最新技术设备的短缺。我们只要记住，这些还在通过支票付款的国家，尚未普及贸易和服务。落后的另一个例子是在这些经济体中只是偶尔使用国家消费信贷。

发展的另一个要求是建立必要的法律，同时除此之外，需要成功设立一套国家调控和监管银行业的制度。国家干预没有严重到扼杀个人的积极性将是可取的，但同时，银行部门也不能任其自生自灭。存款人的安全和国家的金融稳定，都需要法律、保险和监督保证。

这个问题至今一直是银行业自身的私有化问题。然而，它与其他经济成分的私有化有着密切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人在文献中经常提到德国（早前是西德）和日本的例子，其中，工业股有相当比例是在大银行手中。在此基础上的政策建议是国有企业相当比例的股份应该转交给东欧银行。

在我看来，如果这一建议过早又仓促地实施，不会达到效果；它将是无效的，主要是基于社会标准 1 和经济标准 1，我认为它们是最重要的方面。这种做法不会产生一个真正的主人，对提高效率有强烈兴趣。在许多情况下，目前很多与大型国有银行息息相关的国有企业存在重大损失。如果是这样的话，共同利益体的银行和企业会看到公司需要摆脱困境而人为地维持。危险的是，如果一家银行，在目前的财产关系中，也就是大型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将无法充分采用足够的商业标准。

另一个危险是，国有银行将一直是“政治化”的行政机构，正如它们的前身。政府各部分会在任何时间，把它们当做是自己的后院，并尝试安排自己的人担任领导职务。这也是一个警告，不能通过国家契约计划将银行从目前的状态转变成工厂制，即使银行本身属于国家所有。

我认为以后阶段的所有制发展可以与刚才提到的日本和德国例子相衔(95)接。随着国内和国外私人股份在一家银行或准银行机构的整体股份中比重的增加，^①它们就可以成为前身为国有的非金融企业的部分所有者。更多的银行或其他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运行基于真正的商业基础上，由私有制占主导地位更可预期，它将满足经济标准1：严格控制所拥有的公司，并采取真正的专业经济态度。换句话说，作为私有化的银行部门的发展是一个有机的过程，所以，企业全部股份和先前由国有企业持有的各投资组合，可以以同样的速度，传递到银行手中。例如，这样的股份和组合让国家资本投资于合资形式的银行部门。

C2. 养老金。养老金已经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法人股的主要股东之一。这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英国，有超过一半的股票存在于养老保险体制里。^②参与私有化辩论的许多与会者建议，东欧的养老金可以承担类似的所有权角色。所以这个问题需要更详细地讨论。

社会主义体制下养老金的提供是国家的任务。由税收和抚恤金支付的养老金缴款是国家预算的责任。即使退休金的提供是在一个单独机构手中，并且退休金缴款总额在名义上是一个单独的基金，该基金的任何盈余都由国家用在实践中，并且国家涵盖了各种预算赤字。虽然养老金的实际价值一直很低，并且受通货膨胀影响可能进一步降低，但是名义的金额是受法律保障。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没有其他分散的养老保险制度。

(96) 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养老保险制度的彻底改变被提上日程，但是在许多东欧国家，其最终予以采用的形式还没有任何进展。发达资本主义国

① 让我在这里重复刚才强调的观点：问题的关键不是一些私人老板手中的股份百分比，而是私人老板是否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这可能是知名的外资银行有可能成为匈牙利银行的主要拥有者，即使它只是一个小股东。

② 根据 M. E. 沙弗尔 (M. E. Schaffer, 1990)，在 1987 年 32% 英国股份在养老基金手中，25% 在保险公司手中。至于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的作用，沙弗尔的建议在许多方面类似于本研究提出来的观点。

家的养老保险制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统一的，东欧国家也没有达成共识——哪个西方国家的模式可循。虽然这不是本章在这个地方探讨的任务，养老金的角色无法避免地与机构持股相关。因此，我将从以下假设开始进行讨论。

迟早会出现混合所有制。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是必须保证养老金可以维持在基本水平线上的国家政策。当然，保障性国家养老金可以通过制定相应法律来确保高于申诉的最低水平，但是在知识层面上，这种做法的最终资金来源于税收，或以类似于税收的社保缴费来确保。

养老保险的另一组成部分是私人性质的，其主要资金来源是自愿捐款。其投资成本按照法律规定和劳动合同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养老金网络是分散的，并可以由两个非营利组织构成，它们唯一的任务就是为其成员提供退休金，以利润为导向的保险公司，承担支付类似于养老金的年金。

养老金里的国家其他财政收入通过强制性法律征收。另外，私人部分的会员制是自愿的。雇主和雇员可自由决定是否参加养老金计划。在分散式养老保险制度的情况下，每名雇主或雇员都可以在数种私人养老金计划之间进行选择。

没有办法准确预知东欧未来养老金制度将是什么样，但是，上面介绍的制度貌似是一个很不切实际的假设。同样清楚的是，过渡到混合所有制（包含私人部分）也只能是渐进的，不同年龄段的人考虑的出发点也不一样。那些已经依赖退休金或接近退休年龄的人不会再选择；他们必须有保障性养老金。个人生命预期越长，越可能需要在此方面，提供给他们选择的自由。他们可以依据个人预测性风险来决定是否需要将积蓄的一部分投资一些私人养老金计划或其他计划。发展成成熟的、负责任的、分散型养老金行业，显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也属于，我认为有机发展的过程类型之一。(97)

现在让我们回到股份问题。在西方许多私人养老金用于投资股票和其他证券的缴款来获得资本积累。^① 这些资金聘请职业经理人，他们试图建立最有利的组合，并密切关注其成员的利益。虽然他们能够控制这一巨大财富所有的采购和销售产品，他们只能通过购买某些证券和销售，间接地

^① 例如，在美国许多养老基金让其投资者自己，决定可以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上进行投资的贡献比例。

维护自己的影响力。他们的交易影响市场价格，同时也反映出企业价值。这种方式对企业管理人员有着终极性约束，如果企业估值大幅下跌会带给企业管理人员不好的影响，同样，精确的企业价值预估，会带给管理人员成功。最后，这种所有制只是部分地满足经济标准 1：提供激励让企业管理人员有效地管理企业。

从第一部分的价值标准出发，与私有化相关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值得将分散的养老金转换成股份制。没有必要完全依赖于未来某一天的股份累积缴款的部分性投资。如果每一个公司都拥有前国有股的投资组合作为初始资本的一部分，非营利、私人养老金的建立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资助。股份转换可以是免费的，因为有一个隐含的偏差：他们正在接管部分养老金承诺，而这迄今为止由国家预算完全承担。

当然，需要降低法律对这种转移的约束条件。另外，还必须慎重考虑，提供给大众的可预期正效收益的股票投资组合。否则，这种交易可能是欺诈，那些即将成为退休人员的人们会因此遭受亏损，他们对养老金的期望包括基金持股的预期收益率。

此外，必须对自愿加入分散式养老金制度的人们明确说明国家养老金和私人退休金之间的差别。任何一种情况下，两者均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国家部门的退休人员，任由那些运用法律制定和实施退休金的人们摆布，而参与私人养老金计划将暴露于证券市场的波动，取决于私人养老基金管理其证券的成功程度。

价值标准会提醒我们什么计划应予以拒绝。已有人提出下面的观点：养老保险体系在分权和私有化之前，应该先转变成股份制度。例如，在匈牙利，这一转换实际上已经开始。我认为，这一做法只是表面的行动，也从没有特别可以预期的益处。中央集权的养老金制度是国家政府机构的一个分支，它也应该如此。但是，如果它的功能是提供受到法律保障的养老金，其收入来源不应该受制于股市波动，以及好的或差的企业利润变化趋势。

C3. 保险公司。这一类型的状况跟养老保险制度非常相似，因此，得出的结论可以直接参考之前的讨论。

只要保险公司是大型的国家寡头垄断的机构，在推行股份转让方面，这一做法就是一个肤浅的措施。结果只是前面讨论的“混合所有制”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因为这只是将一个国有机构变成另一个国有机构。

价值标准，我已经建议我们值得支持保险体制的部分私有化。这一体制可能包含国有和私营并列的状况，后者包括非营利组织和以利润为导向的保险公司。私人保险公司应该被鼓励将自身积累的资本用作投资。通过合适的法律保障和监督，国家可以将手持的投资组合转给非营利性的私营保险公司，甚至可以是免费转让，作为一种方式来鼓励这些公司建立并得以巩固。这又是一种所有权转移，其中包含了隐含的偏移：私营保险机构的出现是一个有机发展的过程，它们可以不断承接一些国家保险制度的职责。^①

C4. 文化和教育机构、慈善团体、基金会、教会。它们包含了在发达市场经济中可能会将一些自己积蓄投资股份或其他证券的机构。同样，毫无疑问这种方式适用于东欧。严格的债券捆绑将机构领导与机构本身紧密相连，机构越传统，管理者感受到需要履行的机构绩效表现和财务状况的责任也越大，他们会更加尽力成为优秀的财富管理者。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这些机构必须找到可以执行处理其证券专业任务的财务经理。(99)

这里再次出现了一批拥有国有资产的潜在买家：可以预期这些机构将购买股票。但是这一过程最好加快。我的价值标准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来反对这种机构可以免费地接受股票投资组合。唯一的要求是合适的立法和监督保障。当然，必须确定的是这也有重要的社会标准，用以确保接受国有财产之后的机构，会真的成为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因为他们运行着机构，他们是机构利益的最直接受益人。

C5. 地方政府。一些之前集中管理的国家财富，很可能被转移到当地政府部门手中。这是一个必要和可取的趋势，因为它促进了权力的下放，但它显然不等于私有化。市辖区是国家的一部分，所以这只是财产从国家的一只手传递到另一只手。值得一提的是，C1至C4的各种案例，它们可算是真正的私有化，经常会被用来与C5混淆，C5仅仅是国家体制

^① 我想提请大家特别注意转让承诺有必要公正地进行。在任何情况下，公民个人（在C2中是领取养老金的人；在C3中是患病者或者其他被保险人）都不应该遭受损失。也不应该发生下列情况：国家部门急于摆脱自己的承诺认为私人部门已经接受了免费股票，如果事实上这些股份还不能保证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即将离职人的养老金和保险理赔。在这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保证已经遭受不确定困扰的公民个人产生进一步忧虑，远见和谨慎是必需的。

内的分权，而不是私有化。^①

- (100) 在此对所有制形式进行一个总结性的讨论，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才可以得出普遍观察。通过官僚的方式，由国家法令全部一次性地创立真正的私有制制度是不可取的。除了不合时宜外，通常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做法都不可行。转变过程中，类似的机构会出现。它们发展的速度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国内和国外资本的投资意愿（C1 和 C3），能够管理机构里的股票投资组合的国内外的专业人员（C1，C2，C3 和 C4）。同时，所有制形式的转变也取决于国家立法者和行政机构的活动：正确的法律框架和监管机构如何快速发展，官僚展示多少主动权来推动新的必要机构应运而生，并最终在什么程度上让国有产权无偿转让，用此作为各个机构组织创建的初始资本。

（四）匿名股东

现代成熟的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匿名股东，他们自己不能够拥有足够的资金亲自并直接参与股份制公司的股东大会，但是他们能够直接参与投票。如果与其他投资的收益率比较，匿名股东对公司未来的收益没有足够信心的话，他们会出售自己的股份，反之，会购买股票。需求、供给和股票价格的走势，对参与股东大会的大股东们和公司管理层有着间接影响。这种间接影响是通过广泛的中介网络：证券交易所、券商、银行和其他买卖股票的金融机构。

在东欧经济体中，这些机构的所有制形式都刚开始出现。证券交易所已经在几个国家的首都运营，它们发布营业额报告和每天公开交易的股票价格。但是，这一切都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这种形式的所有制出现之前需要时间，伴随着证券一级和二级市场，在有机发展的过程中，这种状况十分普遍。在这发生之前，需要很多重要的条件：专业知识和常规、信心、一大群有能力的工作人员、合理的法律法规、有效的国家监督等。

- (101)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更遥远的未来。谁也无法预料股份制企业的作用和其所有制发展的方向类似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那么，现在这

^① 将一些先前由中央集中管理的国家财富的所有权转让给地方政府可能会加快私有化，是另一回事。这种效应只能随之而来，当然，如果地方政府合法地将这些所有转让给私人手中。地方政府的动机可能是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官员和议员是否认为他们对私有化的帮助会在选民之中获得支持。

一状态的特点是什么？

在一些欧洲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持续运行，而不像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出现了发展中断，总生产财富的一部分保留在企业部门，构成股份制企业，企业部门所占有的股份只有一部分可以上市。^①这一比例在欧洲大陆小于美国或英国。

有些人准备将自身储蓄自愿投资入股。但是，也有人不愿意承担相关风险，倾向于其他类型的投资。这也解释了股份制分布的集中状况。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表明，收入分配较低的人口，87%的人只拥有1%的股份，而在高收入阶层拥有99%。在这一群组中，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80%的股份，最富有的0.1%的人拥有40%的股份。^②

所以，真正的资本主义不是“人民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图像中，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想法，在一夜之间将股票免费发放给全体公民，让他们成为股东。再次使用哈耶克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建构”想法，人为的、做作的，因此，也是相当背离了资本主义的真实发展。我不觉得我们会珍视拥有一小部分股本作为内心的愿望。而且，这也是危险的，我们缺乏可以达到这种发展水平的专家、诚实且合适的监督机构，以及初级和二级股份市场的合格工作人员。^③

就我而言，我只希望大范围的股份分配运动带来一个益处即可，也就是国家持股比例大幅减低。这可能有利于一个主要群体的发展，包括股份制公司，因为我们不再面临一个压倒性的国家雇主。这种优势本身不应该被低估，但是我们也不能期望太多。每个公民所拥有的股份或优惠券无助于促进两个目的，即我在之前章节特别强调的价值标准：企业家和商界人士广泛阶层的发展（社会标准1），加强对效率的激励（经济标准1）。与

① 这应该被理解为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

② 这些数字来自J. O. 莱特 (J. O. Light) 和 W. L. 怀特 (W. L. White) (1979年, 第338页)。

③ 尽管本章提到的投资基金可以被认为是值得发展的“银行类组织”，在这里不详细讨论它们提供给中小投资者的服务。这些基金在基于免费发放的“学券计划”私有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如它们在捷克共和国和俄罗斯一样。并非为自己买特定股票，优惠券持有人可以选择购买单位投资基金，其中很多公司的股票或优惠券会有几倍的资金增长。问题是，作为公司监管和治理的积极业主，投资基金是否有能力发挥积极作用。这很难预计，因为公司股份的投资组合分布广泛。然而，值得强调，投资基金的根基和健康发展是非常有用的。它们在现代资本市场中不可缺少，因为它们可以汇集众多中小投资者的资金，那些小资金可能会缩小选择、购买和单独出售股份的责任。*新的注脚*。

此同时，我担心这会对其他经济条件产生负面影响。在任何情况下，强制压制国家财富都会失去销售的潜在收入（经济标准3）。一些受助人很快将自己拥有的股份或优惠券，为了收益在消费市场抛售，这会引起通货膨胀（经济标准4）。所有的情形下，私有化加速的优点都被这些弊端所抵消，这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在东德和匈牙利会有普遍的股份和优惠券自由分配看来不太可能，但是这样的想法可以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推进实施。经验可能会驳斥上述提到的质疑，在这种情况下，我准备好检讨我的立场。

正如前面提到的，向所有公民免费发放股份或优惠券的政策论证，同样需要基于分配道德标准：这种做法被认为是公平且提供同等机会的新资本主义的开始（分配道德标准3）。我已经提出一些反驳。现在，我想添加一些对所有制形式调查后的进一步观察。真正想改善机会平等和同意免费派发国家财产应该按照真正的利润生成机制将其股份捐给慈善机构、卫生和教育机构、提供奖学金的基金会和其他类似的、非国家的自治机构。
(103) 这将真正帮助改善那些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中下滑的人民，因此也会比将股票或优惠券分配给富人和穷人的方法更有效。

现在值得简要总结，我个人对自由分配的态度，这个问题已经触及本章中几个重要问题。在我看来，这里涉及一种情况，即将之前由国家拥有的财富以无偿转让的方式给新私营业主。这其中包含了私人、非营利的养老保险机构、文化和教育机构、慈善团体、基金会和教堂。实际上，员工购买股份的折扣价还包含一个恩赐因素。这些转让应该只在特定条件下进行（这些条件在本章中已经提出）。我没有看到一个理由可以支持除此之外的任何分配。^①

四 国内或国外所有制

到目前为止，关于各种形式的所有权和机构的讨论衍生出一个问题，即，这些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国内或国外。我将提出两种极端观点：一个

^① 我的书 [1989] (1990)，提出拒绝给予所有公民自由股份或其他证券的观点，并没有提及及其他形式的无偿转让。所以现在的立场是纠正之前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因为我现在支持一些可行和可取的无偿转让形式。

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他们反对所有外资进口，他们认为这是对民族独立和新兴经济体的特有民族特点的威胁。我认为，这种观点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东欧对各种形式的外国资助有巨大的需求，尤其重要的是所有经济部门都需要外国直接投资，而这其中最应优先的是金融领域。

我也不同意另一个极端观点：外资在任何部分的比例都是无关紧要的。经济中的一些重要比重依然保持在国家手中，这是个权宜之计，因为国家拥有不可缺少的主权。通过谨慎的政策，国外资本的全部投资来源不应只源于一个国家而应该分散在各国之间，这是值得去确保的。这给了受惠国更大的运作空间，因此也会加强其独立性。除了这方面的考虑，还需要让本国公民参与到大型商业组织的形成过程中，因为这将增强市场经济的基础，进而成立私人产权。社会标准 1：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化方向是资本主义应该在国内的土壤生根。 (104)

五 私有化的速度

参与私营化辩论的人们经常被问一个问题，即，他们建议快速私营化还是缓慢私营化。我认为这个问题在措辞上是错误的。没有人会称自己是缓慢私营化的倡导者。如果我可以在这里加上主观评论的话，我自己也会被特别指出，我是缓慢私营化的倡导者。

这里要辩论的不应该是速度，而是价值观的选择，国家在此过程中的角色，以及对所有制各种形式和企业类型的重要性评估。一旦有人在这些问题上表明立场，其结果常常就是预测发展速度。

我想声明，我非常支持国有企业私营化的过程越快越好。但是，我不认为可以通过一些巧妙的技巧来加速这一过程。在我看来，关键的问题不是国家拥有的财产转移到私人手上的速度，而是私营部门的增长速度。

下面的计算很容易检验。让我们假设，私营化的起始阶段，国有经济占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 75%，私营部门占 25%。^①私营部门的生产每年以 25% 的速度增长，国有经济的生产以 10% 的速度下降。在这些条件下，私营部门将在第四年年底在社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私有化取决于这两个进程的速度之差，而且最重要的是私营部门的活力，而

① 这包括官方统计数据没有考虑到的非正规私营部门。

不是通过狡诈的方式将国有股转到私人手中。^①

我们有乐观的理由。私有化历程最终不是由智慧或愚蠢而定，也不取决于东欧各国政府、反对势力、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或国内外的建议者，他们之间的强弱。最多，他们可能会减慢或加快这一过程，改革过程受到不可抗拒的内力：现在和未来的私营业主的内在动力。

^① [计算是乐观的，因为它假定会有增长，或者最坏的情况是累积生产停滞不前。一般性的经济衰退情况下，期望私营部门的生产有25%的年增长率是不现实的。在每一个后社会主义国家，一般性的经济衰退还在继续进行（见第七章）。忽视这一点，虽然计算的数值结果并没有证明是正确的，但我仍然认为定性结论是有效的：私营部门如何迅速成为主导部门取决于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增长率之差。新的注脚。]

第五章 后社会主义转型与国家：基于匈牙利财政问题的反思^①

(107)

这一章只是讨论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间出现的无数问题中的其中一个：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本章的分析基于匈牙利的经验，但我相信这一问题相当普遍，一些后社会主义国家早晚会出现，尽管它们可能在强度和形式上有所不同。另外，尽管我以匈牙利作为分析对象，但这篇文章并没有完全对匈牙利经济做全面调研。也许，这其中有一个特征需要注意：东欧地区的几个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也有可能进入无序状态，匈牙利的转型发生在特定的秩序条件下，同时转型带来了一些有前途的经济发展信号。

一 西方著作中的政策建议

当然，学术派的经济学家们，就好像我们一样，第一次的学术之旅会在图书馆里面寻求引领，那里有大量文献讨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分工，甚至有一些观点互相冲突的文献。

^① 在收集本章所需材料和作为分析背景的信息上，以斯帖·特兰西瓦尼亚 (Eszter Erdélyi)，玛利亚·莫拉 (Mária Móra)，拉斯洛·莫拉克奇 (László Murakózy)，玛丽亚·思蒂·彼得斯奈 (Mária Zita Petschnig)，安娜·塞莱娜 (Anna Seleny)，伊斯特万·捷尔吉·托特 (István György Tóth) 和亚历山德拉·瓦克怒 (Alexandra Vacroux)，他们给予我很大帮助，我借此机会感谢他们的支持。我很感谢布赖恩·麦克莱恩和朱莉安娜·班波把它翻译成英文，本章最初是用匈牙利文写作。在这项研究的第一稿上，我接受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它们来自朗西斯·M. 巴托尔 (Francis M. Bator)、塔马斯·鲍尔，朱则撒·丹尼尔 (Zsuzsa Dániel)、马丁·S. 费尔德斯坦 (Martin S. Feldstein)、乔治·克匹茨 (George Kopits)、艾莫斯·科瓦奇 (Álmos Kovács)，迈克尔·马若赛 (Michael Marrese) 和拉斯洛·伍德班 (László Urbán)。当然，我独自承担任何可能性错误的责任。这项研究是由匈牙利国家科学研究基金会 (OTKA) 支持。

后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很多经济学家们，对中央计划幻灭，倾向于
(108) 做出不具批判性的盲目崇拜市场的判断。一种有效的治疗这种极端选择的方法是通读西方著作中探讨市场机制的不足之处。他们有力地证明了在现实中确切存在市场没有办法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例如，保持经济的宏观平衡，确保收入的公平分配，产品的外部性影响，公共产品数量的充足提供，以及限制垄断的权力。提出这些问题的作者认为，市场失灵的地方，国家应该积极介入。^①

但是，另外一些西方文献有说服力地说明了政治行动、政治家和政府人员，他们是如何比市场更显著地影响经济，使其无法得到合理协调。不久前奥地利学派提出这种言论，然后形成公共选择理论的重新论证，这无疑已经引起经济学家们开始重新考虑这个问题。^② 那些以国家的名义介入经济活动的人的意图仅仅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吗？这一问题让生活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人产生了强烈共鸣。同样，与此相关，关于福利国家的批判性分析，高比例的再分配引起了投资、创新和企业发展的迟缓。^③

然而，当一位东欧经济学家离开图书馆后，他会停在混乱中。他依然不能够从资本主义内部了解它；他想依赖这些专业文献，但是，至少乍一看这似乎给了他强烈又冲突的方向。到底在追求些什么？难道是某种或多或少的话题状态？

通过更深入地研究文献，这种混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理论文献得出的规范建议，总是有条件的。这些论证所需要的条件或者很明确
(109) 地陈述或是间接暗示。任何西方专家对后社会主义经济或后社会主义国家里的经济学家们提供意见时，他们在引出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时，都会先会负责任地非常仔细地澄清一些假设，然后援引“权威”的西方经济学著作。

① 早期关于市场失灵理论的概述，可在在 F. M. 巴托尔 (1958) 和 W. J. 鲍莫尔 (W. J. Baumol, 1965) 的著作中找到。关于这一理论的最新讨论，可参阅 J. E. 斯蒂格利茨 (1989) 等人的文章和著作的。随着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少的人讨论不受约束的市场缺点。例如，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导致了早期自由贸易概念一些变化，在一定条件下国家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有一定道理。关于这一主题更加广泛的调研和讨论，可以参阅下列作者的开创性文章和著作：P. R. 克鲁格曼 (P. R. Krugman), E. 赫尔普曼 (E. Helpman, 1990)。

② 参阅 J. 布坎南 (J. Buchanan), G. 塔洛克 (G. Tullock, 1962) 和 W. A. 尼斯卡宁 (W. A. Niskanen, 1971)。

③ 例如，参阅 A. 林德贝 (A. Lindbeck, 1988)。C. 奥费 (C. Offe, 1984) 记录了左、右翼批评福利国家。

让我仅举两个典型的假设。

1. 文献中通常是指一个成熟的市场，一个稳定的、根深蒂固的和完善的民主国家，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发达资本主义。问题在于，匈牙利和其他的后社会主义市场和国家，跟西方国家在几个方面都有所不同：私营部门还很不成熟，民主体制薄弱，尚未发育完全。

2. 文献中对国家和市场的角色分配是基于资本主义制度，它具有永久或缓慢变化的制度和遵守强健规则的市场行为。相比之下，后社会主义体制是在革命性的变革之中：一些制度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其他一些制度逐渐产生，以历史作为标准衡量之下，法律体系正以极快的速度改变，经济体系中每个玩家的经济行为也随之一直改变。因此，我们需要特殊的动态分析。

二 后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的政治和政府领域

让我尝试以电子简报的形式简单介绍一下目前匈牙利的政治和政府领域的特点。^① 在这里不会描绘市场的现状，因为在本章后半部我会进行探讨。

虽然政治自由化的措施在很早之前就已开始，但是匈牙利的转折点在1989年至1990年之间。政党可以自由组织，并举行了在43年之后的自由选举。政府与多数席位的议会成立。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已经清算或试图清算资本主义的处于政治垄断地位的政党——在权力结构重大调整中，已经被清除。(110)

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已经正式分开。但是实际上，任职于每个分支机关的官员均由共产党挑选，共产党会直接指导他们的活动。国家权力分支机构的分离只是在政治转折后开始制度化。

现在国会开始掌握其新的角色。发达民主国家经历了很长历史时期演

^① 这里并不是使用一个整体的全面的“国家”定义，我会尽量将政治领域分成一些组成部分。政治学领域对此有不同方法将这些部分区分开，其中，功能主义模型，早前讨论的经济学领域的公共选择里，分析了不同群体和阶层之间的冲突，还有各种制度主义方法。在我看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可以互补优势，而不是相互排斥地解释，在这篇研究中，我曾试图采用各种分析趋势的观点。关于这一主题的概述，可参阅下列作品：J. D. 阿维尔巴赫 (J. D. Aberbach)，R. D. 帕特南 (R. D. Putnam) 和 B. A. 罗克曼 (B. A. Rockman) (1981)，P. A. 霍尔 (P. A. Hall, 1986)。

变中的宪政国家所需的各种规则，然而，在匈牙利最重要的法律正在以强制性速度起草。政府在立法案起草过程中的迟缓和不断地延迟，国会应对立法的负荷率，都成为了走向现代市场经济过程中最令人痛心的瓶颈之一。国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政治新手：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足够的专家和顾问团队，对议案进行深入研究，更不要说拟定自己的立法提议。因此，国会不能真正地承担严密监督管理工作。法院在对市场经济实施法律和秩序方面也没有经验。

在政治转折点出现之前，他们之间的合作已经被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激烈政治冲突所取代，甚至包含了执政联盟。这些毫无疑问，因为同样的现象在所有议会制中存在。然而，由于缺乏广泛的政治共识，几乎排除了解决议程中严重问题的可能性，例如，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财政稳定和企业重组，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需要高额自我牺牲的不受欢迎的措施。当为了权力的政治竞争变得激烈时，政治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选举机会，而不是为了“社会福利功能”。

根据经典的民主规范性理论，应该在政客和官僚之间有明显的分界线，政客直接对选民负责，而官僚忠实地服务于每一个连续的立宪政府而(111) 不论其政治纲领如何改变。政治任命和“公务员”的立场应通过法律和令人尊敬的惯例明确区分。在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这种区别还没有明确提出。今天执政党已经彻底了解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经常引用的口号：权力的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当填补政治体制中的很多职位时，个人的政治忠诚是比其能力重要得多的选择标准。

与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匈牙利官僚具有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因为自1968年开始推动的局部改革激发了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然而，他们并没有像执行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管理任务所需的知识或经验。而且体制的转变使得官僚的生计处于危险之中：谁知道谁将会在什么时候被解雇？许多较有才华的专家离开国家职位，在私营部门寻找薪资更为丰厚且稳定的工作。国家纪律由于经验不足和不确定性而变得松懈，并且在执行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摩擦。^①

^① T. 辛可斯波尔 (T. Skocpol, 1985) 指出，国家的“能力”，其定义为国家实际执行特定任务的能力，是国家活动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这方面能力的欠缺，就是我提出来的他们在立法起草和颁布时所欠缺的，同样也会阻碍执法。

我们的情况既不符合哲学家和政治家柏拉图的理念，即超越一切的自私标准，也没有与专家和守法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关于官僚作风的一丝不苟一样。我们也不像福利经济学研究中描述的政治决策者那样，他们排他性地专门服务于公共利益。因此，任何经济学家争辩说，市场力量应被削减，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提议是经济学家希望的国家应该分配到某种职能，而这一类型的国家维持一段时间才会达到这种职能。

到目前为止讨论政治领域的唯一组成部分一直是国家的组织和政党。但其他两个影响到国家和市场运作的重要现象也必须提及。

第一，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的新闻机构，它通常被称为平衡体系中政府的第四个手臂，现在在匈牙利是自由的。^①任何试图滥用国家权力或国家金钱管理不善的行为都有被媒体暴露的风险。

第二，政治学家所说的“公民社会”，公众力量开始自我组织并在稳步觉醒中。公众组织包含一些阶层、群体和职业，它们陆续组成，并为自己发声。这种特殊利益集团在美国通常被轻蔑，而被认为它们肯定扮演不利的角色，但是在一个各类自愿和自发组织被扼杀的国家生活的公民会更加珍惜人民自由，他们可以团结起来抵制政治压力。必须补充的是，在经济领域，公民社会的表达仍不清楚。工会从旧秩序中存活下来的后护行动，融合了新工会的弱势，留给雇员一个不成熟又缺乏代表性的低效制度。雇主组织同样也不成熟。换言之，那种能够压倒一切狭隘专业利益并且能够富有责任意识地为民族谈判的欧洲议会代表协会，尚未发展或获得力量。因此，有一种危险，民粹主义组织赢得了大众，它们妨碍政治和经济整合历程。这是新的民主制度的薄弱环节之一，因为民粹主义运动会防止“社会契约”的形成，为了能够帮助克服经济困难，在广泛阶层表现出适当的克制。^② (112)

我对政府和市场之间分工的基本立场非常符合目前的匈牙利政治和政府领域的现状。（其实，我可以把它称为我的偏见，因为我的观点显然是基于一种价值判断）我已经准备好要求政府做出干预措施，只是有一点必

① 新闻界越来越多的自由，与一个事实绑定在一起，即，相当大比例的媒体转为私有制。

② 1990年，匈牙利一小群人——出租车司机，通过他们自己的电台连接很好地组织起来，成功地通过封锁道路来削弱资本对抗，以此抗议汽油价格上涨。许多员工同情出租车司机，在媒体面前跟政府官员协商。

须明确，市场自身的决定很糟糕，并且存在非常强大的可能性——政府的干预会改善现状。我一定要相信相关机构是一只专业、公正和诚实可信之手，而且在现在的特殊情况下，它确实可能确保公众监督可以迫使国家采取明智的行动。但是，如果我对一个不健全的市场或者是一个不健全的国家所作出的决定有疑问，并且我只能做一个随机的选择，我的直觉告诉我

(113) 选择市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很显然，我是一个东欧人，为了我的同胞，在很多时候我已经对我的国家失望，我们的信心不容易恢复。这一选择将是本章其余部分的哲学根基。

三 四个财政问题

匈牙利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标志是权力的集权主义，换言之，国家极为活跃并试图控制社会的所有活动。开始于1968年的局部改革，虽然使得国家的作用在很多方面有所下降，但新的民主制度仍然继承了“大政府”。^①

国家的比重和规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衡量，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是比较政府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表5.1显示了匈牙利政府退出一些领域后再并重新分配国内生产总值占到了60%以上，然而在西欧这一典型的比重是40%到45%，事实上，发展水平类似匈牙利的其他国家，这一比

(114) 例甚至更低。表5.2并没有显示这个比例的任何明显可见的下降趋势，它顽固地停留在60%左右。^②

正如本章的副标题所暗示的，我主要关心的是财政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政策来降低生产的不合格率和国家开支比重？局限于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什么政策可能会产生“小政府”？由于篇幅的原因，我并不打算讨

(115) 论财政问题的所有领域。^③ 我将探讨以下四个主题：行政开支、亏损企业的资助和失业救济金、私营部门的税收，以及福利支出。虽然这四个议题

① 1992年的书，《社会主义体制》，讨论了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的角色。

② 表5.2中1990年和1991年的数据修改过，使用了更多最新数据，以及一些专业讨论在修正的形式给予。参阅I. 科瓦奇 (I. Kovács, 1993) 和思·拉斯洛 (Cs. Laszló, 1993)。新的注脚。

③ 这里我要特别提两个问题，本章有所忽略，即使它们与国家作用紧密。一个是宏观均衡的恢复和经济的宏观管理；另一个问题是迄今为止，国家在国有制企业的私有化中的作用。一直避免讨论它们，不是因为我认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已经有大量的文献对其进行了分析。我也尝试过讨论这两个问题，例如在我 [1989] 1990年的著作中，以及本书第四章。我更希望在本章，引出一些大家到现在为止都很少关注的问题。

都与预算相关，我更愿意超越狭义的公共财政范围，同时观察在政治、社会和一般经济情境下的每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研究对象隶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

表 5.1 1989 年各国政府基本运行概述：国际比较

国家	收入（占 GDP 的百分比）	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
奥地利	46.9	49.7
加拿大	40.3	43.9
丹麦	59.6	59.4
法国	46.2	47.8
希腊	32.7	46.3
荷兰	51.1	56.6
葡萄牙	40.7	45.0
西班牙	35.0	38.6
瑞典	59.1	56.9
美国	34.3	36.5
西德	45.7	45.9
匈牙利	61.3	63.7

注：数据是指合并后的一般政府收入和支出（即，它们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以及预算外资金）。

资料来源：由 G. 克匹茨和 L. 莫拉克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料编制（1990 年）。

表 5.2 匈牙利政府的基本运行概述

年份	收入（占 GDP 的百分比）	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	赤字（-）或盈余（+）
1981	61.0	63.9	- 3.2
1982	59.1	61.2	- 2.1
1983	60.9	62.0	- 1.1
1984	60.8	59.4	1.4
1985	60.0	61.2	- 1.1
1986	63.2	66.0	- 2.9
1987	60.3	64.1	- 3.9
1988	63.7	63.6	0.0

续表

年份	收入(占 GDP 的百分比)	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	赤字(-)或盈余(+)
1989	61.3	63.7	- 2.5
1990	57.9	57.4	0.5
1991	55.3	57.8	- 2.7

注：数据是指合并后的一般政府收入和支出。(更多解释请参见表 5.1 注释)。

资料来源：由 L. 莫拉克奇编制，1981—1990 年的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1 年），1991 年的数据源于匈牙利财政部（Pénzügyminisztérium）。

（一）行政开支

削减行政开支的要求，在世界各国国会关于财政预算辩论中常被听到。在匈牙利，1990 年政府对一般公共服务和社会秩序安全的开支占到了 GDP 的 8.8%，这一比例很高，并且不被允许。为了比较，1988 年，相同事项的开支在西德占 GDP 的比重为 5.5%，智利为 5.1%，丹麦为 4.4%。^① 新的民主政府承诺逐年削减这些开支，同时在野党，很正确地，要求政府对开支的总体规模预算采取更有力的削减措施。

可以观察到两个相反的趋势。一方面，早期的行政支出已经停止或减少；另一方面，新的管理费用开始产生。让我举三个例子。

1. 庞大的官僚体制，这几乎是复制了国家机器的大小，已经解散。与此同时，一个新的专业政治机构已经形成，由各个政党的成员组成，其雇员服务于国家和地方议会的所有成员。

2. 许多集权计划经济机构都被淘汰，例如，计划和价格办公室已经关闭，之前控制生产的几个部委被合并，它们变成更小的组合联合办公。但是，新的体制需要一些新的机构：私有化办公室，银行监管，保险监管，监督遵守反垄断立法，处理小企业业务的机构，监督国家官僚机构财政事务的总审计师办公室，等等。

3. 旧体制的支柱，秘密警察已经解散，但需要更多的警察来治理共同犯罪，这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增长着。产生犯罪浪潮的其中一些原因包括全国网络中告密者的解散，须跟警方登记居住地变化的义务政策开始宽松，边界的开放使得贩毒更容易。换言之，犯罪增加的部分原因可以解释为一

^① L. 莫拉克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0 年的数据计算所得。

个健康变化过程中产生了有害的副作用，即警察国家的废除。

4. 由于私营经济和法律声望的增加，法院悬而未决的案件也会增加。^① 积压的数量将继续增长，除非增加目前法庭的工作人员。

总而言之，必须增加努力削减行政开支，但不应期望这一努力有助于大幅削减预算，也不要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其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会大幅降低。

(二) 亏损企业的资助和失业救济金

表 5.3 很明显地显示，匈牙利的补贴资助和企业转移支付在一段很长时期内呈现下跌趋势（不像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如表 5.3 所呈现，相比于政治改革之前，这一数据呈现出增长趋势）。然而，进一步地，更有力地对资助进行分解，则会带来需要详细分析的敏感问题。

表 5.3 企业补贴和转移支付的国际比较

(117)

	年份	保加利亚	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
经常支出总额	1985	48	51	53
	57	1989	52	55
企业补贴和转移支付	21	1985	13	15
	16	1989	15	19

注：企业补贴和转移支付，包括特殊产品的价格补贴，明确的利率补贴，代表企业和机构偿还债务。补贴和转移支付构成经常支出总额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表中第一行的数据）。

资料来源：G. 克匹茨（1991，第 22—23 页）。

社会主义体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我在之前的著作中将其称为“软预算约束”综合征。^②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支出没有严格的财务部门对其设限，或者，最终，在这种动态状况下，公司收入也不会约束其开支。即使它应该在遇到严重财政困难时停步，稳定其损失，无力偿债时可以指

^① 1988 年布达佩斯法院收到 9000 个新的民事案，1990 年达到 16400 个。法院受到的申请支付强制令在 1988 年是 31000 个，1990 年是 64000 个（司法部部长在 1991 年 11 月 23 日的《人民自由报》上发出的声明）。

^② 关于这一概念的解释，请参阅本书第 13 页脚注①。

望国家帮助。这样的企业将获得税收优惠，或被允许延期缴纳税收，它还会获得补贴，或者有机会获得低息贷款。建立在期望获得国家救助的基础上，确保企业生存是非常安全的事情。预算约束的这种柔软性有一些有害的后果，其中，它导致了对低效率的宽容，延期调整要求，以及曲解的投资决策。

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这种有害的现象与市场经济不相容，所以，在后社会主义国家过渡阶段，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最终必须进行硬化。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这一要求只是口头承诺，到什么程度才会采取实际行动？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可能是因为目前这一工作依然有冲突的不同倾向，目前还不清楚最终什么会盛行。

企业的情况各不相同，它们的行为也如此。^①有些走向私有化，将自己变成股份制公司或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这样做，并与有前瞻性的匈牙利人或外国私营业主商议。不过，我希望在这里重点关注那些尚未采取任何实际私有化步骤的人们。其中一些已经相当成功地适应了新形势，但是其他人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而后一种群体的典型态度是(118) 尽量蒙混过关。这意味着生产的物理或实际状况是，他们收集了短缺经济之下的股票而无须更换，也疏于维护和更新，也许还会卖掉工厂或办公楼。还有持续撤资，换句话说，公司通过消耗自身的资产来吃掉自己。并行事件发生在货币政策方面，稳步的损失增加了公司债务。公司不再承担税收和社会保障金，或者不再准时给商业银行全额支付债务和利息。^②其中，最常见的是公司停止支付供给公司投入的账单。还有在任何情况下，不自愿签订信用合同：通过拒绝支付，债务人迫使债权人贷款。这使我想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债权人面对这样的公司行为如何反应。^③

预算约束的柔软度实际上意味着非自愿债权人容许债务人违约。后社会主义体制中的匈牙利，目前的情况充满矛盾，正如前面提到的，因为习

① 关于国有企业亏损状况，参阅 M. 莫拉的文章（1991），这基于其更详细的研究（1990）。

② 1991 年中期前两个债务总和（未支付税收和社会保障金）大于 1992 年计划的全部预算赤字。

③ 硬化预算约束，一部分是财政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国家补贴和税收。然而，在本质上，问题远比这一点复杂，所以我必须超越本章在之前概述的主题，例如，也简单地讨论货币政策的一些方面。

惯容忍，某些情况继续存在，但是相反的情况也开始出现。虽然很少，但是税收或社会保障部门或银行已经对债务公司采取措施。更常见的是，供应商开始对企业进行清算程序，然而一些企业无力支付他们的账单清算。债权人启动清算程序来针对那些无法支付账单的企业。^①

虽然公司早前就执行清算，但是这只是“行政选择”，因为由政府机构对其宣布死刑或死缓。现在，人们可以看到自然选择的第一迹象。后者，一旦真的发展到完整状态，将成为一个分散的市场化进程。反之，企业生死事宜不再由国家之手决定，债权人出于对自我最佳经济利益的考虑会对违约债务人采取诉讼。

事实上，匈牙利一直有关于清算立法的法典，破产企业退出的法律框架在其他一些方面也适用。之前并没有采用这一优势，但现在似乎有这样做的动作。清算国有部门的浪潮预计在1992年发生，如果发生，它会精确地要求预算约束硬化。⁽¹¹⁹⁾

应该如何评估这样的改变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话题。就我而言，我认为这是痛苦的，但却是健康的。这让我想起熊彼特提出的一个著名概念——“创造性破坏”。^② 生产的重建和重组，技术进步和创新，通常伴随着破坏旧的生产线、组织和机构。这种清理对发展至关重要。由于一些原因，旧社会主义体制没有能力维持。膨胀的、迟缓的、笨拙的旧工业巨人幸存下来，软预算约束继续担任财务机制，用以抵挡创造性的破坏，但是破坏已经开始，以各种纠正措施的形式存在。可以列举五个紧密相连的过程，如下：

1. 抗衡通胀的货币政策必然会造成生产萎缩。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对企业的全面封锁，在其他一些国家则意味着生产的缩减。熊彼特关于商业周期的解释，似乎在这一情境下是合理的；宏观的经济衰退加速了自然选择和破坏。计划经济没有办法继续推动持续扩张和强制成长，来完成这一选择。

2. 生产部门的结构重组。制造业在总产出中的份额正在下降，而服务业的比重正在上升。这包括某些制造业生产的停止或削减。

^① 参阅 K. 拉尼 (K. Lányi) 主编 (1991, 第 64 页)。

^② J. A. 熊彼特 [1911] (1968) 在其第一篇经典作品中讨论了造成亏损者的好处。他 1942 年的书介绍了“创造性破坏”一词 (见 J. A. 熊彼特, 1976, 第 81 页—88 页)。P. 默雷尔 (1990) 的作品强调了转型过程中的熊彼特主义。

3. 与前一个过程密切相关的是出口的结构调整。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认为市场的崩溃给为之提供专门产品的企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并被证明无法满足新市场需求。

(120) 4. 企业规模分布的重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匈牙利，没有规模经济来支撑其分支机构，生产过度集中，公司超大规模。此外，小企业在改革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几乎完全被清除，而且对于中型企业而言，给予的范围也很有限。修正过程包含了关闭很多大型企业，它们的规模太大以至于生产无能，并且不能够被分解成更小的单位。

5. 在匈牙利社会主义体制下，大部分国有企业被政府控制，以低水平效率运行，失业十分普遍。矫正过程的结果是即使生产量保持不变效率必须提高，也可能通过较少的劳动力来实现效率的提高。

所有上述的五个修正过程均有严重的副作用：会大规模淘汰一些工作岗位。然而，一些过程（第2到第4）淘汰旧工作岗位的同时也在创建新的岗位：它们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私营经济，其中大部分是在中小型企业。这将在以后再讨论。需要提前说的是，新就业机会的增加跟不上旧岗位淘汰的速度。因此，失业率上升。这是任何体制中都有的惊天动地的经验，但是在后社会主义体制中具有双重痛苦，生活在匈牙利的人们不仅习惯于充分就业，而且习惯于绝对的工作安全，甚至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劳动短缺。表5.4列出简短的时间序列。1990年5月是历史上特定的时刻，失业人数第一次超过了职位空缺，劳动力市场上从需求过剩转变成供过于求。失业率在1991年11月达到了7.3%，这一比例对于习惯了失业的国家而言也是相当高的。不幸的是，根据预测，失业率可能会进一步上升。^①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做什么？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只是寥寥数语说说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在我看来，政府不应该屈服于压力，在宏观层面上放宽货币政策，并使用随意的分散贷款和出口补贴，轻率提高名义收入、预算性资金的大投资来带动总需求，尤其不在国有部门。尽管匈牙利的通货膨胀率已经受到了一些遏制，在1991年仍然徘徊在35%左右，它将会突然增长，并引起可怕的后果。

^① 关于匈牙利劳动力市场和失业的现状，可参阅J. 科伦（J. Kollo）的研究（1990，1991）。

表 5.4 匈牙利职位空缺和失业

(121)

年份	月份	登记职位空缺数	登记失业人数
1990	1 月	37711	23426
	30055	2 月	38335
	33682	3 月	34048
	33353	4 月	35191
	38155	5 月	37938
	43506	6 月	37859
	50292	7 月	36222
	51670	8 月	33732
	56115	9 月	26969
	60997	10 月	22763
	69982	11 月	17150
	79521	12 月	16815
1991	1 月	12949	100526
	128386	2 月	14721
	144840	3 月	13583
	167407	4 月	16478
	165022	5 月	14919
	185554	6 月	14860
	216568	7 月	15186
	251084	8 月	14124
	292756	9 月	15351
	317692	10 月	15389
	351285	11 月	13021

资料来源：匈牙利全国劳动中心（The Országos Munkaügyi Központ）1990—1991 年的报告。

关于微观层面，需要另一个警告。现在，经济发展的第一批迹象表明（122）对企业的预算约束开始硬化，政府不应该倒过来再次软化它。我相信，公开接受失业这一严重问题是更好的选择（当然需要对那些失业的人们给予有效的协助），而不是继续通过一些政策来试图掩盖许多低效工作场合，以及通过人为手段维持那些患有绝症的企业延续失业。即使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之下，倒退回早期软预算约束综合征的危险仍然存在。一个政治家介

人拯救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的形象在美国并不存在；也没有利益集团游说通过保护主义政策来便利于一些部门或其他部门。另一种危险是有些银行可能会随时给予企业不负责任的软贷款，而不去核算企业的生存现状是怎样，即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以纳税人为代价。最近在储蓄和贷款机构以及美国银行系统的部分机构观察到这样的态势在流行，且深深植根于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金融领域。

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所有权转移到私人手中，在很多方面这是理想的；但不要让任何人认为这个问题只是框架，“创造性破坏”的任务可以舒适地通过私有化解决。没有买方——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心甘情愿地购买不可救药的破产公司，并经营其业务。大部分时候买家会接受企业的有形资产和人力资本。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他们不会从一开始就私有化有财务恢复机会的公司。如果没有成功，新业主（不论是个人股东、共同基金或其他机构投资人），当企业不能赢利的状况变得很明显时，毫无疑问会将其关闭。对相关利益人来讲，这是不能少的苦药丸，也可能比这更残酷，例如，私有化之前企业已经清算完毕。另一种可能性是私有化后，私营企业的雇主和雇员一起开始游说新政权并与之建立联系来挽救企业。这种可能性让我们又回到了起点——软预算约束。

(123) 现在我开始讨论一些可行性措施。政府希望给予企业最后的机会，可以提供企业一次性临时补贴或贷款，用以保证最后它们能适应真正的市场。但是，必须严格规定如果企业不能成功地适应市场，不会继续给它们补贴，而贷款也不会重复提供。我觉得提高这种可能性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仍然有一些危险，与软预算约束相连的现象也有可能会出现。

国家必须建立适当的失业保险制度。应该提供临时的援助，以减轻失业冲击，但是降低失业者寻找工作的激励和预备调整劳动力需求不应该被允许。匈牙利经济转型的一个有利的特点是，相较于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的失业保险组织要早得多。但是，目前的制度依然有很多空间需要改进；保险额度、持续时间和受惠条件都受到质疑。

保险必须伴随着就业交替和再培训组织。这无疑是国家的任务。这种做法值得称赞，匈牙利已经开始，虽然迄今为止的绩效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创造就业机会，主要是在私营部门的就业机会。这是本章下一节要讨论的问题。

综上所述，硬化预算约束的政策可以规制财政陷阱。一方面，减少对无法生存下来的国有企业的国家预算支出。假设企业能够缴纳所有的税，适用于国有企业的更严厉的财政纪律应该会带来税收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预算约束的硬化可能导致经济活动收缩得更为明显，从而减少税收，最终影响到预算收入。同时，失业救济金开支代表着日益加重的预算负担。^① 没有办法准确地预测这些相互矛盾趋势的最终结果：它们将改善或加重整体财政状况？我认为恶化是在未来数年更可能出现的结果，但是，为了获得更长远持久的优势，应该接受严重的短期缺陷：发展可以从“创造性破坏”中获得期望。(124)

（三）私营部门的税收

也许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趋势是私营部门的增长非常快。熊彼特在“创造性破坏”最后一章讲到最具破坏力时提到这一现象。新的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或许是创造面的最显著的表现。私营企业最可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引进创新、更好地为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并赢得新兴出口市场。

不幸的是，匈牙利现有的统计记录（以及在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测量目前时期的私营部门扩张的情况。^② 专家估计各不相同，但大多数关于私营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估计在 25%—35% 之间。^③

一部分私营部门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运营。税务机关的记录显示，在 1991 年 8 月，有 111700 个经济单位。^④ 为了比较，我们可以回头看看，十年前大约有 3000 个大型国有企业和几千个其他同等大型的、准国家农业

① 在匈牙利，预算外保险基金支付失业津贴这一巨款，基金由雇员和雇主共同支付。这样的单独处理是有利的，但它不会改变一个事实，最终面临两种意义上的财政问题。财政问题在两种意义上，对基金的捐款是强制性的，不是自愿的，它是一种税。如果基金陷入赤字，国家预算需要通过提高其他税收来保障这一基金。

② 研究人员正在试图通过保密性访谈来获得私营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但是他们面临着很大的困难。N. 埃斯蒂 (N. Esti) (1991, 第 23 页) 的报告中描写对私营企业家的调查，在访谈中提问他们关于收入的问题，“一直都颇具耐心的企业家们，在听到这个问题时，很多人提到这个问题超越了访谈的界限；这种状况在很多情况下发生”。恰是那些生意做得很好的企业家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③ 这里比较的是私营部门的生产和真实的 GDP，其中既有官方记录也有非正式私营企业尚未记录的部分。

④ 参阅匈牙利财政部资料 (1991, 第 848 页)。

合作社在运作。无疑，注册的私人经济部门的数量增长非常迅速。

(125) 私营企业在服务业和国内外贸易业中，已经有了特别大的数字。对国内外贸易的观察获得了表 5.5 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在 1989 年至 1991 年之间，有 4500 多家出口企业出现，而在 1989 年还没有这样的企业。如果我们跟之前时期进行比较，这种变化比较明显。改革前，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整个对外贸易额由二十几家国有外贸公司所垄断。

在合法的私有企业外围有一个非常广泛的半合法企业群。即使在改革前的传统社会主义，这种非正式经济体都存在，而且在改革过程中增长非常快。如果我们定义真正违法的私营企业为黑色，遵守所有的法律法规的认真的企业为白色，我在这里提到的这一部分，可以描述为不同程度的灰色。政治转折之后，出现了相当大的“灰色部分”扩张，包含了各种各类的活动。这包括了“走穴”，一些人一只脚仍在国有部门活动，而另一只脚已经跨进其他私营部门。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人完全在私营部门工作，但他们却逃避法律法规。许多正式注册的私营企业部分在白色区域运行，部分在灰色地带运行。^①

表 5.5 从事硬通货出口的匈牙利企业

规模类型	企业数		贸易额（百万美元）	
	1989 年	1990 年	1989 年	1990 年
大于 1000 万美元	136	158	4422	5268
50 万—1000 万美元	668	1115	1700	2554
小于 50 万美元	1899	5108	172	347
总计	2703	6381	6294	8169

资料来源：在 K. 拉尼（K. Lányi）和 G. 奥布拉特（G. Oblath）合编（1991 年，第 76 页）的基础上得出的数字。

(126) 尽管灰色活动的形式可能是多样化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涉及“无形收入”，税务机关无法抓到这些把柄。这使我想到了这

^① 正式和非正式私营部门发展的另一个指标是银行个人存款硬货币的快速增长。银行并没有询问存款人这些存款的来源，但外界普遍认为，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私营企业活动，比如匈牙利的出口或游客服务。1991 年前 9 个月，个人硬通货存款的净增量（官方统计将其称为“没有回报的转让净值”）在整个银行总顺差账户中占了 40%（匈牙利国民银行，1991，第 24 页）。

一问题的财政面。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金融权威部门“抓住”大型国有企业相对简单。他们很容易检查企业的商业账户，垄断性银行只需扣除企业账户的预算总和。这些年来，正如我之前提到，即使是从国有企业那里收钱都是不容易的事。至于私营部分，它的“深灰色”部分完全逃避税收义务，“浅灰色”的部分回避税收，至少其中一些如此。这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灰色部分包含了全部总额或部分增值税，社会保障款和所有其他种类的工资税种。看起来匈牙利正走向市场经济，市民和官方都采取“意大利风格”的态度来征税，而不是荷兰或瑞典的，那里的人们尽职尽责地缴税。

税收的这种蒸发是预算平衡最严重的障碍之一。而且，这种情况已经造成对税收公平这一原则最严重的侵害。日益递增中的主要原因不能用来决定可见收益的征税率。最大程度的递减源于一个事实，即税收的直接负担被放置在可见的收益上，然而，无形收入却在逃避征税。

在这些条件下的一个任务显然是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其中涉及很多事情：更多突击检查，更频繁更深入的审计和会计需求，当规则被打破时采取法律行动。^①这一任务将引起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难题。一方面，财政和公平标准要求有力的税收征管，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到，新的商业人士以相当大的比重不断出现在好奇的“早期资本主义”的暮光世界中。残酷的镇压或骚扰私营企业家将一无所获。这只会把一些人推入违法活动中，劝阻他人离开私营经济。

针对违反法律的措施必须是严格的，但应该在合法范围之内，并作为一系列变化的一种补充，使之有利于遵守法律。私营部门的比例越来越大，必须合法引导，可以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组合，正如下面例子采用的合适激励手段。^② (127)

一个商人考虑从半合法互动走出并走进合法境地，我们可以把这一行为考虑为一种“交易”。他获得的服务是法治，而他付出的代价是税收。

^① 参阅 M. C. 德·简思尔 (M. C. de Jantscher), C. 西尔瓦尼 (C. Silvani) 和 C. L. 维宏恩 (C. L. Vehorn) (1991)。

^② 在这方面，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济发展有启发意义。合法化的过程持续数年，并很可能还没有结束，参阅 C. 萨贝尔 (C. Sabel, 1982) 和 L. A. 本顿 (L. A. Benton)。I. 伊克斯 (I. Ékes, 1991) 和 A. 塞莱娜 (A. Seleny, 1991) 分析了匈牙利正规私营部门合法化的问题。

私营部门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法律制度已经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发展着。一系列新法律都已经通过，包括《公司法》、《破产法》、《银行法》和《审计法》。还有另一些法律正在起草，但有希望可以加快这一进程。我们希望这个立法过程将伴随着法院力量的增强和工作加速。私营企业家将被法制所吸引，如果这是他们能够获得财产合法保护的唯一途径。如果他们遇到了官僚冲突，还可以依靠在法庭上进行公正待遇诉讼。

商业交易的合法化有助于强化私人合约。这有利于企业家和与之签订合同的另一方，它提供了根基让我们希望国家能在公众中找到盟友。然而，所有的合同当事人还是会遇到尴尬。让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目前，匈牙利增值税非常高。如果卖方没有提供收据，或买方没有提出要求，双方都可以获益，但却以国家利益为代价。然而，如果买方随后因为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差想要投诉，却没有任何法律可以补救。在未来，买家要求收据时，更积极的法律保护会变得常见，即使这意味着要付出更高的价格，其中包含增值税。

第二个例子，假设比起匈牙利，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雇主和雇员，不得不为社会保障、养老金和失业保险支付更高的经费。它相当于工资总额(128)的55%，并计划再次提高支付失业救济金的费用。^①如果用人单位无法注册员工数或工资漏报，那么，雇主和雇员可以划分原本应交的与工资相关的强积金。在许多情况下，员工不会失去很多，因为他们仍然有资格获得许多社会福利。^②但是，如果较高比例的社会福利取决于雇主和员工自己的贡献，员工可能成为合法化就业联盟的成员。

所有这些问题与公民、法律和国家三者间的关系紧密相连。对国家的感情——猜疑、冷漠，甚至是对立，在公民之间非常普遍，这是旧秩序的遗产。相当大比例的人民并不认为逃税是不道德的行为。^③很长一段时间，它是公民反抗国家的一种勇气，而这种态度不能单靠礼仪声明而改变。经

① 比较而言，社会保障缴费占工资的比例，在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是在30%—40%之间，希腊是在20%—30%（美国卫生部，1990，第12、98、208、238和246页）。

② 在这一方面有许许多多的机会。人们可能会休病假、带薪产假或登记为失业，他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获得收益。或者，他们可能会花一些时间在国有部门，这使其有权申请社会保障福利，在私营部门从事不注册的非法工作也是如此，由此节省了一些跟工资相关的税收。

③ 匈牙利盖洛普研究所的民意调查发现，44%的受访者使用以下语句表示同意：“人们通过任何方式而繁荣都是可以的，如果他们对税务机关隐瞒了一些收入，不应该受到指责。”参阅R.曼钦（R. Manchin）和L. G. 纳吉（L. G. Nagy）（1991a，第8—9页）。

验已经证明，国家将是纳税人的好管家，它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赢得公众信任。^①

如果期待获得比现在更多的经济优势，私营部门需要朝着合法化方向发展。这里，我仅举一个例子：可以有合法的信贷和资本市场。例如，大型商业银行，对待小型私营企业是相当不大方的，因为它们常常只与大型国有企业联结，并且彼此息息相关，他们认为贷款给私营企业的风险较高。如果金融机构的行为改变，银行表现出更多的愿意将信贷扩展到合法的私有企业，包括小型和中型企业、新的合资企业，以及即将更有理由合法化的个体工商户。^② (129)

总结这一部分，过渡依然处在另一个财政陷阱中。私营部门分享的生产份额越大，就越难完成税收。换一种方式讲，产权关系转型越成功就存在越多的预算风险。必须将有助于提高守法相对权重的所有激励机制与私营企业纳税部门挂钩。这可能带来的是税收的增加。遗憾的是，我不能排除这一过程旷日持久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同时面临着由于财政预算损失造成的严重财政问题的困扰。

(四) 福利支出

综合预算中最大的项目是“福利支出”，这其中，还包括需要分开处理的不同统计目标的基金，分组如下：(1) 现金福利，如养老金、残疾抚恤金、产假和育儿津贴、病假工资、家庭津贴、学生奖学金、社会援助和失业补偿；(2) 实物福利，如医疗保健、药品、公众教育、培训、幼儿园和课后中心、养老院，以及免费或以优惠价格提供的劳动力市场服务；(3) 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补贴，包括住房价格（和租金）。^③ 这项研究中大多数观察指的是作为整体的福利开支；没有足够的空间在这里讨论跟教

① 在这一点上匈牙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一项调查中，人们被问各机构是否真的有利于公众利益。只有42%的受访者认为政府确实如此，与此相比，教会、新闻媒体、宪法法院和议会反对党获得很高的评价，参阅R. 曼钦 (R. Manchin) 和 L. G. 纳吉 (L. G. Nagy) (1991b, 第10—11页)。

② E. 盖姆 (E. Gém, 1991) 对私有企业的信贷投放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和分析。

③ 匈牙利一些专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度的分析。我特别推荐茹饶·费尔格 (Zsuzsa Ferge) (1991a、1991b) 的研究和菲特阿提·瑞特 (Fraterité Rt) 公司1991年的报告。国际机构组织编制的说明和分析是非常有益的，特别是世界银行 WBG (C. Kessides, 1991)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C. 克匹茨等, 1990)。我研究中的很多观点得益于此。

育、文化、住房等相关的特殊问题。

(130) 表 5.6 社会支出的国际比较：政府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

国家	社会支出总额		医疗健康		养老金	
	1980 年	1986 年	1980 年	1986 年	1980 年	1986 年
希腊	12.6	19.5	3.6	3.7	5.8	10.6
意大利	23.7	26.4	5.6	5.2	12.0	12.2
挪威	24.2	24.8	6.5	6.6	7.9	8.8
西班牙	15.6	17.0	4.3	4.3	7.3	7.6
瑞典	33.2	32.0	8.8	8.3	10.9	11.4
美国	18.0	18.2	3.9	4.5	6.9	7.2
西德	26.6	25.2	6.3	6.3	12.1	11.4
匈牙利	21.8	24.4	3.3	4.1	7.8	9.1

注：与经合组织定义一致，匈牙利的社会总支出数据不包括消费和住房补贴。

资料来源：C. 凯西斯等（1991 年，第 7 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统计数据来源于经合组织资料库；匈牙利的数据来源于匈牙利中央统计局（Kö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编制的不同年份的统计年鉴；一些数据来源于社会保障局、政府官员、世界银行职员的概念情况。

表 5.7 社会保险税净额和转移费的国际比较：占 GDP 的百分比

统计	经合组织中 低收入国家 ^a	经合组织中 福利国家 ^b	匈牙利
	1986 年	1986 年	1989 年
社会保险费总额（员工和雇主）	8.3	12.0	15.2
社会支出总额	21.0	31.0	25.4 ^c

资料来源：C. 凯西斯等（1991 年，第 13 页）。关于表中相关数据的更详细信息，请参阅表 5.6 的来源。

- a. 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土耳其的均值。
- b. 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荷兰、挪威和瑞典的均值。
- c. 按照经合组织的定义，见表 5.6 的注。

表 5.6 和表 5.7 中的国际比较表明，匈牙利的福利支出非常高。只考虑其总额占 GDP 的比重，匈牙利的这种支出已经超出了其他经济发展指数国家所持的水平（希腊、西班牙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低收入国家）。虽然这一比例比发达的“福利国家”（瑞典或丹麦）（131）低，它接近那些欧洲的发达国家，如西德和意大利，但是匈牙利并不属于“福利国家”。

表 5.8 按时间序列列出匈牙利的福利支出，它显示政府支出中社会保障不断增加。同时，我们从匈牙利市民那里听到很多抱怨，其中很大部分是相当必要的需求。例如，尽管医生和医院的人均床位数都非常高，但是存在严重的医疗问题，例如悲惨的低寿命预期和婴儿高死亡率。虽然养老金制度在某些方面的发展需要走很长的路，目前养老金也只是部分得到关注，高速膨胀的时代里退休的人将面临着毁灭性的困难。此外，不平等越来越多：后社会主义转型允许一些人先致富，但其他人都是贫穷或是实际陷入赤贫，现在的法规和制度都不足以阻止这一衰退过程。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也许是本研究所有讨论的问题中，最严重的困境之一。

表 5.8 匈牙利主要的社会保障计划福利支出

年份	十亿福林（匈牙利币种）	占 GDP 的比重（%）
1985	167.0	16.2
1986	181.5	16.7
1987	200.3	16.3
1988	255.2	18.1
1989	317.1	18.6
1990	414.7	19.9

注：经合组织编撰的数据与社会保障计划的定义一致，这比表 5.6 和表 5.7 中呈现的世界银行统计数据中的所使用的定义狭小一些。然而，表 5.6 和表 5.8 均显示类似的社会支出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1 年，第 67 页）。

匈牙利福利国家诞生的“过早”。通常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其福利服务的规模之间有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发展不是唯一的因素，但无疑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匈牙利在这方面“超越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古典的、改革前的社会主义体制会冲到前面，当它给出宪法承诺免费或最（132）

低报酬地满足一些基本需求。引入免费的医疗服务和教育，推出几乎覆盖整个人口的退休金计划，补贴食品价格，设定国家住房租金维持在名义水平上，等等。后来，事实证明政府无法信守承诺。慢性过度需求产生了免费的或不切实际的便宜价格服务，同样产品和服务质量非常差。

在1968年开始的改革过程中，政府继续增加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未能保持的承诺。这是匈牙利改革的特点之一，有时也被称为“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它试图回到过去，强制工业化政策，更加重视广大市民的需求。自由化的措施伴随着被称为“生活标准倡导者”势力的政治影响力的增长。然而，承诺及其履行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实际上，因为经济增长变缓成停滞使得这一差距再次被拉大。一些新的让步是理所当然的，而另一些则应该被撤回。

终于到了政治转折点，人民——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预计新制度会履行其提出的旧制度没履行的承诺。人们被国家干涉私人生活和对个人骚扰所惹恼，但是许多人仍然希望有一个有爱心的、家长式的国家。

那么，可以做什么？所有人都认为必须改革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此外，可以大力改善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① 对服务供应商的激励可以大幅提高，消减管理成本。详细的建议早已预备，它们扩展和超越了很多细节。这可能会导致一定的成本降低。然而，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提高行政效率而解决的印象是一种错误的信息传达。

(133) 在这一领域，快速并大力降低国家作用的一些激进建议也已经被提出。例如，至少这样的模板存在于今时今日的美国。有人认为，快速地权力下放和私有化，应该在两个领域推行——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除了一些特别需要国家资助的部分。

我认为，对美国的现状发表评论不是本章研究的任务。一个辩论正在美国发生，例如，是否应该有国家卫生服务部门或大多数人民的医疗是否应该继续基于私人保险。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本章前一部分的精神：要记住一条路从哪里到哪里，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决定国家是否应给予公民之前没有享受到的权利，另外决定是否收回他们已获得的权利或已经

^① 例如，匈牙利没有什么护理养老院，而且大多数养老院都没有足够的资源。另外，医院却在很大程度上照顾其实并不需要住院治疗的老人。这对老人来说，远远没有得益于此，并且花费很昂贵。

习惯的权利。在这里可以看到奇怪的“体制棘轮效应”。历史发展的齿轮转向一条道路，但是它不能回头朝相反的方向转动。如果英国没有建立国家卫生服务体系，撒切尔夫人管理的政府肯定不会建议引入；但是正是因为它在撒切尔夫人掌权之前就已经存在，她的政府并没有建议关闭它。

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市民遭受着许多之前不知道的不确定性。例如我已经提到的，郁闷的失业经历。很多人的安全意识被动摇，如果再加上医疗、养老保险制度，以及由国家保证的其他福利服务的崩溃。

随着权力下放和福利分配的私有化，迅速大幅度削减由国家提供福利服务的观念面临着很大的阻力。事实上，转型的经济问题也增加了新支出的福利，已经取得的失业救济金。此外，必须说社会的巨大变革伴随着收入的重新分配，并且，社会中很多物质生活条件开始急剧恶化。他们期待社会保障网至少拯救他们摆脱轰然倒地的境况。不幸的是，社会保障网有大洞；如果编织一个更密集的网，当预算开支迫切需要大幅消减时，便会产生国家预算的额外需求。

逃脱这种困境并不容易，需要耐心和技巧来建立一个更容易接受的局面。最重要的指导原则应该是“自愿和自由选择的原则”。^①让我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些原则如何在这个领域得到应用。 (134)

对雇主和雇员可以自愿加入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而言，这一分散网络的演进必须大力推进，而不仅仅是给予许可。值得引入一项法律来规定这些新机构应当接受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的有价值的、真正产生收益的证券组合，作为免费分配给他们的初始资本。

必须给予私营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更多的回旋余地，包括儿童保健、病人护理和照顾老人的私营机构。他们的活动应该获得市场性报酬。^②

换句话说，在适当的政府监管之下确保私营部门在这一领域快速增长将是值得的。我同意下述观点，即改造后的理想的“最终状态”将是三种基本形式的组合：作为公民权利，一些特定服务的最低标准应得到保障；其他服务的提供必须与受益人和他们的雇主所缴纳的款额一致；最后，一些服务可以由个人通过私人保险或通过市场上的直接购买行为而获得。个

^①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J. 科尔奈，1988），我尝试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如何通过扩大经济选择来增加个人自由。

^② 决定谁应该支付这笔报酬是另一回事。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得益于服务或保险的客户；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是国家或社会福利基金；还有一些情况，报酬可以由两者组合一起提供。

人可以在提供福利的各种方案中拥有尽可能多的选择范围。然而，鉴于在初始条件下，这种最终状态只能逐渐接近。没有办法做出真正的选择，就不能被给予“既成的事实”。^①

(135) 也许比提供不同社会服务机制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让人民通过政治进程来表达自身意愿的机会。大部分监督提供社会服务机构的角色应给予维护不同权益的志愿组织。此外，立法机关必须对社会福利支出、社会保险事项和与它相连的税收有一锤定音权。各政党无法回避这一复杂问题。他们需要清晰界定公民可以从国家和准国家机构获得什么和需要支付的纳税额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义务并不只是抗议廉价的推诿，还包括揭露那些在福利计划不变的前提下承诺消减税收的政客们。国家福利支出比例的减少应该获得消息灵通的选民们的同意和期望，用以减轻税收负担。而且福利支出只能维持在市民愿意用自己的税收来融资的比例上。

综上所述，尚未有其他预先的财政陷阱，福利支出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最痛苦的一个。国家福利支出的大幅削减将带来不安全因素，许多人的生活质量严重恶化。然而，不仅要维持福利开支的现有水平，更要提高它们，这将伴随着税收不同的等级，但是税收会使得投资者望而却步，进而阻碍经济增长。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还需要更多的生产用以支付所提供的福利服务：一个更大的馅饼比较容易划分。

很难做出预测来预计未来日子的福利支出。我认为最有可能的结果将是社会福利服务将部分权力下放和市场化，但这是痛苦而缓慢的。

四 总结

通过分析匈牙利的经验我已经探讨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如今一些国家（例如，形成于苏联境内的共和国国家）的问题更令人咋舌，充满了竞争（136）的元素，比如，决定生产什么来确保人民有食物，有实际购买力的货币，生产下降停止，等等。但是，迟早所有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将进一步超越充满混乱和危机的有害状态是有希望的，然后他们会发现我在研究他们议程

^① 例如，现在年轻人可以在养老保险的各种替代方案之间进行选择，但是不能迫使那些接近退休年龄的人转移支付私人养老基金。国家根据现行的养老保险法律与正处在工作期的工人们订立“合同”，而且不能随意单方面违反合同。

中讨论的问题。^①

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苦涩的结论。即使宏观经济稳定的任务元素已经获得或多或少的成就，但是严重的问题也在不断重现。即使在预算稳定方面获得了一定成功，公共财政的严重压力仍然存在。一方面，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呼吁增加各种支出；另一方面，征税的困难越来越多。一直停留在预算赤字危险中。包括央行贷款在内的亏损可能构成通胀压力的一个危险指数。任何成功的货币宏观稳定都可以很容易地从指缝中溜走。涵盖通过发行国债的赤字会排挤掉生产性投资，这将阻碍经济增长。

任何一种速战速决的解决方案，只能是由没有诚意的经济学家或政治骗子提出。我多次提到潜在陷阱，只是为了强调任何研究讨论的问题都没有简单的答案和出路。怎么展示他们权衡利弊的痛苦，以及在好坏之间做选择！

必须有强大和持久的努力来压制先前的多动状态，并同时减少政府支出，但是打击官僚的集中倾向会不断地恢复。这一变化很可能会缓慢发生；今天之前的大政府已经被压缩到所希望的规模，远远比现在要小这种状况很好。

虽然我不能对短期预测乐观，但是更看好长期的前景。政治变革已经释放出自主、自由和创业精神，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看来有理由期望生产随后上升，生产上升的一个效果是更容易解决本章中所讨论的财政问题，也会扩大税基，这是税率降低的先决条件。后者会刺激投资，反过来又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失业率的下降，最终会降低国家的社会保障负担。 (137)

明智有效率的政府可以加速这一发展，错误和疏忽的政府却会挡住它，但是转型的最终结果并不在政府的手中。新的后社会主义体制，国家可以最大限度地影响经济，但它不能运行经济体，这是由那些参与其中的利益所推动。这是中央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拥有的主要优势之一。

^① 与其他几个东欧国家一样，要使得政府支出和税收强制减少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匈牙利期望加入欧盟。成员资格的一个要求是这些速度不能远远低于欧洲标准。

第六章 后社会主义体制的财政纪律演变^①

我认为，财政纪律是指执行下列四个简单任务的行为准则：

- (1) 买家：为购买的商品付费。
- (2) 债权人：信守贷款合同，偿还债务。
- (3) 纳税人：缴纳税款。
- (4) 企业：营业收入可以弥补支出。

不言自明，虽然这些行为准则类似于市场经济中的准则，它们明显不同于社会主义计划（命令）经济中的准则。计划经济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学科，其中包括执行计划命令，尤其是达到产量目标，遵守投入配额。本章的主题是后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如何学会观察新的纪律。

分析建立在匈牙利的经验之上，对于其他国家，我只提到了几个地方而已。但是，在我看来，本章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它们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试图在研究结束时得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

一 国家和企业之间的新合同

分析问题之前需要先建立一个概念框架。让我们来看看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它们之间有一份长期合同（本章不探讨一些领域，尽管

^① 本章是“匈牙利向市场经济转轨”研究课题中的一部分，这是匈牙利的国家科研基金会和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合作支持的研究项目。我必须感谢，安娜玛利亚·巴尔格（Annamária Balogh），贝拉·巴马依（Béla Bártfai），伊姆雷·菲托（Imre Ferto），伊丽莎白·盖姆（Erzsébet Gém），玛丽安娜·霍洛（Marianna Holló），玛丽亚·科瓦克斯，拉兹洛·莫拉克奇，沙多尔·皮申格尔迪（Sándor Piskolti），简·普罗科普（Jane Prokop）和捷尔吉·罗则撒（György Rózsahegyí），他们为本章的资料收集提供了很多帮助。我很感谢布赖恩·麦克莱恩和朱莉安娜·班波出色的匈牙利文翻译。

在这些领域财政纪律也显而易见，例如官僚或公司内部的财政纪律)。事实上，这种关系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具体的保险合同。

根据改革前社会主义体制中运行的旧合同，保险公司（即国家）要承受所有的损失。如果一个企业发现自身陷入财务困境，国家需要无条件将其保释出来。国家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技巧来达到保释目的：扩大财政补贴，给予税收优惠或推迟纳税要求，重新安排贷款偿还方案，或提供新的软性贷款。国家还需要保证长期亏损企业的生存。所有这些技巧意味着不断地违背上述提到的第二、第三和第四条财政行文准则（贷款规则、财政规则和市场成本弥补规则）。我早期的作品将这些现象称为软预算约束现象。同样明显的是，保险理论中众所周知的副作用：所谓的道德风险。如果投保者清楚保险公司将支付所有的伤害险，他们也就不值得努力避免受伤，这种情况意味着企业没有充分的动机提高经济生产效率并避免损失。

成熟市场经济的一个特点是国家和企业之间有各种类型的保险合同。保险公司只弥补部分损害，而投保人支付大部分损失。没有什么损失会被自动地且无条件地弥补。只有在某些特权部门（如银行），国家将承担可能发生的绝大部分损失。无论国家的角色是否是“保险公司”——它只是在一些特殊的严格确定的条件下，给一些特权部门或其他一些部门提供保险——它也不能保证一个企业的生存。一个长期亏损的企业，早晚不得不从经济舞台上退出。第二、第三和第四个行为准则都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套用前面介绍的术语，预算约束开始硬化。

几个迹象显示匈牙利已经转向市场经济下的长期保险合同，并具有了相应的特征。表 6.1 似乎证实了这一观点，可以看到，政府补贴的大幅减少——补贴占 GDP 的比例从 12% 下降到 3%。此外，在表 6.2 和表 6.3 (143) 中，企业破产并进入清算程序的数目明显有大幅度提升，这意味着国家救援行动的相应减少。我记得，在 1976 年至 1982 年，^① 匈牙利平均每年有 26 家企业停产。虽然已经有了小规模的企业退出，但它们的退出不是因为财政问题，而是这些个案背后的其他因素。再做一个比较，1992 年 1 个月的进入清算程序的企业数目也多于 1986—1988 年期间所有年份的企业退出总额。

① 参阅 J. 科尔奈 (J. Kornai) 和 Á. 马梯思 (Á. Matits) (1987, 第 100 页)。

表 6.1 政府预算和企业部门之间资金流动（占 GDP 的比例） 单位：%

年份	从企业部门转向政府预算	从政府预算转向企业部门	政府预算净额
1987	29.6	12.3	17.3
1988	20.4	9.9	10.5
1989	15.4	6.7	8.7
1990	16.2	4.7	11.5
1991	12.4	2.8	9.6
1992	9.8	2.7	7.1
1993	10.0	2.6	7.4

注：（在编辑这本书时此表有所修改；此后可称为修改表）1993 年的数据是政府的预测。第一列包含了国有企业交给政府预算的净利润，国有和私营企业缴纳的利润税。第二列不包括政府对消费者的补贴。

资料来源：L. 莫拉克奇（1993，第 25—39 页）。

(144) 表 6.2 1992—1993 年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数目

年份	月份	备案数	法院正式公告数	
1992 年	1—3 月	786	285	
	4 月	2259	205	
	5 月	201	465	
	6 月	145	482	
	7 月	154	300	
	8 月	113	69	
	9 月	151	104	
	10 月	150	190	
	11 月	118	225	
	12 月	154	175	
	1992 年总数		4231	2500
	1993 年总数		987	887

注：[修改表] 中的第一列是破产程序起点时的企业数目。第二列中数字指的是破产程序开始公示后的企业数目。法院具有在官方报纸发出公告的职责。

资料来源：1992 年数据来自匈牙利财政部（1992，第 4—7 页）和 T. 绍洛伊（T. Szalai, 1993，第 79 页）；1993 年数据来自财政部（1994，表二/3.3）。

表 6.3

企业清算程序数

(145)

月份和年份	备案数	法院正式公告数
1986—1988 年	无	159
1989 年	无	141
1990 年	无	233
1991 年	无	526
1992 年		
1—3 月	2617	120
4 月	1281	161
5 月	837	201
6 月	927	166
7 月	699	219
8 月	701	210
9 月	797	482
10 月	782	211
11 月	751	233
12 月	692	223
1992 年总数	10084	2227
1993 年总数	7242	2593

注：[修改表] 第一个数字覆盖的周期开始于 1986 年 9 月 1 日，截至 1988 年 12 月 31 日。第一列的数据记录（备案）起始于清算程序开始时。第二列中的数字是清算程序开始公示时。一旦进入破产程序，法院具有官方报纸发出公告的责任。

资料来源：1986—1991 年的数据来自 M. 莫拉（1992 年，第 18—23 页）；1992 年的数据来自匈牙利财政部（1992 年，第 5—9 页）和 T. 绍洛伊（T. Szalai, 1993, 第 79 页）；1993 年的数据来自匈牙利财政部，（1994 年，表二/3.3）。

实际上，很显然，国家和企业之间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是，理论经济学中一个有前途的分支，称为“契约论”，已经检验了无数案例里存在着不成文的契约；习俗和习惯性行为让各方遵守合同条款。^① 每一方，

^① G. S. 贝克尔（G. S. Becker, 1992, 第 338 页）的研究对习惯性行为和传统进行了如下陈述：“……习惯、成瘾、传统和其他偏好，直接取决于过去部分受控制的选择，因此未来行为，以可预见的方式发生。事实上，习惯和其他一些可能是非常好的替代品，来取代长期合同和其他明确承诺机制。”

指望对方继续循规蹈矩地按照惯常行事，自己也信守合同里的不成文条款。因此，这种社会关系建立在公司长期预期上。^①

在旧合同下，特色的改革之前的经典社会主义，企业很肯定它可以从国家那边获得什么帮助来克服财务危机。但是，如果没有了长期期待的基础，例如同一方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是政府）突然改变，会发生什么？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心理学，都没有提供足够的关于习惯和期望巨变的可靠信息。仅这一点就使得它们很难找到一个答案来探讨本章研究中的问题。

上述描述的概念框架为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合适的分析结构。让我们先来看看政府的行为，然后关注企业的行为。

二 政府行为

（一）相互冲突的目标

政府可以有效改变先前长期合同的首要前提是**政治意愿**。这是政治目标的一种功能。(146) 当政府制定有关财政纪律的政治目标时，它必须权衡预期的收益和成本。让我们首先看一下执行财政纪律的好处。

(1)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一个平稳运行的信用体系必不可少，但是同时我们也观察如果没有信贷合同作为保证，这个体系就不会出现。

(2) 后社会主义转型过程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与平衡预算相关的问题。克服这些困难的其中一个要求是提高税收征管。

(3) 分化不均匀的税收和补贴制度扭曲了市场相对价格。停止这些制度有助于开发出更可靠的价格信号。

(4) 更加严格的财政纪律将使长期亏损的生产商离开生产行业。如果相对价格体系可以充分真实地反映成本和相对稀缺性，上述情况会变得特别适合。此外，财政纪律鼓励幸存的老企业和新兴企业降低

^① 分析长期隐性契约，换言之，不断更新基于“游戏规则”的社会关系，“重复博弈”最常使用的数学模型。关于理论描述，可参阅 D. 弗登伯格 (D. Fudenberg) 和 J. 梯若尔 (J. Tirole) 的书 (1991, 第 147—206 页)。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理论模型，T. C. 谢林 (T. C. Schelling, 1978, 第 115—133 页) 和 K. 宾默尔 (K. Binmore, 1992, 第 345—381 页) 的文章以比较流行的方式将其呈现出来。

成本，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

综上所述，收紧财政纪律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来提高效率。匈牙利的经验也表明一些立即显现的好处，其他的好处只是延迟出现而已。

经济互助委员会解体后最壮观的结果是匈牙利对生产行业进行了迅速调整。两位世界银行工作人员，K. 德尔维 (K. Dervis) 和 T. 康登 (T. Condon) 在 1994 年的研究中已经提到了匈牙利企业所面临的威胁：“出口或灭亡。”表 6.4 描述了匈牙利的出口情况。在很短的时间内，出口到欧盟国家的份额翻了一番。

表 6.4 出口目的地 (占总出口的比重) 单位: %

年份	欧盟	转型国家或非市场经济国家	其他国家
1987	20.1	56.5	23.3
1988	22.6	51.2	26.2
1989	24.8	47.3	27.9
1990	32.2	37.7	30.1
1991	45.7	23.6	30.7
1992	49.8	23.3	26.9

注: [修改表]。

资料来源: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1993 年, 第 106 页。

不那么显眼但非常重要(147)的是, 执行更严格的财政纪律对生产重组产生影响, 这一过程被称为改制和重组。司法破产程序并不一定意味着结束的开始, 因为进入破产程序只是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延期清偿债务。在此期间, 如果可能的话, 企业事务依然必须定为企业的基本权力。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所有或部分的高层管理人员的人事变动, 以及委任新的更好的经理人。当然, 执行清算程序并没有造成对物质和智力资本的不负责任的破坏。如果只是为了在更大的程度上满足债权人的需求, 它们促进尽可能多的企业出售。清算期间, 先前庞大的企业往往被分裂成更小的单位, 其各项资产被出售。无论是破产还是清算都可创造和改善原企业或继任企业的私有化条件。

最后, 还有一个最不显著的, 也耗时最久的, 但却是执行严格的财政

纪律最重要的影响，即让严格的纪律印在人们的思想中。稍后我再论述。

现在让我们转向权衡的另一边：成本。

财政纪律的紧缩，包括企业破产和清算程序的浪潮，导致了生产的下滑。这不是导致经济衰退无一例外地出现在全部的后社会主义经济体中的唯一原因，但是它无疑是导致经济收缩的原因之一。

(148) 表 6.5 职位空缺和失业人数

时间	注册的职位空缺数 (个)	注册的失业人数 (个)	失业率 (%)
1990 年 3 月	34048	33682	0.7
6 月	37859	43506	0.9
9 月	26969	56113	1.2
12 月	16815	79521	1.7
1991 年 3 月	13583	144840	3.0
6 月	14860	185554	3.9
9 月	15351	292756	6.1
12 月	11529	406124	8.5
1992 年 3 月	15124	477987	8.9
6 月	25346	546676	10.1
9 月	25634	616782	11.4
12 月	24097	663027	12.3
1993 年 3 月	35760	697585	13.4
6 月	30771	657331	12.6
9 月	35784	669761	12.9
12 月	28089	632050	12.1
1994 年 3 月	33341	610994	12.2

注：[修改表] 1992 年 1 月开始失业率的统计口径调整到了西方劳动力统计定义。因为没有重新计算，1990 年和 1991 年的数据按照旧定义进行计算。基于新定义后，这一期间的失业率会有所回落。

资料来源：Országos Munkaügyi Központ（匈牙利全国五一劳动中心）1991 年至 1994 年的报告。

整个工厂的倒闭显然损失了一些就业机会。此外，幸存的企业也努力降低成本，裁员是必然的结果之一。表 6.5 呈现了劳务市场上的变化。在 1990 年 5 月以前，职位空缺数目已经开始多过求职人数。从那时开始，这

一比例倾向于失业一边，持续性地逐月增长。失业的增长给一个国家带来特别严重的创伤，劳动力人口已经习惯了几十年的充分就业，尽管实际上是劳动力短缺。失业的出现和增长是一个巨大的痛苦，失业救济金也只能缓解一部分疼痛。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失业带来的经济损失，也需要考虑失业后引起的心理效应。

此外，社会主义体制下，特别是在改革前的阶段，企业不仅仅是雇主，它们还提供了许多福利：公寓或宿舍、食堂就餐、节假日、医疗、幼儿园和托儿中心。随着企业变成以利益为中心的雇主，它逐步地将这些任务一一放开。因此，企业层面所提供的社会保障被侵蚀的同时，就业保障也随之消失。

收益和成本的对抗导致了政府在冲突目标之间艰难选择。政府的大部分注意力都倾注在权衡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宏观稳定的经济政策上。遏制通货膨胀需要严格遵守紧缩货币政策，而同时必然伴随着定期的失业率上升；相反，采取措施降低失业率会增加通货膨胀加速的危险。(149) 后社会主义经济也面临两者间的取舍问题，而且这给后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匈牙利的年通货膨胀率已经有所下降，但在1992年和1993年，它仍然在22%到23%之间徘徊，同时失业率已经上涨到12%以上。然而，在这背后还有另外一个更严重的取舍问题，因为这一取舍具有更深刻的影响：“效率与安全”。效率的提高，在短期、中期和长期来看，与放弃充分就业和就业保障齐头并进，对社会保障的侵蚀起源于企业提供的福利服务。

国际比较表明，面对这种严重的困境，匈牙利在严格执行财政纪律、硬化预算约束，促进效率的提高等方面，已经走得最远。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也在同一方向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到目前为止，他们还处在犹豫阶段，例如，他们依旧犹豫是否要创建现代破产法并相应地推动执行。举一个极端的反例，俄罗斯中央银行在1992年的下半年几乎延伸了不可估量的信贷款项来维持处在破产边缘的国有企业，或者至少确保这些企业能够继续雇用工作人员并支付工资。

（二）信誉和承诺

让我们回到更广泛的层面进行讨论。假设有那么一刻，政府决定从现在起实行严格的财政纪律并强化企业预算约束。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会不会有恒心持续这一政策？而且，即使它承诺这样做，企业是否也会相信这

个承诺？如这篇文章前面所述，采用新合同的一个条件是政府应该有信誉，一般来讲，在本文讨论的特殊情境下，信誉就是政府“不救市”的承诺。冲突理论与保险合同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信誉问题，其中至关重要的(150)是各种威胁的可信性。匈牙利呈现出来的图像目前尚不清楚；反之，可以找到一些奇怪的矛盾点。

这让我回想起尤利西斯（Ulysses）与海妖的故事。^①海妖塞壬（Sirens）的迷人声音会吸引水手破坏船只使之沉船。当尤利西斯的船接近塞壬的岛屿时，他用蜡将自己的耳朵堵住，并告诉同伴将他绑在桅杆上，这样他就可以不贪图美声。当他听到海妖迷人的声音时，要求同伴们为他松绑，可是他越恳求，同伴们越会将他绑得更紧。

借用诱惑和承诺的比喻来谈论匈牙利的真实情况，我们先来看看诱惑。政府尝试放松财政纪律和软化预算约束会带来很多影响。政府背后的政治势力，扮演着赞助者的身份，他们通过财政救助计划来赢得客户。面对政治压力、行业或区域游说团体的请求，政府就做出让步。政客们显然记住未来的议会和地方政府选举，这样的救助计划能够帮助他们赢得廉价的普及率。

这构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政治诱惑，已经可以实际观察到这一诱惑的影响。从开始执行更严格财政纪律时起，政府在一些案例中已经采用了特殊方案，其中一些方案在经过讨价还价后已经变成了协议。软预算约束的残余依然清晰可见。同时我们依然面临着一种危险，即频繁的异常现象会削弱政府在强硬财政纪律承诺上的可信度。

绑住尤利西斯的绳索功能可以看成是捆住政府之手的约束和先前承诺。某些时候政府需要满足宏观经济需求并化解政治紧张局势，所以我们无法期待政府会绝对地、教条式地应用“不救助”原则；但是政府必须确保财政救助是相对少的，也就是说，在极少数情况之下政府才提供财政救助。拯救企业的标准和程序必须通过法律做出规定，不能保留额外的行政议事程序。当然，只是暂时的经济援助是可以的，但是所采取的任何形式的援助（推迟税收、债务重组、财政补贴）都必须遵循明确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需要严格地确定救助期限，不允许救助离期限太遥远。政府不应该闭门造车式地达成保密协议，应该将每一种救助方案充分地公之于世，

^① J. 埃尔斯特（J. Elster）的书，《尤利西斯与海妖》（1979年），多处采用了这一比喻来分析诱惑和承诺。

使其受到议会委员会和新闻媒体的公众监督。(151)

令人遗憾的是，政治人物们通常表现出跟荷马所说的尤利西斯相反的行为。他们不可能告诉他们的水兵来约束他们的手脚。相反，他们会尽一切所能放开手脚，以便自己有空间和余地来即兴发挥。正如赫希曼所说，“不可预知就是力量”。^① 比起清晰，朦胧更适合政治家。

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特别是专业经济学家是否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并确保政府可以保持承诺。无论发生什么，考验政府在财政纪律承诺上的可信度将是它在未来几年的实际做法。

(三) 强制实施纪律的机制

现在让我们假设，政治意愿会持续地且一致地推行财政纪律。这仍然留下了一个问题，即是否这些方式可用于任务的执行。

我们先从立法开始。在这一方面，匈牙利取得了显著进展：已经创立了符合市场经济的现代会计法、银行法和破产法。立法过程本身就是实验的启发之一。一个特别的法律可能错误百出，迟早需要修正，这使得它很难正确地融进经济行为者的意识之中。^②

但是，虽然已经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然而执法却是另一个问题。法院处理商业案件的工作量得到了跨越式发展，但是合格的专业人数却太少。不仅仅缺少法官，也缺少收银人员、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有资格和经验的经济分析师和企业管理人员，来执行破产、清算、拍卖、兼并、分拆和重组。^③ (152)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一个企业打破了财政纪律的第一个准则：它没有支付所购物品。卖方要求法院发出支付令。随之的警告是如果买方还没有

^① 参阅 A. O. 赫希曼 (1977, 第 50 页)。

^② 在破产和清算规则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措施“切腹条款”。一旦公司无法履行其付款承诺，将变得很明显，企业负责经理有责任申请破产。如果管理者没有这样做，可能被证明会造成损失，他或她个人可能会被起诉要求通过民事法院进行赔偿。如果企业陷入财务困境，这一规定提供了非常强大的动力让经理们申请破产。“切腹条款”加重了破产潮到一定程度后，这一条款最近被撤回，同时对其他条款进行了较小修订。经验将会表明这项修正案是否已经大幅弱化了破产法。

^③ G. S. 贝克尔和 G. J. 施蒂格勒 (Stigler) 1974 年的一篇关于法律执行的研究表明制度目的会改变。如果社会成员的利益由此分配 (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确实如此)，这一制度的规模、方法和组织形式可被调整到更高的标准之上；这种活动的质量可以提高，例如，通过必要的激励方式。

支付，将会面临拍卖警告。表 6.6 显示，这类案件的数量在四年内翻了六倍。大概三至四个月之后，法院会发出支付令，同时警务人员开始拍卖债务人的庞大资产。

表 6.6 1992 年布达佩斯法院发出的支付令案件数

年份	案件数	索赔总金额（亿福林）
1988	11000	6
1989	31000	19
1990	64000	45
1991	61645	43
1992	31470	38

资料来源：访谈 S. 匹圣柯尔迪（S. Piskolti），布达佩斯法院经济部门前负责人。

也难怪，一些创业者觉得他们必须将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媒体上已经有一些报道，一两个不起眼的公司以奇怪的手段专门从事讨债业务：几个强壮的年轻男子到债务人门口，打出几套类似的拳法，或者至少是说着来势汹汹的话，提醒债务人的责任。^① 也有一些其他案件，殴打债务人或
(153) 警告他，他的财产将被损坏，或者他的家属会被袭击。也就是，存在着实施财政纪律的黑手党方法……

这令人震惊且不能容忍。但是，不幸的是，因为执行财政纪律的法律基础设施发展之前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已经预测到会出现这样的黑手党手段。

虽然财政纪律的执法必不可少，立法也不足够。它必须通过转变公众对财务交易道德态度来增强对法律的尊重。^② 这个问题将我们引到本章的第三部分——企业行为。

① 例如，参阅 1992 年 10 月 19 日《人民自由报》的新闻报道。

② 经济发展史表明，立法监管和执法之前被广泛提出，私人契约基于双方的诚实和相互尊重。当第一个商业法律获得通过后，他们毫不客气地处理那些不支付债务的人。13 世纪英国的商人法（Lex Mercatoria）获准通过，这项法律规定如果债务人不清偿债务，债权人首先可以拿回其可移动性财产：“如果债务人没有动产可用于抵偿其债务，那么他需要被检举并关进监狱，知道他可以偿还债务，或者他的朋友可以替他偿还。”这段话引自 W. D. 米切尔（W. D. Mitchell, 1969）。欲了解更多关于商法案例，可参阅 L. E. 特拉可曼（L. E. Trakman）的书（1983）。因此，从中世纪起，就有严格法律促使尊重商业世界中行动者之间的私人合同和财务纪律。只要几个世纪之后，对法律的需要已经被历史性地定格在他们的脑海中，被法律制裁为“驯”。

三 企业行为

(一) 例子：企业间的强制信贷

国家和企业之间的明确市场经济精神的新合同，不仅需要政府行为的改变，也需要企业行为的改变。可以看到匈牙利商业领域内，第二个变化并没有充分发生。让我们来看看企业之间强制信贷现象。B企业已将生产材料交付A企业。买方已接收货物，但是并没有付账。人们可以把它看成这样：A企业强制B企业延迟了信贷，而没有事前协商，然后不支付所欠的债务。这样，A企业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准则。以类似的方式，B企业也不支付C企业提供的货物，由此造成的麻烦之一是B企业也没有获得A企业的支付。对支付和债务结算的忽视波及其他企业，形成一条环环相扣的长强制信贷链。^①直到1992年4月这种情况持续增长，(154) 如表6.7所示。

表 6.7

强制信贷

年份	非自愿债权企业的数目	强制信贷总额 (亿福林)
1979	52	7.9
1980	25	3.8
1981	27	4.7
1982	85	15.2
1983	167	33.8
1984	159	38.4
1985	127	28.3
1986	82	14.0
1987	82	14.0
1988	208	45.5
1989	314	72.8

^① 这意味着债权人排队在债务人企业外等待债务结算。因此“排队”一词说明了这一现象在匈牙利变得普遍。

续表

年份	非自愿债权企业的数目	强制信贷总额（亿福林）
1990	432	90.5
1991	1017	159.8
1992年4月	1143	197.0
1992年12月	642	104.0
1993年12月	638	99.0

注：[修改表] 1991年的数字是指截止到1991年11月30日。其他所有非自愿债权企业数目的截止日期都是12月31日。关于非自愿信贷总额仅涵盖比25百万福林大的部分。包含规模较小的非自愿信贷之后的总额应该会大得多。为了便于比较，仅考虑未偿还银行贷款的企业总数量，匈牙利以万亿福林为单位：1990年是144.3，1991年是121.4。强制信贷占银行信贷的比例在1990年是63%，1991年是132%。

资料来源：1979年至1991年数据来自É. 瓦荷格依（É. Várhegyi）和L. 亚历山大（L. Sándor）（1992年，第25页）；1992年和1994年的数据，通过与É. 瓦荷格依电子邮件获得。这些数字基于匈牙利国家银行的数据。

1992年下半年强制信贷总额大幅下降。这似乎显示着破产风波在加强财政纪律上有了良好的效果。另外，在解决破产企业之间的合作方面也采取了多样化的尝试。例如，通过清算体系在几个不同企业之间建立互惠债务关系。企业内部的信贷可以转成银行信贷。虽然强制信贷的总额大幅下降，但是只要财政纪律继续保守而不产生基本和持久的变化，我们就不能排除强制信贷再次增长的可能。为了确保强制信贷只是零星点点，而不是大范围覆盖，企业必须接受下面两种禁令：

买家：未经卖方事先同意，切勿将货物处于未支付状况。如果债务仍在，很可能惹上法律麻烦——卖方可以把你告上法庭，查封你的资产。除了法律纠纷，这将会是公司商业信誉和商誉的一个污点，信用等级会因此下降。

卖家：直到确信买家会支付而且买家真的值得可信，才可以发货。

第二个警告特别值得强调。强制信贷的扩展人往往表现为“无辜的受害者”，他们需要正义。他们认为他们有权期望国家急于给予他们援助，就好像他们是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必须承认，市场不是“只是而已”。企业家，需要承担风险。如果交易顺利的话，他们可以赚很多钱，但如果生意不好，他们会遭受损失。如果买家恰好没有

支付，就必须尝试通过法律手段来征收他们的债务。如果没有成功，那只是他们的问题。如果他们失去了智力，下一次他们会更加谨慎应该提供货物给谁。

同样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习惯变化。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能够计算的是一个企业可以生产多少。一旦生产发生了，报告给统计部门，通过粉笔记录，产品的数量为规划的实现做出了多少贡献。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货品到底怎么样相当不重要。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唯一计算的事情是企业达到的销售量，它的产品可以卖多少钱。

基于上述启发性例子，现在是时候来分析一个更普遍的企业行为。我们值得单独研究两个经济部门：新私营企业和旧国有企业。

(二) 新私营企业：“印记”

(156)

借鉴于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后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私营企业行为，我想借用进化生物学的一个概念：“印记”^①（字典的定义是铭刻或盖章，象征性意义是指记忆的不可磨灭的印象）。对动物的观察提供确凿的证据，在生命的最初，尤其是敏感阶段，后天养成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它们成为印象深刻、几乎不可逆转地存储起来的，并促使动物关注重复性的经历。^②

对新的私营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明白企业必须遵守财政纪律。现实中已经出现了抵制这一要求的阻力。私营企业家可能会说，如果国家救助仍在国有企业范围内实施，为什么他们不能受到同样的帮助？我认为屈服于这种压力，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撇开一些罕见的、真正合理的例外（已经提到），私营企业不应该获得国家的财政帮助。让他们自己为生存而挣扎。如果每年有10%到15%的新企业，特别是小型和中型的企业，停止商业活动，并不会造成经济恐慌。这是一个健康的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企业进出。

^① 参阅 E. H. 赫斯 (1973) 和 W. 瑟金 (W. Sluckin) (1973)。

^② 雏鹅一条线地跟随鹅妈妈的散步路径。“印记”发现者中的一员，康拉德·洛伦茨 (Konrad Lorenz) 指出，如果在孵化器里的雏鹅结识了一个男人，在它们生活中的第一个小时内，当它去散步时它们会一条线地跟着他，而不是它们的亲生母亲，即使母鹅就在附近。

（三）旧国有部门：从创伤中学习

同样的论点使人怀疑，如果国有企业继续保留在国家手上，对国有企业还有什么可以期待？宽松财政纪律可被容忍，软预算约束也可以被接受，这些观点已经印记在依旧运营着的国有企业和很多雇员的脑海中。是否还有可能改变这些印记呢？

可能会改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果（且仅当）缔约的另一方，国家，作为“**保险公司**”，严格且坚定地遵守新的市场经济合同。

国有企业已经习惯依赖国家的援助之手和持续性救助，最重要的步骤是要认识到这些行为是有害的，且很危险。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的认知来自解释性文字或演讲所带来的影响，然而很多时候带给人们认知冲击的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体验，例如，染毒习惯导致吸毒者犹豫不决，并在吸毒时引发悲剧，或者导致自己患重病。^①

表 6.2 和表 6.3 显示，企业长期亏损和严重破产已使得匈牙利企业面临灭亡的致命危险。如果这种压力变成永久性，企业管理者会开始相信遵守财政纪律对企业来说是个生死攸关的事情。

企业遵守财政纪律是可能发生的，但现在还不能确定情况真的会如此发展。其实，对成瘾习惯的观察显示，诱惑非常容易导致老习惯复发。国家旧行为——容忍侵犯财经纪律和软化预算约束——每次复发极有可能是由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引起，这意味着毕竟他们不必很严肃地对待此事。随后，他们也将恢复旧行为方式。

因此，我们有机会期望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会伴随着企业新的习惯行为，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于此。除了一些其他关于私有化国有资产的著名论点，上述观点可以作为一个例外，因为我们只能期待非公有制企业和起初就习惯财政纪律的企业可以发展新行为和新习惯。

^① I. 斯温森 (I. Swenson) 和 J. A. 多尔顿 (J. A. Dalton) (1983) 的一项研究指出诱导吸烟者戒烟的因素中包含了以下数字：前吸烟者的样本中，67.9% 的人提到一个事实，即他们再看到有关吸烟对他人危害的统计数据时被震慑到；在一些情况下，57.6% 的人提到吸烟损害吸烟者自身的呼吸系统，而在另一些情况下，29.2% 的吸烟者提到相关家庭成员或朋友由于吸烟死亡。类似的研究结果，可参阅 S. 柯里 (S. Curry)，E. H. 瓦格纳 (E. H. Wagner) 和 L. C. 格罗特豪斯 (L. C. Grothaus) (1990)。

四 总结

(158)

分析匈牙利的形势可以得出很多一般性结论。

在政府和司法机关可以真正坚定地实施财政纪律之前，需要很长的筹备阶段。上述情形的发生需要先满足一系列先决条件。私营部门的发展需要达到一定的数量，这样它们可以既是供应商也是雇主；如果国有企业大量消失，他们能够至少部分性地取代国有企业。另外，市场组织和法律基础设施的发展也需要到达一定关键量；我们需要处理失业问题的组织，尤其是分发失业救济金和劳动力交换的组织。

然后，当财政纪律被更有力地执行时，经济中各个行为者开始相信国家在这一方面的行为已经改变得很好，但还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企业管理者对政府的期望首先来源于他们自身的经验，而不仅仅源于政府作出的承诺。如果过了数年，他们事后回想，可以看到一个新的、严格的、一贯的财政纪律已经形成，企业的新行为也得以巩固。

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出的两个经验教训均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财政纪律的巩固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其可能会延长至数年。

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并不会顺利成行或没有严重的社会代价。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发展过程会带来痛苦的副作用，例如，产量下降和裁员，但是动荡和创伤本身就是教育过程的一部分。

实施更严格的财政纪律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这种执行需要很多民众在背后支持。假定具有一定规模的共识存在，至少是隐性和被动的意识。换句话说，发展的要求是政治领域没有显著的力量攻击并阻碍财政纪律的执行。

最后一个教训是，采取强制步骤实施财政纪律会带来风险。强制带来负面效应——产量下降、失业和社会保障的弱化——会引起一些冲突。这些冲突的明显上升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并对仍然脆弱的民主体制产生破坏。在东欧，关于“魏玛现象”（Weimarization）的危险性，我们已经听到不止一个惊人的警告，其中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仇恨都对经济问题引起的不满做出令人不安的反馈。

在本章结束时，我想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虽然在各项经济和社会福利的目标之间仍然存在冲突，我个人很强调要注重提高效率和执行

财政纪律。但是，如果冷静客观的政治分析表明采取激烈的经济措施会对民主产生威胁，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我会接受一个更谨慎的方式，并以此推动财政纪律前进。

第七章 转型后退：匈牙利发展模式的一般现象^①

(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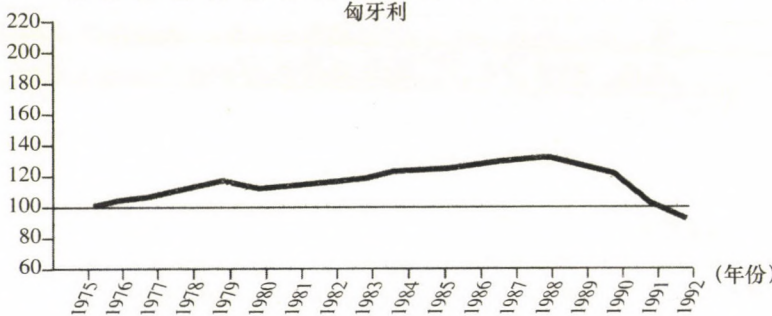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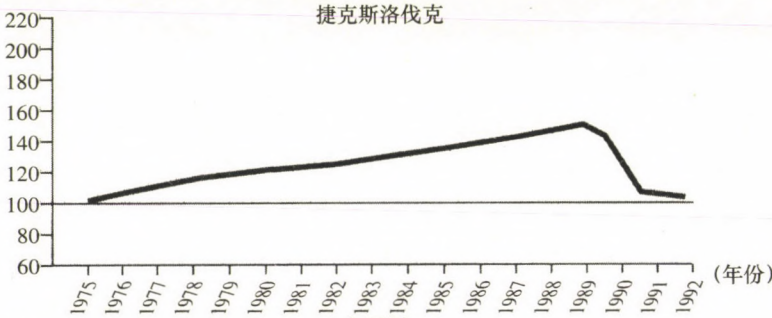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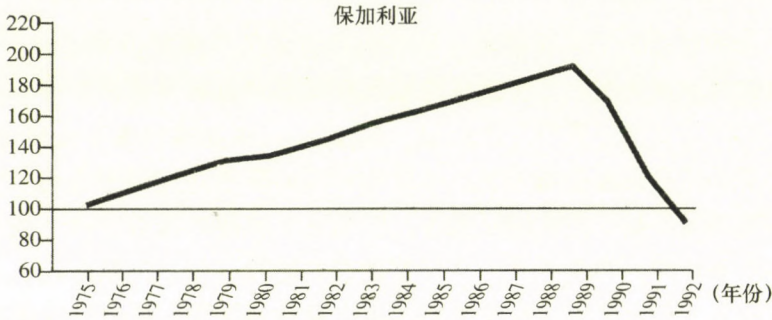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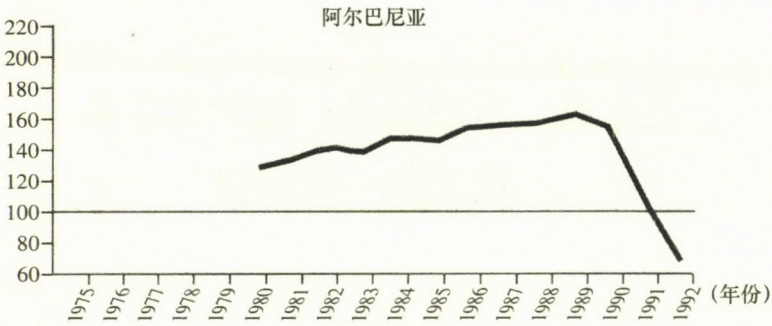
所有的后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患上了严重经济衰退症。图 7.1 清楚地描述了此情况。尽管这些国家各自的出发点和具体情况很不同，每个国家的经济衰退过程明显地相似。在波兰，“休克式疗法”是典型例子，生产下滑的历史类似于匈牙利，尽管匈牙利的转型是循序渐进的。产量大幅下滑的国家开始有高额国际债务，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或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也是如此，在转型的起初阶段，这一问题并没有带来麻烦。在政治转折点之前没有改革的国家产量持续下降，同样，改革持续多年的国家也是如此。这种强烈的相似性促使我在这个研究中专注这类国家历史发展中的相似因素。虽然本章讨论的是匈牙利，我希望这篇文章的研究分析方法，在讨论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时也会被证明是有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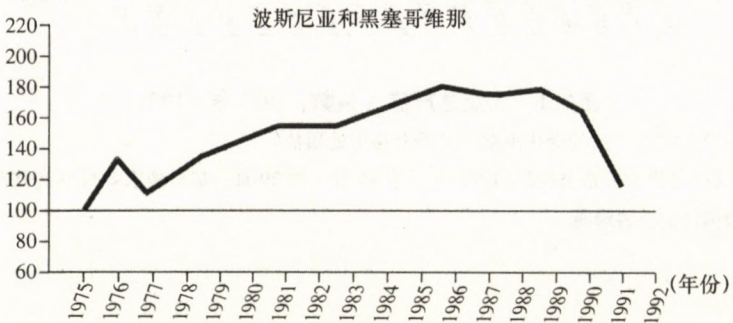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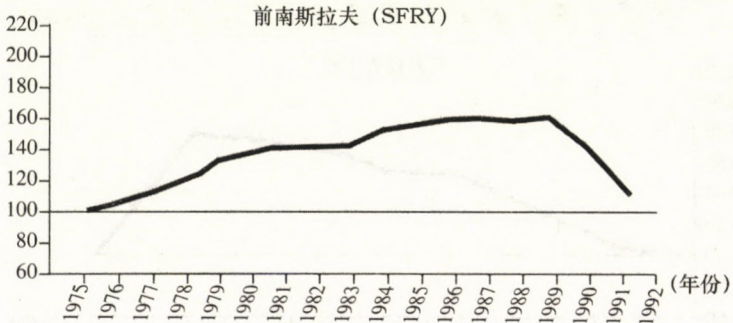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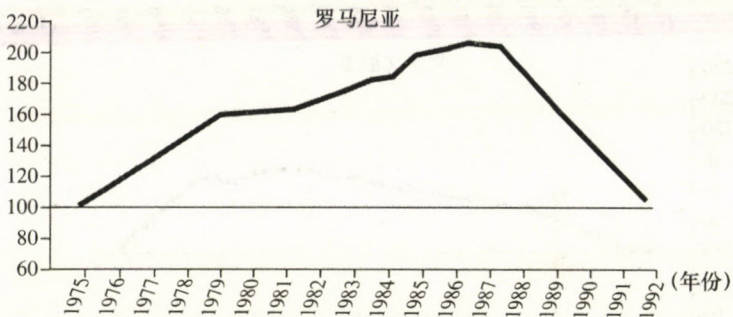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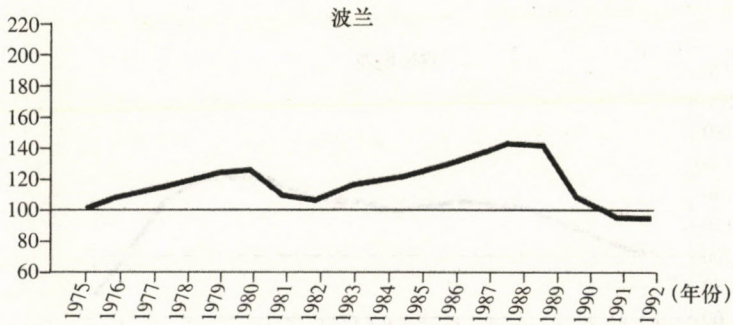
由于这种现象与迄今在经济波动理论中所讨论的案例有很大不同，有正当理由给它一个独立的名称。为了区分开来，我把它称为**转型衰退**。

表 7.1 和表 7.2 列出匈牙利的数据（也可参阅表 6.5）。数据清楚地表明生产的下降，随后是长期的经济停滞，比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发生的经济大萧条更严峻。生产总量下降了 19% 而不是 7%，工业生产下降了 39% 而不是 12%。然而，到目前为止，匈牙利的经济衰退已经比东欧地区大多数国家温和多了。^②

① 我非常感谢玛丽亚·科瓦克斯（Mária Kovács）对这一研究的大量协助，感谢阿莫斯·科瓦奇（Álmos Kovács）和捷尔吉·瑟然依（György Surányi）提出宝贵的意见，感谢布赖恩·麦克莱恩和朱莉安娜·班波出色地将匈牙利文翻译成英文，感谢匈牙利国家科学研究基金会（OTKA）、欧洲复兴开发和发展银行，以及奥地利乐透（Austria Lotto）为其计划提供的财政援助。

② 可以假设非正规部门（以下简称“影子经济”）在总产量中所占份额同期增长了。如果这是真的话，包含正式和非正式部门的 GDP 总量的下降少于官方给出的统计数据。





(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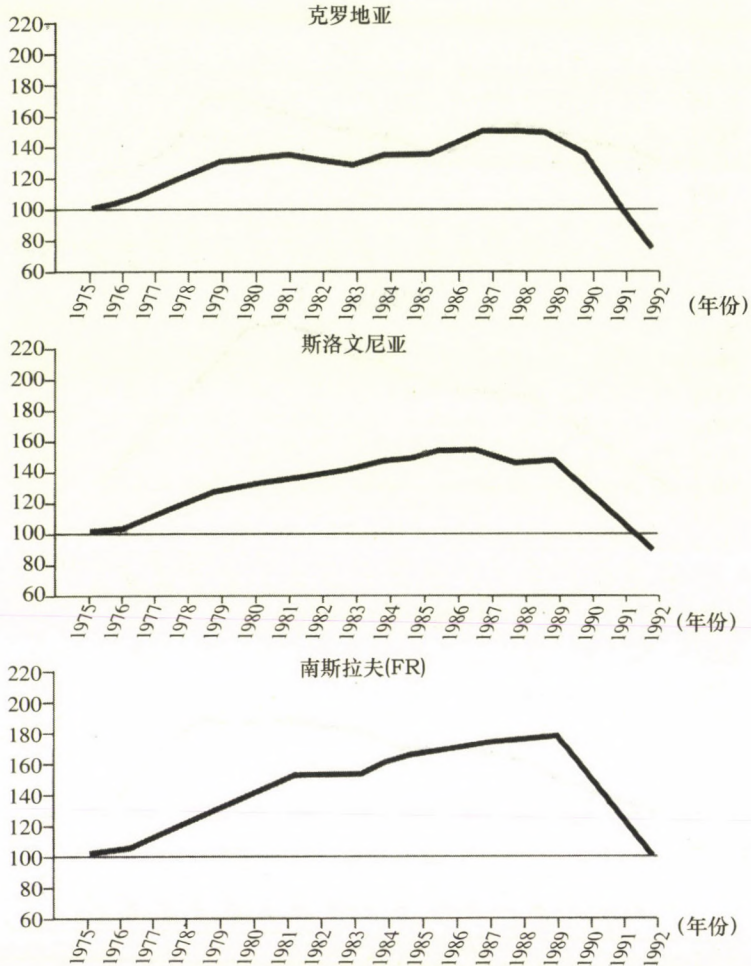


图 7.1 工业总产值 (指数, 1975 年 = 100)

注：1992 年工业产值的变化由欧洲经委会秘书处预估。

资料来源：《欧洲经济公报》，1992 年，第 44 卷，第 29 页，基于国家统计局和欧洲经委会秘书处公共数据库的资料绘制。

表 7.1 匈牙利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总值 (1980—1992 年)
(1980 = 100)

年份	GDP	工业生产总值
1980	86.3	89.8
1981	88.0	94.3
1982	91.3	98.7
1983	91.9	100.5
1984	94.4	103.2
1985	94.1	100.9
1986	95.5	100.4
1987	99.4	103.6
1988	99.3	102.1
1989	100.0	100.0
1990	96.5	92.3
1991	85.0	75.7
1992	81.2	71.1

注：[修改表]。

资料来源：匈牙利中央统计局（1993 年 b，第 71 页）。

表 7.2 大萧条中的匈牙利产出、投资和就业指数

(166)

年份	国民净产值	工业生产	资本形成	工业就业
1929	100.0	100.0	100.0	100.0
1930	103.3	94.6	75.6	91.3
1931	101.1	87.4	59.1	82.9
1932	96.2	81.9	54.5	73.0
1933	93.6	88.2	43.5	73.6
1934	102.0	99.2	34.9	79.9
1935	102.7	106.8	34.5	85.9
1936	107.8	118.4	41.8	94.7
1937	115.1	129.5	54.3	104.0
1938	112.5	125.3	60.7	112.3

资料来源：国民生产净值和资本形成的数据来自 B. R. 米切尔 (B. R. Mitchell, 1976, 第 786 页)；工业生产和就业数据来自国际联盟 (1939, 第 67、181 页)。

人们普遍预计，这一转变将伴随着一系列困难，但据我所知，很少有经济学家预测到这样大规模的生产下降。^①自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探讨转型衰退的问题，但业内人士却未能在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上达成共识。有些将其归于单一原因（或至少一个主要原因），如经济互助委员会贸易的崩溃，其中包括了苏联。这种简单的理论似乎并不能令我信服。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复杂的复合现象，需要**多因果解释**，^②我的研究目的就是提出一个综合性的多样化解释。

本章的第一部分指出导致经济衰退的**一般性**因素。第二部分分析导致宏观需求主要组成部分之间互相矛盾的**特殊**因素，如投资、消费、政府支出、进出口。这两个章节讨论的偶然性因素均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终极因素：后社会主义转型自身。当然，我并不是认为，变化中没有部分是由个别因素引起；而是变化全是转型过程相连的所有因素共同引起。例如，已经确定后社会主义地区的生产下降源于一个事实，即整个世界，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正在经历着经济衰退。除了直接的经济问题（更严格的出口条件，更少的资金流入），经济衰退还有一个不利的社会心理效应。⁽¹⁶⁷⁾不幸的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开始迈向资本主义的时间点上，而资本主义体制并非处于最佳状态。但我的研究没有讨论这个因素。本章只讨论转型自身的“**内部效应**”因素。

第三也是最后一部分，基于前面两部分所描述的因果检验而得出的结论。所有这三部分的重点是实证描述和分析，同时也包含一些规范性建议，大多数情况下，也仅仅是解释性的例子。

值得一说的是本章研究并没有考虑的部分。研究不提供数字预测，也没有提出政府行动的详细规划。相反，本章有助于了解匈牙利经济现状的争论，我将分析过去和未来几年匈牙利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趋势，并评论由此引起的战略性问题。

① 对于出现新政党和其政要或新的民主政府的可能性，后社会主义地区的人民并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有从早期著作中找到概述转型过程中这种严重经济衰退的任何预测。所以这种预测不存在，例如，在我自己的书中，《通往自由经济之路》[1989]（1990），以及经常被引用的O. 布兰查德（1991）和其他西方著名宏观经济学家的研究。极少数例外关于这一问题的预警来自K. 拉斯基（K. Laski, 1990）的文章。

② 很明显地努力尝试提出这种解释的文章：T. 厄尔多斯（Tibor Erdos, 1992），S. 科曼德（S. Commander）和F. 科里切利（F. Coricelli）（1992），S. 哥穆尔卡（S. Gomulka, 1991a、1991b）和G. W. 科沃德科。在本章中我已经采取了他们的一些重要观点。

一 导致经济衰退的一般性因素

即使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确实存在经济衰退，每个企业的生产和产品均有所下降。当然即使是在低谷中，至少可以零星地发现一些成功并处在扩展中的企业。在转型的经济衰退中，这也不算是例外；这种双重性是转型的特征之一。可以同时观察到收缩和扩张，成功和失败，大规模出局和大规模准入。套用熊彼特常常引用的一个词语，“创造性破坏”，以暴风雨般的速度发生着。但是，仍然可以提出宏观意义上的经济衰退，因为这两个过程的平衡结果为负值；就目前而言，经济收缩速度大于并行的经济扩展速度。

认识到这一点决定了我们的分析不应该只局限于解释导致绝对下降的各种因素。带有相反信号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衰退过程之间的最终平衡由一切促进或阻碍增长或导致下降的因素所决定。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每个经济周期都有特定的特征。即便如此，我将尝试抽象地检验和对比，发生在社会主义转型衰退中的独特特征与发生在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中典型衰退的“理想类型”。⁽¹⁶⁸⁾

（一）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这里将资本主义经济常态作为比较的基础，宏观层面的货币均衡作为一个长期趋势：宏观供给和宏观需求之间的平衡取决于普遍的价格水平。通常随之而来的现象是相对应的自然失业率，伴随着不完全竞争支配了大部分的市场的产能过剩，一个持续不断的准入和出局过程。这种经济状况中，生产兼销售商与买方之间的权力平衡被买家的喜恶所推翻。在买方市场上，卖方争夺买家的钱，而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最大优势之一，因为它鼓励企业适应需求，尊重消费者权利，提高质量，并引进新的产品。^①

与此相比，传统社会主义的正常状态是长期短缺经济，宏观供给和宏观需求之间在普遍的价格水平上不均衡。随之而来的现象是劳动力短缺，

^① 关于买方市场的优势，可参阅 T. 思科通威斯齐 [1951] (T. Scitovsky, 1971、1985) 和 E. 多马尔 (E. Domar, 1989) 的文章。关于买卖市场的详细的比较讨论，可参阅我 1992 年的书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 (1992a)。

产品和服务短缺，广泛的排队现象，以及强制替代。生产的扩大经常碰到原始资源短缺的瓶颈和制约。^① 生产兼销售商与买方之间的权力平衡倾斜于卖方。这是一个卖方市场，买家争夺销售产品。

即使是在成熟资本主义经济周期高峰期，市场状态也会转换成一般密集的长期短缺经济。平衡球保持在同一半场，也就是说，买方市场基本仍然我行我素，同时，顶多权力平衡略有偏移向卖方。在谷底时，失业会上升，资源利用不足也会上升，进而加剧了更严峻的竞争。

(169) 另外，转型衰退融合了深刻而独特的变化。这场游戏转移到另一半场，经济也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即从供给约束型经济转向需求约束型经济。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经济政策（货币和财政政策、价格政策）有意识地控制，怀着结束短缺经济的美好愿望。但同时这一过程是由几个不受控制的、自发的环境所影响。在经济衰退和“市场机制”交换之间（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影响，因此这一过程不能简单地说是—方导致另一方。

在远离古典式社会主义国家系列中，匈牙利保持首位，在政治转折点出现之前匈牙利已经从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在这方面，表 7.3 有所启示，表 7.3 中显示了生产要素约束是如何在 7 年之内稳定减缓的（例如，人工、原材料、半成品和零部件的短缺）。因为资源约束而构成对产量增长的直接阻碍，这已经变得很罕见。匈牙利这种因为生产投入限制而导致的经济生产下滑，也存在于其他任何成熟的市场经济中。表 7.3 中显示（来自其他众多事实），该短缺经济在匈牙利已不再存在，不再有一般密集的长期短缺问题。与此同时的巨大变化是需求约束的作用增大。表 7.3 清楚地显示提高生产期望遇到的最频繁的障碍现在是什么样。（非常重要是融资限制所引起的额外作用，这将在后面讨论。）

稍微简化些，匈牙利转型的长周期可分为两个阶段（表 7.4）。首先，构成短缺经济的一个特点——压抑通胀开始转变为温和速度的开放通胀。物价逐步朝这个方向发展，价格自由日益广泛；宏观供给和宏观需求的价格水平发展可能达到平衡。这也得益于供给因素：私营部门的出现，放宽企业进入生产的条件，以及进口部分自由化。通货膨胀率开始加快，在 1991 年 6 月达到高峰，物价比前一年高出 38.6%。这些过程预估已经引

^①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增加生产的愿望常常受到可用性硬外币的限制。

表 7.3

匈牙利的调查数据显示的生产障碍

单位：% (170)

年份	季度	需求不足	劳动力短缺	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不足			金融问题
				国内原产	从卢布区进口	从美元区进口	
1987	1	26.0	22.2	41.2	42.6		31.2
	2	27.4	233.7	42.3	46.7		24.3
	3	21.3	24.1	46.6	50.4		22.1
	4	24.1	15.8	39.4	41.8		20.4
1988	1	28.0	15.7	50.0	16.6	32.8	32.7
	2	28.3	24.7	44.1	17.2	35.3	36.4
	3	27.3	23.0	45.3	18.2	64.0	35.0
	4	30.7	19.3	38.5	14.9	22.4	40.1
1989	1	38.0	21.5	37.6	14.4	17.9	49.6
	2	40.1	22.0	28.7	11.0	11.8	46.1
	3	40.4	21.9	27.5	10.3	8.9	46.8
	4	51.2	13.4	21.4	8.0	6.3	49.4
1990	1	51.3	12.1	13.8	5.8	3.9	57.8
	2	56.1	13.9	13.0	3.4	2.2	45.2
	3	51.0	10.3	15.3	4.6	2.6	51.9
	4	54.5	4.3	11.3	3.2	3.7	48.7
1991	1	60.6	4.3	9.4	2.3	2.6	53.2
	2	70.1	4.0	7.1	1.5	2.4	54.1
	3	66.8	3.3	6.2	1.2	2.0	52.7
	4	65.9	3.0	7.2	0.5	1.0	47.3
1992	1	65.1	3.3	5.8	0.3	1.0	51.0
	2	62.2	7.4	5.9	0.7	1.5	45.9
	3	56.1	4.4	10.6	1.7	3.1	47.8
	4	54.5	4.8	8.7	0.7	23.3	42.9
1993	1	57.7	2.2	6.1	1.3		45.5
	2	68.8	3.0	6.0	3.2		47.3
	3	67.9	3.7	7.5	3.1		48.6
	4	62.5	4.3	9.4	2.4		47.3

注：[修改表] 本次调查所使用的方法源于德国研究机构，德国经济信息研究所注册协会 (IFO)，其他几个国家也是如此。受访者被问及“生产障碍”。每一个受访者可以提到尽可能多的障碍，如果他或她愿意。这些数字是相对频率的百分比（例如，在1987年，26位受访者中在提及及其他因素影响外，大概有1%的人提到了需求不足）。一些受访者提到的其他障碍，没有包括在此表中。“卢布区”指的是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前成员国家。在1987年和1993年，该调查并没有分开“卢布区”和“美元区”；数据指的是缺少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

资料来源：KOPINT-DATORG (1994)。

(171) 表 7.4 匈牙利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980—1993 年)

年份	平均每年变动率 (%)
1980	9.1
1981	4.6
1982	6.9
1983	7.3
1984	8.3
1985	7.0
1986	5.3
1987	8.6
1988	15.5
1989	17.0
1990	28.9
1991	35.0
1992	23.0
1993	22.5

注：[修改表]

资料来源：1980—1990 年的数据来源于匈牙利中央统计局（1991，第 218 页）；1991—1992 年的数据来源于匈牙利中央统计局（1993a，第 34 页）；1993 年的数据来源于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起未使用的购买力或“货币过剩”。换句话说，导致了宏观经济形势的结束，一些经济学家将其定性为一般的需求过度。

金融管理部门的反通胀努力在 1991 年展开，1992 年带来更多直观感受。到 1992 年 7 月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最低水平，物价水平比前十二个月高出 20.1%。此后每年这一数字保持在 20%—26% 的范围内波动。在一定程度上，需求实际上已被更早的货币政策所制衡。虽然没有正统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将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的财政政策称为“限制”，因为货币供应的范围一直维持着通货膨胀式增长，但是需求显然没有“跑远”。^①事实上，从数量上看明显下降了，需求和早期的最大供

^① 机构改革抑制了一部分需求，同时，经济行为者的行为也发生改变。在一定程度上，预算约束越来越难，同时也伴随着投资饥渴的降低；企业，甚至是国家预算，在开支方面也不再那么浪费。

应量之间的差距稳定扩大，即潜在 GDP。最终，在宏观层面的经济也将 (172) 从过度需求向需求不足倾斜。

“市场机制”可以通过表示股票组合的综合指数来图示化。在短缺经济中，企业主要是投入的积累股，而产出很快由买家占有。当短缺经济结束后，比例发生变化；不再需要囤积投入股，但是产出股由于销售困难而堆积。表 7.5 显示了这个变化。早些时候匈牙利的股指在 6 左右，即投入股比产出股大 6 倍。与此相比，在成熟的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体中，这个值在 1 左右。该指数的现值，显示出大幅下降，低于 3，但还没有达到通常一个成熟市场经济的数值。

表 7.5 投入股和产出股之间的比率

国家和期间	投入股/产出股	
资本主义国家 (1981—1985 年)		
澳大利亚	1.06	
加拿大	0.92	
芬兰	1.92	
日本	1.09	
葡萄牙	1.66	
美国	1.02	
联邦德国	0.71	
匈牙利	1981—1985 年	6.10
	1988 年	5.16
	1989 年	4.65
	1990 年	3.50
	1991 年	2.67

资料来源：本表由 A. 希坎 (A. Chikán) 编译。

从这可以得出一系列对本章研究主题很重要的结论：转型衰退。

经济衰退无法在需求不足的条件下被完全解释。即使现在，只有一半的企业认为需求是导致生产不足的障碍物。^① 目前，我们面临着

^① 在成熟的发达市场经济中需求不足并不是唯一阻碍生产的因素，即使其处在经济周期的最低谷。这一比例最多占到 80%，参阅 J. 拉丰特 (Laffont, 1985, 第 354 页)。

(173) “半凯恩斯主义”的局面，教条的凯恩斯疗法不适合我们。但是另一半评论必须立即补充：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已经是半个凯恩斯主义，需求在决定产出上起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因此本章的第二部分分析了这个细节。在后社会主义转型衰退中，“刹车”尚未被中央用来控制供给，因为当投资和生产都被社会主义经济所遏制时，这只是个例子。虽然我们面对的不是因为需求排他性地导致了经济衰退，但是需求确实应承担主要责任。

23年前，当我第一次问自己，如何由供应受限的卖方市场转变为需求约束的买方市场，我希望在生产力没有下降的情况下实现这种转变。^①我认为供应将继续增加，而需求增长将放缓（但仍维持正数）到一定程度，最终从需求过剩转向供应过剩。这个想法，或者说希望，可以参见图(174) 7.2a，从我1971年的书中摘录。不幸的是，因为一些原因，这种转变在实践上产生了差异。匈牙利体制变更之前，生产的增长已经放缓，并停滞了很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从供应过剩转变为过度需求，需求增长的遏制（以数量计算），其绝对减少必然会拖累供给，并且这些互动会变成恶性循环，进而加深经济衰退。当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个世俗的市场体制——卖方市场，转向另一个世俗市场体制，它“变动太远”，而不是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供给和需求的实际走势在图7.2b以规范形式呈现出来。实际生产量陡然从先前的高峰期回落，这一方面的经济状况类似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惯性低谷。^②

其实，我对使用一般的需求过剩和供给过剩的表达方式感到内疚，因为它们简化了实际情况。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呼吁在这学科领域，不要草率使用宏观总量类别。未售出的商品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过度需求和供给过剩的出现可以共存于微观层面。一些生产商碰到了供应限制，而其他的遇到了需求约束。这种谨慎的态度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贴切，但是它会导致下一个因素——经济实际结构的转型。

① 参阅《反均衡论》（1971年，第325页）。当时，我使用了其他术语（“吸力”和“压力”），但在后来的作品中，及在本章中，我使用了更广泛的表达方式。

② 1992年联合国经济委员会欧洲年度报告中认为没有认识到东欧宏观经济条件的改变是一个错误。“新出现的失业、短缺经济的消除和基本货币均衡的恢复，都是从供给约束型经济的科尔奈模式转变为需求约束型经济的凯恩斯模式的所有症状。”（第5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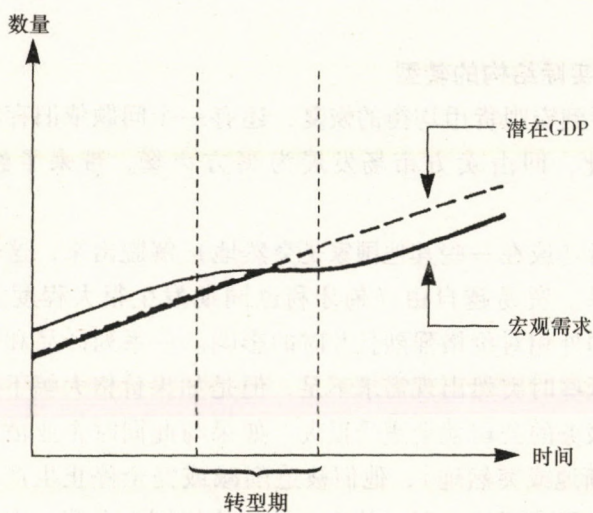


图 7.2a 1971 年提出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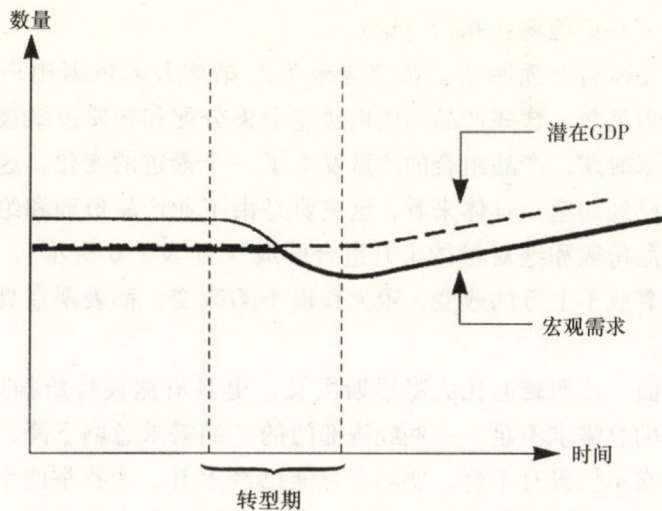


图 7.2b 20 世纪 90 年代的实际情况

注：粗线表示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少于潜在 GDP 与宏观需求。图 7.2a 的曲线与《反均衡论》(1971) 中的图 22.2 一致；为了遵循通常使用的术语，我只修改了各变量的名称。

(175) (二) 经济实际结构的转型

当我们刚看到宏观货币均衡的恢复，还有一个问题依旧存在：为什么市场机制的变化，即由卖方市场发展为买方市场，带来了经济衰退的效果？

价格也逐渐（或在一些其他国家是突然地）解脱出来，这带来一个相对价格的新体系。贸易越自由（匈牙利也同期发生很大程度上的自由），越容易体会到国外相对价格强烈且及时的影响。一系列产品和服务在其价格很高或稍微低些时突然出现需求不足，但是如果价格大幅下跌，生产这些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公司就会遭受损失。如果与此同时企业被取消财政补贴（无论是逐渐地或突然地），他们被迫削减或完全停止生产。同时，由于以往被抑制的需求开始出现，其他产品的价格则会上涨，因此生产或进口这些产品将有利可图。因此，新的相对价格和新产品组合需求使得供给方面做出调整，即生产实际结构的转变。但是，新产品调整到新价格总是需要时间，由于一些原因，尤其是在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价格调整特别缓慢（其中一些原因将在稍后讨论）。

(176) 社会主义体制下强制增长战略导致生产结构并未依据用户需求而调整，包括国内消费，这些产品的使用通过中央分配和物质短缺被强加给购买者。在改革时期，产品组合的产量发生了一个渐进的变化。这种转变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加速。具体来看，这主要是由工业产品份额和绝对量的下降和服务产品份额和绝对量的上升组合而成（如表 7.6 所示）。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着成千上万的改变，很大和很小的改变，都表现在具体产品产量的构成上。

在这方面，转型衰退比起凯恩斯主义，更具有熊彼特所描述的特征。
(177) 这不是简单的总需求不足。一些经济部门的产品需求急剧下降，而其他行业的产品需求不但没有下降，实际上可能已经上升。让我举两个例子。长期被推迟的需求导致了与个人计算机、电子产品、现代信息系统和电信相关的商业几乎爆炸式的发展，因此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广泛的行业经历了经济衰退之中的积极增长。新的相对价格和新的需求结构使得与旅游餐饮和服务相关的行业蓬勃发展。

表 7.6 匈牙利 GDP 组成比例

行业	各经济部门对 GDP 的贡献 (%)			
	1986 年	1988 年	1990 年	1991 年
工业	36.7	34.1	31.8	30.7
建筑	6.6	7.7	6.6	6.3
农业和林业	20.7	16.6	16.2	14.8
交通运输、邮政和电信	8.9	8.0	8.2	8.8
商业	9.4	10.1	11.5	11.1
水资源管理	1.4	1.4	1.3	1.3
其他生产活动	1.2	1.1	1.3	1.4
生产活动	84.9	79.0	76.9	74.4
个人服务和经济服务	4.6	5.0	5.6	—
金融机构服务	—	1.5	2.0	—
卫生、社会和文化服务	6.2	8.7	9.4	—
社区、公共管理和其他服务	4.3	5.8	6.1	—
非生产活动	15.1	21.0	23.1	25.6

资料来源：1986 的数据来源于匈牙利中央统计局（1989，第 57 页）；1988 年和 1990 年的数据来源于匈牙利中央统计局（1992a，第 95 页）；1991 的数据来源于匈牙利中央统计局（1992b，第 61 页）。

产品组成和分支结构的变化与两个变化过程相连接：

财产关系的改变。目前，纯国有部门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与此同时，纯私营部门和涵盖国有和私有的各种组合的混合所有制部门比例上升。这种情况以纯国有部门绝对值减小的方式呈现，而私有和混合所有制的所占比例增长。

企业规模分布的变化。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小型和中型的企业几乎全部被淘汰。在 1968 年至 1989 年社会主义改革期间，小型和中型的企业开始增长，但是这才刚刚开始，随着政治制度的改变而开始迅速繁殖。大型企业所占比例和绝对产量正在下降，而那些小型和中型企业的部分都在上涨。

这三方面的重组并不完全互相重叠，但它们之间很显著地存在重合。不为其过地说，后社会主义经济中两个最有特色的行动者分别是大型国有企业 and 规模不断扩大的小型私有服务公司。以一个更全面和更准确的方式来说，这是指经济体中收缩和扩大的部分，而无须指定它们的所有制、规

模和产品分类。理想的状态是如果扩张比收缩速度快，它们之间的平衡也就得到了积极的增长。与此相反的是很不幸的情况：第一部分的收缩比第二部分的扩张速度更快，这不是因为任何人期望如此，而是因为有许多因素延缓生产部门的扩张。后面将对这些减速因素进行讨论。

(178) “自然选择”的痛苦过程随之发生，但创伤带来健康且清洁的效果。事实上，类似的过程在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过程中也会发生；这个想法大部分都符合 A. 斯皮托夫 (A. Spiethoff) 和 J. A. 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① 转型衰退的过程更为激烈和全面。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结束，从周期起点算起，经济实际结构的变化比较小，然而可以假设（或者说希望）经过转型衰退的局面后这一结构将被彻底改变。

(三) 协调中断

很多人有天真的想法，消除中央计划和政府协调就会立即自动跟着市场协调机制的运作。事实上，有一个奇怪的“无人区”，在那里官僚协调不再适用，而市场协调还没适用；经济活动被分散开，没有协调机制，并处于无政府状态中。^②

缺乏协调呈现多种形态，我选择其中几个例举如下：

- 经济行动者的旧行为规范已经停止，但他们还没有学会新行为以适应新形势。

- 一些早期的政府协调机制（组织和法律法规）已经结束，但是新的市场机制架设尚未开始，或者进展非常缓慢。市场连接的网络还是很宽松，而且在密集网络形成之前需要时间。

- 政府协调的信息系统已经没了，但新的信息系统还没有开发，或者经济参与者还没有足够的能力评估和处理新的信息资料。

(179) • 政府协调，特别是其最后解体之前的综合时期，提供了一种秩序和可预测性。市场的本质涉及参与者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然而，在

^① 参阅 A. 斯皮托夫 (A. Spiethoff, 1902) 和 J. A. 熊彼特 (J. A. Schumpeter, 1934) (1939) 的文章。可以在 A. 汉森 (A. Hansen) 的著名总结性文章中看到关于这两个周期理论的完整阐述 (1964)。

^② G. A. 卡尔沃 (G. A. Calvo) 和 F. 科里切利在其研究 (1992) 指出贸易的“内爆”。由于缺乏市场机制，贸易关系被破坏，他们描述的现象是更广泛组群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所述，两种协调机制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并缺乏协调。

目前不稳定的情况下，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加倍了。大多数经济参与者对于决定都处于亏损、焦虑和犹豫状态。

从原苏联中解体出来的共和国，这种现象成为了最终形式，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例如，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这种现象依然占有重要的比重。在我看来，这是导致这些国家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有可能是最主要原因）。

匈牙利对政府协调的摒弃开始得更早，从1968年开始，之后逐步取得一些进展，同时政府协调也保持着连续性复发。因此，在那些几乎直接从传统社会主义过渡到后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上述现象并没有如此戏剧化。但值得提醒的是，还有一些地方是“无人区”，甚至是在整个社会主义体制下推动部分改革时期，陶马什·鲍尔将这一状态描述为“既不是计划也不是市场”。^①

即使是在匈牙利，转型过程还没有完成。协调混乱和“无人区”现象似乎仍然不时地发生，至少在某些行业，它们对经济衰退起着重要作用。让我们来看看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农业，生产已经发生了真正的急转直下。以家庭人口数的自留私人耕地的集体所有制之下的合作生产在许多方面效率不高，但尽管如此，它的工作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那个时期合作中的所有元素都调整为产权形式：中央管理、投资分配、信贷和税收制度、价格设定、生产者之间的商业关系，等等。旧产权形式已被动摇，但是成熟的新的产权形式并没有在这些地方出现，一切都处于流动状态之中。旧体制和组织间的合作，在这些条件下，停止运作。但必要的新协调体制——一种最新的新型批发和零售网络让小农业主和消费者相连接，为小农业主而建的新信用体系，以及欧洲国家运行的稳定增加的价格和补贴制度——仍然没有得以建立。⁽¹⁸⁰⁾所有这些因素都严重阻碍了生产。它们融合进大政府的连续政策失误中，尤其是原土地拥有者的征用补偿和合作社的重组。

另一个例子是建筑行业，以及与此相关的住房建设和城市规划。虽然这一领域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被贬低和忽视，但它仍然有一个既定的体制和组织制度。这一体制在某些时期表现得比较出色，至少是在房屋完工数量上，尽管建成的房屋质量很差。现在这一领域也处在崩溃状态，即使对房

^① 参阅 T. 鲍尔 (1983 年)。

屋的需求量很大。市场机构尚未发达，适应房地产市场的具体特点的信用体系仍然难以运行，不动产机构网络是最基本的，能够承担整个社区发展的开发商还没有出现，另外，租金和社会补贴制度也存在混乱。这一领域毋庸置疑地需要国家对市场过程的监管，并在某些方面需要国家调控（例如，城市规划和社会政策的标准应用）。并没有政府协调和市场协调的和谐组合，我们常常遇到的情况是它们之间重复的混淆性冲突。源于这一切，住房建设的下滑严重，而这可能是后社会主义转型的主导行业之一。

市场的协调发展需要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在诸多领域经济衰退是长期的。但是，发展时期可以通过适当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措施而将其缩短。政府已承认在这方面的遗漏很多：磨磨蹭蹭地起草和实施立法以支持市场协调，过多地组建与市场经济组织一致的监督机构，并在某些方面提供太多的国家担保制度。

（四）财政纪律和执行效率

在匈牙利经济中可以观察到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① 这方面最现实的表现就是强而有力地执行破产法，即使原本非常严格的法律被提上日程有所缓解。(181) 大量资不抵债的企业正在经历破产重整，其中不少企业都被清算。

虽然也存在一些尝试来软化预算约束，私营部门从最初就面临硬预算约束。私营部门的增长意味着硬预算约束的广泛化。

这些变化对经济衰退有什么影响，本章将讨论这一现象。有些企业倒闭和退出，这意味着裁员和企业对投入需求的结束。幸存者变成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从现在开始真正使用市场手段来为生存而战，节省开支比之前会更好，这意味着企业对投入的需求正在减少。他们试图将过去的臃肿股票用掉。这也有需求减少的效果。他们解雇多余的工人。比起就业者，失业者通常会产生更少的消费需求。

即使国有企业的管理者需要自己去解雇工人，他们仍然有点不愿意承接大幅度削减其过剩的劳动力。表 7.7 显示，生产行业就业的下降速度慢于其生产，这使得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恶化。假设还有大量的“工作中的失业”。一旦国有资产私有化，形势将会随之变化。许多情况下的经验证实了理论中的预期：新业主做的第一件事是解雇他们认为多余的工人。

^① 关于这个过程的分析，参阅第六章。

私有化被广泛认为是克服经济衰退，并引起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但是对这一真实关系存在简化了的误解。从长远来看，随着私有部分的蔓延，效率会真正提高，此前国有的资产私有化，财政纪律的执行，预算硬约束，在所有经济部门中，将使增长的趋势越发陡峭。然而，短期内，私有化带来不同的效果，正如我们已经描述的，它会引发失业问题，降低需求，因此导致了经济衰退。在短期反衰退目标和长期增长目标之间进行选择是后社会主义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最严重困境之一。

表 7.7 匈牙利产业行业的生产总值、就业和劳动生产率 (1980—1992 年)

(182)

年份	产量	平均就业数 (1989 = 100)	就业者人均生产总值
1980	89.0	116.1	76.7
1981	91.2	113.7	80.2
1982	93.2	111.4	83.8
1983	93.9	109.2	86.0
1984	96.3	108.6	88.7
1985	97.2	107.9	90.2
1986	98.9	107.1	92.4
1987	102.7	104.4	98.4
1988	102.1	101.7	100.5
1989	100.0	100.0	100.0
1990	89.8	94.5	95.0
1991	74.9	84.1	89.1
1992	67.5	73.1	92.5

注：产出数据是基于属于产业类别的经济组织生产总值 (GDP)。该表不包括建筑业。

资料来源：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1993b, 第 95 页)。

(五) 金融部门的落后

现在要讨论的问题其实是前面两个主题的一部分，但是，因为其特殊的重要性，值得单独讨论。只有现在，金融部分的落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之一，在全货币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半货币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之间，对其理解有着重要的意义。

现在回顾表 7.3，表中的比例显示资金不足是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个因素在 1987 年的受访者中占 20%—30%，然而，这一比例现在是 45%—50%。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银行体系并不是真正的银行体系。它的实际功能是为提供全国性记账簿和收银员服务，再加上监管生产企业的某些方面。

(183) 它的指导原则是，如果一个实际行动由计划或国家官僚机构宣布为必要的，它将为其提供资金。一开始是为了在政治制度改变之前先改革经济，正如匈牙利银行体系的转变也同时开始，因此，这一银行体系有点类似于真正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体系，虽然其发展不能被视为完成式。

这项研究并不是对金融业的综合分析，这里只讨论直接关系到经济衰退和增长的诸多问题。

一个问题是十分仓促地和不负责任地非商业化信用风险。这个问题与上一节中所讨论的问题相关，即财务纪律，在继承苏联模式的国家里，它仍然显得非常尖锐。有成千上万的亏损公司通过银行贷款而维持生命，这种方式助长通货膨胀，阻碍财政纪律的执行。这一现象在匈牙利不会大规模蔓延，因为我们已经从那个阶段走过。但是，即使在匈牙利，国有商业银行和大型国有企业并未完全停止这种特殊关系。两者的所有者都是国家，在一定意义上适用“个人联合”。一些时候，比起新客户——私营企业家，当涉及按企业要求时，银行对老客户更宽容。有时，在新信用延伸上可以看出类似的偏心。^① 贷款无法收回的情况，解决需要很长的时间。银行对国有企业部门的“软”行为妨碍了前面所描述的自然选择过程。这种状况因为下面的事实而进一步加剧，政府和政治活动时不时地进行干预的高大形象通常以非正式方式，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活动中发挥它们对信贷衍生决策的威力。

一些信用关系漠视风险，而在其他一些关系上，在延长信贷上存在过度谨慎和真实胆怯，特别是当申请人是小型或中型私营企业或家庭。现时

(184) 必须承认存在一个真正的困境。银行刚刚开始习惯必须追求商业活动，这将作为一个整体产生利润。他们应该知道，银行不是依据上层下达命令或政客友好建议的派钱机构。情况也许是如此，但现在他们怀着热情渴望所学到的教训可以规避风险。他们还没有掌握教训的第二部分：一家银行，作为商业机构，必须通过延长信贷生存下去进而得以繁荣。在市场经济中，没有任何风险可以通过“抑制商品”来获得持久利润。

^① 偏见也不只是在国有企业中。银行也贸然增加大量信誉给许多大型私营企业，并且这样银行很难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强制还款。

所以，矛盾的状况开始出现。巨大的流动性存量积在银行体系内积累起来，但是它被卡住了。一方面，商业银行在大规模放贷上比较谨慎，但是另一方面，企业家们在信贷上也很谨慎，因为他们也认为这样太冒险了。

很长一段时间内名义利率非常高，并且最近它才开始下降。实际利率不那么令人震惊，因为通胀率很陡峭，但仍然不够高到阻止很多企业家贷款。目前正在进行一场辩论，在匈牙利的目前情况下利率幅度对贷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缺乏足够强大的论据来支持决定性意见，在此，我只能根据个人印象做出评述。甚至是在相对成功的企业可以根据这样的协议提供贷款时，实际利率看起来都很普遍。我倾向于同意那些认为不愿意贷款的主要原因是不确定性的观点。^① 未来的法律状况、财产关系、税收和其他公共征税、相对价格与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势，都有太多不可预知的问题，同时对未来经济的总体情况也很少预测。在债权人方面，利率可能回落使得银行更不愿意放贷，背后的原因也是因为对经济状况的不确定。

跟随上一章节的论点，我认为我们一直持续缺失对一般市场经济运作非常重要的整体性制度和组织，在刺激匈牙利经济转型上这种制度和组织尤其重要。让我举几个例子，目前还没有出现抵押和担保制度，它们不只是复制成熟市场经济的规则和惯例，同时这个制度要能接受匈牙利典型的（185）不成熟经济和创业者在初期遇到的问题。目前现代金融体系所需的基本工具都尚未完全得以发展：活期（检查）账户体系；通过银行系统索赔的转移和支付仍然非常缓慢且昂贵；信用卡不普遍；各类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公司，养老基金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网络仍然没有整合起来；资本市场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②

需要再次提到之前提到的两个行业：农业和住房建设。在世界各地，这两个行业均采用特殊的信贷和投资计划。在匈牙利，这些计划的发展非常缓慢，这极大地导致了这两个行业的严重衰退。

当然，金融业的发展必然需要很长时间，但是事实是我们依然需要指责

① 例如，参阅 Á. 瓦类廷伊（Á. Valentinyi）1992 年的文章。

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国家正面临的不成熟问题不仅仅指狭义银行业，而是在更广泛的金融部门。让信贷在企业融资中发挥过大作用将是个错误，所以这意味着将自身资本贬低到次要位置。在分配初始资金并获得所需投资资本方面将出现问题。保值和投资盈利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另外，还有组织不发达的投资管理，这些都决定了很多储蓄者是否会将储蓄投资到资本市场。

政府，因其存在很多疏漏使得金融业的发展并不快。这适用于所有论述落后现象的分析。然而，政府忽视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提供给创业者的所谓“E币”有所延迟和拖沓，这加大了E币的不可使用。（一个具体的信贷计划，在政府资助下以优惠贷款给私营企业家作投资使用。）在这一领域内，原本实际需要的建设性政策举措，实际上是犹豫不决并缺乏想象力。

前面的研究提到，卡尔沃和科里切科（1992）认为采取信用制度的混乱和信用不足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① 这个论点似乎是正确的，但是至少在匈牙利的情况下，需要一些改进。我不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央货币政策所允许的总信贷投放比较紧，反而认为甚至有一些宽裕。在我看来，问题是作为中介在资金拥有者——存款保护——和存款人之间运行的金融体系，自身存在着过度摩擦，且低效率。

总结第一节，可以说，后社会主义转型必然引起产量下降的过程。这个痛苦的转型结果已经通过五个维度呈现出来。这五个维度交织在一起，彼此加强，阻碍和延缓经济生产。这种负面影响也融合了政府部门的政策失误。

二 宏观需求的四个组成部分

前面章节第一部分关注了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需求，在决定产品生产量上发挥了显著和不断扩大的作用。通过采用宏观经济惯常使用的类别，我将一个个地讲述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表7.8总结了这一方面的变化）。^② 但需要提前强调的是，我不只单一探讨需求（使用），也会关注供给（生产）的一些方面。虽然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以一个宏观角度为出发点来研究现象，同时也将多次提及微观层面和体制方面。

（一）投资

让我们首先讨论在中长期增长上最重要一个分类：投资。投资额度严

① 参阅 G. A. 卡尔沃和 F. 科里切利（1992）。

② 本章的文本使用了宏观经济学的既定分类：投资、私人消费、政府消费、出口盈余或净出口。经典的官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分类跟这个表有些差别，例如，表7.8可以看出。宏观经济类别和官方统计类别多多少少可以做一些对应。因为此时我不是要做定量分析，所以希望这两种分类之间的偏差不会给大家造成混乱。

重下滑（见表 7.9），实际已经下降到低于峰值的 27%。占 GDP 支出比例的投资部分也持续性下滑（见表 7.10）。

表 7.8

国内生产和支出总额

(187)

按 1988 年可比较价格（百万福林）计算 GDP 表格指数（%）

年份 组成	1988	1989	1990	1991	1989/ 1988	1990/ 1989	1991/ 1990	1992/ 1991	1992/ 1989
私人消费	873814	893586	861112	811591	102.3	96.4	94.2	97.8	88.8
集体消费	175000	164000	168300	163755	93.7	102.6	97.3	98.9	98.7
最终消费	1048814	1057586	1029412	975346	100.8	97.3	94.7	98.0	90.3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310801	332.529	308800	272925	107.0	92.9	88.4	93.6	76.9
股票变动	49941	32685	40947	-1136	—	—	—	—	—
资本形成总额	360742	365214	349747	271789	101.2	95.8	77.7	78.6	58.5
国内开支总额	1409556	1422800	1379159	1247135	100.9	96.9	90.4	93.8	82.2
出口	530395	536815	508132	430345	101.2	94.7	84.7	—	—
进口	491738	500737	479425	437038	101.8	95.7	91.2	—	—
进出口净额	38657	36078	28707	-6693	—	—	—	—	—
GDP 总额	1448213	1458878	1407806	1240442	100.7	96.5	88.1	95.5	81.2

注：[修改表]。

资料来源：匈牙利中央统计局（1993c，表 1.3.2）和（1993a，第 105 页）；匈牙利国家银行（1992，第 129 页）。

表 7.9

匈牙利固定资本形成总额（1980—1992 年）

(188)

年份	投资 1980 = 100（基于可比较的价格）
1981	95.6
1982	94.2
1983	90.9

续表

年份	投资 1980 = 100 (基于可比较的价格)
1984	87.7
1985	85.1
1986	90.6
1987	99.4
1988	90.3
1989	95.0
1990	86.8
1991	76.8
1992	72.8

注：[修改表]。

资料来源：本资料来自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表 7.10 匈牙利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1980—1991 年)

年份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 GDP 的百分比 (按当年价格计算)
1980	28.8
1981	26.5
1982	25.2
1983	24.5
1984	23.0
1985	22.5
1986	24.0
1987	24.7
1988	20.6
1989	20.3
1990	17.8
1991	19.1

资料来源：1980—1987 年的数据来源于匈牙利国家银行 (Magyar Nemzeti Bank) (1990, 第 97 页); 1988—1990 年的数据来源于匈牙利国家银行 (1991, 第 129 页); 1991 年的数据来源于 J. 维格 (J. Vigh, 1993, 第 22 页)。

(189)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里明显存在着恒定的投资饥渴。凯恩斯定义为“动

物精神”的投资刺激从未被强调。各个层面的决策者，从企业管理者到首相，都被经济扩张驱动。投资法案最终总是公共基金支付的事实，让金融投资失败被抵消，因此保证了对经济增长的永久乐观。

这种态度，已经被准改革所拖累，也完全被政治转折和随后的制度变革所根除。投资饥渴走到了尽头，必须由谨慎甚至是很多人的懦弱和害怕所取代。^① 让我们依次关注各个领域的投资决策。

1. 政府部门的投资活动有所下降，这里并不包括国有企业。当然，这与陷入困境的财政状况相关。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因为决策制定由政府内部决定类似的紧张局势不会阻止最高领导层做出大额投资承诺。然而巨大的投资支出，包含了市民间接缴纳的税。现在这一方面已经没有问题了，因为国会需要在公众监督下决定如何使用纳税人的钱。

为了克服经济衰退，增加政府投资比重将是可取的。国家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

2. 极有可能保持长期或永久性国家所有制的国有企业，需要投资来确保生存和实现现代化。麻烦的是，很多国有企业在对抗严重的财政困难，且没有充分的信誉。如果一个投资项目已出现损失，不能指望它们自助。所以，它们原有自信已经丧失；经理们犹豫不决，不敢投资。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当然，决策者，需要为这些投资决策负责，毕竟他们使用了公款。但是不应该阻止所有由决策者独自决定的投资决策；市场社会的舆论也应该鼓励国有企业投资。(190)

3. 那些仍然处于国家所有制但已知在未来会被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它们的状况更糟。几乎所有的投资活动已经瘫痪；没有人敢在等待新主人到来之前发起任何投资行为。事实上，企业在安静地撤资——耗尽早期投资而来的资产。一些实用的结论可以从这些观察中得出：

(1) 从投资角度看，所有权变更的加速会很紧迫。销售的直接收益不应该是主要标准。基于社会转型的总体目标，主要考虑新业主所承诺的投资成果和创造就业方案。

(2) 私有化之前必须确保至少这一资产将会使新私营业主达到最佳经

^① 看看行为动机，这种现象与先前描述的信用相关。对风险的强大厌恶在这两个领域都很明显。这两个领域不同，尽管它们重叠。一些投资并不是信贷融资，一些信用并没有延长为投资目的。

济状态。这方面的基本要素是保存和细心维护资产。许多公司需要重组，这通常也需要或多或少的投资金额。

(3) 必须给予企业管理人员更多的激励来执行上述任务，使其私有化的资产有价值，而不是在即将破产的状况中。

4. 实际上，凯恩斯提出的“动物精神”在私营企业中是活的，因为大量刚成立的企业表现出这一精神。它们是活的，或者说即使有一些投资不利的情况，这种投资倾向并不会冷却。在讨论金融时已经提到两个方面：不确定性，这其实是远远大于市场经济中的不确定性；金融业的落后以及不愿意贷款给私营企业，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的弱点和税收制度对投资并不友善的事实，还包括很多抑制高利率投资的因素（这个问题之前已经提到）。克服这些不利情况是从衰退中复苏的关键一步。

5. 投资领域的主要角色是家庭，他们用自身储蓄和信贷投资建设自己拥有的住房公寓或别墅。为了完整起见，让我再说一遍，住房建设的一般情况，由家庭资助的住房建设已经严重下降。刺激这样的经济活动更容易获得信贷和税收优惠，例如，可以在克服经济衰退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 消费

如表 7.8 显示，私人、个人消费有所下降，其占国内生产总值和总实际收入的比例更小。

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由国家进行管制，储蓄的比例相当稳定，这样集中的经济管理可以准确地预测普通大众的消费需求。现在显然不再是问题。让我依次介绍需求的决定因素：

1. 预算中产生一小部分收入，然而大部分收入取决于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协议。虽然这是发生在最高层次上的集体谈判和利益协商，政府有很大的影响，但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实际的工资协议是分散的。中央协议最多被认为只是建议。

2. 一旦家庭开始拥有现金收入，再加上之前积攒下来的储蓄，他们可以独自决定花多少钱，储蓄多少。这样的消费行为可能会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例如，影响利率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这种影响力量的强度是值得怀疑的。

虽然未来消费意向，也就是家庭总需求，将会对经济衰退有很大的影

响，这依然很难预测。因为家庭本身，刚刚熟悉新形势，开始学习一种新的储蓄决策。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可以知道学习过程的结果，或者还没有意识到它的规律是什么，又或者从未来规律出发理解什么是一次性消费。^①在此我举出几个假说，似乎不仅适用于匈牙利目前的情况，还存在更普遍的有效性：^② (192)

(1) 在建立预防疾病或失业保险，以及养老方面，居民可以依靠越来越少的国家援助。

(2) 我们看到的“家庭储蓄”是新私营企业（包括未登记的灰色或黑色的企业）的经营性业务资本积累。

(3) 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比一般比低收入阶层高。所以可以假定，近些年会发生收入分化，因为人们倾向于提高平均储蓄率。所有这些倾向根据预期会持续下去。

在克服经济衰退的经济政策方面，可以得出什么结论？通过肆无忌惮的工资增长来刺激消费需求增长将是一个错误。虽然起初这或许是通用的，但也是一种危险的武器，它很容易让目标挫败。消费储蓄率也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这使得更多的倾向性消费通过收入顺差倾泻到市场上。这可以提高产量，同时价格也会上涨，进而导致大通胀冲击。未来我们急需认真思考和理性对待具有代表性的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最终过度的工资压力会出现，让我们希望雇主（包括最大的雇主——国家）可以负隅顽抗。

仓促管制工资对就业有不利影响。有一个普遍共识，即这一问题与宏观经济相连接。如果在目前的成本和劳动生产率条件下，过高的工资成为了负担，很多企业将不得不解雇工人。虽然仍然需要在工资问题上谨慎且有纪律，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特别有针对性的措施，旨在能帮助家庭，并通过经济决策来克服经济衰退。在这方面，政府和金融部门仍然集中在 (193)

^① 家庭储蓄可通过各种存量和流量指数来说明。在这里我只用匈牙利经济统计数据中使用一个存量指数：一般公众，即居民部门的“净财务状况”。这个指标是累积的总储蓄（其主要成分是现金、储蓄存款和证券）减去总债务。这个指数在1991年和1992年的第一季度忽然增长；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立即偿还住房贷款的强烈动机。即使大幅上升开始减缓以后，一般公众的实际净财务状况持续三年有大幅度的提高；比起1989年，1992年年底这个数据高出了71%（数据来源：匈牙利国有银行和马扎尔国家银行，1993年，第122页）。

^② J. 基拉伊 (J. Király, 1992年) 的文章提出一些在这方面较有说服力的假设，我自己在下面也有所讨论。

国家手中，并没有显示出足够的积极性。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1) 更应该去做的是，确保银行体系并不只是通过私人储蓄转为投资的唯一路线。家庭应该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到资本市场，主要是通过投资基金、保险公司和分散养老基金来做经济调节。这将牵制并稳定高储蓄比例。

(2) 这里，我再次重复前面所提到的观点：相当大的一部分家庭储蓄可用于集资建房，这是可取的。

(3) 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遗产，所有的后社会主义国家保留下来的消费信贷范围太小，包括匈牙利；比起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这更是有限。消费信贷的传播可以提供更易控制的需求增加，对生产也有利。

(三) 政府消费^①

作为政府消费资金的国家预算，已经成为每天政治的不变话题。这项研究并不对这些争论提出见解。专门探讨预算和经济衰退之间的关系，仍然在本章研究的范围之内。我们要超越眼前的情形，我考察了几个与这种关系相关的一般性问题。

(194) 匈牙利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产量下降必然与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相关，而大多数国家的支出与生产数量没有直接关系。因此经济衰退可能会导致所有经济部门出现预算赤字。但是，一旦赤字存在，可以受约于经济中的财政激励将会变得很难。

自从凯恩斯建议“采取财政措施提高宏观需求来抵制经济衰退是很好的方法，尽管会面临着财政赤字的问题”，这一做法就成了一个真理。加税并在经济周期的收缩阶段削减开支的政策，随后就被描述进关于凯恩斯主义精神大错特错的经济史中，因为这些措施降低了总需求。

这种思考引出下面的观点。如果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赤字太低（消费越来越少，收入越来越多），和所有其他情况一样，生产下滑将比实际还要多。预算赤字充当了反周期稳定剂。

^① “政府消费”的分类（即，政府总支出减去政府投资支出）并不完全与“集体消费”（见表7.8）的统计类别相吻合，虽然他们之间有相当大的重叠。还有第三类，“总预算支出”，也不同于上面两类，其中一个原因是总预算支出也包括预算中的投资资金。比较这些类别的细节或制定出它们之间的数值差，不是本章研究的任务。我不得不说，只限于提出定性上的趋势。这部分看起来最重要的是，所有三种开支的总和，即不由预算资金的集体消费。

同样的思考可以得出以下短期性结论：现在迅速地并大规模地削减赤字将是危险的（假定政府完全有能力这样做）。快速和大幅削减（例如，通过大幅增加税收）会突然降低宏观需求，并且会忽然加剧已经非常严重的经济衰退。关于这一切，我不想忽略已经完整阐述且很有道理的关于预算赤字的严重破坏本质的论点。它意味着通货膨胀的风险；此外，对它的资金支持会挤占投资部分，而投资对经济恢复和增长都是必需的。我只是想特别强调，匈牙利经济中这两个严重的疾病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经济衰退和财政赤字。对待任何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慎重，都会产生有害的副作用，进而阻止其从另一个顽疾中复苏。

鼓励赤字增加远离我的本意。相反，目标一定要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削减预算中的主要参数，即减少开支、收入，同时还有赤字。但是，对下面几个方面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如果可能的话在整个范围内，政府消费需求的减少必须由投资需求取代。期望这种可取的资源重新分配将在未来减少对融资预算中的信贷需求中得到保证，换句话说，对挤出效应的缓解。这必须与总预算支出中投资支出的上升随时相连。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总需求中各个部分的令人满意的重新组合。比起政府消费需求，各部门（政府、企业和家庭）总投资需求将产生更为有利的多重效应。 (195)

（四）出口和进口

毫无疑问所有的事情一起引发了经济衰退，之前的讨论逻辑让贸易这个主题留在了最后。前经济互助委员会国家贸易的严重下滑，包括苏联市场的崩溃，已造成了最大的动荡。^①

一些作者将转型衰退这一问题描述为“外部冲击”的发生。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恰当的名称。诚然，从地理概念上看，外贸冲击确实是一个国家的外部问题，但经济互助委员会贸易的所有特征可以追溯到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基本特征上；其影响深植于体制内的规则。卖方市场之所以能够运营是因为即使对国内而言条款很不利，但依然有经济互助委员作为买家；如果所有其他方法都失败了，销售也是配合性的强制执行。“外部冲击”这一表述通常是指突然出现后又忽然消失的时间，从而使经过一些调整的经济越过它，并在受到震荡之前离开这一冲击后继续前行。但是，

^① D. 罗德里克 (D. Rodrik, 1992) 的文章尝试以定量的方式分析这一效果。

经济互助委员会贸易的崩溃有持久的决定性影响。这些经济体的结构必须一劳永逸地改变，才可以繁荣下去。

表 7.8 显示，1989—1991 年出口显著回落。匈牙利经济成功地做出了第一步的调整，证明它能够重新定位在经合组织市场上出口潜力中拥有很高的占有率（见表 6.4）。这确保了匈牙利经济继续留在它的脚步之下，使生产下滑并不达到灾难性地步，匈牙利的国际收支地位也很坚固。

不幸的是，这种骑兵式攻击不能持久；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放缓，也可以看出经济下滑的第一个警示。我们是不幸的，因为西方世界的经济衰退（196）退（远远比我们国家的衰退更温和）正巧发生在我们最需要扩大到他们市场上的时候。

另一个问题是第一次巨大进步是按老配方制成：“不计一切成本的出口。”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为了能够出口而不必停产在贸易中肩负了巨大损失。但在未来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正如预算约束需要硬化一样。现在必须为所有可能的额外出口而竞争，它们会使企业在没有国家补贴的情况下真正盈利。另一方面，国内需求限制已经有所缓和，这使得企业不那么有压力，只能通过出口盈利，否则就得停业。

进出口贸易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由几个因素导致的农产品出口问题，不只是因为恶劣天气，还有进口国日益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以及之前讨论过的农业生产危机。

我同意一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从长期来看对小型开放国家而言出口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分支之一。但有另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在目前情况下，在何种程度上出口有助于尽快克服经济衰退这一紧迫的短期任务。一些早期的投资刺激手段也可以不证自明地适用于出口中。需要特别注意生产出口产品的私人投资部分。

详细的分析并不支持进口总是将国内生产商挤出国内市场的主张。有这样的例子，但不普遍。没有进口的竞争对手的所有企业都已陷入深刻的危机中，而另一方面，许多企业管理有了成功的生产和销售，尽管他们与进口产品相竞争。所有这些讨论都是在考虑经济理性的基础上给予国内一些产品或一组产品的临时保护参数，而不是企业游说而产生的压力。保护有助于遏制经济衰退。但是，保护只能是暂时的，等到必要时就需要进行调整，并与关贸总协定的规则相一致，这样不会导致保护主义打击外国贸易伙伴。

关于进口和出口的担忧，有必要重新考虑汇率政策。如果促使匈牙利货币升值的现行政策继续，出口和面临进口竞争的国内生产商之间的竞争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恶化，这往往会加深经济衰退。阻止经济衰退的政策必须包括汇率政策的调整。^① (197)

众所周知，贬值推动了通货膨胀。^② 无论匈牙利选择走向哪一个方向，或者经济衰退，或者通货膨胀，都会变得更糟。这个难题需要将大部分措施综合起来加以考虑，同时它也必须以更一般的形式上进行讨论，正如这篇研究最后一部分所讨论的。

总结这一部分，可以得出下列结论：宏观需求四个部分的收缩在很大程度上是转化过程本身的结果。但是作为发展角色的宏观需求受到了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部分是由于政府部门的失误。

三 结论

(一) 优先事项

在我看来现在有必要考虑一下优先事项的重组。两三年前，下列事项的优先权有非常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参数支撑：

1. 必须停止负债的增加；必须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流动性。
2. 不得不尽可能放慢通货膨胀。
3. 失业问题需要从福利政策的角度进行“处理”。

既没有政治声明和政府项目，也没有经济学家的著作，认为迫切的优先事项必须包含对经济衰退的防卫，或者之后需要停止或抑制经济衰退。

现在，我提议下列事项的优先顺序：

1. 我们必须阻止任何再一步的经济衰退。必须促进经济从衰退中复苏。经济必须转入增长轨道。也许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作为可能的副产物，失业将不再增加，随后就业将开始增加。 (198)
2. 我们必须防止通胀再次加速。通胀率必须逐步回落到 12%—18%，

^① G. 奥布拉特 (G. Oblath, 1994) 的研究详细地论证了这个观点；我同意他的结论。

^② 如果名义工资是为了弥补贬值，这对通胀的影响尤其严重。因此，汇率政策成功的条件是它应该基于社会共识。

这一范围被认为是“温和的通胀”。^① 必须暂时从议程中取消，达到单个数字的通货膨胀率目标。这一切准备工作将成为经济增长之路的“天时、地利、人和”。

3. 不必急于大量消减外债总存量或处理上升的外汇储备。^② 暂时容忍一点货币赤字是可以的，尽管必须防止国际收支的任何显著恶化，我们绝不能进入债务累积的新循环。

我尽力将这些新的优先事项尽可能准确地描述清楚。基于过去不好的经验，我想提前抗议那些将我的观点扭转成一个或其他一些分散的点，这留下空间让一些有资质的对手通过扭曲的形式对我在建议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挑战。^③

没有任何理由放松关注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恰恰是因为正在采取对抗经济衰退的措施，其现在通货膨胀和债务积累的危险将大于以往任何时候。只需要应付这三个痛苦问题之一的国家——例如，只是通货膨胀，或者(199) 只是经济衰退和与之相伴的事情——它们处在一个令人羡慕的情形中。匈牙利经济正在一次性地面临这些严峻问题，这使得国家很难决定怎么做，因为无论我们采取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能达到的有利效果将伴随着副作用。不太可能找到让每个方面都满意的解决方案。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选择是决定在不久的将来哪个问题最值得重视，也就是我们认为最严重的问题。

关于通货膨胀问题，我想多说一些，因为一些令人不安的现象正在出现。通胀压力的危险意味着需要迅速增加货币供应量（特别是高效率的钱，即“基础货币”），以及附带银行体系的“剩余”资金。政府承诺的缓解通货膨胀率实施得比预期还慢。因此，本研究强调的是“友好性增长”措施，它们可能会极大地促进生产，而不会造成总需求的普遍上涨，也就是说，那些措施会有副作用，但不会加速通货膨胀。

①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可以在数年内保持在这个频段内，而不必达到单一数字的通胀率，也可以避免通胀重新加速的危险。参阅 R. 多恩布施 (R. Dornbusch) 和 S. 费舍尔 (S. Fisher) 1993 年的研究。

② 关于最后一项建议应作如下理解。评价尺度不是外汇储备的绝对数值，而是外汇储备和进口之间的比例。乐意接受下列提议：不值得进一步增加这个比例。

③ 不准确的解释并没有让我的对手在辩论中受限。当我在布达佩斯公开提出这种论点，一份报纸用简短报告阐述我提出作为一个临时顺序的优先事项。根据这份报告，我建议经济增长应首先实现，在这之后已经发生，我们应该抵制通货膨胀，然后当这项任务完成后，我们应该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实际上，这些都是需要同时进行的任务。

我的建议是“半转”式走向增长，而不是“掉头”回到早期优先任务：处理通货膨胀和债务增长。这不能只局限于将“半转”作为一个口号。为了确保，将需要一个有说服力的、详细的且切实可行的方案，具体的实施必须立即开始。

什么可以论证重新排列的优先顺序？承认我们犯了思维僵化的错误会很羞耻。这些经济政策任务，无论是早前提到，还是现在设定的优先事项，都不在最终目标的范围内，经济活动的主要价值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它们是中期目标和工具性价值，需要在适合特定情况的方式下进行选择，如果情况改变则需要重新排列。这些优先事项，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永远有效的顺序，来推动经济增长，减少失业，遏制通货膨胀，或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因此，段落开头的问题可以具体为：在现有情况下，什么样的变化让我们需要重新评估优先事项？让我举例几个情况。

第一，正如我在引言中提到的，经济衰退已经证明比任何人在两三年前预期的更严重，而且经济衰退的延长不能被排除。这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国家遭受各种问题的困扰：技术落后，民不聊生，随之进一步恶化的经济贫困，对医疗卫生服务、教育和基础建设的忽视，等等。如果通过再分配，将其他资源转移到开展已经推迟或被忽视的任务上，所有这些问题都不会得到圆满的解决。只有经济增长可以缓慢而稳步地解决这些或其他他没有提到的问题。(200)

第二，私营经济是我们最能依靠的克服经济衰退的力量，但是需求不足已经阻碍了私营经济的发展。许多私营企业越来越难以克服困难，继续维持企业依旧在水面之上。^① 如果私营经济的生产总量开始下降，复苏前景将变得几乎无望。

第三个因素（也可能是最有分量的因素），相当大比例人口的实际收入下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失业现象，已经产生了人们广泛的对经济的不满。如果不满的强度和程度达到临界点，将对年轻的匈牙利民主造成严重威胁。政治家们多次警告，有可能是后社会主义地区的“魏玛现象”，包括匈牙利。^② 应该记住，德国魏玛的大规模失业和通货膨胀导致

^① 匈牙利最大型私营公司的领队们提出了这种担忧，他们提道“因为经济衰退私人领域也在收缩”；他们提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经济下滑使他们无法获得相应营业额，来支撑迅速扩张的企业债务，参阅思·哈莫尔（Sz. Hámor, 1993）。

^② 我的文章第一次与 G. M. 塔马斯（G. M. Tamás, 1990）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交锋。

人们希望的大规模的幻灭和拒绝民主制度和议会制度。经济上引起的幻灭，会提供一个肥沃的土壤，让人们滋生出哗众取宠、廉价承诺，并希望铁腕领导。

我们必须警惕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魏玛现象”。不用其代替政治行动，而是作为一个需要在经济政策上加以区分的平行式努力得出的结论。这就是本章研究中提出的“半转”所列出的事项。

(201) (二) 自信和诚信

需要保有经济复苏的政治和社会心理需求。这不仅仅是专业经济学家之外的政治家或专家所提出的假设，还有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意识到这种真理也已经完整地渗透到现代经济学中。值得注意以下部分：

1. 预期性研究已经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脱颖而出。在第一波研究菲利普斯曲线的文献中，人们认为所有的通货膨胀显然是伴随着失业率的具体增长。然而，从那时起，对理论的修改已被设计出来。目前已经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菲利普斯曲线可以根据通胀预期而转变。^① 经济中的人们越期望通胀持续，为克服这种期望就需要有更高失业率的牺牲。人们越认为通胀将放缓，所需要的牺牲规模就越小。将这一思路应用在我们的情况之下，可以得出下列结论：经济增长和宏观平衡的并行进程只可能是在下列情形中产生，即经济中的行为者们信任政府可以实现这一目的。^② 但是如果人们预期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将继续，尽管政府可能已经承诺做政策性调整，这种预期也会自我实现。

2. 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强调，乐观——对经济将回暖的自信——需要再次加强对投入的倾向。在这方面，可以说，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都会自我实现。

3. 稳定的感觉，人们要对现有的法律和制度是持久稳定的认识，而不是善变或任意改变，需要加强人们的投资倾向，并且，除此之外，商务活动要在私有制基础之上。

^① M. 弗里德曼 (M. Friedman, 1968) 和 E. 费尔普斯 (E. Phelps, 1968) 的文章最早阐述了这个理论。自那时开始就有了检验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关系的新动力，主要是由理性预期理论引起。

^② 理论和历史都证明了稳定计划的可信性在成功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论证。例如，T. 萨金特 (T. Sargent, 1982) 题为《四大通货膨胀的终结》的著名研究中的言论横扫了一切抗辩。

不幸的是，社会心理方面出现了很大的麻烦。为说明起见，我只提其中一个。表 7.11 显示了西方研究人员组织的一次国际民意调查的一些结果，匈牙利脱颖而出，成为最悲观的受访国家之一。(202)

表 7.11 1991 年西欧和东欧国家的个人乐观或悲观 单位：%

国家	上升	中立	下滑	乐观	中立	悲观
英国	43	28	29	51	37	12
法国	36	34	30	42	39	19
意大利	41	34	25	51	31	17
西班牙	34	43	23	39	48	13
西德	45	38	17	42	46	12
保加利亚	16	24	60	56	20	24
捷克斯洛伐克	29	22	49	41	33	26
东德	34	33	33	62	29	9
匈牙利	18	25	57	26	40	34
波兰	27	21	52	36	40	24
俄罗斯	21	22	57	40	36	24

注：a. 百分比，采用坎特里尔类型，测量指数为 0 至 10；b. 上升或下滑是基于五年前和今天的对比；c. 乐观或悲观是基于当今或从现在起五年后的对比。

资料来源：M. 卡塞 (M. Kaase, 1992, 第 23 页)，基于时代明镜的数据 (1991 年，第 21—23 页，附录表格)。过去和现在的缺失值为一到两成。未来部分的缺失值平均约为 20%。数据缺失的个案被排除。

公众的这种态度可以逆转吗？可以通过广泛的政治共识来支持一个令人信服的政府项目吗？这篇研究写于 1993 年 6 月，即下一届议会选举之前的 9 个月。当政治分歧和对抗有可能变得比以前更尖锐，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指望这样的共识将是自我欺骗。更好听一点的期望（甚至是远一些的期待）是这种情况至少不会进一步恶化，选举后的政治格局将提供有利条件来推进执行可靠、信心饱满且鼓舞人心的项目。

(203) (三) 国家的作用^①

从理论上讲有两种方式走出衰退：向前或向后。“向后”意味着恢复到保持补贴的旧经济体制，支持低效率的出口，人为地维持处在金融危机中的国有企业和与之相随的很多工作，通过保护主义手段捍卫所有的国内生产者免遭进口竞争，维持生存下来的企业里的工作岗位和低生产率。放弃深化转型和部分地恢复旧经济体制，以此克服经济衰退。如果现在我们忽略政治条件，从经济意义上讲，一定可以通过“超凯恩斯主义”的需求膨胀式货币政策与政府干预型财政政策的组合来实现这一计划。这类想法出现在好几个国家，带了一点匈牙利政治光谱中的各种颜色。

走出衰退的“向前”道路是尝试并摆脱最严重的困难，换句话说，消除亏损企业中的就业岗位，集中精力确保私营经济的扩大，创造新的高效的工作岗位、必要的结构调整和发展营利性出口。

即使对那些支持渐进路线的人来说，也需要维持一致的转型，两种观点可以在其策略中相应发现。对市场和个人自发力量的信心非常强。在经济内部动力可以自行将其拉出困难时期之前，我们需要耐心等待。这些力量是如此强大，它们能占上风，即使一个无能的政府屡犯错误。我必须承认，我自己倾向于这种观点，一切都是因为我对政府的态度，与那些曾经经历的人们一样，几乎没有任何信心。

但是现在我不得不有所调整，也许是过于教条的观点。这源于我意识到上一节讨论的“魏玛现象”中的政治危险。进行调整的另一个根据是，我意识到，匈牙利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下简单的等待自发和自我成长的运动，在经济学领域被认为是“低级均衡陷阱”。这种状态在匈牙利的情况下会表现出以下特点：

投资倾向会长期处于松弛状态。大规模失业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其他资源的利用率也将是低效的。因为缺乏创业精神，私营经济的增长将继续维持在目前的水平上。外资将失去对匈牙利投资的兴趣。财政危机将延续下去；缺乏足够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和福利服务。生产增

^① 在本章研究中的这个和其他地方，我使用“国家”来指所有国家权力机构的所有分支机构（立法机关、政府和司法机关）。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许多读者有着根深蒂固的习惯，立即认为“国家”就是当时的政府，却没有考虑到议会、国家元首和法院，包括宪法法院，作为政府的“制衡”部门。他们有很大的权力，并为国家和政府的发展承担相应责任。

长才可以克服财政赤字，因为高税收和财政赤字的溢出效应，产量也无法增长。通胀会有重复的浪潮，再通过重复性的伤害性措施将其减缓下来。虽然经济衰退会停止，却无法爬出低谷。

这不仅仅是一场噩梦。在第三世界很多国家，这种缓慢的停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成为了典型。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必须走出谷底，在此过程中国家的经济活动必不可少。

我并不提倡过多的国家干预和微观管制。这将走向刚才我认真剖析自己观点的反方向：通过部分恢复旧制来击退经济衰退。

在我看来，值得提及两种合理且可取的国家参与层级。事实上，第一个层级，就是国家应该按照自由主义的理念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范行为：引入法律，并确保它们执行，制定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必不可少的时候发挥监督（例如，对金融部分或自然垄断的监管）。政府必须按照调整后优先顺序来完成所有的事项。

第二个层级期望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有更多行为。国家必须启动并积极协助市场经济所需的新制度，建立一些新组织并废除其他一些组织，以及财产关系的转变。本章研究提到很多这样的实例。(205)

所以我不支持那些认为国家应该什么都不做的观点。这将为立法和行政两大权力部门减轻责任。在一个明确定义领域内，国家当然应该做好它的工作。如果伴随着转型的经济衰退，证明在不久的将来，将带来太大损失，政府依然需要为其负责。

（四）经济学家的专业责任

政治斗争尖锐的时候，有一种危险，即在政府部门任职的政客们可能会选择短期内受欢迎但从长远来看有害的措施和政策。同样的危险，反对派可能通过夸大的承诺试图挑起公众舆论反对现有政府。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更大的责任将授予研究型的经济学家，他们拥有专业责任站出来反对这两种威胁。

许多政客和政治新闻记者们以及一些研究者们，对经济衰退和国家一般性经济状况展开各种公开辩论，正如蒂博尔·伊尔多斯形象地指出，这属于“将自己挖进意识形态壁垒”的状况。^① 他们之间有一种相互猜疑的

^① 参阅 T. 伊尔多斯（1992，第1000页）。

气氛。提到“刺激”观点的人被怀疑支持政府，而那些提到“限购”观点的人被归类为自由主义反对派。厄尔多斯强调，研究者不应该爬上任何意识形态的壁垒，应保留客观性，根据他们的信念发表意见。类似的观点，鲁道夫·翁多尔考（Rudolf Andorka）也提到，他认为，“没有唯一一个救赎经济方案。实用主义是必需的；意识形态和教条不能被用来决定经济政策”^①。

我完全同意上述观点。我们许多人对贴“标签”感到厌烦，这在经济辩论中很普遍。教条式地应用尚未消化完全的经济理论，此外，目前匈牙利的党派习惯性地各种理论流派分类（这个党是凯恩斯主义，另一方是弗里德曼流派），这对客观研究具有毒性作用。

(206) 必须解决的问题极为困难，且前所未有的，我们都会犯错误。这意味着更需要镇定和理性的争论。

^① 参阅 R. 翁多尔考（R. Andorka, 1993, 第 17 页）。

第八章 后社会主义转型：综合性观察

(209)

关于后社会主义转型的各种信息流已如洪水般泛滥。除了日常的报纸和媒体报道外，亦有数以百计的研究和书籍，以及大量的学术会议出现，它们倾向于评估这些变化并概述这些转型中的任务。本章不会详细地讨论这些具体的问题。相反，我想对如此浩瀚的信息进行一些推进和系统分析，勾勒出一个概念框架，并希望它有助于分析这些变化。

不再详细讨论某个国家或其他国家的具体情况，在此我将试图做一个广泛的总结，提出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但是，有时我会用匈牙利的经验作为例子。

我考虑到一个事实，本章不是面向那些专门从事后社会主义转型问题的人们，而是那些更广泛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他们曾亲自参加过东欧的转型，或者至少是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有多种可行的分析方式，其中三个特别值得一提。第一个方法是开展对欲望、希望和期待的条理性调查。第二种方法是总结提交给政客和政府的建议，批准一些建议，论证并拒绝其他一些。^①最后，第三种方法是对到目前为止的转型经历进行总结呈现，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预测。我将会尝试第三种方法：积极预测。我没有要去解释我希望看到东欧未来的样子，而是检查根据我的推测东欧可能会是什么样子，而不论我对其未来形象满意与否。

我没有水晶球可以预言未来。本章的预测借鉴了几种经验来源。三个领先的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转

^① 在后社会主义转型的初始阶段，我总结了自己的经济政策建议；我 [1989] 1990 年的著作——《通往自由经济之路》，第一次在这个领域内出现。在本章中我不想回到早期的提议，本章的专属目的是对未来发展的预测。对规范性文献和头两年实际经验的优秀总结可以在联合国经济委员会针对欧洲的报告中获得（1992 年）。

型过程中发生的许多因素肯定也会在其他国家出现。一些重要的知识也可以从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一些拉美国家的近代史中获得。我在这里指的是从未经历过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但是它们也经历了深刻的政治变革，即独裁统治被民主制度取代。最后，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教训，它们源于更遥远的过去，即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框架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时期。

高度谨慎是可取的，应该尝试最多的就是随机预测。每一个过程都有几种可供选择的结果，更需要极大的勇气评论这些相对可能的替代品。

本章描述了七种趋势，提前预测这些极有可能会被实际应用的发展趋势。“趋势”一词表达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社会运动的流动和发展方向，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内部趋势、倾向和方向，而并不是那些事前就可以确定的绝对性。

一 趋势一：市场化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融合在一起的经济活动通过政府协调机制运行。^①协调的最重要手段是命令。上级机关发出指令给下级领导，执行相应任(211)务，他们不仅提供物质和精神奖励来执行任务，而且如果需要的话，也会使用强制的行政手段。

社会主义体制中也保有一些市场机制，但是在改革之前，市场机制被限制在很窄的范围内，而且很多是地下交易。后来，在伟大的政治变革之后，通过改革给市场开辟了略宽的范畴。

市场化趋势，在政治变革之后加速到很激进的程度，甚至变得不可阻挡。在一些国家命令式经济被清盘，进入中风状况，其他一些国家也出现某种程度的清盘。迄今为止，由国家管制的价格迟早会以更快或更慢的速度被释放。产品和资源的官僚分配方式也会被生产者 and 使用者、买家和卖家之间的自愿商业合同所取代。竞争持续发展，包括国内商品和或多或少的自由化的进口商品之间的竞争。

各种衡量标准可用于测量市场化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其中，最传神

^① 关于社会主义体制运行的详细研究，可参阅我1992年出版的书——《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

有效的方法是自由价格交易产生的 GDP 比例。当这部分商品的营业额占主导地位，且这一比例占整个营业额的绝大部分时，经济才能够被称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至少在这方面。现在，通过这个方法，匈牙利已经可以被归类为市场经济。可以预见市场化趋势会被强烈地用于所有的后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没有人认为我们正在见证胜利地迈向完全竞争市场（所谓的“完全竞争”并不是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特点，稍后进行讨论）。大型国有企业垄断保持相当长的时间，而新出现的垄断和它们一起（或者是源于它们，即国有垄断公司私有化）。外国投资者往往也明确表达其意图获得垄断地位。自由竞争依然受到无数经济和行政因素影响，即使那些障碍在经济上不可取。

新的民主国家无法找到其应有的地位。它是极易变动的，当人们认为没有理由要如此时，一些领域需要国家调控或控制，或偶然或经常性的国家干预，其地位很被动。

二 趋势二：私营经济的发展

(212)

如果没有私有制占主导地位，就不会有平稳运行的市场。根据定义，私有制是市场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行动者可以彼此自愿订立合约。但是这需要真正的自治，换句话说，决策者不会在权威部门的指示上有所行动。这种独立性只能由私有制保证。

关于这方面的警告，在社会主义体制实际被采用很久之前，路德维希·冯·米瑟斯早已提出。这个想法后来被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在其研究中非常郑重地指出。^① 尽管有这些诚勉信号，依然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倾向于执意推行“市场社会主义”，其指导原则可以归纳如下：“让我们结合国有制与市场机制。”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的道路上尝试运用这一概念，例如，匈牙利卡达尔·亚诺什（János Kádár）或随后苏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领导之下的改革实践。

来自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改革灵感辜负了拥护者们的期望。他们肯定希望可以放松旧斯大林体制，并让很多经济参与者接受真正的市场经济思

^① 参阅 L. 冯·米瑟斯 [1920] (1935) 和冯·F. 哈耶克 (1935)。

想，但是实际情况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并且远远落后于雄心勃勃的期望。实际上并没有创造可以“第三体制”证明在斯大林社会主义下的经济优势可以与现代资本主义相媲美，而且这一体制可以稳稳地站立并得以巩固。

“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并没有消失，而且还在期待一次又一次地重振起来。我可以补充一点，即使这些想法再一次获得影响力，它们注定要再次失败。

进一步预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后社会主义国家将被标记为“二元经济”。国有和私有部门相映成趣。

其中决定转型速度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私营部门的企业发展。中小型企业已经开始迅速发展。私营部门在服务、国内外贸易、建筑和金融领域，发展非常快，同时私营部门的比重在制造业也开始增长。

(213) 根据相关国家的大小，约有几万或几十万的新型私营企业“初创”。我们看到国内大型投资者开始出现，他们汲取了已经产生的国内积累。社会主义体制几乎已经消灭了中产阶级，并停止或扭转资产阶级化，一个广泛的新兴中产阶级开始发展。这个新兴中产阶级包含由企业家、资产所有者和管理者组成的新“商人阶层”，一个广泛阶层“自由民”。

这一过程伴随着各地和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很多情况下包括了知名的大公司、银行和跨国公司。起初新的“商人阶层”就包含了国家边界之外的经济生活。

即使是今天，这种方式发展私营经济呈现出一个非常不同的景象。我们可以看到国有私有混合并互相纠缠的状况，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落后的“巴尔干风格”的作坊，现代化的超级工厂，合法的、半合法的，甚至是非法的企业。这个过程可以跟最类似的一些细胞增殖或生长相比较，它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展为丛林中成千上万种植物。

与此同时，国有部门继续萎缩，直到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习惯性的适度规模。收缩以各种形式发生，一些国有企业转到私人手中，无论是其原来的形式抑或重组之后。这种所有权的变化可能通过出售国有财产或通过免费发放给特定人群而发生（例如，相关企业雇员，参与到没收财产之前获得补偿规划的人，或者是所有参加无偿私有化的公民）。各种私有化方案可通过单独或组合的方式执行。

但是，国有部门的收缩却是通过除了严格意义上的“私有化”之外的

其他方式而实现。一些国有企业被关闭；其他的依然存在，但其规模被永久减少，国有部门中一些被出售或被清盘。许多公司发生“资本化”，因为它们逐渐用尽其资产的重要部分。我们也面临着另一种现象：一些国家财富被窃取，特别是“智力资产”、人力资本、宝贵的商业网和商誉；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窃取是通过非正式的方式，套用了这一方面的法律空白。国有部门的萎缩缓慢发生，伴随着太大的损失和人类苦难，并且不止在一个方面以相当可耻的方式萎缩。同时，幸存下来的国有部门工作效率非常低。只是希望，但绝不是肯定，之后一段时间，在私营经济的压力下国有部门的残留部分提高其效率。(214)

基于上面的分析有两种计算私有化的方法。一是指严格意义上的私有化速度：原始的国有部门与每年转入私人手中的比例。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另一种计算方法具有更广泛的基础，在我看来，也相对更加重要。计算私营部门的发展，包括新的“初创”企业和被私有化的前国有企业，然后将私营部门的增长与国有部门的收缩相比，不管国有企业的收缩以何种方式进行——私有化、清算、生产下滑或资产被侵占。这两个过程，具有相反的标志，可以融合在一起，几年后私营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将大于国有部门。这是可以想象的，例如，在未来的几年内私营部门在匈牙利将获得优势。其他国家的步伐会有所不同，但任何国家私营经济的发展历史时期的长短都主要依赖于彼此关联的两个动态过程。

政府可以做很多工作来加快这些过程；或者，为了使财产关系转移慢一些，政府的行动笨拙且不称职，使得转型过程更慢、更痛苦。但是，最终任何政府的政策失误都不可能阻碍所有权的转变。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从根本上说，是它按照自己的规律发生，而不是国家命令。^①

三 趋势三：宏观失衡的再现

(215)

政治转折之后的新政权从它的前身那里继承了严重的宏观经济失衡问题。下面的四种失衡是最常见的：长期短缺经济，公开或压抑的通货膨胀

^①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对社会主义转型的市场化本质和财产关系转变上有一些争论。就我而言，我同意那些强调关于协调机制和产权形式领域会有一场深刻的变革，而且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观点，通过积极的国家措施必然会发生渐进形式的全面发展。类似的观点可以在 P. 默雷尔 (1992) 和 K. 波兹南斯基 (K. Poznanski, 1992) 的著作中找到。

胀，财政赤字和外债。所列出的四个问题中，两个或三个，甚至有四个，可能会再次困扰经济结构，并且彼此互相加强。^①

一些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宏观动乱如此严重，以至于没有选择地推出一揽子并发稳定措施，这导致社会的严重颠簸。其他国家政府可以在更激进且迅速的措施和渐进的、较慢且稳定的战略选择之间进行抉择；由于害怕政治阻力，政府通常选择后者。

大多数专家会同意以下的预测。

在克服社会主义体制最痛苦的症状之一（长期和普遍的经济短缺）方面已经有了良好的前景。整个范围内的融合措施已经到达治疗的效果：私营部门快速增长，企业自由和进口自由使得过度需求迅速在供应方上获得满足。与此同时，价格的释放、紧缩的货币政策、更强制的财政纪律，以及对工资上涨的控制，这一切使得需求得到遏制。例如，已经可以说匈牙利不再是一个长期的短缺经济；最多是有一部分或其他一些局部短缺。同一地区许多其他国家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但它们都可能有能力在不久的将来克服短缺经济。

相比而言，更有理由对通货膨胀悲观，及对其主要诱发因素预算赤字悲观。停止甚至从根本上降低通货膨胀，需要显著措施：艰难的削减公共开支，限制信贷，并阻止名义收入的增长，有可能达到临时结果，并大幅削减通货膨胀率，但是这通常伴随着生产下降，以及失业的出现和持续增长。(216) 结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制定者面临着不断更新的压力，他们需要采取措施对抗经济衰退，重新开始经济增长，缓解失业问题，但这些又可能再次产生通货膨胀。因此，仍然存在着恒定的危险——通货膨胀曾经被减慢或完全停止之后，又出现一次次的加速。

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发行债券，而不是采用通胀手段给预算赤字融资，即开动印钞机，这可能会将私人投资者挤出信贷市场，从而推迟了经济从衰退中复苏。还有另外一个公开路线——通过外资贷款对预算债务融资——但是这会增加外债。

失业问题已经被提及多次。不管之前的体制带来的其他困难如何严重，它至少设法维持了充分就业，事实上是劳动力的永久不足。经济体制

^① 关于中东欧地区的宏观形势分析，以及对这一问题进行广泛的文献回顾，可以参阅之前提到的联合国调查报告（1992）。

变化最痛苦的伴随物是发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改变：劳动力由需求过剩转变为供应过剩，即劳动力短缺转变成失业，这是各种因素的综合结果。正如我刚才所说，生产力下降可能由反通货膨胀政策导致。许多工厂完全或部分停止生产是由国内需求结构，再加上外贸的重新调整而引起，部分是因为经济互助委员会（连接社会主义国家于一体的组织）的崩溃。私有化以及对国有部门更高盈利能力的要求，迫使管理人员通过展示高比例的劳动岗位来解决失业问题。所有这些因素可相应地导致失业，然后通过溢出效应加重失业。生产在一个地方的下滑导致了同一步骤下的需求下降，而需求下降又会进一步导致另一部分的生产下降，依此类推。

基于上面的讨论可以得出两个预测。第一，长期劳动力短缺的停止和经济结构转型的结果——结构性失业的措施得以巩固。第二，必须预测到延伸的经济衰退，这很可能导致在数年内的失业率高于未来的长期平均值，即“正常的”失业率。

在先进工业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反复面临着商业周期波动的一个两难境地：全力应付失业问题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会增加失业。这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使通货膨胀率在其开始增长时数值比较低。后社会主义国家被同样的问题困扰，但其目前面临着更不利的情况，因为经济甚至在重要的转折时刻——政治转折点——遭受严重的公开或压抑的通货膨胀。社会陷入一些非常残酷的陷阱中：不管哪一个试图解决的严重问题，都可能加剧其他问题。因此，宏观经济稳定和平衡的前景并不被看好。目前，政府面临着风险，有可能会因进一步受到阻碍而不敢坚持必要的、强硬的且连贯的政策，这一政策要求社会中的一些牺牲，而这其实是由经济问题引起的社会内部紧张关系。政府更可能倾向于“得过且过”的政策，推迟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意味着宏观失衡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困扰社会。(217)

四 趋势四：宪政国家的发展

以私有制为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离不开必要的法律基础。私有财产的安全必须得到保证，遵守私人合同的执行，企业和公民受到保护以避免官僚任意干涉。与此同时，经济的许多领域需要国家监管和调控，特别是一些私人合约和私营企业的活动存在外部效应的领域，这超越了参与交易双

方所能掌握的部分。国家有众多这样的任务，从银行监管到保险机构，再到通过执行反垄断法来保护经济环境。

似乎有理由做出如下预测：在后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无疑将会建立起来，因为经济转型需要它。但是这个过程会很漫长。分析这一现象，可以在三个层次上区分国家活动。

第一是立法。这也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多先前的法律条文需要(218) 被用于新情况下的法律条文所取代，律师精通刚刚新兴的现代市场经济规则，但议会成员还没有拥有作为宪政国家中立法者的工作经验。但是，尽管有这些困难，这一任务的绝大部分可以在几年之内进行。

第二是执法。这可能会更难。法官、检察官、律师和企业法律顾问必须重新学习交易条文。涉及商业正义与诉讼的法律已经捉襟见肘；审判和民事诉讼的拖延破坏对法律和合同的尊重。

第三也是最后一个层面是公民心态的改变。这可能被证明是所有之中最难和最长期的任务。以前的非法制度摧毁了人们对法律的诚实性尊重；他们被恐惧于飘忽不定的压制所影响。同样缺乏对私人合约的尊重；不践约或不支付债务被认为是经济生活中最自然的状态。这些人巧妙地规避了一些法规或其他法律真的令人羡慕，因为这是生存的一种方式。当违反规定，背叛公众信任，偷税漏税，商业欺诈和腐败被谴责的时期到来之前，改善民众在这一方面的公共道德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五 趋势五：民主制度的发展

大家都熟悉市场经济和民主之间简单相连的表面性口号，然而实际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复杂。

我想提出三点观察。

第一个观察。社会主义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取消政治垄断。这是一个系统，执政党享有垄断性的权力提出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和计划。其反资本主义不是某种二级或三级的意识形态和规划元素，而是其主要目的的体现。这简单地解释了为什么在1990年之前所有的改革都不完整也并不一致。建立基于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条件废除政治垄断的规定。一旦条件被满足，市场经济转型之路的主要障碍以无法回避的方式得到清除，转型的过程也开始得到全面保证（参见上述对第一个

和第二个趋势的讨论部分)。

第二个观察。不存在不以私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议会民主制度。然而，不同议会民主国家的经济仍可能彼此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例如，国有部门可能占更大比例，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其国有部门是经济的主导和优势部门。一些国家控制再分配的作用可能会更大，但在所有国家里，市场依然是主要的协调者和经济活动集成者。(219)

民主制度的稳定，必须保证个人自由和自主。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和私人合同的辩护权。当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或达到了几乎全部经济角色，个人员工失去了“离职”机会，因为从根本上讲，只有一个雇主：国家。综合公有制必然导致极权政治制度。但是相反的声明持什么立场？基于私有制的每一个市场经济都是民主国家？这显然是不正确的。(220)

第三个观察。并非所有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都是民主国家。这种经济形式与许多版本的独裁和其他形式的专制相兼容。你只需想想希特勒帝国，拉美军事独裁政权，或者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十年。

随之而来的争论在社会主义地区被频繁地提出（如果不是印刷作品的话，至少也是私人谈话）：

转型伴随着无政府状态，因此需要“法律与秩序”，这只能由严格的政府提供。转型带来社会紧张局势，不能对因有牺牲的经济政策望而却步，对转型的成功来说非常重要。这也是另一个要求严格管理的证据，可以坚决地打破来自群众的部分阻力。支持并推动这一观点的模范是智利的皮诺切特（Pinochet）。

我并不否认这种观点里有一些理性的元素。特别是在伟大的革命社会转型时期，在经济增长率和民主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权衡。不能肯定任何情况下都存在这种权衡，我们希望在东欧地区尽可能少的国家会面临这种痛苦的选择，但是困境不容忽视。在这里，让我一个人忏悔。如果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会选择民主，而不仅仅是目前的成就，而是进一步的发展，即使要付出的代价是经济成就。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我们都必须面对需要在基本价值之间进行选择，最好可以提前思考一个人所在的立场。

迂回之后，让我们回归到对预测方法的规范性分析。之前的四个趋

- (221) 势，我都是毫不保留地或满怀信心地提出，但在这一点上，我必须表达进一步的保留意见。虽然一些国家走向民主的过程有可能是畅通的，但也没有排除其他可能性，民主制度将被扼杀，专制政权在某些或全部部门出现，独裁应运而生。社会紧张局势拖延时间越长，它们也会变得越清晰，发生危机的机会越高。每一个后社会主义国家里对民主信赖的人必须保持警惕，捍卫民主，同样国际社会也应如此。

六 趋势六：国家联盟的重新定义

东欧的共产主义制度之命运，在这方面是最重要的部分，苏联第一次持续地表现出脆弱然后与一些国家相分离。与之相关的所有事情中最需要强调就是“成就”。得知东欧国家和苏联的国家主权已经恢复是个很好的鼓舞人心的经历。将近半个世纪的被别国占领，首先是德国，随后是苏联，目前在很多主权国家已经没有进驻任何外国军队（但是，必须立即补充，也有一些例外情况）。^①

- 出现的新形势有以下几方面的启示。在这里我只提经济效应。可以在先进工业国家和后社会主义地区观察到相互矛盾的发展趋势（为了简洁起见，虽然从地理角度上看，没有精准表达，我们将经合组织成员国称为西方，后社会主义国家称为东方）。在西方，一直存在着稳定的加强型向心力。一方面，国家经济正往社区、协调和一体化方向发展。商品、资本、货币、劳动力和知识的流动跨越旧的国家边界，变得越来越自由。另一方面，在东方，已经有忽然并异常加速的离心力。先前较大的超国家的单位土崩瓦解；可以看到碎片和隔离方向的运动。存在着新的坚实的国家边界，在先前没有或几乎无效的地方，它们成为了经济障碍物。
- (222)

从严谨的经济角度评估后一个趋势，会令人悲伤。根据技术专家或经济学家的标准，大规模地整合比碎裂的、分散的小国家经济更有效，后者会减少合作，并或多或少地彼此孤立。像几乎所有其他阻碍资源的自由配置一样，正在出现的新情况有可能会降低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率。

^① 目前仍有相当大的外国势力驻扎在波罗的海国家，它们在共同财富独立国家的军事管制之下，接管了一些苏联先前的功能。在前南斯拉夫境内战争期间，新成立国家的边界已经变得模糊可疑。以原有边界为界定，这些自认为是主权国家里有新的外国占领势力。

但这项研究并非旨在从这个角度评论发生的变化。本章的目的在于描述出一些预测，而不是提议。所以最主要的是要理解我们周围发生的变化。

似乎国家联盟不可避免地需要首先重新定义自己。只有这样才会有超国家的单位，或加入已经存在的大单位。一些国家的合法政府在获得本国人民支持之后，加入一个超国家组织（或者是货币联盟，关税同盟，对劳动力或资本的自由流动规划，或更全面的整合计划），只能以自愿加入的形式发生。通过外在的向心力和不同程度和类型的整合计划强加给一个国家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一些国家现在才开始理解到这才是真正的主权。^① 回想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一方面，经济互助委员会崩溃，因为它是苏联强加给其他东欧国家的；苏联和南斯拉夫已经土崩瓦解，在很多方面这些联盟都是人工作品，无情地推给那些期望拥有主权的小国。另一方面，(223) 欧洲经济联盟得以巩固，开展旨在更全面的一体化进程；这一联盟从起初就是一个整体并稳步发展，其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府一步步地自愿放弃一些主权。

它遵循着之前讨论过的趋势，即分离和分裂的倾向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实现区域合作的趋势依然脆弱，尽管存在着有利的理性经济论据。但是，在这个一般性的预测中，依然存在多种可以想象的图景。最有利的相互分离、离开和区分是通过文明的协议方式和平达成。最令人生畏的图景是通过局部战争重绘地图。即使没有战争，边界紧张可能是由邻国之间的激烈争论引起，邻国关于少数民族不公平待遇的抗议会引发激烈的反对声音，指责这种批评和对主权的嫉妒。这些现象，在东欧地区几个世纪的历史中非常熟悉，遗留下的互不信任破坏了区域合作的机会。

在我看来，人们希望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加快“欧化”。但是，延续这本书研究的基本性质，如果我对预测仅是关注而不是愿望的话，必须说，我并不希望会有如此迅速的进展。

我们面临着客观的困难。欧盟有很多规范，从经济活动的法律规制到质量标准、关税和税率。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和经济活动可以与欧

^① 关于后社会主义国家外贸经济合作问题，请参阅 I. 伊雷什 (I. Illés)，K. 米热伊 (K. Mizsei) 和 I. 瑟佐哇喏 (I. Szegvári) 1991 年的研究，还有 P. B. 凯南 (P. B. Kenen, 1991) 的文章。

洲标准在各个方面相协调，依然需要很长的时间。

同时，必须清楚地看到有明显的阻力，难以从官方公共言辞中辨析出来，但却在斜面和实际变化的刹车制动上以含蓄方式呈现出来。东欧国家里包含了一些有影响力的群体，他们挑起反对国家“西化”，传播对“洋”资本的疑虑，当国际组织用严格标准要求一些国家的经济表现时，(224) 激发了民族情绪。这种对立在西方世界也常常存在。如果需要对新移民提出更高门槛，谁愿意劳动力跨越国界自由流动呢？如果被证明是有利可图的，商业世界对东欧出口看起来挺好的，但是并不热衷于开放其对东方的进口市场。

这一切都说明了为什么我希望“欧化”，在平等权利的基础上，有机地融入欧盟及其机制，过程是缓慢的。

七 趋势七：福利的不平等增长

到目前为止讨论到的各种趋势如何影响一般大众？先前的体制导致低生活标准。人们遭受了长期短缺经济。但是，这些方面都融合在充分就业和适度的社会和经济安全措施之中。社会被标注为一定程度的平等。特权阶层相当狭窄。即使其他人不都生活在同样的方式下，他们的生活物质标准是在一系列的灰色之中。

现在后社会主义社会正通过大变革离开先前的状态，物质福利的平均水平也极有可能提高。但是这并没有以正确的方式产生，因为在上述讨论的第三个趋势中的经济问题将倾向于在一段时间内导致生产停滞或市民物质消费水平的绝对下降。然而，所有这一切仅仅是指平均值，这是个人还没有直接经验体会的统计类别。

有些人已经在转型初期成为经济赢家。这适用于社会中相当广泛阶层，尤其是那些所有者、管理者，或者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一名私营企业的普通员工。必须补充的是，这个阶层中的一小群非常迅速地变得特别富有。同时，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在某些情况下，缓慢地在小范围内发生，而其他一些情况则是非常尖锐并在很大程度上发生。

市场经济是一种个人生活极大地取决于个人表现的制度。同时，国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也更少；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对个人发挥家长式作用。(225) 所有这些辨别制度变化的方法都是基于它们自己制度内的价值观，无

论是个人角色的迅速上升还是国家在决定个人命运的下滑时是顺势还是逆势，它都必然是被采用的变化趋势。这需要更广泛地物质繁荣分布，也伴随着不平等的增长。

东欧地区每一个政府和政党都强调必须维护社会安全网，或在其尚未开发时创建一个安全网。网络中的一些部分，例如，国家卫生服务和失业救济金计划，已经在很多后社会主义国家发挥作用。但是，必须承认还有很多部分没有涉及。当然，社会主义体制继承成熟的福利国家没有任何问题。它们已经承诺通过继承福利国家的法律制度履行社会福利任务，但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它们没有能力履行这些完整的福利标准。养老金制度很广泛，但大多数的养老金所能提供的生活水平有限；人人有权享有免费医疗，但医疗服务水平不高。可以发现北欧国家是最发达的福利国家，只有经过几十年不间断的经济发展，才可以形成这样的制度，并通过法律制定国家的福利义务。^① 后社会主义地区的国家承担福利任务是处在经济衰退、通货膨胀、高额外债对外履行债务之中，换句话说，宏观失衡，对高福利的承诺构成了一个严重和持续存在的挑战。

所有这些原因导致广大人民阶层对经济停滞或生活物质标准的下降产生了高度的不满意，同时失业和社会不安全感又忽然降在他们身上，这被认为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要求人们做出进一步的牺牲。这是另一个原因，为什么宏观失衡的整治将会是长期的，更不要说，从维持民主的角度看由于人们不满而造成的危险。

八 变化趋势的总结性评论

(226)

我列出了七个趋势：这些并不包括可以预测到变化的综合状况，但它们是我挑选出我认为最重要的部分。正如在引言段的强调，这个研究开始时，我还没有想出这些宿命的预言。我提出替代解决方案和选择的困境，然后说哪个选择是我最有可能采用的（我最想看到的不同于我已经表达出来的）。这也不能事先决定变化的步伐。最多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转型需要很长时间，需要完整的历史周期。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宿命论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影响变化的方向和速度取决于这些因素：

^① 参阅 A. 林德贝克 (1990)。

(1) 取决于智慧或愚蠢，效率或无能的政府。伊拉斯谟（Erasmus）建议统治者和其他官员“避免让一些充满野心、愤怒、贪婪和奉承的人成为政府咨询者”^①。这还有待观察到底需要多久他们才能够抵御这些诱惑。

(2) 取决于反对派势力，是否反对派具有破坏性并希望通过民粹主义的煽动获得权力，或者他们是温和且具有建设性的。

(3) 依赖于普通大众所提供的社会环境，他们受纪律规范，并接受长久的牺牲。

(4) 依靠外国的帮助，其所需要帮助的范围和形式。

所以我到底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我不关注即将到来的未来几年。对于什么样的综合现象可以导致本章中提出七个趋势的综合成果，依然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在一些国家，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可以忍受一些问题，另一小部分人将越来越有利，因此带来了稳定的普遍性提高的机会。但是，在其他国家，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动荡，甚至是社会爆炸。

从长远来看，我坚决看好。最终形成的体制将不会是个“好社会”。⁽²²⁷⁾ 它一定会充满缺点，也呈现出显示一些令人厌恶的特性，但是在物质成果和人权保障方面，它仍然优于先前的社会主义体制。我是一个长期的乐观主义者，因为即使政府治理未必在最优秀的人手上，也会有很强的内在的自发倾向来引导向这种有利的方向发展。

九 学术的作用

本章并非针对任何政府；最后，关于学者责任，我想补充几句话。

在同一位置的西方同事们，对东欧学术界的教学和研究给予了实际帮助。邀请并给予奖学金给东欧的同事，接受后社会主义地区的客座教授，通过联合研究的方式传授经验，捐赠图书、期刊和设备给东欧的研究机构，是这些知识一部分的支持形式。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帮助，但是即使这种帮助再加倍，仍然达不到应有的要求。

^① 引自伊拉斯谟的著作《基督君主的教育》[1516]（1968）。

东西方学者往往为政府、政党、运动、代表具体利益的联合会、国际组织和商业界担任顾问。这些活动非常必要，但我添加一点警告或许并无伤害。我们必须设法适当谦逊地提出我们的建议。如果我们期望的想法并不适用？如果它并不完全适应于我们不那么熟悉的当地情况？我们不能冒进，不惜一切代价地推动我们自己的想法，这有可能会因为抹黑而反作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顾问工作。我们需要从伊拉斯谟那里汲取灵感，保留一点点讽刺给自己是个好事。

有时环境分配给我们的角色是调解员，而不是顾问；我们的任务是设法调和矛盾的想法，或是社会和政治力量。再一次，从伊拉斯谟的作品中获得灵感，让我们努力争取理性、意识和节制。我们不能压缩他提到的风险：那些介入对抗者之间的针锋相对的人会发现他们自己被一方拒绝被另一方当成品牌。然而，我们必须要对社会良心发声，如果人的自由受到侵害，年轻的民主制度受到袭击，智慧和耐心被激情覆盖，我们需要说出警告的话。(228)

附录 研究前因和第一版出处

本书中的所有文章最初都以讲座的形式呈现。下面介绍了每一个讲座的框架，演讲的时间和地点，以及第一版英文发表的详细说明。

第一章 市场社会主义回顾

丹拿 (Tanner) 讲座——人类价值。每年丹拿基金会向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学发出邀请，包括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公众人物或作家，由主讲人自己选择主题。早些年演讲者包括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阿罗 (Arrow)、贝罗 (Bellow)、布罗茨基 (Brodsky)、福柯 (Foucault)、哈贝马斯 (Habermas)、哈维尔 (Havel)、赫希曼 (Hirschman)、科拉科夫斯基 (Kolakowski)、诺齐克 (Nozick)、波普尔 (Popper)、普里高津 (Prigogine)、罗尔斯 (Rawls)、罗蒂 (Rorty)、琼·罗宾逊 (Joan Robinson)、赫尔穆特·施密特 (Helmut Schmidt) 和斯蒂格勒 (Stigler)。这篇研究是作为丹拿讲座系列之一，1991年1月18日和1月20日，斯坦福大学。

第一次出版：《市场社会主义回顾》，收录在格瑞则 B. 彼得森 (Gretchen B. Peterson) 主编的《丹拿讲座——人类价值》一书中，盐湖城：犹他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4卷，第3—41页。

第二章 所有制形式和协调机制之间的亲和力

这篇研究于1989年3月28日至30日，以“计划经济中的市场力量”为题在圆桌会议上发表，这次会议由国际经济学会和莫斯科的苏联科学研究院共同举办。

(230) 第一次出版：《所有制形式和协调机制之间的密切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经验》，收录在奥列格 T. 博戈莫洛夫主编的《计划经济中市场力

量》一书中，伦敦：麦克米伦，1990年，第32—54页。

第三章 苏联的自由经济之路：旁观者的评论

丹拿讲座——人类价值。1991年6月12日列宁格勒大学，不久之后这个城市就被更名（关于丹拿系列讲座，请参阅关于第一篇研究的说明）。这是丹拿讲座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地区举行。

第一次出版：《苏联的自由经济之路：旁观者的评论》，收录在格瑞则B.彼得森主编的《丹拿讲座——人类价值》一书中，盐湖城：犹他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4卷，第42—68页。

第四章 东欧市场化的本质

丁伯根（Tinbergen）讲座。为了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由荷兰皇家经济协会每年举办的讲座。先前的演讲者有劳伦斯·E. 克莱恩（Lawrence E. Klein）、埃德蒙·马兰沃（Edmund Malinvaud）和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这个演讲是1990年10月19日在荷兰乌得勒支（Utrecht）。

第一次出版：《东欧市场化的本质》、《德国经济学家》，1992年第140卷第2期；第153—176页。

第五章 后社会主义转型和国家：基于匈牙利财政问题的反思

埃利（Ely）讲座。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两次传统的全体参与讲座：总统讲座和纪念理查德·T. 埃利（Richard T. Ely）讲座。1992年1月3日，在新奥尔良举行的年度会议中第五个讲座。

第一次出版：《后社会主义转型和国家：基于匈牙利财政问题的反思》、《美国经济评论》，文件和记录，1992年第82卷第2期，第1—21页。

第六章 后社会主义体制的财政纪律演变

(231)

缪尔达尔（Myrdal）讲座。为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冈纳·缪尔达尔，定期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举行的讲座。这篇研究于1992年11月5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发表。

第一次出版：《财政纪律的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演变》，Kyklos，1993

年秋季第46卷第3期，第315—336页。

第七章 转型后退：匈牙利发展模式的一般现象

佩鲁（Perroux）讲座。为了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经济学领域的杰出人物——弗朗索瓦·佩鲁（François Perroux），由其命名的基金会定期举行的讲座。这篇文章于1993年6月9日在巴黎法兰西学院发表。

第一次出版：《转型后退：匈牙利发展模式的一般现象》、《应用经济学》，1993年第46卷2期，第181—227页。

第八章 后社会主义转型：综合性观察

伊拉斯谟讲座。1991年欧洲科学院的主要成员决定在每年全体会议上，增加以欧洲思想、科学与人文的伟大人物——伊拉斯谟——命名的讲座报告。这篇文章是于1992年6月17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欧洲科学院年度全体会议上，由我做第一次伊拉斯谟讲座。

第一次出版：《后社会主义转型：综合性观察》、《欧洲评论》1993年第1卷第1期，第53—64页。

参考文献

第一章

- Alchian, Armen A. 1965. "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 *Il Politico* 30 (4): 816 - 829. Alchian, Armen A. 1974. "Foreword." In *Th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 edited by E. G. Furubotn and S. Pejovich. Cambridge, Mass.: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pp. xiii - xv. Alchian, Armen A., and Demsetz, Harold. 1972.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 (5): 777 - 795.
- Arrow, Kenneth J., and Hurwicz, Leonid. 1960. "Decentralization and Computation in Resource Allocation." In *Essays in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pp. 34 - 104.
- Bardhan, Prahab. 1990. "Some Reflections on Premature Obituaries of Socialism."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India), February 3: 259 - 262. Barone, Enrico. [1908] 1935. "The Ministry of Production in the Collectivist State." In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edited by Friedrich A. Hayek.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p. 245 - 290. Brus, Wlodzimierz. [1961] 1972. *The Market in a Socialist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Brus, Wlodzimierz, and Laski, Kazimierz. 1989. *From Marx to Market. Socialism in Search of an Economic Syste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Dewatripont, Michel, and Maskin, Eric. 1990. "Credit and Efficiency in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Economies." Discussion Paper, no. 1512,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Gorbachev, Mikhail S. 1987. *Perestroik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Hart, Oliver, and Holmström, Bengt R. 1987. "The Theory of Contracts." In *Advances in Economic Theory. Fifth World Congress*, edited by T. Bew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71 - 155.
- Hayek, Friedrich A. 1960.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London: Routledge, and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Hayek, Friedrich A. 1989. *Order—With or Without Design*. London: Centre for Research into Communist Economies.
- Hayek, Friedrich A., ed. 1935.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Heertje, Arnold, ed. 1981. *Schumpeter's Vision: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After Forty Years*. New York: Praeger.
- Heilbroner, Robert. 1990. "Analysis and Vision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8 (3): 1097 - 1114.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BRD, OECD, EBRD. 1990. "The Economy of the USSR: 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s." A study undertaken in response to a request by the Houston Summit, Washington, D. C.
- Jasay, Anthony de. 1990. *Market Socialism: A Scrutiny. 'This Square Circle'*.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 Kidric, Boris. 1985. *Sabrana Dela* (Collected Works). Belgrade: Izdavacki Centar Komunist.
- Kolodko, Grzegorz W. 1991. "Polish Hyperinflation and Stabilization 1989 - 1990." *Most* 1 (1): 9 - 36.
- Kornai, János. [1957] 1959.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ornai, János. 1971. *Anti - Equilibrium*. Amsterdam: North - Holland.
- Kornai, János. 1980.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North - Holland.
- Kornai, János. 1986a.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Kyklos* 39 (1): 3 - 30.
- Kornai, János. 1986b. "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Visions, Hopes and Re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4 (4): 1687 - 1737.
- Kornai, János.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e, Oscar. 1936 - 1937.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Re-*

- 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 (1, 2): 53 - 71, 123 - 142. Lavoie, Don. 1985.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Reconsider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 Grand, Julian, and Estrin, Saul, eds. 1989. *Market Soci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Lerner, Abba P. 1946. *The Economics of Control.* New York: Macmillan.
- Liberman, Evsey G. [1962] 1972. "The Plan, Profit and Bonuses." In *Socialist Economics*, edited by A. Nove and D. M. Nuti.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pp. 309 - 318.
- Lipton, David, and Sachs, Jeffrey. 1990a. "Creating a Market Economy in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75 - 133.
- Lipton, David, and Sachs, Jeffrey. 1990b. "Priv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 293 - 333. Malinvaud, Edmond. 1967. "Decentralized Procedures for Planning." In *Activity Analysi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and Planning*, edited by E. Malinvaud and M.
- O. L. Bacharach. London: Macmillan, 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p. 170 - 208. Marx, Karl. [1867 - 1894] 1978. *The Capital.* London: Penguin.
- Mises, Ludwig von. [1920], 1935. "Economic Calculations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In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edited by Friedrich A. Hayek.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p. 87 - 130.
- Mises, Ludwig von. 1981. *Socialism.*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Nove, Alec. 1983.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New York: Allen and Unwin.
- Nutter, Warren G. 1968. "Markets Without Property: A Grand Illusion." In *Money,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edited by N. Beadles and L. Drewry.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pp. 137 - 145.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1. *OECD Economic Surveys: Hungary* 1991. Paris. OECD.
- Ortuno - Ortin, Ignacio, Roemer, John E. and Silvestre, Joaquim. 1990. *Mar-*

- ket Socialism*. Mimeo. Davi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Péter, György. 1954a. "Az egyszemélyi felelos * vezetésrol * " (On Management Based on One - Man Responsibility). *Társadalmi Szemle* 9 (8 - 9): 109 - 124.
- Péter, György. 1954b. "A gazdaságosság jelentőségéről * és szerepéről * a népgazdaság tervszero * irányításában" (On the Importance and Role of Economic Efficiency in the Planned Control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Közgazdasági Szemle* 1 (3): 300 - 324.
- Péter, György. 1956. "A gazdaságosság és jövedelmezőség * jelentősége * a tervgazdaságban, I - II"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Profitability in the Planned Economy, I - II). *Közgazdasági Szemle* 3 (6, 7 - 8): 695 - 711 and 851 - 869.
- Qian, Yingyi, and Xu, Chenggang. 1991. "Innovation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in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Economies." Mimeo. Cambridge, Mas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 Schroeder, Gertrude E. 1988. "Property Rights Issues in Economic Reforms in Socialist Countrie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21 (2): 175 - 188.
- Schumpeter, Joseph A. [1911] 1968.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Business Cycl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mpeter, Joseph A. 1939.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gress*. New York: McGraw - Hill.
- Schumpeter, Joseph A. [1942] 1976.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Schumpeter, Joseph A. 1954.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k, Ota. 1966. *Economic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Czechoslovakia*. Prague: Orbis.
- Stalin, Josef V. 1947. *Problems of Leninism*.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Stiglitz, Joseph E. 1987. "Principal and Agent." In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 3, edited by J. Eatwell, M. Milgate, and P. Newman.
- London: Macmillan, and New York: The Stockton Press, pp. 966 - 972.
- Sun, Yefang. 198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period 1958 - 1961). "Some

- Theoretical Issues in Socialistic Economics." In *Social Needs versus Economic Efficiency in China*,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K. K. Fung. Armonk: M. E. Sharpe. Taylor, Fred M. 1929. "The Guidance of Production in a Socialist Stat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 (1): 1 - 80. Reprinted in 1938 in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edited by B. E. Lippincot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Temkin, Gabriel. 1989. "On Economic Reform in Socialist Countries: The Debate on Economic Calculation Under Socialism Revisited." *Communist Economies* 1 (1): 31 - 59.

第二章

- Afanas' ev, Iuri N., ed. 1988. *Inogo ne dano* (There Is No Other Way). Moscow: Progress.
- Antal, László, Bokros, Lajos, Csillag, István, Lengyel, László, and Matolcsy, György. 1987. "Change and Reform." *Acta Oeconomica* 38 (3 - 4): 187 - 213.
- Burkett, John P. 1989. "The Yugoslav Economy and Market Socialism." In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Models and Cases*, edited by M. Bornstein. Homewood, IL and Boston, Mass.: Irwin, pp. 234 - 258.
- Dallago, Bruno. 1989.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in the West and East: A Comparative Approach." In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Models and Cases*, edited by M. Bornstein. Homewood, IL, and Boston, Mass.: Irwin, pp. 463 - 484.
- Davis, Christopher M. 1988. "The Second Economy in Disequilibrium and Shortage Models of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Berkeley - Duke Occasional Papers on the Second Economy in the USSR, no. 12, July.
- Gábor, István R. 1985. "The Major Domains of the Second Economy." In *Labour Market and Second Economy in Hungary*, edited by P. Galasi and Gy. Sziráczy. Frankfurt and New York: Campus, pp. 133 - 178.
- Grossman, Gregory. 1977. "The 'Second Economy' of the USSR." *Problems of Communism* 26 (5): 25 - 40.
- Hewett, Ed. A. 1988. *Reforming the Soviet Economy. Equality versus Efficiency.*

-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Kornai, János. 1986. "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Visions, Hopes and Re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4 (4): 1687 - 1737.
- Kornai, János. [1989] 1990.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Shifting from a Socialist System: The Example of Hungary*. New York: W. W. Norton.
- Kornai, János.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nin, Vladimir Ilych. [1920] 1966. *Left - 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Perkins, Dwight Heald. 1988. "Reforming China's Economic Syste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6 (2): 601 - 645.
- Pomorski, Stanislaw. 1988. "Privatization of the Soviet Economy under Gorbachev I: Notes on the 1986 Law on Individual Enterprise." Berkeley - Duke Occasional Papers on the Soviet Economy in the USSR, no. 13, October.
- Schroeder, Gertrude E. 1987. "Anatomy of Gorbachev's Economic Reform." *Soviet Economy* 3 (3): 219 - 241. Shmelev, Nikolai. 1987. "Avansy i Dolgi" (Credits and Debts). *Novyi Mir* June, 6: 142 - 158. Tamás, Gáspár Miklós. "A Kornai - bomba" (The Kornai bomb). *Heti Világgazdaság* November 11, 11 (45): 66.

第三章

- Allison, G., and Yavlinsky, G., eds. 1991. "Window of Opportunity: Joint Program for Western Cooperation in the Soviet Transformation to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Economy." Mimeo. Cambridge: Joint Working Group of Harvard University, and Moscow: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search.
- Antal, László. 1979. "Development—with Some Digression. The Hungarian Economic Mechanism in the Seventies." *Acta Oeconomica* 23 (3 - 4): 257 - 273.
- Bauer, Tamás. 1983. "The Hungarian Alternative to Soviet - Type Planni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7 (3): 304 - 316.
- Berend, Iván T. 1990. *The Hungarian Economic Reform*. Cambridge: Cam-

-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anchard, Oliver, Dornbusch, Rudiger, Krugman, Paul, Layard, Richard, and Summers, Lawrence. 1991.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Fischer, Stanley, and Gelb, Alan. 1990. "Issues in Socialist Economy Reform." Working Paper WPS 565.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 Frydman, Roman, and Rapaczynski, Andrzej. 1990.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in Large Scale Privatizations." *Economic Research Repor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p. 90 - 420.
- Hare, Paul, Radice, Hugo K., and Swain, Nigel, eds. 1981. *Hungary: A Decade of Economic Reform*. London and Boston: Allen and Unwin.
- Kornai, János. 1983. "Comments on the Present State and Prospects of the Hungarian Economic Reform."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7 (3): 225 - 252.
- Kornai, János. 1986. "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Visions, Hopes and Re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4 (4): 1687 - 1737.
- Kornai, János. [1989] 1990a.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Shifting from a Socialist System; The Example of Hungary*. New York: W. W. Norton.
- Kornai, János. 1990b. *Put k svobodnoi ekonomike. Strastnoe slovo v zashitu ekonomicheskikh preobrazovani*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Moscow: Ekonomika.
- Kovács, János Mátyás. 1990. "Reform Economics: The Classification Gap." *Daedalus* 119 (1): 215 - 248.
- Lewandowski, Janusz, and Szomburg, Jan. 1989. "Property Reform as a Basis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form." *Communist Economies* 1 (3): 257 - 268.
- Lipton, David, and Sachs, Jeffrey. 1990a. "Creating a Market Economy in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75 - 133. Lipton, David, and Sachs, Jeffrey. 1990b. "Priv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 293 - 333. Révész, Gábor. 1990. *Perestroika in Eastern Europe: Hungary'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1945 - 1988*. Boulder: Westview Press. Szamuely, László. 1982. "The First Wave of the Mechanism Debate in

Hungary (1954 - 1957).” *Acta Oeconomica* 29 (1 - 2): 1 - 24. Szamuelly, László. 1984. “The Second Wave of the Economic Mechanism Debate and the 1968 Reform in Hungary.” *Acta Oeconomica* 33 (1 - 2): 43 - 67.

Working Group formed by a joint decision of Mikhail S. Gorbachev and Boris N. Yeltsin. 1990 (August). “Transition to the Market. Part 1. The Concept and Program” (The Shatalin Plan). Mimeo. Moscow: Avkhanagels’ koe; Cultural Initiative Foundation.

第四章

Alchian, Armen A. 1950.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8 (93): 211 - 221. Alchian, Armen A. 1974. “Foreword.” In *Th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 edited by E. G. Furubotn and S. Pejovich. Cambridge, Mass.: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pp. xiii - xv.

Ehrlich, Éva. 1985. “The Size Structure of Manufacturing Establishments and Enterprise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9 (3): 267 - 295.

Fischer, Stanley, and Gelb, Alan. 1990. “Issues in Socialist Economy Reform.” Working Paper WPS 565.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Friedmann, Jacques. 1989. “Sur l’expérience de privatisation et sur les noyaux stables.” *Commentaire*, pp. 11 - 18.

Frydman, Roman, and Rapaczynski, Andrzej. 1990.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in Large Scale Privatizations.” *Economic Research Repor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p. 90 - 420.

Hayek, Friedrich A. 1960.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and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Hayek, Friedrich A. 1973.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Hinds, Manuel. 1990. *Issues in the Introduction of Market Forces in Eastern European Socialist Countries*. Mimeo.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Kornai, János. [1989], 1990.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Shifting from a Socialist System: The Example of Hungary*. New York: W. W. Norton.

- Lewandowski, Janusz, and Szomburg, Jan. 1989. "Property Reform as a Basis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form." *Communist Economies* 1 (3): 257 - 268.
- Light, J. O., and White, William L. 1979. *The Financial System*. Homewood, Ill.: R. D. Irwin.
- Lipton, David, and Sachs, Jeffrey. 1990. "Priv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 293 - 333.
- Móra, Mária. 1991. "The (Pseudo) - Privatization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 *Acta Oeconomica* 43: 37 - 58.
- Murrell, Peter. 1990a. *The Nature of Socialist Economies: Lessons from Eastern European Foreign Trad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urrell, Peter. 1990b.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Reform of the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es*. Mimeo. College Park: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Schaffer, Mark E. 1990. *On the Use of Pension Funds in the Privatization of Polish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Mimeo.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 Schumpeter, Joseph A. [1911] 1968.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Business Cycl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mpeter, Joseph A. 1939.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gress*. New York: McGraw - Hill.
- Schumpeter, Joseph A. 1949. "Economic Theory and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In *Change and the Entrepreneur*. Cambridge, Mass: Research Center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p. 63 - 84. Reprinted in J. A. Schumpeter, *Essays*. New Brunswick and Oxford: R. V. Clemence, 1989, pp. 253 - 271.
- Stark, David. 1990. "Privatization in Hungary: From Plan to Market or From Plan to Cla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4 (3): 351 - 392.
- Szelényi, Iván. 1988. *Socialist Entrepreneurs: Embourgeoisement in Rural Hungar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Tinbergen, Jan. 1952. *O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 Amsterdam: North - Holland.
- Voszka, Éva. 1991. "Tulajdonreform vagy privatizáció?" (Reform of Ownership or Privatization?). *Közgazdasági Szemle* 38 (6): 117 - 133.

第五章

- Aberbach, Joel D. , Putnam, Robert D. , and Rockman, Bert A. 1981. *Bureaucrats and Politicia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ator, Francis M. 1958. "The Anatomy of Market Failur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2 (3) : 351 - 379.
- Baumol, William J. 1965. *Welfare Economics and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nton, Lauren A. 1990. *Invisible Factories: The Informal Econom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Spai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uchanan, James, and Tullock, Gordon. 1962.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Ékes, Ildikó. 1991. "A második gazdaság az átmenet időszakában * és a piac fejlődése * " (The Second Economy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Mimeo. Budapest: Kö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
- Esti, Nóra. 1991. "A magyarországi kisvállalkozások helyzetének és lehetőségeinek * alakulása 1991 - ben" (The Trend in the Situation and Outlook for Small Business in Hungary in 1991). Mimeo. Budapest: Gazdaságkutató Intézet.
- Ferge, Zsuzsa. 1991a. "The Social Safety Net in Hungary: A Brief Survey." In *Social Safety Nets in East/Central Europe*. Mimeo.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 Ferge, Zsuzsa. 1991b. "Marginalization, Poverty,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Labor and Society* 16 (3) : 417 - 438. FRATERNITÉ Rt. 1991. *Jelentés a társadalombiztosítás reformjáról* (Report on the Reform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Budapest.
- Gém, Erzsébet. 1991. "Hitelt - de honnan? A vállalkozásfinanszírozás rendszere Magyarországon" (Credit—But Where From? The System of Financing Entrepreneurship in Hungary). Mimeo. Budapest: KOPINT - DATORG.
- Hall, Peter A. 1986. *Governing the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 Britain and Fr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lpman, Elhanan. 1990.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in Trade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0. *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al Yearbook*. Washington, D. 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1. *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al Yearbook*. Washington, D. C.
- Jantscher, Milka Casanegra de, Silvani, Carlos, and Vehorn, Charles L. 1991. *Modernizing Tax Administration in Eastern Europe*. Washington, D. C.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Kessides, Christine, Davey, Kenneth, Holzman, Robert, Micklewright, John, Smith, Andrew, and Hinayon, Carlos. 1991. *Hungary: Reform of the Social Policy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 Kopits, George. 1991. *Fiscal Reform in Europea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Washington, D. C.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Kopits, George, Holzman, R. , Schieber, G. and Sidgwick, E. 1990. *Social Security Reform in Hungary*. Washington, D. C.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Köllo * , János. 1990. "Munkaerőpiac * : Mitől * legyünk pesszimizták" (Labor Market: Why One Should Be a Pessimist). In *Társadalmi riport 1990*, edited by Rudolf Andorka, Tamás Kolosi, and György Vukovich. Budapest: TÁRKI.
- Köllo, János. 1991. "A foglalkoztatáspolitikai igazi dilemmája" (The Real Dilemma of Employment Policy), *Figyelo* * 35 (August 22) : 3.
- Kornai, János. 1988. "Individual Freedom and Reform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2 (2-3) : 233 - 267.
- Kornai, János. [1989] 1990.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Shifting from a Socialist System: The Example of Hungary*. New York: W. W. Norton.
- Kornai, János.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ovács, Ilona. 1993. "Tényleg túl sokat fogyasztunk?" (Do We Really Consume Too Much?). *Közgazdasági Szemle* 40 (78) : 663 - 679.
- Lányi, Kamilla, ed. 1991. *A gyors változások területei a magyar gazdaságban* (The Areas of Rapid Changes in the Hungarian Economy). Budapest: KO-

PINT – DATORG.

Lányi, Kamilla, and Oblath, Gábor, eds. 1991. *A világgazdaság és a magyar gazdaság helyzete és kilátásai 1991 végén* (The Conditions and Prospects for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Hungarian Economy at the End of 1991). Budapest: KOPINT – DATORG.

László, Csaba. 1993. “Mekkora valójában az államháztartás szerepe az újraelosztásban” (How Big a Role Does the State Budget in Fact Play in the Redistribution?). *Közgazdasági Szemle* 40 (1): 63 – 79.

Lindbeck, Assar. 1988. “Consequences of the Advanced Welfare State.” *World Economy*, 11 (March): 19 – 37.

Manchin, Róbert, and Nagy, Lajos Géza. 1991a. *Ismeretek és vélemények az adóról* (Information and Opinions on Taxes). Budapest: Magyar Gallup Intézet. Manchin, Róbert, and Nagy, Lajos Géza. 1991b. *Vélemények gazdaságról, életszínvonalról, politikai intézményekről* * (Opinions on the Economy, Living

Standar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Budapest: Magyar Gallup Intézet.

Móra, Mária. 1990. “Az állami vállalatok (ál) privatizációja” (The (Pseudo –) privatization of State – Owned Firms). Mimeo. Budapest: Gazdaságkutató Intézet.

Móra, Mária. 1991. “The (Pseudo) – Privatization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 *Acta Oeconomica* 43: 37 – 58.

Murrell, Peter. 1990.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Reform of the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es.” Mimeo. College Park: University of Maryland.

National Bank of Hungary. 1991. *Quarterly Review*, No. 4, Budapest.

Niskanen, William A. 1971.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hicago: Aldine.

Offe, Claus. 1984.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1. *OECD Economic Surveys: Hungary 1991*. Paris.

Pénzügyminisztérium. 1991. “Az 1991. VII – VIII. havi és várható éves gazdasági folyamatokról” (On Actual and Expec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 the July - August Period and for the Whole Year). *Pénzügyi Szemle* 35 (11): 847 - 852.
- Sabel, Charles. 1982. *Work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umpeter, Joseph A. [1911] 1968.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mpeter, Joseph A. [1942] 1976.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Seleny, Anna. 199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ngarian Politics: 1949 - 1989." Mimeo. Cambridge, Mass.: MIT.
- Skocpol, Theda.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ited by P. B. Evans, D. Rueschemeyer, and T.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 37.
- Stiglitz, Joseph E., et al. 1989. *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State*. Oxford: Blackwell.
-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1990. *Human Services Research Report* 62 (May).

第六章

- Becker, Gary S. 1992. "Habits, Addictions, and Traditions." *Kyklos* 45 (3): 327 - 346.
- Becker, Gary S., and Stigler, George J. 1974. "Law Enforcement, Malfeasance, and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3: 1 - 18.
- Binmore, Ken. 1992. *Fun and Games. A Text on Game Theory*. Lexington: D. C. Heath and Company.
- Curry, Susan, Wagner, Edward H., and Grothaus, Louis H. 1990.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 for Smoking Cessati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8 (3): 310 - 316.
- Dervis, Kemal, and Condon, Timothy. 1994. "Hungary—Partial Successes and

- Remaining Challenges: The Emergence of a 'Gradualist' Success Story?" In *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edited by O. J. Blanchard, K. A. Froot, and J. D. Sach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23 - 152.
- Elster, Jon. 1979. *Ulysses and the Sirens. Studies in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udenberg, Drew, and Tirole, Jean. 1991. *Game Theo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Hess, Eckhard H. 1973. *Imprinting. Early Experience and the Developmental Psychobiology of Attachment*. New York: D. Van Nostrand Company.
- Hirschman, Albert O. 1977.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ornai, János, and Matits, Ágnes. 1987. *A vállalatok nyereségének bürokratikus újraelosztása (The Bureaucratic Redistribution of Firms' Profit)*.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 Kö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1993. *Magyar statisztikai év könyv 1992 (Hungarian Statistical Yearbook, 1992)*. Budapest.
- Mitchell, William D. 1969. *Essay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Law Merchant*. New York: Burt Franklin.
- Móra, Mária. 1992. "Változások a csodkezelésben * —nyolcvanas évektől * napjainkig" (Changes in the Way of Handling Bankruptcies—From the 1980s to Our Days). *Vezetéstudomány* (4): 18 - 23.
- Muraközy, László. 1993. "Az átmenet költségvetése Magyarországon, 1986 - 1992" (The State Budget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in Hungary, 1986 - 1992). Mimeo.
- Debrecen: Kossuth Lajos Tudományegyetem. Pénzügyminisztérium (Ministry of Finance). 1992. *Eloterjesztés * a Kormány részére a csodeljárásról *, a felszámolási eljárásról szóló törvény makrogazdasági hatásairól* (Report to the Government on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the Bankruptcy and Liquidation Act). Budapest, October. Pénzügyminisztérium (Ministry of Finance). 1994. *Tájékoztató az 1994. Évi gazdasági folyamatokról* (Repor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1994). No. 11 -
12. Budapest. Schelling, Thomas C. 1978. *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 Sluckin, W. 1973. *Imprinting and*

- Early Learning*.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Szalai, Tamás. 1993. "Konstruktív bizalom" (Constructive Confidence). *Heti Világgazdaság* 15 (February 20): 78 - 80.
- Swenson, Ingrid, and Dalton, Jo Ann. 1983. "Reasons for Smoking Cessation among a Random Sample of North Carolina Nurses." *Women and Health* 8 (Winter).
- Trakman, Leon E. 1983. *The Law Merchant: The Evolution of Commercial Law*. Littleton, Colorado: Fred B. Rothman and Company.
- Várhegyi, Éva, and Sándor, László. 1992. *A sorban állások kialakulásának okai és visszazortításuk lehetséges módjai* (The Causes Behind Queuing and the Possible Means to Eliminate It.) Mimeo. Budapest: Pénzügykutató Rt.

第七章

- Andorka, Rudolf. 1993. "Gazdaság és társadalom dogmák nélkül." (Dogma - free Economy and Society). *Népszabadság*, May 15, 51 (112): 17, 19.
- Bauer, Tamás. 1983. "The Hungarian Alternative to Soviet - Type Planni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7 (3): 304 - 316.
- Blanchard, Oliver, Dornbusch, R., Krugman, P., Layard, R., and Summers, L. 1991.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MIT Press.
- Calvo, Guillermo A., and Coricelli, Fabrizio. 1992. "Output Collapse in Eastern Europe: The Role of Credi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The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in Eastern Europe" organized by the World Bank and IMF, June 4 - 5.
- Commander, Simon, and Coricelli, Fabrizio. 1992. "Output Decline in Hungary and Poland in 1990/1991: Structural Change and Aggregate Shock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The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in Eastern Europe" organized by the World Bank and IMF, June 4 - 5.
- Domar, Evsey. 1989. "The Blind Men and the Elephant: An Essay on Isms." In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Serfdom*, edited by E. Do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9 - 46.
- Dornbusch, Rudiger, and Fischer, Stanley. 1993. "Moderate Inflation."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7 (1): 1 - 44.
- Erdos *, Tibor. 1992. "A gazdaság stabilizálásáról" (On the Question of Sta-

- bilizing the Economy). *Közgazdasági Szemle* 39 (11): 985 - 1000.
- Friedman, Milton. 1968.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 (1): 1 - 17.
- Gomulka, Stanislaw. 1991a. "The Puzzles of Fairly Fast Growth and Rapid Collapse Under Socialism," Socialist Economies Reform Unit, Country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ld Bank, *Research Paper Series*, no. 18.
- Gomulka, Stanislaw. 1991b. "The Causes of Recession Following Stabilization."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33 (2). Hámor, Szilvia. 1993. "Toke * nélkül ma már nincs elorelépés * " (Today There Cannot Be Any Progress without Capital). *Népszabadság* May 19, 51 (115): 17. Hansen, Alvin H. 1964. *Business Cycles and National Income*.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Király, Júlia. 1992. "Tartós tendencia vagy pillanatnyi robbanás?" (Is It a Lasting Tendency or a Temporal Explosion?). *Napi Gazdaság*, October 17, 2 (240): 4. Kolodko, Grzegorz W. 1992. "Stabilization, Recession and Growth in Postsocialist Economy." *Working Papers*, Institute of Finance, Warsaw, no. 29.
- Kornai, János. 1971. *Anti - Equilibrium*. Amsterdam: North - Holland.
- Kornai, János. [1989] 1990.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Shifting from a Socialist System: The Example of Hungary*. New York: W. W. Norton.
- Kornai, János. 1992a.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ornai, János. 1992b. "Visszaesés, veszteglés vagy fellendülés" (Recession, Stagnation or Recovery). *Magyar Hírlap*, December 24, 25 (302): 12 - 13.
- Laski, Kazimierz. 1990. "O niebezpieczeństwach związanych z planem stabilizacji gospodarki narodowej," *Gospodarka Narodowa* 1 (2 - 3): 5 - 9. Also published in German in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no. 5.
- Laffont, Jean - Jacques. 1985. "Fix - Price Models. A Survey of Recent Empirical Work." In *Frontiers of Economics*, edited by Kenneth J. Arrow and Seppo Honkapohja. Oxford and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pp. 328 - 367.
- Oblath, Gábor. 1994. "Economic Transition: Exchange Rate Policy, Real Exchange Rate Changes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 Restructuring in Eastern Europe*, edited by J. Gács and G. Wincler. Wien: II-SA.
- Phelps, Edmund. 1968. "Money - Wage Dynamics and Labor - Market Equilibriu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Part 2, July - August, 678 - 711.
- Rodrik, Dani. 1992. "Making Sense of the Soviet Trade Shock in Eastern Europe: A Framework and Some Estimat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The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in Eastern Europe" organized by the World Bank and IMF, June 4 - 5, 1992.
- Sargent, Thomas. 1982. "The Ends of Four Big Inflations." In *Inflation: Causes and Effects*, edited by Robert Hall. Chicago: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chumpeter, Joseph A. 193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mpeter, Joseph A. 1939.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McGraw - Hill.
- Scitovsky, Tibor. [1951] 1971. *Welfare and Competition*. Homewood, Ill.: Irwin.
- Scitovsky, Tibor. 1985. "Pricetakers' Plenty: A Neglected Benefit of Capitalism." *Kyklos* 38 (4): 517 - 536.
- Spiethoff, Arthur. 1902. "Vorbemerkungen zu einer Theorie der Überproduktion." *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 Tamás, Gáspár Miklós. 1990. "Weimar." *Beszélok* *, February 12, 1 (5): 5.
-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1992. *Economic Survey of Europe in 1991 - 1992*. New York.
- Valentinyi, Ákos. 1992. "Stabilizáció és növekedés Magyarországon: néhány elméleti megfontolás" (Stabilization and Growth in Hungary: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Közgazdasági Szemle* 39 (10): 908 - 923.

第八章

- Erasmus, Desiderius. [1516] 1968. *The Education of the Christian Prince*. New York: W. W. Norton.
- Hayek, Friedrich A., ed. 1935.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Illés, Iván, Mizsei, Kálmán, and Szegvári, Iván. 1991. "Válaszúton a

- Közép – európai gazdasági együttműködés” (Central –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at Crossroads). *Európa Fórum* 1 (2): 28 – 42.
- Kenen, Peter B. 1991. “Transitional Arrangements for Trade and Payments Among the CMEA Countries.” *IMF Staff Papers* 38 (2): 235 – 267.
- Kornai, János. [1989] 1990.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Shifting from a Socialist System; The Example of Hungary*. New York: W. W. Norton.
- Kornai, János.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ndbeck, Assar. 1990. “The Swedish Experienc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 Seminar Paper no. 482. Stockholm University.
- Marx, Karl and Engels, Frederick. [1848], 1970.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pp. 35 – 63.
- Mises, Ludwig Von. [1920] 1935. “Economic Calculations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In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edited by Friedrich A. Hayek.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p. 87 – 130.
- Murrell, Peter. 1992. “Evolutionary and Radical Approaches to Economic Reform.” *Economics of Planning* 25 (1): 79 – 95. Poznanski, Kazimierz. 1992. “Market Alternative to State Activism in Restoring the Capitalist Economy.” *Economics of Planning* 25 (1): 5 – 77.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1992. *Economic Survey of Europe in 1991 – 1992*. New York.

关键词索引^①

A

- Administrative expenditures, 114, 115 - 116, 132 (行政开支)
-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 72 (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 Agriculture, 39, 40, 81, 176, 179, 185, 196 (农业)
- Anticapitalist demagoguery, 44 (反资本主义煽动)
- Anticapitalist ideology, 218 (反资本主义理念)

B

Bank (银行)

- central, 67, 92, 136, 149 (中央银行)
- commercial, 92, 128, 183 (商业银行)
- privatization of, 93, 95 (银行私有化)
- regulation of, 115 (银行调控)
- supervision of, 94 (银行监管)

Bank sector, 93, 95, 142, 154, 185 (银行部门)

Bankruptcy (破产)

- wave of, 151, 154 (破产风波)

Bankruptcy acts, law (s), legislation, 127, 149, 151, 181 (破产行为, 法律, 法规)

Bankruptcy proceedings, 143, 144, 147, 181 (破产程序)

Big government, 113, 136 (大政府)

Budget, budgetary, state budget, 95, 110, 113, 115, 116, 122, 123,

① 本索引根据英文版索引制作而成, 所引页码为英文版页码。

- 126, 129, 136, 143, 146, 193, 194, 195 (预算, 预算的, 国家预算)
- Budget deficit, 8, 9, 60, 66, 114, 118, 136, 194, 204, 214, 215 (预算赤字)
- Budgetary redistribution, 108, 200, 219 (预算再分配)
- Bureaucracy, viii, 12, 13, 14, 15, 17, 26, 36, 42, 44 - 48, 50, 62, 98, 100, 110, 111, 115, 118, 151, 183, 217 (官僚)
- Business, 42, 43, 84, 90, 184 (商业)
- Buyers' market, 43, 168, 173, 174, 175 (买方市场)
- transition from sellers' market toward, 168 - 175 (从卖方市场转变到买方市场)
- C
- Capital market, 17, 102, 185, 190, 193 (资本市场)
-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capitalism, 21, 40, 58, 60, 62, 85, 87, 101, 109, 110, 111, 167, 168, 173, 182, 210, 220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
- Change of system, 36, 40, 55, 216 (体制变化)
- Charitable societies, charities, 99, 102 (慈善团体, 慈善机构)
- Churches, 99, 103, 128 (教会)
- Civil society, 112 (公民社会)
- Classical socialism, classical socialist system, vii, 1, 7, 8, 12, 16, 17, 25, 27 - 28, 35, 36, 59, 60, 120, 125, 126, 144, 168, 177, 179, 182, 189 (经典社会主义,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
- Comecon, 146, 166, 170, 195, 216, 222 (经济互助委员会)
- Comecon market, 119 (经济互助委员会市场)
- Communist party, , viii, ix, 1, 4, 8, 9, 10, 19, 21, 28, 36, 46, 59, 61, 109, 110, 115, 218, 219 (共产党)
- Compensation, 83, 84, 180, 213 (补偿)
- Constitutional state, 11, 110, 116, 151, 217 - 218 (宪政国家)
- Constructivist creature, 27 (建构主义者)
- Constructivist formation, 86 (建构主义的形成)
- Constructivist idea, 101 (建构主义理念)

- Consumption, 191 - 193 (消费)
- domestic, 176 (国内消费)
 - government, 186, 193 - 195 (政府消费)
 - private, 186, 187 (私人消费)
 - of the public, 224 (公众消费)
- Contract theory, 9, 22, 143, 149 (契约论)
- Convertibility, 58, 69, 70, 72 (兑换)
- Coordination (协调)
- bureaucratic, 45, 46, 48, 49, 50, 53, 54, 178, 179, 180, 210 (官僚协调)
 - market, viii, 45, 46, 48, 49, 50, 51, 53, 54, 55, 59, 178, 180 (市场协调)
-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19, 21, 35, 44 - 45, 45, 48, 49, 50, 51, 52, 54, 178, 214 (协调机制)
- Court, 116, 127, 144, 152, 155 (法庭)
- Creative destruction, 18, 24, 119, 122, 124 (创造性破坏)
- Credibility xiv, 70, 149 - 151, 201 (信誉) 234
- Credit, 27, 41, 42, 60, 68, 70, 71, 74, 88, 90, 94, 128, 149, 183, 184, 185, 189, 193 (信贷)
- consumer, 94 (消费信贷)
- Credit - card companies, 93 (信用卡公司)
- Credit guarantees, 90 (信用担保)
- Credit market, 5, 216 (信贷市场)
- Credit schemes, 90 (信贷计划)
- Credit system, 88, 146, 179, 180 (信贷体系)
- D
- Decentralization, decentralized, 5, 14, 17, 26, 29, 36, 39, 47, 48, 55, 59, 75, 76, 87, 95, 98, 99, 133, 135, 191 (权力下放, 分权)
- Demand, 120, 146, 168, 169,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81, 186, 191, 192, 193, 194, 200, 215 (需求)
- excess, 120, 132, 171, 173, 174, 175, 215, 216 (需求过剩)

- growth of, 173, 174 (需求增长)
- macro, 166, 168, 169, 186 - 197 (宏观需求)
- restriction of, 196 (需求限制)
- Demand - constrained economy, 169, 173, 175 (需求约束型经济)
- Demand constraint, 169, 175 (需求约束)
- Democracy, democratic, 29, 113, 159, 200, 218 - 221, 225 (民主, 民主的)
 - institutions of, 159, 218 - 221, 228 (民主制度)
 - parliamentary, ix, 4, 219 (民主议会)
- Democratic consensus, 64 - 66, 71, 73, 77 (民主共识)
-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vii, 95, 101, 166, 211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 Development, organic, 97, 98, 100 (发展, 有机发展)
- Dual economy, 212 (二元经济)

- E
- Economic policy priorities, 197 - 201 (经济政策优先事项)
- Efficiency, 7, 11, 17, 18, 20 - 21, 21, 28, 47, 53, 82, 89, 120, 132, 142, 146, 214 (效率)
 - enforcement of, 180 - 182 (效率执行)
 - versus equality, 29 (效率与公平)
 - versus security, 149 (效率与安全)
- Election, 4, 28, 58, 64, 83, 109, 150, 203 (选举)
- Embourgeoisement, 81, 85, 89, 104 (资产阶级化)
- Enterprise, entrepreneur, entrepreneurship, 17, 25, 40, 42, 44, 54, 64, 65, 71, 72, 73, 75, 81, 85, 88, 90, 102, 108, 124, 126, 136, 142, 152, 155, 156, 157, 167, 183, 184, 185, 212, 214, 215, 217 (企业, 企业家, 企业家精神) 另参见, 业务, 担保, 风险投资公司
- Entry, 9, 17 - 18, 24, 30, 45, 54, 64, 156, 167, 168, 169, 190 (准入)
- Equality, 28, 41, 84, 85, 102, 224 (公平)
- Ethics, ethical, 20, 28, 62, 92 (伦理, 道德)
- European Community, 147, 222 - 223 (欧盟)
 - joining, 136 (加盟欧盟)

- integration into, 224 (融入欧盟)
- Evolution, 62, 72, 75, 86 - 87, 89, 100, 158, 212 - 214 (进化)
- Excess demand, 120, 132, 171, 173, 174, 175, 215, 216 (超额需求)
- Excess supply, 120, 173, 174, 175, 216 (供应过剩)
- Exchange rate, 5, 68, 69, 72 (汇率)
- policy, 197 (汇率政策)
- Exit, 9, 14, 17 - 18, 54, 143, 156, 167, 168 (退出)
- Expectations, 70, 117, 144, 157, 158, 201 (期望值)
- Export, 69, 119, 125, 146, 166, 187, 195 - 197, 203 (出口)
- Externalities, 26, 108 (外部性)
- F
- Fairness, 84, 85 (平等)
- Financial discipline, 16, 141, 142, 146, 147, 149, 150, 151, 152, 153, 155, 156, 157, 158, 159, 180 - 182 (财务纪律)
-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90, 93 (金融中介机构)
- Financial sector, 75, 103, 128, 182 - 186, 190, 193, 204 (金融部门)
- Firms (公司)
- behavior of, 117, 153 - 158 (公司行为)
- loss - making, 16, 17, 67, 82, 88, 94, 115, 116 (公司亏损)
- Fiscal discipline, 60 (财政纪律)
- Fiscal policy, 169, 191, 203, 204, 216 (财政政策)
- Forced credit, 153 - 155 (强制信用)
- Foreign capital, 204, 213 (外资)
- Foreign debt, 7, 8, 215, 216, 225 (外债)
- Foreign governments, 90, 105 (外国政府)
- Foreign investors, 211 (外国投资者)
- Foreign loans, 216 (外资贷款)
- Foreign trade, 7, 68, 69, 124, 175, 195 - 197, 212, 216 (外贸)
- Formal private sector, viii, 4, 8, 39, 70, 125, 165 (正规私营部门)
- Foundations, 74, 99, 102 (基金会)
- Free economy, 57, 58, 63, 64, 65 (自由经济)

Free elections, 28, 57 - 58, 109, 219 (自由选举)

Free enterprise, 57, 63, 64, 65, 73 (自由企业)

Free trade, 47 (自由贸易)

Freedom, 40, 64, 219 (自由)

G

Government, governmental, 70, 105, 113, 114, 185, 186 (政府, 政府的)

commitment of, 149 - 151 (政府承诺)

credibility of, 149 - 151 (政府信誉) 235

conduct of, 145 - 153 (政府行为)

Government consumption, 186, 193 - 195 (政府消费)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113, 130, 131, 166, 189 (政府支出)

Governmental sphere, 109 - 113 (政府领域)

Growth, 7, 132, 135, 136, 167, 182, 186, 194, 196, 198, 199, 201,
220 (增长)

Guaranties, system of state, 180 (担保, 国家体系)

H

Health care, health service, 76, 130, 133, 225 (医疗保健, 医疗服务), 参见医疗保健, 医疗服务

Housing, 40, 180 (住房)

rents of, 129, 180 (租金)

Housing construction, 180, 185, 191, 193 (房屋建设)

Housing demand, 180 (住房需求)

I

Import, 69, 70, 187, 195 - 197, 198 (进口)

Import liberalization, 69, 169, 211, 215 (进口自由化)

Income, incomes, 14, 191, 200, 215 (收入)

Income differentiation, 192 (收入分化)

Income distribution, 22, 26 (收入分配)

equitable, 28 (收入分配均等)

- fair, 108 (收入分配公平)
- Industrialization, 132 (工业化)
- Industry, industrial, 119, 164, 165, 166, 176, 177, 181 (工业, 工业的)
- Inequality, 131, 225 (不平等)
- Inflation, inflationary, 7, 8, 17, 60, 67 - 68, 70, 110, 120, 131, 149, 169, 171, 184, 194, 197, 198, 199, 200, 201, 204, 215, 217, 115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
- open, 169, 215, 217 (公开型通货膨胀)
- repressed, 169, 215, 217 (抑制型通货膨胀)
- Inflation rate, 149, 169, 171, 184, 198, 199, 215, 217 (通货膨胀率)
- Inflationary expectation, 70, 201 (通胀预期)
- Inflationary pressure, 82, 84, 102, 136, 199 (通货膨胀压力)
- Informal private sector, viii, 4, 8, 70, 125, 127, 165 (非正式私营部门)
- Innovation, vii, 7, 17, 25, 89, 108, 119, 124 (创新)
- Insurance companies, 74, 95, 98, 134, 193 (保险公司)
- private, 75, 103 (私人保险公司)
- Integration, 222, 223, 224 (整合, 一体化)
- Interest, interest rate, 5, 68, 90, 118, 184, 191 (利息, 利率)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23, 227 (国际组织)
- Investment, 136, 166, 186 - 191, 193, 194, 196 (投资)
- private, 196 (私人投资)
- propensity to invest, 90, 137, 201, 202 (投资倾向)
- state, 60 (国家投资)
- Investment funds, 93, 185, 193 (投资基金)
- Invisible earnings, 126 (无形收入)
- Involuntary creditor, 118 (非自愿(强制)债权人)
- J
- Jobs, 76 (工作)
- loss of, 120, 147 (失去工作)

Joint - stock companies, 13, 14, 72, 74, 88, 91, 93, 94, 100, 101, 102
(股份制公司)

Judiciary 110, 203 (司法系统)

K

Keynesian policy, 172 - 173, 175, 189, 190, 194, 201, 203 (凯恩斯政策)

L

Labor, demand for, 122 (劳动力, 劳动力需求)

Labor exchanges, employment exchanges, 76, 122 (劳务交流, 职业介绍所)

Labor market, 120, 147, 129, 216 (劳动力市场)

Labor shortage, 120, 147, 168 - 169, 170, 216 (劳动力短缺)

Lange economy, 24 (兰格经济)

Lange Model, 2, 5, 6, 9, 12, 22, 23, 25, 37 (兰格模式)

Large systems of redistribution, 76 (大体系再分配)

Legislation, legislature, legislative, 110, 111, 151, 153, 203, 217 (立法, 立法机构, 立法)

enforcement, implementation of, 111, 152, 153, 180, 181, 204, 216 (执法, 实施)

Liberalism, 87 (自由主义)

Liberalization, 66 - 71, 132, 175 (自由化)

Liberty, 62, 64, 77 (自由)

Linkage, 48, 49, 51, 53, 54 (连接)

Liquidation legislation, 118 (清算立法)

Liquidation proceedings, 118, 143, 145, 147 (清算程序)

Local governments, 4, 99, 113 (地方政府)

Loss - making firms, assistance to, 115, 116 - 124 (亏损企业, 亏损企业援助)

M

- Macro disequilibria, 60, 215 - 217, 225 (宏观失衡)
- Macroequilibrium, macro - level equilibrium, macroeconomic equilibrium, 8, 108, 114, 168, 175, 201, 217 (宏观均衡, 宏观经济平衡)
- Macro stabilization, 66 - 71, 72, 136, 149 (宏观稳定)
- Management, 12, 17, 87, 88, 103 (管理)
- labor, 48, 49 (劳动力管理)
 - buy - out, 88, 90 (买断)
 - workers' / self - management, 50, 61, 92 (工人管理/自我管理)
- Manager, viii, 5, 7, 9, 10, 12, 14, 15, 18, 22, 45, 47, 74, 88, 90, 92, 97, 99, 147, 151, 157, 158, 181, 189, 190, 212, 216, 224 (经理)
- Market, role of, 12, 109 (市场, 市场作用) 236
- Market clearing prices, 5, 9, 30, 41 (市场出清价格)
- Market coordination, viii, 45, 46, 48, 49, 50, 51, 53, 54, 55, 59, 178, 180 (市场协调)
- Market economy, 110, 111, 117, 126, 137, 142, 146, 151, 153, 157, 169, 172, 180, 184, 193, 204, 210, 211, 212, 217, 219, 220, 224 (市场经济)
- Market institutions, 158, 178, 180 (市场制度)
- Market mechanism, ix, 44, 50, 108, 211, 212 (市场机制)
- Market socialism, xii, 1 - 34, 37, 49, 54, 55, 212 (市场社会主义)
- experiments in, viii, 9, 27 (市场社会主义实验)
- Marketization, 54, 210 - 211 (市场化)
- Market - socialist reforms, 3, 4, 7, 8 (市场社会主义改革)
- experiments in, 18, 26, 60 (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实验)
- Marxism, 20 (马克思主义)
- Medical care, medical service, 129, 131, 132, 133 (医疗保健, 医疗服务) 参见保健, 卫生服务
- Middle class, 75, 81, 213 (中产阶级)
- Monetary equilibrium, 168, 175 (货币均衡)
- Monetary overhang, 7, 17, 81, 171 (货币过剩)

Monetary policy, 118, 119, 120, 171, 185 (货币政策)

restrictive, 68, 215 (限制型货币政策)

Monopolies, 17, 26, 108, 204, 211 (垄断)

antimonopoly legislation, 68, 115, 217 (反垄断立法)

N

Naive reformer, 22, 29 (天真改革者)

National community, redefinition of, 221 - 224 (国家联盟, 重新定义国家联盟)

Natural selection, 9, 17 - 18, 24, 44, 119, 178, 183 (物竞天择)

O

Opposition forces, 226 (反对势力)

Orientation towards a "Western - style" social structure, 81, 82 (走向西方式社会结构)

Ownership, 91 - 92 (所有权)

employee, 103 - 104 (员工所有权)

foreign, 103 - 104 (外资所有权)

institutional, 92 - 100, 102 (机构所有权)

Ownership form, 48, 49, 52, 54, 55, 82, 91, 92, 93, 104 (所有制形式)

Ownership relations, 95 (所有制关系)

P

Parliament, x, 41, 60, 64, 72, 110, 151, 189, 202, 203, 218, 219 (议会)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ix, 4, 28, 31 (议会民主)

Party, parties (政党, 党派)

communist, viii, ix, 1, 4, 8, 9, 10, 19, 21, 28, 36, 46, 59, 61, 109, 110, 115, 218, 219 (共产党)

governing, 110, 111 (执政党)

opposition, 110 (在野党)

- Party state, 9, 11, 13, 14, 15, 28 (党国)
- Paternalism, 47 (家长式作风)
- Paternalistic state, 77 (家长式国家) 参见国家, 家长式管理的国家
- Pension, pensions, 76, 95, 96, 97, 129, 130, 131, 225 (退休金, 养老金)
- provision, 95, 96, 97 (退休金提供)
- Pension funds, institutions, 75, 95 - 98, 103, 134, 193 (养老基金, 养老机构)
- Pension system, scheme, 95, 96, 98, 131, 132, 133, 225 (养老保险制度, 养老方案)
-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4, 8, 36, 109 (政治自由化)
- Populist demagoguery, 159, 226 (民粹主义煽动)
- Populist movements, 112 (民粹运动)
- Postsocialist country, countries, region, 31, 92, 105, 107, 111, 123, 124, 141, 161, 193, 200, 212, 215, 217, 223 Press, 73, 111, 128, 151, 152, 205, 209 (后社会主义国家, 地区, 区域)
- Press, 73, 111, 128, 151, 152, 205, 209 (媒介)
- Price, relative, 7, 76, 146, 175, 177, 184 (价格, 相对价格)
- Price liberalization, freeing, 59, 68, 169, 175, 215 (价格自由化, 自由价格)
- Price subsidies, 60, 67, 129, 132, 146 (价格补贴)
- Principal and agent, 9, 13, 14, 18 (委托代理)
- Private business, 42 (私营商业)
- Private craftsmen and traders, 42 (私营工商业者)
- Private ownership, 14, 15, 48, 51, 52, 53, 54, 64, 84, 93, 100, 157 - 158, 177, 181, 202, 218, 219, 220 (私有制)
- Private property, ix, 21, 39, 54, 64, 73, 84 (私有财产)
- security of, 82 (保障私有财产)
- Private sector, 43, 156 (私营部门)
- credit extended to, 89 - 90, 128 (信用延伸到私营部门)
- development, growth of, 8, 54, 55, 59, 134, 204 (私营部门发展与增长)

evolution of, 38 - 44, 89, 212 - 214 (私营部门发展)

size of, 54, 55, 70, 71, 104, 105, 116, 124, 125 (私营部门规模)

taxation of, 124 - 129 (私营部门税收)

Private small - scale industry and trading, 90 (小规模私人工业和贸易)

Privatization, 7, 79, 80, 82, 85, 97, 122, 181, 211, 213, 216 (私有化)

almost gratis, 213 (几乎无偿的私有化)

based on free distribution, 101 (基于自由分配的私有化)

giving free shares or vouchers, 83 (提供免费股票或优惠券的私有化)

pace, speed of, 99, 102, 104 - 105, 214 (私有化的速度)

rapid, 72 (快速私有化)

small - scale, 74 (小规模私有化)

values considered in, 80 - 86 (私有化过程中价值观) 237

Property agency, 86 (产权代理机构)

Property form, 50, 64, 72, 179, 214 (产权形式)

Property relations, 4, 19, 21, 60, 64, 79, 84, 177, 184, 214 (产权关系)

Property rights, 9, 19, 13 - 16, 74, 75 (产权)

Public opinion, 73 (舆论/公众意见)

Public ownership, 54, 71 (公有制)

Q

Queuing, 154, 168 (排队)

R

Real income, 191, 200 (实际收入)

Recession, 105, 119, 147, 161 - 208, 216, 225 (衰退)

causes of, 185 (导致衰退的原因)

factors inducing, 166, 167 - 186 (引起衰退的因素)

economic, 147, 161 (经济衰退)

- transformational, 161, 168, 176, 178, 205 (转型衰退)
- Redistribution, x, 9, 18, 22, 108, 200, 219 (再分配)
- systems of, 76 (再分配制度)
- Redistributive action, 84 (再分配行动)
- Redistributive principles, 84 (再分配原则)
- Reform, reform socialism, reform socialist, vii, viii, ix, xii, 2, 3, 4, 7, 8, 13, 16, 18, 20, 21, 26, 35, 36, 37, 38, 44, 49, 50, 51, 53, 54, 55, 59 - 60, 63 - 64, 111, 125, 132, 134, 156, 161, 171, 176, 177, 179, 183, 189, 211, 212, 219 (改革, 改革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改革)
- Rents (租金) 参看住房
- Reprivatization, reprivatized, 39, 84 (再次私有化, 重新私有化的)
- Revolution, 21, 37, 63 - 64 (革命)
- S
- Savings, 40, 74, 88, 89, 97, 101, 191, 192, 193 (储蓄)
- Savings - and - Loan sector, 122 (储蓄和贷款机构)
- Securities, 83, 99, 100, 101, 103, 192 (证券)
- Self - governance, 50 (自我管理)
- Sellers' market, 43, 168, 173, 174, 175, 195 (卖家市场)
- from, toward a buyers' market, 168 - 175 (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 Service, 39, 41, 43, 46, 68, 94, 101, 119, 124, 129, 134, 175, 176, 177 (服务)
- Shares, 15, 18, 72, 74, 83, 86, 88, 91, 93, 95,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股份)
- Shareholders, shareholding, share ownership, 13, 14 - 15, 88, 93, 94, 100 - 103 (股东, 持股, 股份所有制)
- Shock therapy, 58, 67, 161 (休克疗法)
- Shortage, 70, 174, 176, 215, 224 (短缺)
- Shortage economy, 7, 41, 118, 168, 169, 172, 215 (短缺经济)
- Shortage - cum - inflation syndrome, 7 (短缺加通货膨胀综合征)
- combination of shortage and inflation, 8 (短缺和通货膨胀综合体)

- Small business, 90 (小企业)
- Small privatization, 74 (小型私有化)
- Small commodity production, 42 (小商品生产)
- Small commodity producer, 42 (小商品生产商)
- Social security, 11, 132, 133, 149 (社会保障)
- authorities, 118 (社会保障机构)
 - contributions, 118, 126 (社会保障缴款)
 - insurance, 130, 135 (社会保障保险)
-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131 (社会保障计划)
- Social welfare policy, 66, 76 - 77 (社会福利政策)
- Socialism, vii, 1, 20, 21, 25, 29, 35, 36, 44, 50, 58, 59, 60, 76, 113, 137, 142, 176 (社会主义)
- Socialist system, vii, viii, ix, x, 1, 9, 19, 20, 30, 36, 38, 53, 59, 61, 62, 63, 70, 82, 83, 95, 110, 116, 119, 148, 179, 210, 213, 215, 218, 224, 227 (社会主义体制)
- Soft budget constraint, softness, softening of, 13 - 16, 18, 47, 116, 118, 119, 122, 142, 150, 157 (软预算约束, 软预算约束的软度, 预算约束软化)
- Stabilization, 58, 66 - 71, 215 (稳定)
- Standard of living, living standard, 65, 132, 224, 225 (生活标准, 生活水平)
- State (国家)
- paternalist/ic, 77, 132, 157, 224 (专制国家)
 - role of, 9 - 13, 25, 64, 77, 81, 86 - 87, 104, 114, 203 - 205, 225 (国家角色)
- State investments, 60, 120, 189 (国家投资)
- State monopoly, 26, 108, 211 (国家垄断)
- State ownership, viii, 4, 11, 14, 15, 19, 21, 31, 39, 48, 52, 53, 59, 74, 79, 82, 93, 94, 97, 102, 114, 122, 156, 177, 181, 189, 220 (国家所有制)
- State paternalism, 47 (国家家长作风)
- State property, state - owned property, 40, 89, 93, 99, 100, 102, 181

(国有财产, 国有资产)

State sector, state - owned sector, viii, 19, 31, 36, 39, 40, 43, 46, 47, 48, 49, 70, 104, 105, 119, 120, 125, 128, 156 - 158, 177, 212, 213, 219 (国家部门, 国有部门)

State subsidy, 27, 118, 123, 196 (国家补贴)

Stock exchange, 72, 100, 101 (证券交易所)

Stock market, 98 (股市)

Stocks, 70, 118, 172, 181, 187 (股票)

Subsidy, 5, 16, 27, 42, 47, 60, 67, 116, 117, 123, 142, 143, 175, 180, 196 (补贴)

Supply, 46,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86, 215 (供给, 供应)

excess, 120, 173, 174, 175, 216 (供应过剩)

macro, 168, 169 (宏观供应)

Supply constraint, 169 (供应紧张)

Supply - constrained economy, 169, 173, 175 (供给约束型经济)

T

Tax authorities, 126, 128 (税务机关)

Tax collection, 60, 126, 136, 146 (税收征管)

Tax concessions, 74, 116, 142, 191 (税务优惠) 238

Tax evasion, 128, 218 (偷税漏税)

Tax reductions, 91 (减税)

Tax revenues, 123, 126, 129 (税收收入)

Tax system 42, 67, 179 (税务制度)

Third Road, Third System, ix, 6, 7, 55, 61 - 63, 81, 212 (第三条路, 第三体系)

Totalitarian power, 113 (极权主义的权力)

Trade unions, unions, 11, 37, 112 (贸易工会, 工会)

Transformation of property relations, 66, 71 - 75, 205, 214 (财产关系转变)

Transformational recession, 161 - 208 (转型衰退)

Transition, 4, 8, 55, 57, 58, 65, 72, 76, 79, 93, 96, 117, 129, 131, 133, 146, 156, 161, 165, 169, 174, 175, 180, 181, 186, 204, 209, 218, 220, 224 (转型, 过渡)

U

Undertakings, 73, 75, 124, 125, 129, 184, 214 (事业, 企业) 参阅请企业, 企业家, 创业

Unemployment, 16, 70, 76, 120 - 123, 127, 133, 137, 147, 148, 149, 158, 168, 174, 181, 192, 197, 198, 199, 200, 201, 203, 204, 216, 217, 225 (失业)

Unemployment benefits, 76, 115, 116, 123, 128, 133, 158, 147 (失业救济金)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129 (失业补偿)

Unemployment rate, 148, 149, 168 (失业率)

V

Values, 21, 53, 77, 80 - 86, (价值, 价格)

Ventures, 42, 43, 44, 129, 184, 192 (创业) 参阅企业, 企业家, 企业家精神

Venture capital, 75, 90, 93 (风险投资)

Voucher schemes for privatization, 101 (私有化券计划)

W

Wages, 191, 192, 215 (工资)

nominal wages, 60, 68, 197 (名义工资)

Wage discipline, 16, 68, 193 (工资纪律)

Walrasian thinking, 22 - 24 (瓦尔拉斯思想)

Welfare expenditures, spending, 115, 129 - 135 (福利支出, 福利开支)

Welfare policy, 76 - 78, 132 (福利政策)

Welfare services, 131, 133, 135, 148, 149 (福利服务)

Welfare state, 108, 131, 225 (福利国家)

Western social structure, 82 (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

人名索引

说明:

书中人名的翻译参考《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新华通讯社译名室主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2007年,第2版,修订版)。另外一些名字的翻译参考网络搜索。

人名按照英文字母顺序编排,且采用姓作为编辑顺序(这与各章节中以“名在前,姓在后”有所差别)。

A

- Aberbach, Joel D., 109 (阿维尔巴赫, 乔尔·D.)
Afanas' ev, Juri N., 36 (阿法纳西耶夫, 朱里·N.)
Alchian, Armen A., 14, 87 (阿尔奇安, 阿门·A.)
Allison, G., 58 (艾利森, G.)
Andorka, Rudolf, 205 (翁多尔考, 鲁道夫)
Antal, László, 36, 45, 58 (安塔尔, 拉斯洛)
Arrow, Kenneth J., 16 (阿罗, 肯尼思·J.)

B

- Balcerowicz, Leszek, 66 (巴尔采罗维奇, 莱塞克)
Bardhan, Prahab, 1 (巴尔坦, 普拉阿巴)
Barone, Enrico, 2 (巴罗内, 亨利)
Bator, Francis M., 108 (巴托尔, 弗朗西斯·M.)
Bauer, Tamás, 179 (鲍尔, 陶马什)
Baumol, William J., 108 (鲍莫尔, 威廉·J.)
Becker, Gary S., 143, 152 (贝克尔, 加里·S.)

- Benton, Lauren A. , 127 (本顿, 劳伦·A.)
Berend, Iván T. , 58 (拜伦德, 伊万·T.)
Binmore, Ken, 144 (宾默尔, 肯)
Blanchard, Olivier, 66, 165 (布朗夏尔, 奥利维尔)
Bokros, Lajos, 55 (博克斯, 拉约什)
Brus, Włodzimierz, 1, 2 (布鲁斯, 沃齐米日)
Buchanan, James, 108 (布坎南, 詹姆斯)
Burkett, John P. , 36 (伯克特, 约翰·P.)

C

- Calvo, Guillermo A. , 178, 185 (卡尔沃, 吉列尔莫·A.)
Chikán, Attila, 172 (希坎, 阿蒂拉)
Churchill, Winston, 62 (邱吉尔, 温斯顿)
Commander, Simon, 166 (科曼德, 西蒙)
Condon, Timothy, 147 (康登, 蒂莫西)
Coricelli, Fabrizio, 166, 178, 185 (科里切利, 法布里齐奥)
Csillag, István, 55 (奇洛格, 伊什特万)
Curry, Susan, 157 (柯里, 苏珊)

D

- Dallago, Bruno, 40 (达拉戈, 布鲁诺)
Dalton, Jo Ann, 157 (多尔顿, 乔安)
Davey, Kenneth, 138 (戴维, 肯尼思)
Davis, Christopher M. , 40 (戴维斯, 克里斯托弗 M)
Demsetz, Harold, 14 (埃罗尔德, 德姆塞茨)
Dervis, Kemal, 147 (德尔维, 凯末尔)
Dewatripont, Michel, 18 (德物浦, 米歇尔)
Domar, Evsey, 168 (多马尔, 艾富希)
Dornbusch, Rudiger, 77, 198 (多恩布施, 鲁迪格)

E

- Ehrlich, Éva, 91 (埃利希, 伊娃)

- Ékes, Ildikó, 127 (伊克斯, 艾迪扣)
Elster, Jon, 150 (埃尔斯特, 乔恩)
Engels, Friedrich, 219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rasmus (Rotterdam), 226, 227 (伊拉斯谟)
Erdos, Tibor, 166, 205 (厄尔多斯, 蒂博尔)
Esti, Nóra, 124 (埃斯蒂, 诺拉)
Estrin, Saul, 1 (埃斯特林, 索尔)

F

- Ferge, Zsuzsa, 129 (费尔格, 茹饶)
Fischer, Stanley, 66, 79, 198 (费希尔, 斯坦利)
Fourier, Charles, 50 (傅立叶, 查理)
Friedman, Milton, 201 (弗里德曼, 米尔顿)
Friedmann, J., 88 (弗里德曼, J.)
Frydman, Roman, 75, 79 (弗吕德曼, 罗曼)
Fudenberg, Drew, 144 (弗登伯格, 德鲁)

G

- Gábor, István R., 40 (加博尔, 伊什特万 R.)
Gelb, Alan, 66, 79 (格尔布, 艾伦)
Gém, Erzsébet, 129 (盖姆, 伊丽莎白)
Gomulka, Stanislaw, 166 (哥穆尔卡, 斯坦尼斯瓦)
Gorbachev, Mikhail S., 6, 21 (戈尔巴乔夫, 米哈伊尔 S.)
Grossman, Gregory, 40 (格罗斯曼, 格雷戈里)
Grothaus, Louis C., 157 (格罗特豪斯, 路易斯 C.)

H

- Hall, Peter A., 109 (霍尔, 彼得)
Hámor, Szilvia, 200 (哈莫尔, 思琪尔威亚)
Hansen, Alvin H., 178 (汉森, 阿尔文)
Hart, Oliver, 9 (哈特, 奥利弗)
Hayek, Friedrich A., 3, 22, 23, 27, 29, 30, 212 (哈耶克, 弗里德里)

希)

- Heertje, Arnold, 25 (黑尔奇, 阿诺尔德) 240
Heilbroner, Robert, 2 (海尔布隆纳, 伯特)
Helpman, Elhanan, 108 (埃尔普曼, 埃尔赫南)
Hess, Eckhard H., 156 (赫斯, 埃克哈德)
Hewett, Ed. A., 36 (休伊特, 埃德 A.)
Hinayon, Carlos, 138 (希莱恩, 卡洛斯)
Hinds, Manuel, 79 (海因兹, 曼努埃尔)
Hirschman, Albert O., x, 151 (赫希曼, 艾伯特 O.)
Holmström, Bengt R., 9 (霍姆斯特罗姆, 本特 R.)
Holzman, Robert, 138 (霍尔茨曼, 罗伯特)
Hurwicz, Leonid, 2 (赫维茨, 利奥尼德)

I

- Illés, Iván, 222 (伊雷什, 伊万)

J

- Jantscher, Milka Casanegra de, 126 (简思尔, 米尔卡 凯斯南内格拉
德)
Jasay, Anthony de, 1 (雅赛, 安东尼 - 德)

K

- Kaase, Max, 202 (卡塞, 马克斯)
Kenen, Peter B., 222 (凯南, 彼得 B)
Kessides, Christine, 129, 130 (凯西斯, 克里斯蒂娜)
Keynes, John M., 175 (凯因斯, 约翰 M.)
Kidric, Boris, 2 (克德瑞克, 鲍里斯)
Király, Júlia, 192 (基拉伊, 朱莉娅)
Kólló, János, 120 (科伦, 亚诺什)
Kolodko, Grzegorz W., 6, 166 (科沃德科, 格热戈日 W.)
Kopits, George, 113, 129 (克匹茨, 乔治)
Kornai, János, ix, x, 1, 2, 6, 15, 19, 24, 26, 36, 54, 58, 66, 71,

79, 93, 103, 113, 114, 134, 143, 165, 168, 173, 175, 209, 210 (科尔奈, 雅诺什)

Kovács, Ilona, 114 (科瓦奇, 伊洛娜)

Kovács, János Mátyás, 58 (科瓦奇, 雅诺什 马加什)

Kowalik, J., 87 (科瓦利克, J.)

Krugman, Paul R., 77, 108 (克鲁格曼, 保罗 R.)

L

Laffont, Jean - Jacques, 173 (拉丰特, 让-雅克)

Lange, Oscar, 2, 3, 5, 6, 12, 23, 25, 37 (兰格, 奥斯卡)

Lányi, Kamilla, 118, 125 (拉尼, 卡米拉)

Laski, Kazimierz, 1, 165 (拉斯基, 卡齐米日)

László, Csaba, 114 (拉斯洛, 乔鲍)

Lavoie, Don, 1 (拉沃伊, 顿)

Layard, Richard, 77 (莱亚德, 理查德)

Le Grand, Julian, 15 (勒-格兰德, 朱利安)

Lengyel, László, 36 (伦吉尔, 拉斯洛)

Lenin, Vladimir Il' ich, 21, 42, 111 (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Lerner, Abba P., 2 (莱内尔, 阿瓦 P.)

Lewandowski, Janusz, 75, 79 (莱万多夫斯基, 雅努什)

Lieberman, Evsey G., 2 (利伯曼, 艾胡希 G.)

Light, J. O., 101 (莱特, J. O.)

Lindbeck, Assar, 108, 225 (林德贝, 克阿萨尔)

Lipton, David, 6, 66, 75, 79 (利普顿, 大卫)

Lorenz, Konrad, 156 (洛伦茨, 康拉德)

M

Malinvaud, Edmond, 2 (马兰沃, 埃德蒙)

Manchin, Róbert, 128 (曼钦, 罗伯特)

Mann, Thomas, 43 (曼, 托马斯)

Marx, Karl, 21, 23, 37, 219 (马克思, 卡尔)

Maskin, Eric, 18 (马斯金, 埃里克)

- Matits, Ágnes, 143 (马悌思, 艾格尼丝)
Matolcsy, György, 55 (毛托尔奇, 捷尔吉)
Micklewright, John, 138 (米克尔奈克, 约翰)
Mitchell, Brian R., 166 (米切尔, 布赖恩)
Mitchell, W., 153 (米切尔, W.)
Mises, Ludwig von, 14, 22, 27, 29, 30, 212 (米泽斯, 路德维格 冯)
Mizsei, Kálmán, 222 (米热伊, 卡尔曼)
Móra, Mária, 93, 117, 145 (莫劳, 玛利亚)
Murakózy, László, 113, 114, 115, 143 (莫拉克奇, 拉斯洛)
Murrell, Peter, 87, 119, 214 (默雷尔, 彼得)

N

- Nagy, Lajos Géza, 128 (纳吉, 拉约什 盖佐)
Nagy, Tamás, 45 (纳吉, 塔马斯)
Niskanen, William A., 108 (尼斯卡宁, 威廉 A.)
Nove, Alec, 1 (诺夫, 亚历克)
Nutter, Warren G., 14 (纳特, 瓦伦 G.)

O

- Oblath, Gábor, 125 (奥布拉特, 加博尔)
Offe, Claus, 197 (奥费, 克劳斯)
Ortuno - Ortin, Ignacio, 2 (奥图诺 - 奥尔坦, 伊格纳西奥)
Owen, Robert, 50 (欧文, 罗伯特)

P

- Perkins, Dwight Heald, 36 (佩尔金斯, 德怀特 希尔德)
Péter, György, 2 (彼得, 捷尔吉)
Phelps, Edmund, 201 (费尔普斯, 埃德蒙)
Piskolti, Sándor, 152 (匹圣柯尔迪, 沙多尔)
Pomorski, Stanislaw, 40 (波莫尔斯基, 斯坦尼斯瓦)
Poznanski, Kazimierz, 214 (波兹南斯基, 卡齐米日)
Proudhon, Pierre J., 50 (皮埃尔, 蒲鲁东 J.)

Putnam, Robert D. , 109 (帕特南, 罗伯特)

Q

Qian, Yingyi, 18 (钱颖一)

R

Rapaczynski, Andrzej, 75, 79 (拉帕钦斯基, 安杰伊)

Rockman, Bert A. , 109 (罗克曼, 伯特 A.)

Rodrik, Dani, 195 (罗德里克, 达尼)

Roemer, John E. , 2 (勒默尔, 约翰 E.)

S

Sabel, Charles, 127 (萨贝尔, 查理)

Sachs, Jeffrey, 6, 58, 66, 75, 79 (萨克斯, 杰弗里)

Sándor, László, 154 (沙多尔, 拉斯洛)

Sargent, Thomas, 201 (萨金特, 托马斯)

Schaffer, Mark E. , 95 (沙费尔, 马克 E.)

Schelling, Thomas C. , 144 (谢林, 托马斯 C.)

Schieber, G. , 138 (希贝尔, G.)

Schroeder, Gertrude E. , 1, 36 (施罗德, 格特鲁德 E.)

Schumpeter, Joseph A. , 2, 17, 24, 25, 87, 88, 89, 119, 178 (熊彼特, 约瑟夫) 241

Scitovsky Tibor, 168 (思科通威斯, 蒂博尔)

Seleny, Anna, 127 (塞莱娜, 安娜)

Shatalin, Stanislav S. , 58 (沙塔林, 斯坦尼斯拉夫 S.)

Shmelev, Nikolai, 36 (什梅廖夫, 尼古拉)

Sidgwick, E. , 138 (西奇威克, E.)

Sik, Ota, 2 (希克, 奥塔)

Silvani, Carlos, 126 (西尔瓦尼, 卡洛斯)

Silvestre, Joaquim, 2 (西尔韦斯特雷, 若阿金)

Skocpol, Theda, 111 (辛可斯波尔, 西达)

Sluckin, W. , 156 (瑟金, W.)

- Smith, Andrew, 138 (史密斯, 安德鲁)
Spiethoff, Arthur, 178 (斯皮托夫, 阿瑟)
Stalin, Josef V. , 21, 59 (斯大林, 约瑟夫 V.)
Stark, David, 79 (斯塔尔克, 大卫)
Stigler, George J. , 152 (施蒂格勒, 乔治 J.)
Stiglitz, Joseph E. , 9, 108 (斯蒂格利茨, 约瑟夫)
Summers, Lawrence, 77 (萨默, 劳伦斯)
Sun, Yefang , 2 (孙冶方)
Swenson, Ingrid, 157 (斯温森, 英格丽德)
Szabó, Kálmán, 45 (绍博, 卡尔曼)
Szalai, Tamás, 144 (绍洛伊, 塔马斯)
Szamuely, László, 58 (萨姆利, 拉斯洛)
Szegevári, Iván, 81 (瑟佐哇喏, 伊万)
Szelényi, Iván, 81 (撒列尼, 伊万)
Szomburg, Jan, 75, 79 (思宗布格, 简)

T

- Tamás, Gáspár Miklós, 55, 200 (塔马斯, 加斯帕·米克洛什)
Taylor, Fred M. , 2 (泰勒, 弗雷德 A.)
Temkin, Gabriel, 1 (特姆金, 加布里埃尔)
Tinbergen, Jan, 79 (丁伯根, 简)
Tirole, Jean, 144 (梯若尔, 瓊)
Trakman, Leon E. , 153 (特拉可曼, 列昂 E.)
Tullock, Gordon, 108 (塔洛克, 戈登)

V

- Valentinyi, Ákos, 184 (瓦类廷伊, 阿克什)
Várhegyi, Éva, 154 (瓦荷格依, 伊娃)
Vehorn, Charles L. , 126 (维宏恩, 查尔斯 L.)
Vigh, Judit, 188 (维格, 尤迪特)
Voszka, Éva, 93 (沃斯卡, 伊娃)

W

Wagner, Edward H. , 157 (瓦格纳, 爱德华 H.)

Weber, Max, 111 (韦伯, 马克思)

White, William L. , 101 (怀特, 威廉 L.)

Y

Yavlinsky, G. , 58 (亚夫林斯基, G.)

X

Xu, Chenggang, 18 (许成刚)

《社会发展译丛》已出版书目


1. [美] 阿瑟·奥肯著，陈涛译：《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
2. [英] 威廉·阿瑟·刘易斯著，梁小民译：《增长与波动，1870—1913年》。
3. [法] 乔治·索雷尔著，吕文江译：《进步的幻象》。
4. [美] 丹尼尔·贝尔著，张国清译：《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5. [美] 伊万·撒列尼等著，史普原等译：《社会主义企业家：匈牙利乡村的资产阶级化》。
6. [挪威] 古德曼·赫内斯著，张晨曲译：《“热”话题——“冷”安慰：气候变化与态度变迁》。
7. [美] 戴慕珍著，李伟东译：《中国乡村起飞：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
8. [匈牙利] 雅诺什·科尔奈著，朱桂兰译：《康庄大道和羊肠小路：改革与后共产主义转型研究》。



译者简介

朱桂兰，香港城市大学政治人类学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硕士、国际经济学学士。曾任职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8—2009），现任职于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2014—）。

责任编辑：王 茵

封面设计： 大鵬設計
010-81574888



扫一扫
获得更多新书信息

ISBN 978-7-5161-6266-8



9 787516 162668 >

定价：55.00元